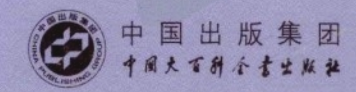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奥地利史

史蒂芬·贝莱尔 著　黄艳红 译

A Concise History of Austria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A Concise History of Austr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ww.cambridge.org


ISBN 978-7-5000-8231-6
定价：40.00元



奥地利史

史蒂芬·贝莱尔 著　黄艳红 译

A Concise History of Austria



图字:01－2009－5507

A Concise History of Austria[1](978－0－521－47886－1) by Steven Beller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地利史/贝莱尔著;黄艳红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000－8231－6
(世界历史文库)

Ⅰ.奥… Ⅱ.①贝…②黄… Ⅲ.奥地利－历史 Ⅳ.K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5269 号

责任编辑 郭银星 王亦妮
责任印制 张新民
装帧设计 海马书装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635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10 千字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0.00 元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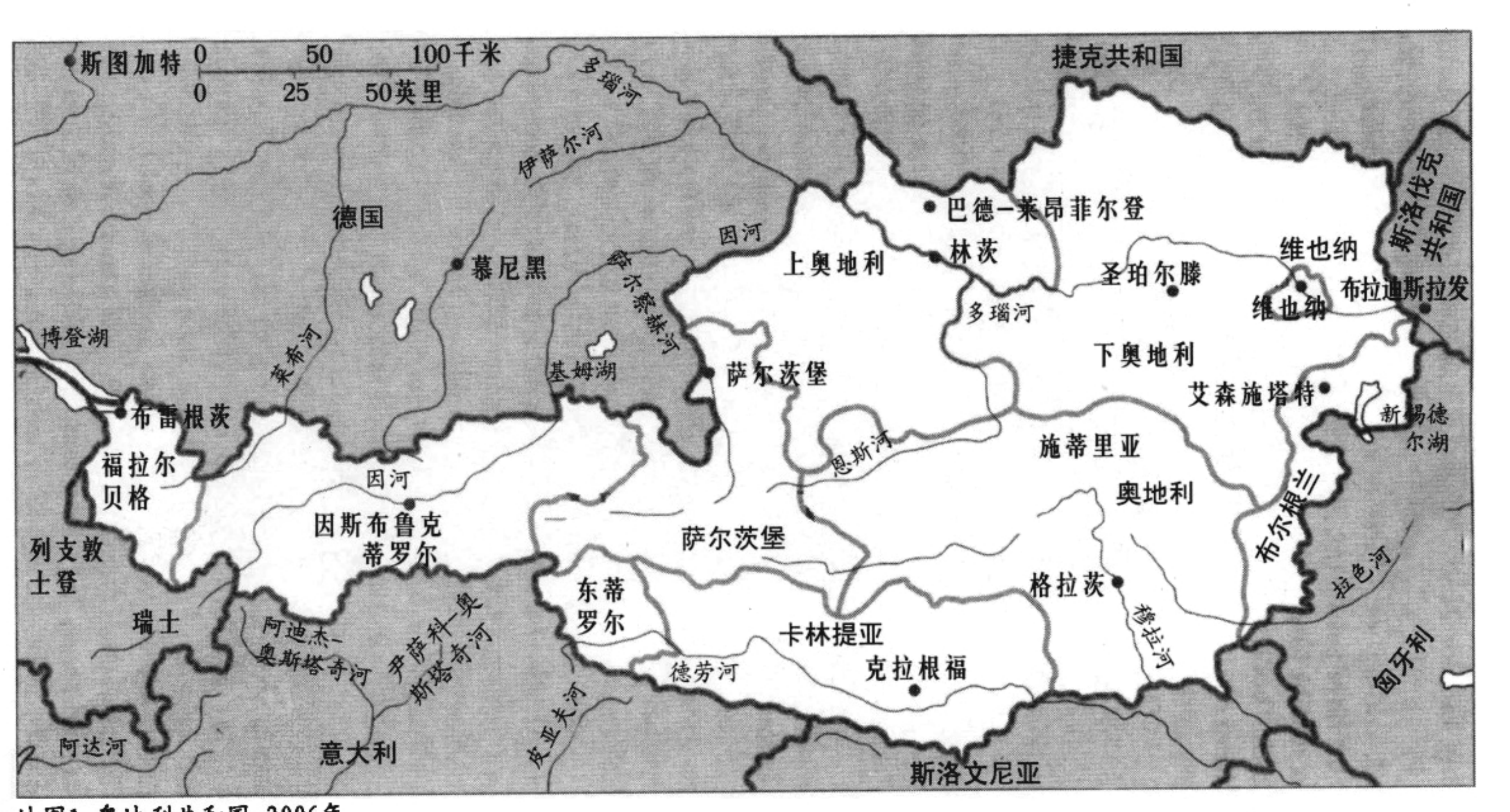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

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地图1 奥地利共和国，2006年

致 谢

很多年前，当比尔·戴维斯（Bill Davies）问我是否知道谁有兴趣写一本简明奥地利历史时，我很轻松地来了个毛遂自荐，虽然这个决定有点不够谦虚。创作这样一部书看起来颇具挑战性，但真正写起来可能相当简单，而且不会花太多时间。但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这种简明是多么耗费时间，一部奥地利的简明历史几乎缺乏连续性——对于这样一不大的国家来说也是这样。写作这本书甚至花了我更长的时间，但现在它终于完成了，我希望它既有助于为理解奥地利极具吸引力的历史提供基本的轮廓，又有助于认识到这一点：奥地利历史的广阔和复杂使得任何方便简明的阐述并不像乍看起来的那样容易（至少不像我当初认为的那样容易）。的确，奥地利历史之所以有魅力，部分原因正在于这种广阔性和复杂性，但我希望读者能在随后的阅读中自己去领会这一点。

在这个研究项目刚开始时，我有幸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一员，随后又担任维也纳中欧文化国际研究中心（IFK）的研究员，这些经历对我帮助甚大。我还要感谢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系给我讲授哈布斯堡君主制历史的课程。此外，我想感谢多丽丝（Doris）和安德鲁·布里默（Andrew Brimmer）的慷慨宽容，还有我美丽而宽厚的妻子伊斯特·戴安娜·布里默（Esther Diane Brimmer），她的支持是我得

以完成此书的主要原因。

我的朋友和同事——他们太多了，我恐怕不能在这篇简短的致谢中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在我写作这部著作时给了我帮助、鼓励和建议，尽管有时是因为他们的不同意见而收此效果。我感谢所有在奥地利、美国、英国和其他地方的朋友和同事。我还要特别感谢：国会图书馆的布鲁斯·马丁（Bruce Martin）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最有益的帮助；德雷克·比尔斯（Derek Beales）耐心地回答了我就书中的插图提出的无知问题；维也纳《标准报》（Der Standard）艾哈德·施塔克尔（Erhard Stackl）也对本书的几个问题提供了至为有益的协助；维也纳人文科学院的克劳斯·内伦（Klaus Nellen）一直是我善意的听众和协助者。还要感谢尤里安·索法尔（Julian Sofaer）慷慨允许我为此书复印两幅格哈特·弗兰克尔（Gerhart Frankl）的绘画作品，以及答应我将巴德—莱昂菲尔登（Bad Leonfelden）《地方志》（*Heimatbuch*）中的几幅照片在此付印的马格·弗兰茨·胡默尔（Mag. Franz Huemer）。另外，我还要向汉斯·海德尔（Hans Haider）、雷吉纳·胡贝尔（Regina Huber）、沃尔夫冈·雷山茨（Wolfgang Leschanz）、格哈德·米尔克拉姆（Gerhard Milchram）、雷纳特·派因（Renate Pein）、鲁道夫·希默坦（Rudolf Semotan）和威廉·瓦德尔（Wilhelm Wadl）致以最深切的谢意，感谢他们慷慨应允本书使用各种插图。

埃文·布凯（Evan Bukey）、阿兰·雅尼克（Allan Janik）、阿维尔·罗什瓦尔德（Aviel Roshwald）和大卫·索尔金（David Sorkin）十分友好地阅读了部分手稿，并就如何改进书稿提供了建议，对此我深表谢意。但他们对定稿中的任何错误不负担任何责任。

我同样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各位员工，首先是比尔·戴维斯，是他给了我写作本书的机会，并竭尽所能地关注此事。马里戈尔德·艾克兰（Marigold Acland）、克里斯·哈里森（Chris Harrison）和伊丽莎白·霍华德（Elizabeth Howard）对作者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在此也谨表谢忱。伊莎贝尔·丹布里古尔（Isabelle Dambricourt）、乔·布里兹（Jo Breeze）、卡罗尔·菲林汉姆·韦布（Carol Fellingham Webb）

及制作组对本书最终的出版付出了耐心和帮助。

最后，我要感谢几位尚未提到的人，他们多年来的友好招待和垂范为本书贡献了很多特别之处，他们是：乔治（George）和克里斯特尔·克莱尔（Christl Clare）；伊丽莎白·德·吉尔塞（Elisabeth de Gelsey）；维尔纳·埃希鲍尔（Werner Eichbauer）；克里斯特尔·法布里齐（Christl Fabrizii）；马塞尔·福斯特（Marcel Faust）；库尔特·鲁道夫·费舍尔（Kurt Rudolf Fischer）；玛莎·霍夫（Mascha Hoff）；英格堡·劳（Ingeborg Lau）；希尔德·施皮尔（Hilde Spiel）；尼克·瓦格纳（Nike Wagner）和海波克（Haiboeck）大家族的所有成员，无论他们是在巴德—莱昂菲尔登、马赛、萨尔茨堡、林茨，还是在纽约。阿兰（Alan）和比亚·科尔干（Bea Corgan）、扬（Jan）和赫尔塔·帕尔默（Herta Palme）同样为本书做出了贡献，最然他们并不总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上面提到的很多人先后故去，我的父亲“老好人”米尔顿·贝莱尔（Milton Beller）也在此间去世。正因为他深爱着我母亲赫尔米·贝莱尔（Hermi Beller），一个奥地利人，才会有我，有这本书。因此唯有此书能献给我的父母，献给他们的孙子纳撒尼尔（Nathaniel），因为书中的故事也有他的一部分。

史蒂芬·贝莱尔

奥地利史

史蒂芬·贝莱尔

现代奥地利是个繁荣的中欧小国，但它有一段十分丰富和复杂的历史，这段历史远远超出它如今的国境线。今天的奥地利人与其历史的关系存在一些困扰，无论是哈布斯堡君主国那段多民族的历史，还是1938—1945年作为德国人的奥地利人在希特勒第三帝国时期的历史。史蒂芬·贝莱尔以引人入胜、全面深入的阐述追溯了奥地利非凡历程中的诸多变迁：从作为德意志军事边区到王朝世家的建立，从成为帝国皇室家族到建立中欧大帝国，从失败的阿尔卑斯共和国到德国的一个地区，再到成功的阿尔卑斯共和国，奥地利的特性和遗产及其多姿多彩的源泉构成了一幅多层次的画卷。这是一段充满反常与另类色彩的故事，是探讨欧洲历史的另一面的力作，它并非以更为清晰的民族叙述方式给出方便的答案，因而更切合于今天的世界。

史蒂芬·贝莱尔（Steven Beller）是位独立学者。他已出版数本有关奥地利历史的著作，如《维也纳和犹太人，1867—1938年：一部文化史》（*Vienna and the Jews, 1867—1938: a Cultural History, 1989*），《特奥多尔·赫茨尔》（*Theodore Herzl, 1991*）和《弗兰茨·约瑟夫》（*Francis Joseph, 1996*）。

导 论

奥地利人可以说是个没有历史的民族，奥地利历史则是一段没有民族的历史。一直到1945年以后，奥地利人才真正尝试构建一种同德国人分离的民族身份，他们取得了成功。不过，作为一个清晰可辨的历史概念，奥地利甚至远在民族—国家观念诞生之前就出现了。如今的奥地利只有800万人口，对这样一个小国来说，奥地利历史有着一番不幸的命运遭际。

然而，这段历史很难简单地称为“民族”历史，因为其中的很多内容涉及今日奥地利边境之外的地区和人民。直到1918年，奥地利还是个多民族的王朝帝国，或被称为哈布斯堡君主国家，在这个国家内部，阿尔卑斯山区世袭领地（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奥地利）上的日耳曼人只是其他“奥地利人”（如捷克人、鲁赛尼亚人，等等）中的一种族裔“民族”（ethnic nationality）。1918年以后，虽然“奥地利”继续以奥地利第一共和国存在，但很少有“奥地利人”把这个奥地利视为君主国家崩溃后的最佳替代品，大多数人情愿与德国合并（Anschluss）。这个愿望在1938—1945年得以实现，但结局是可怕的，纳粹德国将奥地利人纳入其战争和杀戮机器，使其成为对犹太大屠杀的同谋和全面溃败中的难友。

1945年以后崛起了一个新兴的、独立的奥地利。奥地利的领导者

们有意识地创建起一种新的认同感，这既要创立两次大战之间曾一度痛苦地缺失的团结，又要将“奥地利人”和1938—1945年间“德国人”的所作所为区分开来。1945年之后奥地利的重生是战后欧洲重建中诸多奇迹中的一个。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和平、对外采取的中立政策和全面的历史和解，这一切使得奥地利在20世纪后半期成为世界上最繁荣最安宁的国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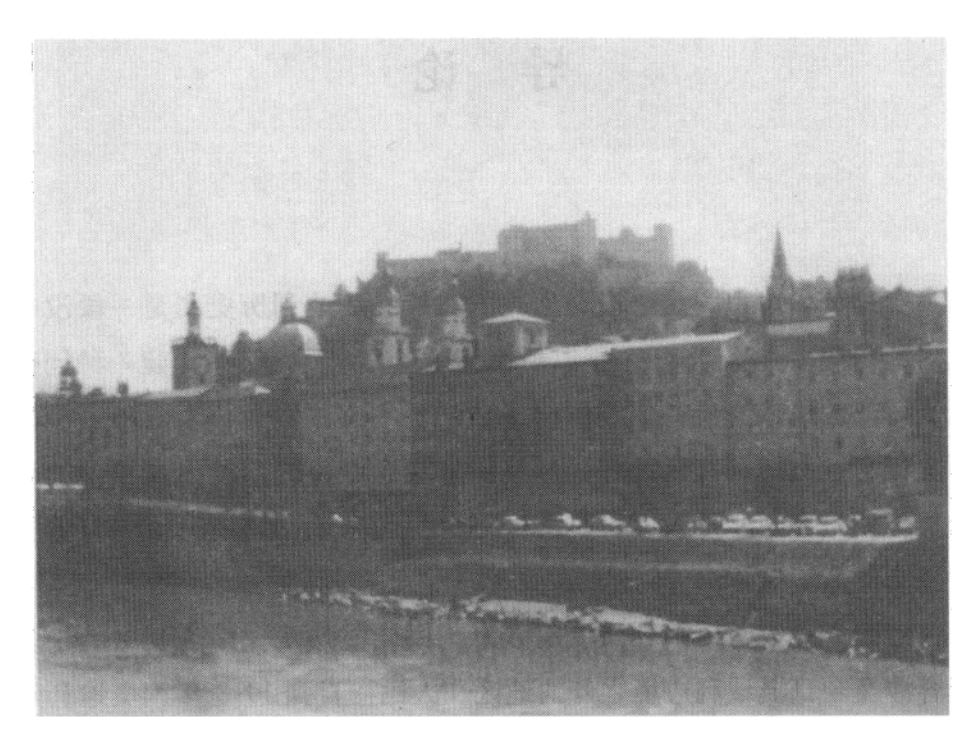


插图1　萨尔茨堡

从表面上看，即使是在今天，奥地利仍然堪称“至福岛”。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欧盟中最高的国家之一，奥地利的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转型，它利用居民高水平的技术教育，将经济的基础从工业转向了服务业。奥地利人享有的福利国家慷慨而周到，他们的犯罪率处于世界最低水平，尤其是在暴力犯罪方面。

这个国家地处欧洲中心，过去这是个很大的不利之处，如今则有着很大的潜在优势。由于夹在德国和意大利之间，奥地利在两次大战期间曾是两大强国争夺的猎物，但现在，作为欧盟内部市场的一部分，

这种地理位置使得奥地利具有了商业上的战略意义。在两次大战之间，奥地利被哈布斯堡君主国瓦解后新成立的国家包围着，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这种状况造成的是政治上的敌对和经济上的混乱。1945 年，共产党在这些邻国掌权，奥地利的很长一段边境成为了铁幕，于是这个国家处在了“西方”的边缘上。

随着苏东剧变和 2004 年欧盟的扩大，如今奥地利边境地带的经济蒸蒸日上，奥地利也赢得了巨大的经济机会。另外，欧盟的东扩终于使奥地利置身于奥地利人一直认为的独特位置上：“欧洲”的中心，而不是欧洲的东部边缘。人们或许可以认为，奥地利人应该觉得他们民族的重大变迁是件十分幸运的事。

然而，奥地利历史的重负，尤其是 1938—1945 年那个不是“奥地利”的奥地利发生的事件，仍然在提醒、纠缠、困扰着国民的自我理解。1986 年以后，瓦尔德海姆（Waldheim）事件引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陈年幽灵，并在国外舆论中造成震动。此后弗拉尼茨基（Vranitzky）政府的行动表明，奥地利人正试图严肃认真地对待“他们的”过去。但是，本来能被遏制的约尔格·海德尔（Jörg Haider）的崛起及其极右翼的自由党的上台（虽然是与温和的保守派结盟）则有着另一番意义。一件十分矛盾的事情是：以“无忧无虑”的天性而闻名、生活在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之一中的奥地利人，当他们被问及自己“民族”的过去时，仍是极度敏感，甚至有些忸怩和局促不安，并且怀有戒心。

奥地利历史造成的这种苦恼是有很充分的根据的。今天的奥地利和奥地利人和从前的奥地利与“奥地利”人之间有十分剧烈的断裂，这就是我们开篇处提到的核心矛盾所在。历史上的“奥地利”身份认同问题纠缠不清、错综复杂，这个难题的根源在于，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奥地利”无法让自己适应民族—国家构成的“现代”世界。这就给中欧留下了一笔麻烦的遗产，与此同时，这也使得“奥地利”成为 20 世纪众多精神、思想和文化潮流的中心，不管这些潮流的影响是好是坏。

4

当代的很多奥地利人希望接纳双重遗产：超民族的、哈布斯堡帝国

的奥地利，以及世界主义的“维也纳1900”。但这种抱负造成许多困难，其中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在实现这一抱负时不致落入那个罪孽深重的泥沼中，即不与1938—1945年的“插曲”发生瓜葛。援引别的“奥地利”历史来支持当代奥地利的民族认同，所有这类企图在道义上都是危险的。挑拣或选取“奥地利”历史的某些部分作为依据，这种做法是不可能的，为追求某种宜于操作的民族历史而被略去的章节已经以十分尖锐的方式产生了反作用。今天的奥地利人是否完全愿意同自己的过去——包括过去那段曾试图隐瞒的历史——和解，仍需拭目以待。

即便是看起来“有用”的历史片段实际上也并不总是与其表面意义相符。1991年9月19日，在豪斯拉比约赫（Hauslabjoch）附近阿尔卑斯山上的厄茨塔尔（Öztal）冰川上发现了一具尸体。一个救援队从因斯布鲁克（Innsbruck）赶了过来，人们以为这是个遇难的登山者，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这具尸体是一个几千年前被杀死的男子，事实上也是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完好的青铜时代的尸体。奥地利的公共舆论，特别是那些耸人听闻的小报，对此事的反应带有某种民族自豪感，因为“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人”是个奥地利人。当然，““冰人厄茨”（Ötzi）”早在奥地利这一观念诞生之前几千年就死去了，但称呼远古时代的人为“祖先”并非反常的做法，这就像英国人把巨石阵视为民族骄傲一样。但奥地利人对“冰人厄茨”的诉求接着便受到一次毁灭性的重创，因为当人们重访发现地点时，已注意到冰人实际上是在意大利境内被发现的，奥地利和意大利的边境线刚好横穿豪斯拉比约赫的中心。多次辩论过后，两个国家达成如下协议：奥地利人可以暂时将厄茨保存在因斯布鲁克，以供研究，但之后厄茨须交给意大利人永久保管。这个“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意大利人”（冰人看起来的确像是来自地中海一带）如今留在了意大利奥尔托·阿杰迪（Alto Adige）省的博尔扎诺（Bolzano）城，而这个省又称南蒂罗尔（South Tyrol）。

这样一来话就很长了。对大多数奥地利人而言，南蒂罗尔应该是奥地利的一部分。这个省的居民大部分讲德语，意大利对这个省的主权一直是有争议的，因为该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协约国交给意大

利的，为的是报答后者1915年的参战。虽然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已经平息，但边境两侧的蒂罗尔人仍把南蒂罗尔视为大蒂罗尔的一部分。一直到最近的时候，因斯布鲁克的一份主要报纸《蒂罗尔日报》的抬头处仍有一份这样的蒂罗尔地图：属于奥地利的两部分为深色（北方和东方），南蒂罗尔为浅色。大部分南蒂罗尔人对自治和意大利政府给予的其他特许权感到满意，但他们无疑仍自认为是蒂罗尔人。因而“冰人厄茨”既不是奥地利人也不是意大利人，而是蒂罗尔人。



TIROLER TAGESZEITUNG - 9

KALENDARIUM

Namenstag: Alice, Barnabas, Roselinde, Paula, Adelheid, Johannes Facundo, Jolenta.

插图2　蒂罗尔的身份认同(《蒂罗尔日报》)

“冰人厄茨”事件突出地反映了今日奥地利的一个惊人的现实状况：对这个800万人口的国家而言，它的地区多样性着实让人吃惊，9个省[①]都具有强烈的地区特色。这种情况部分原因在于国家坐落在山区，而且西部地区延伸得过长。最西端的福拉尔贝格（Vorarlberg）毗连康斯坦茨湖（Lake Constance），并因此跟莱茵河联系在一起，该省与德国和瑞士交通网的融合程度远高于同奥地利交通网的融合。从布雷根茨（Bregenz）乘火车到维也纳耗时比到巴黎还长。蒂罗尔主要位于阿尔卑斯山区，因而一度是作为旅游胜地的现代奥地利的中心。但它同样远离奥地利的主要的、“肥大”的组成部分，它的地方独立传统相当强固，这是它相对较晚地于14世纪并入哈布斯堡“奥地利”领地的部分原因。另一个省也对现代奥地利的文化特性及其旅游产业具有中心意义，这就是萨尔茨堡（Salzburg），但它直到1816年才完全并入哈布斯堡君主国家。当莫扎特（Mozart）1756年在这里出生时，他还不是“奥地利人”。

南方和东方各省或各州（Länder），即施蒂里亚（Styria）和卡林提亚（Carinthia），它们归属奥地利的传统更长些，施蒂里亚早在巴奔堡（Babenberg）时代就与奥地利的核心地带合并，卡林提亚1336年归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但是，阿尔卑斯山限制了它们同北方的联系，而河流又是向南流的，因此从历史上说，这两个省与它们的北方邻居有着不同的关切。它们的北方邻居是奥地利的核心部分，即横跨多瑙河的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维也纳原是下奥地利的首府，现在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省。最东边的布尔根兰（Burgenland）毗邻匈牙利和多瑙河平原（puszta），它的奥地利传统最为短暂，历史上它是匈牙利的一部分，直到1919年才归属奥地利。

从地理宽度上说，奥地利从莱茵河延伸到匈牙利平原，阿尔卑斯山横亘中间，再加上各省的历史多样性，这些都助长了地方身份认同

---

① 作者把今日奥地利的一级行政单位称为省（province），但有的著作和工具书中作“州”（state或Bundesland），这里按原文译作省。——译者注

和地方性忠诚，并使得任何简单明了的奥地利认同诉求变得十分勉强。这种地方性倾向目前已被部分地缓和，因为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国家的肥大部分，即多瑙河谷地和维也纳。上奥地利、下奥地利及维也纳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尽管如此，小省的地方认同，以及它们对阿尔卑斯传统的强调——全国一半以上的地区为森林或不毛之地——仍在很大程度上渗透在今日奥地利的身份特性中。实际上，这种身份特性的核心主题可被视为“多瑙河”奥地利和“阿尔卑斯”奥地利两种主旋律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二者大致与布鲁诺·克莱斯基（Bruno Kreisky）所称的“河谷民族”和“山地民族”相对应。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个国家的东西两部分之间存在分裂，或更简单地说，维也纳与其他地区存在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由来已久。

奥地利历史中最关键的问题浓缩在瓦尔德海姆事件的一个小插曲中。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在回答有关其战时表现的问题时陈述道：“我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无非是数十万其他奥地利人的作为，就是说，我只是在履行作为一个军人的义务。”

这种辩护看起来很合理，不过，一旦你问他是向什么人、为了什么而履行义务时，这种辩词就很奇特了。由于奥地利曾被纳粹德国“征服”，瓦尔德海姆并不是为奥地利，而是为第三帝国、为推定的外来篡夺者履行义务。按通常的理解，“义务”只能是向合法的权威履行的，而在现代民族国家只能是为自己的民族、说到底是向道德上更高的自我主体履行义务。如果第三帝国如大多数奥地利人认为的那样，并不是合法的权威，那么就不可能向它履行“义务”。因此，瓦尔德海姆的说法使人对奥地利是“第一个遭受入侵的国家”的说法产生了怀疑，并突出地反映了二战期间“奥地利人”在民族认同上的深刻矛盾。如果一个在二战期间为德国人作战的捷克政客说出这样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8

奥地利与纳粹的历史一直存在麻烦，瓦尔德海姆的陈辞被视为这种麻烦的一个片段，是一种将第三帝国视为合法权威的漫不经心的残

留意识，因为奥地利人曾自认为是德意志人、并认为德奥合并是合法的，虽然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个错误。这种看法可能有其合理之处，但我认为另一个解释更为贴切。

瓦尔德海姆所称的“义务”，其意义并非西欧意义上的义务，甚至也不是北欧的、康德传统的德国意义上的义务，它是一种中欧形式上的义务，与数个世纪的哈布斯堡君主制传统关系密切。这种意义上的“义务”（Pflicht）不考虑谁是命令者，是命令就应该服从，因为从本质上说，发出命令者必定是一个权威者，或者是“多重权威”，所以必须服从命令，但对权威的基础则不去质疑。这是臣民的“义务”，而不是公民的义务。

瓦尔德海姆关于二战期间的奥地利人的评论指出了奥地利历史中一种更为深远的遗产：为哈布斯堡王朝寻求合法性和权威之基础而历时几个世纪的艰难探索，目标是使其在统治自己的领地时不致有冲突矛盾之虞。1945 年以后，奥地利人有选择地运用自己的历史来构建某种历史认同，这种认同可以为奥地利民族国家带来某种合法性及权威性，不过这种做法并不新鲜。奥地利历史的中心主题曾是寻找“奥地利”的确切内涵，即寻找能为统治提供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某种本质、某种意义，否则这种统治就只是对一堆王朝领地的家族统治。

哈布斯堡家族最初是瑞士原初民主制的反对者，后来成为新教民族国家的反对者，接着又充当法国大革命时代自由的民族国家的反对者，最后终于被本国各族人民（及邻国人民）的民族主义冲垮。在整个这段历史中，“奥地利”一直在努力寻找自己的本质特性，以便使自己、使自己在他人面前取得合法性。它有时取得了成功，但绝非长久和全面的成功，而且总是缺少一点信心。奥地利历史是欧洲史中一个另类的个案，是主流的民族国家催生的政治协调统一观念的对立面。战后奥地利在历史问题上和身份认识上的尴尬是其漫长的历史传统的一个部分。

9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1439 年前的东部边区

一、公元一千年之前的奥地利

奥地利的历史发端于 10 世纪后期，当时它是巴伐利亚公爵领 (duchy of Bavaria) 的一个东部边区。正是在这个时期，位于多瑙河谷的一个地区被称为“东方地带”，拉丁语为“terra orientalis”，在当时该地的德语中为“ostarrichi”。在中世纪早期的书面文献中，“Österreich”[①] 的对应词最早出现在 996 年。在 11 世纪，这个边区有时也被称为“Osterlant”，而“Austria”一词的拉丁语形式于 1147 年首次出现在文献中。　10

虽然 1945 年之后的奥地利历史学家们竭力论证说，这个边区实际上从来没有被称为“Ostmark”[②]，但实际上它仍是巴伐利亚宗主权下的日耳曼王国的一个东部边区，即日耳曼人东南边境地带的一个军事管辖区，奥地利的历史就从这里开始。

正如“冰人厄茨”的发现所表明的那样，人类活动早在“奥地利”这一概念诞生的几千年前就已出现在这个地区。由于这里是山

① 即现代德语中的奥地利，意为“东方地带”。——译者注

② 即东部马克或东方边区。——译者注

地，早期的人类定居地很少。这个地区没有走在人类文明的前列，霍尔施塔特（Hallstatt）的铁器时代文化的出现相对较晚，大约在公元前800年。从那个时期直到公元前400年左右，这个地区中的主要群体是“伊利里亚人”（Illyrians），后来他们大部分被凯尔特人（Celts）赶走，后者主要是诺里奇（Norici）和陶里奇（Taurisci）部落。拉挨提人（Raetii）仍然控制着今日福拉尔贝格和蒂罗尔的山地要塞，但在东部地区，凯尔特人于公元前200年左右建立起诺里孔（Noricum）王国。公元前2世纪，诺里孔王国受到北方日耳曼部落日益强大的压迫，最终于公元前15年和平地并入罗马帝国。而拉挨提亚（Raetia）则被罗马强制占领，很多拉挨提人被迫流亡。

11

罗马的统治延续了500多年。此外，罗马人还征服了诺里孔东边肥沃的潘诺尼亚（Pannonia）省，并试图征服北边的日耳曼部落。公元9年，日耳曼的切鲁西（Cheruscii）部落在条陀堡（Teutoburg）森林让罗马军队遭受惨败，罗马人只得退守多瑙河，于是诺里孔变成了帝国的边缘地带，其边境最终成为界墙（Limes）——即横亘欧洲的罗马军事城墙——的一部分。已经存在的凯尔特人据点变成罗马的市镇（municipia），如伦提亚（Lentia，今林茨，Linz）、尤瓦武（Juvavum，今萨尔茨堡）、布里干提姆（Brigantium，今布雷根茨）和文多伯纳（Vindobona，今维也纳）。潘诺尼亚首府卡努图姆（Carnuntum）位于界墙的最东端，一度是个重要的罗马城市。葡萄的栽培已经被引入该地，联系广泛的道路体系建立起来，罗马文明繁盛一时。

在相对和平的公元1世纪，罗马对界墙以北的日耳曼部落，如纳里斯提人（Naristi）、马克曼尼人（Marcomannii）和克瓦迪人（Quadii），尚能行使控制权，但此后，日耳曼人入侵的威胁日渐加剧。172年，皇帝马可·奥里略（Marcus Aurelius）亲临该地，以驱逐马克曼尼人侵者，180年他在文多伯纳驾崩，这使维也纳第一次扬名。公元3世纪以后，阿勒曼尼人（Alemannii）成为主要威胁。罗马人的军事存在不断增长，但边防却日益松懈。到君士坦丁（Constantine）时期，罗马军队很多已是由日耳曼雇佣兵组成。公元4世纪后半叶，罗马人

准许一些躲避匈奴人（Huns）侵扰的日耳曼部落定居在界墙内侧，并把他们作为罗马防御体系的构成部分。

但是，东哥特人（Ostrogoths）、东日耳曼人和匈奴人的攻击接踵而至。面对匈奴人的威胁，罗马人于 433 年撤出潘诺尼亚，当阿提拉（Attila）于 453 年死去后，哥特人（Goths）占领了这个地区。而这时的诺里孔已被日耳曼的鲁基（Rugii）部落控制，488 年，诺里孔基督教化和罗马化的居民被勒令撤离。拉挨提已经落入阿勒曼尼人之手。493 年以后，阿尔卑斯山东部地区成为提奥多里克（Theodoric）的东哥特帝国的一部分，罗马时代结束了。

部落“移民”运动仍在继续，多瑙河谷地无疑是移民的首要通道。500 年左右，伦巴第人（Langobardii 或 Lombards）出现在这个地区的北部和东部。567 年，来自东方的阿瓦尔人（Avars）又将他们赶走。569 年，伦巴第人在意大利北部落足。但阿瓦尔人继续迁移，还有一些斯拉夫（Slavic）部落跟随他们。在北部和西部，另一个日耳曼部落，即法兰克人（Franks）的附庸巴尤瓦里人（Bajuvarii）也进入这个地区。于是阿瓦尔人、斯拉夫人与巴尤瓦里人（亦即巴伐利亚人 Bavarians）为争夺该地的控制权而发生对抗。

12

公元 7 世纪初，阿瓦尔人控制了从波罗的海沿岸到巴尔干的广阔地带。他们从欧亚大草原驰马进攻，横扫所有对手。拜占廷（Byzantium）曾利用他们对付匈奴人和斯拉夫人，这两大部落于 6 世纪初出现在巴尔干地区。阿瓦尔人征服斯拉夫人，后者变成了他们的附庸，于是阿瓦尔人可以重新分派征服来的土地，以照顾阿瓦尔主人们。600 年时，巴伐利亚人和斯拉夫人仍在争夺阿尔卑斯山以东的大片地区。626 年，阿瓦尔人同波斯人联合进攻君士坦丁堡。但这次行动失败后，阿瓦尔人的斯拉夫附庸反叛了。北方的斯拉夫人选择法兰克人萨摩（Samo）作为他们的王；阿尔卑斯山区的斯拉夫人，即卡兰塔尼人（Carantanii），选举巴伐利亚人奥迪罗（Odilo）为他们的伯爵。后来阿瓦尔人征服了北边的萨摩王国，但卡兰塔尼人（亦即卡林提亚人）的土地仍在巴伐利亚人的控制下。在这两个

地区之间是相对肥沃的多瑙河谷地及周边山丘地带，巴伐利亚人在这里并同斯拉夫人及其阿瓦尔主人作战，同斯拉夫人的定居运动做斗争。650 年前后，斯拉夫人的据点已延伸到普斯特塔尔（Pustertal）。此后，斯拉夫人的据点在巴伐利亚人的压迫下开始退缩，到780 年，恩斯河（Enns）成为巴伐利亚人和斯拉夫人的界河。

巴伐利亚人成为这个地区占据支配地位的力量。他们开始是东哥特人的附庸，后来一度为法兰克人效劳，但在公元 6 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和公元 7 世纪，他们可以自行其是，法兰克人的控制时断时续。他们向东方和南方扩展，在多瑙河谷地和阿尔卑斯山东部定居，并取得了对卡兰塔尼亚的宗主权。

13

公元 8 世纪时，加洛林王朝的法兰克国王们恢复了对巴伐利亚人的控制，791 年以后，查理曼（Charlemagne）率领法兰克人和巴伐利亚人反击阿瓦尔人。803 年，阿瓦尔人被赶回菲沙河（Fischa）和莱塔河（Leitha）一带，大片的移民地被开辟了出来。在这个地区建立起一个从多瑙河到亚得里亚海（Adriatic）的边区防御体系，这一举措显然是必要的：该地一直受到各种冲突的困扰，或是因为斯拉夫人的叛乱和保加尔人（Bulgar）的攻击，或是因为内部的竞争和“大摩拉维亚王国”（Great Moravian Kingdom）的干涉，后者是北方的一个斯拉夫强国。但最严重的是公元 9 世纪末期马扎尔人（Magyars）的袭击。

像阿瓦尔一样，马扎尔人的力量也来自骑兵。为了躲避更为强大的部落，他们离开欧亚大草原，862 年开始出现在这个地区。起初他们人数很少，并在法兰克人和摩拉维亚人（Moravians）的战争中充当雇佣兵，但是，896 年，大批马扎尔人来到后来所称的匈牙利平原上，“匈牙利风暴”进入最猛烈的阶段。一开始，以骑兵为基础的马扎尔部队远远优越于法兰克军队。马扎尔部队从位于多瑙河谷地的基地出发，肆无忌惮地洗劫周边地区。906 年，他们打败摩拉维亚人，907 年在普雷斯堡（Pressburg）摧毁巴伐利亚军队。加洛林各边区瓦解了。巴伐利亚人的边境退回到恩斯河，但马扎尔抢劫者甚至经常渡过恩斯河。在 50 年或更长的时间内，马扎尔人使这个地区笼罩在恐怖中。

955 年 8 月 10 日，国王奥托一世（Otto I）和日耳曼人在奥格斯堡（Augsburg）城外的莱希菲尔德（Lechfeld）击败马扎尔人和巴伐利亚叛乱者的联军。

莱希菲尔德战役对中欧历史有重大影响。962 年，奥托一世利用他新确立的权威和声望当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是“皇帝”世系中的第一个，这个世系一直维持到 1806 年，皇帝们的国体则以德意志为核心。[1] 在多瑙河谷地，莱希菲尔德战役之后，恩斯河东部的土地被慢慢收回，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很多马扎尔人到来之前的社会状态依然保留着。奥托一世在这里建立了另一个边区，976 年以后，边地伯爵卢特波尔德（Luitpold）成为其首领，他是巴奔堡家族的第一个统治者。巴伐利亚军队把这个新边区的边境沿多瑙河向东推进，1002 年，边境线抵达维也纳周围地区。与此同时，卡兰塔尼亚于 976 年成为独立的公爵领，那里建立的边区后来成为卡尼奥拉（Carniola）和施蒂里亚（Styria）。虽然 996 年首次出现的“ostarrichi”一说还不是奥地利历史的确切开端，但它的确发生在这个地区的历史转折点上。接二连三的部落入侵的“黑暗时代”终于结束，后来“奥地利”的地理中心已经确定下来。 14

这个中心地区已经拥有一份复杂的遗产。曾经在这里居住过的一波一波的人民，都留下了各自的烙印。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居民是巴伐利亚人，西部地区直到康斯坦茨湖一带是阿勒曼尼人和其他日耳曼部落占大多数。但是，当不同的部落席卷该地区时，原有的居民或者接受某种形式的臣服，或者迁往高山或森林深处。尽管有流放、撤离和屠杀，但这些行动并不彻底。在罗马时代，大部分凯尔特人已经“罗马化”，公元 4 世纪以后还逐渐基督教化。

罗马的统治在日耳曼人入侵之前就已经瓦解，但少量“罗马”人仍然留在当地，例如在萨尔茨堡周围。很多罗马地名保留了下来，如

---

① 奥托一世以后，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也是德意志国王，由它的大诸侯（即后来的选帝侯）选举产生；德意志国王也是“罗马人的国王”；当选的德意志国王只有在罗马接受教皇的涂油后才能正式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因此很多“皇帝”正式来说仅仅是国王。

萨尔茨堡的一个郊区戈洛迪格（Grödig，来自罗马名 Crethica）。萨尔茨堡在公元 8 世纪时仍以拉丁名尤瓦武著称。在德语中，原来的“罗马人”被称作 Walchen 或 Welsche（这个词与威尔士人 Welsh 在词源上是同根的），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居民团体中，继续保持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和语言，这种拉丁语方言后来被称作罗曼什语（Romansch）。公元 7 世纪和 8 世纪时，基督教再度传入这一地区，当时的传教团多由英国或爱尔兰的教士领导，如温弗里德（Winfrid，或 Bonifatius）和克伦巴努斯（Columbanus，或称 Kolumban），这些传教士发现当地已经存在很多“罗马”基督教社团。

在奥地利地区，罗马和基督教的影响从来没有完全消失。罗马的统治在 500 年左右瓦解，但 739 年，萨尔茨堡已经变成了一个主教区，798 年升格为大主教区。奥地利地区文化和语言上占主导地位的是日耳曼诸部落，尤其是巴伐利亚人，德语方言的采用和绝大多数罗曼什语居民区的消失就是明证，但日耳曼居民也采用了罗马人的习俗，如种植葡萄，还有城市中的罗马街道布局，以及田野上的罗马耕地规制。公元 7 世纪以后，巴伐利亚人也慢慢皈依基督教，随着拜占廷东正教在公元 9 世纪的竞争中受挫，奥地利地区再次在宗教上成为罗马世界的一部分。

阿瓦尔人的入侵和斯拉夫人在阿尔卑斯山东部大片地区的定居为这种已然复杂的混合局面平添了另一种。虽然日耳曼人最终胜出，但很多斯拉夫社区留存下来，虽然它们后来采用了战胜者的日耳曼语言。马扎尔人的插曲也对这里的局面造成了一些冲击。奥地利一带的居民远远不是来自一个纯粹的种族，和欧洲很多其他地区一样，这里也有很丰富的民族和文化交汇现象，尽管巴伐利亚因素占了支配地位。

二、巴奔堡时代，1000—1278 年

1000 年，匈牙利国王斯特凡（Stephen）皈依基督教。斯特凡在将马扎尔人改造成一个基督教国家以后，开始遏制巴伐利亚人向东边多瑙河平原的推进。诚然，1030 年，当斯特凡和马扎尔人在军事上大获

全胜时，日耳曼人的东进势头被遏止并部分地倒转方向，但日耳曼人和马扎尔人的冲突仍很激烈。然而，由于面对的是一个基督教对手，日耳曼人在东部边区的行动有了新的限制。多瑙河地区从一个备受权力剧烈变动之苦的地带变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区，这就使得权力集团能够发展并巩固下来。

巴奔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地利边区只是这类权力集团中的一个，而且明显不是最强大的一个。它的北部和东部是一些非日耳曼人的王国，如波希米亚、匈牙利和波兰，但它们的国王是基督徒。同这些王权实体比起来，区区一个奥地利边地伯爵就像个小配角，直到 1156 年，伯爵还臣服于巴伐利亚公爵。 16

即使与今天的奥地利比起来，最初的几位巴奔堡边地伯爵控制的领地也是十分狭小的。在西边，萨尔茨堡长期是巴伐利亚的一部分，并逐渐向教会领地发展，其管理者是当地大主教。在萨尔茨堡西边的蒂罗尔，小地主统治仍是通例，直到蒂罗尔伯爵（其名号来自他们位于米拉诺［Merano］附近的城堡）在 12 世纪控制该地时为止。今天的福拉尔贝格还是一块封建势力的百衲布。这里更加远离巴奔堡的权力基地，大部分居民是阿勒曼尼人。 17

在南方和西南方，卡林提亚和新的施蒂里亚边区（或称施泰尔马克，Steiermark）逐步发展为独立领地。卡林提亚于 975 年成为公爵领，其传统可以追溯到斯拉夫人和卡兰塔尼人的首领缔结联盟之时。一直到 15 世纪，该地的新公爵上任还需举行双重仪式，第一个仪式在卡恩堡（Karnburg）举行，卡林提亚人民的一位象征性代表让公爵安坐在“诸侯石”（Fürstenstein）上，这件物什是罗马石柱的遗迹；这个仪式过后，公爵再坐在措尔菲尔德（Zollfeld）的“公爵凳”（Herzogsstuhl）上向贵族封授采邑。这个仪式带有异教色彩，并意味着权威来自下层，因而在 1414 年被废弃。第二个仪式符合天主教教义，象征着权力是自上而下的，故一直延续到 17 世纪。不过，卡林提亚虽然有自身的延续性，但它是个不断衰微的力量。由于内部的封建混战，这个公爵领日渐虚弱，边区一个个脱离——其中包括卡尼奥拉、

弗留里（Friuli）、伊斯特里亚（Istria）和维罗纳（Verona），它的领地也大量缩减。



插图 3　卡林提亚的诸侯石（卡林提亚省档案馆）

施蒂里亚一开始有 3 个在莱希菲尔德战役后建立的卡林迪亚人边区。不久，卡林提亚最东边的 4 个伯爵领并入施蒂里亚，以便获得军事上的支持来对抗马扎尔人持续不断的威胁。施蒂里亚地区的居民最初大部分是斯拉夫人，后来特劳恩高尔（Traungauer）家族成为这里的统治者。这个家族的城堡在施泰尔（Steyr，施蒂里亚［Styria］的名称即源于此），又称奥塔卡尔（Otakar）家族，他们以通常的封建手段，即战争和联姻建立起权威。1180 年，奥塔卡尔四世获得公爵头

衔，从而摆脱了臣服于巴伐利亚的最后的痕迹。1186年，奥塔卡尔家族因无法推出继承人而被迫订立乔根堡（Georgenberg）条约，巴奔堡家族于1192年接管了施蒂里亚。

因此，巴奔堡家族自己的边区只是它在奥地利众多权力基地中的一个。但是，即使在自己边区的内部，巴奔堡家族的权威也远非是完整的。边区最好的土地很多控制在教会当局手中，尤其是萨尔茨堡大主教区和帕绍（Passau）主教区。在封建主义制度框架下，剩下的土地大部分被边区的贵族控制，巴奔堡家族真正可以凭靠的只有自己的庄园领地。在随后的岁月里，这个家族通过继承、购买和没收等手段大大增加了直接控制的产业，但别的贵族世家势力仍很强大。绥靖边区贵族的斗争是持续漫长的，这种斗争或通过协商，或采取武力形式。为了给这场斗争提供协助，巴奔堡家族引入了“协理人”（ministeriales），如库恩林格（Kuenringer）家族，这个家族虽然是契约奴仆，但负有广泛的行政和军事职责。不过协理人逐步演变成一种新的服役贵族，他们急于摆脱自己的卑下身份，并成为抵制公爵权威的另一种潜在势力。但与此同时，在保卫边区免受通常更为强大的邻人的攻击时，巴奔堡家族与自己的贵族存在某种相互依赖关系。

18

在中世纪的权力政治中，巴奔堡这样的家族需要大胆而高明的手腕来协调内部封臣之间的关系、维持并改善其外部地位。同样，它还需具有不断再生的运气和能力，以便比那些家族竞争对手延续得更长久。在几乎3个世纪的时间里，巴奔堡家族的表现十分出色。到13世纪，它已成为神圣罗马帝国东南部一个辽阔的长条地带的统治者，拥有公爵头衔，同时占有奥地利和施蒂里亚，并与帝国皇室霍亨施陶芬（Hohenstaufen）家族联姻。

这种成就是几代巴奔堡人靠精明的手腕取得的，当然其中也经历了很大的风险。王朝世家的成败经常系于偶然，最漂亮的计划会因为战场上的阵亡或疾患而告吹。面对如此众多的权力分层和涉足者，任何王公都得仰赖其盟友的成败及其通常不可预测的后果。

帝国的政策受皇帝和教皇之间斗争的左右，这场争斗开始于1075

年的授职权危机之时，接着转变成圭尔夫派和吉伯林派之间的战争（Guelph-Ghibelline Wars）。在这场斗争中，巴奔堡家族表现出了它的精明之处，它支持一方或另一方、或双方都支持，一切都要看具体情势。这个家族的两个统治者尤其精于在皇帝和教皇的冲突中见风使舵以增强自己的内部根基。在这两个人当中，父亲列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因为反对皇帝亨利四世（Henry IV）而一度被剥夺边区，儿子列奥波德三世（Leopold III）支持亨利四世的儿子亨利五世（Henry V）的反叛，因而最终赢得了教会和帝国的双重好感。凭借自己的效劳，列奥波德在1106年迎娶了皇帝的妹妹，此举大大提高了巴奔堡家族的声望。但此后他与帝国政治生活拉开距离，专注于绥靖奥地利贵族的事业。他对教会十分慷慨，新堡修道院（Klosterneuburg）和圣十字修道院（Heiligenkreuz）都是他创办的。他于1485年被封为圣徒，最后又被称为奥地利的主保圣徒。

19

与他同名的列奥波德六世（Leopold VI）在12—13世纪之交奉行相同的政策。在圭尔夫派和吉伯林派的冲突中，他坚定地支持自己的亲戚霍亨施陶芬家；不过他也是教会的大庇护人，建立了一些修道院并参加过多次十字军行动，既有在中东也有在西欧的行动（在西欧是攻打阿尔比派［Albigensians］和西班牙的穆斯林）。他的女儿嫁给了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Frederick II）的儿子亨利七世（Henry VII），1230年，他成功地调停了皇帝和教皇之间的冲突。在奥地利境内，列奥波德六世对贵族实施监控，他还从封君手中买下了几个城镇，其中包括威尔斯（Wels）、林茨（Linz）和弗莱施塔德（Freistadt），因为他认为这些城镇将来会成为财富和权力的基地；此外，他还大大拓展了维也纳的发展前途。在大力增强内部资源根基的同时，他也强化了对自己的公爵领的控制，作为皇帝政治上的同盟者，他的地位大为增强。

巴奔堡家族的另一些统治者则没有这么精明，但总的而言他们还是有所成就，虽然有时他们也会失败。1156年，绰号“神佑者”（Jsomirgott）的亨利二世（Henry II）获得公爵头衔，成为第一位奥地

利公爵，取得对巴伐利亚的独立地位，红胡子弗雷德里克（Frederick Barbarossa）还赐予他了“小特权状”（Privilegium minus），这个特许状是亨利二世的前任列奥波德四世（Leopold IV）在1139年获得的，当时只是对他臣服于巴伐利亚公爵领的一个安慰性奖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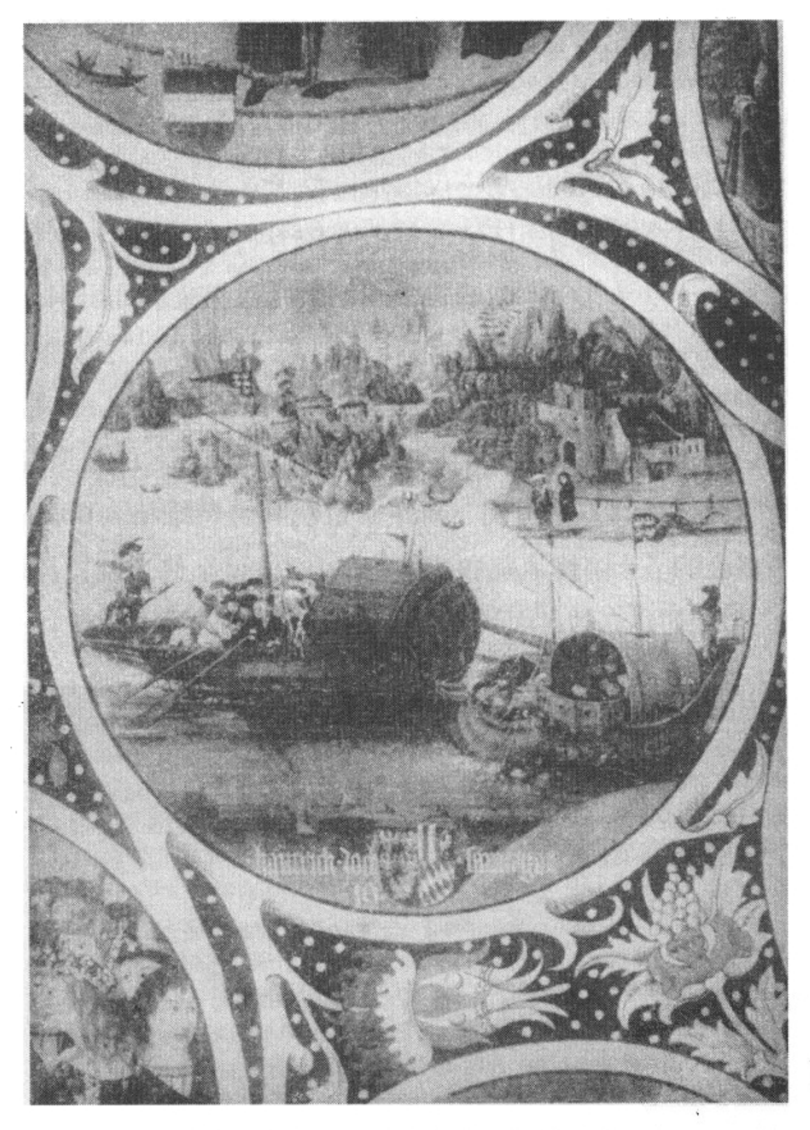


插图4　雅索密神亨利二世（奥地利国家图书馆）

亨利二世的继承人列奥波德五世（Leopold V）是个既精明又寡廉鲜耻的冒险家。他从巴伐利亚手里夺取土地，并与施蒂里亚签订了乔根堡条约。1192年，他在迪恩斯坦（Dürnstein）逮捕并囚禁英格兰国

王理查一世（Richard I），但这一囚禁十字军战士的行动导致他被革除教门；不过他甘愿冒这种精神上的风险，因为他利用英国人支付的赎金修建了维也纳到施蒂里亚的大道，为很多城市修建起城墙，并铸造了新的铸币。在第三次十字军远征期间，列奥波德和理查一世曾在围攻阿克（Acre）时发生争吵，此事就是臭名昭著的“囚禁事件”的起因，它突出地反映了封建王公在履行自己的义务时所遭遇的或曰必然会遭遇的风险。

21 不过，巴奔堡家族的成功不仅仅是得益于它高超的冒险行动和狡猾的家族政策。这个家族的边区领地是中欧较为肥沃，因而也是较为繁荣的地区之一。一旦马扎尔人的威胁缓和，土地就能被清理出来，并会出现真正的拓居地。这里人烟稀少，机会很多。在这个“蛮荒的东部地带”，贵族和宗教团体能从皇帝或边地伯爵那里获得授地。本笃会和西多会等修道团体成为重要的吸收器：奥地利很多最有名的修道院，如本笃会的梅尔克（Melk）修道院、新堡修道院和哥特维格（Göttweig）修道院，西多会的圣十字修道院和茨维特尔（Zwettl）修道院，都是11世纪末或12世纪初建立的，而且都是重要的拓居推进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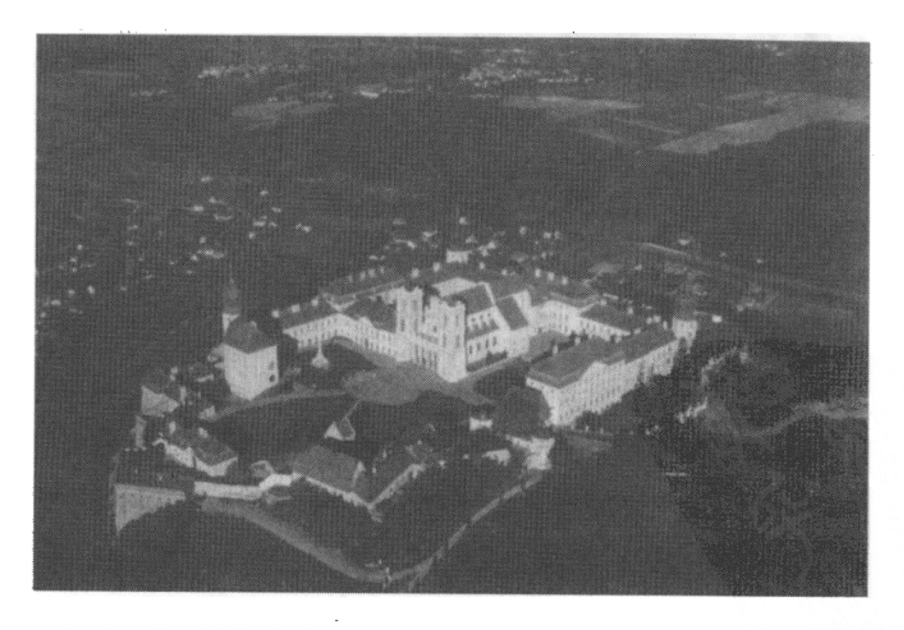


插图5 哥特维格修道院

被授地者从大部分已成为农奴的农民中征召到大量的劳力。对一个农奴来说，成为拓居者的吸引力在于较低的封建负担，以及耕种更多土地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巴伐利亚人愿意向东迁移到新地区的原因，他们后来占据了这个地区人口中的大多数，而最初是斯拉夫人占多数。

在较好的土地被占用后，较远和较贫瘠的地带便成为新的拓居地，但是这个过程为时很长。到 13 世纪时，林茨北边直到波希米亚都被大片森林覆盖，只有几条商道穿越其间，波希米亚和奥地利的边界还没有确定——这里是典型的童话故事中的森林。一直到 13 世纪中叶，地方贵族才开始建立居民点，这其中有瓦克森堡（Waxenberg）的领主维尔林（Wilhering）家族。磨坊区（Mühlviertel）北部的社区是很晚才形成聚落的，第一个教区莱昂菲尔登（Leonfelden）的设立是 1292 年的事。

22

由于大部分土地被开垦出来，再加上葡萄等经济价值高的作物被逐步推广以及铁制轮犁等新农业技术的采用，奥地利的经济变得更为复杂精细，城镇发展为重要的商业和行政中心。多瑙河已成为重要商道，维也纳是商道上最重要的商栈。从维也纳沿河西上可连接德国腹地，同时这里还是通往匈牙利、并由匈牙利通往拜占廷帝国的门户，这一地理位置使维也纳和奥地利具有某种东方导向。在巴奔堡家族最杰出的统治者中，有两个迎娶了拜占廷的公主，他们就是亨利二世和列奥波德六世。

巴奔堡家族的政策进一步增强了维也纳在商业上的战略优势。随着自身权力的扩张，这个家族的驻跸地沿多瑙河移动，1108 年它驻扎在新堡修道院，1150 年驻扎在维也纳。列奥波德五世用部分来路不正的财富来建设维也纳，包括修筑一条阔气的新城墙。1221 年，列奥波德五世授予维也纳商人以贸易特权，此举使该城在商业上获得了一项重大的有利条件。从此，维也纳商人掌握了多瑙河上德国和匈牙利双边贸易的垄断权。1192 年施蒂里亚并入奥地利后，维也纳同威尼斯的接触增加了，而且来自埃尔茨山（Erzberg）——欧洲最大的铁矿之

——的巨额收入也流入奥地利公爵的金库，这些都进一步增强了维也纳的商业地位。

由此带来的繁荣反映在城市面貌上，最显著的表现是对市中心的圣斯特凡（St Stephen）教堂的重建，这项铺张、奢华的工程开始于1230年。维也纳还成为早期德语文学重要开创性人物的落脚地。迪特马尔·冯·埃斯特（Dietmar von Aist）、瓦尔特·冯·德·福格尔维德（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奈德哈特·冯·罗扬塔尔（Neidhart von Reuental）和汤豪泽（Tannhauser）等吟游诗人在宫廷——或是列奥波德六世的宫廷，或是他儿子弗雷德里克二世（Frederick II）的宫廷中表演。也许最有意义的是，《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是在13世纪初的奥地利创作的。从其源头上说，尼伯龙根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多瑙河谷地，而不是发生在莱茵河地区。

23

巴奔堡家族的奥地利的好运没有一直延续下去。列奥波德六世于1230年死去，他的儿子弗雷德里克二世继位，但他缺少父亲的外交和政治手腕。他热衷于对抗的性格——他又被称为爱吵架者弗雷德里克——使得他对如何管理领地上的新势力准备不足，不管这些新势力是宗教机构、市政还是新的"协理人"贵族；至于协调同自己同邻人或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之间的关系，那就更不消说了。公爵弗雷德里克二世在位早年是个政治动荡的时期，其间发生了贵族叛乱，皇帝还一度褫夺公爵的头衔，直到皇帝因为意大利的局势而分心时，公爵才重新掌控了自己叛乱的领地。蒙古人入侵东欧（但没有入侵奥地利）、皇帝与教皇冲突的再起使得公爵弗雷德里克二世得以控制自己的领地，而且皇帝和教皇都争相向他献殷勤。



插图 6a　列奥波德六世



插图 6b 好斗者弗雷德里克二世

公爵终于能安下心来经营自己的领地。1238 年，他将自己的公爵领分为两个部分管理，即恩斯河以上奥地利（上奥地利）和恩斯河以下奥地利（下奥地利），并将施蒂里亚的特劳恩高（Traungau）（以及

施泰尔）划给上奥地利。他的另一个重大行政举措是于1244年颁发针对其领地上的犹太人的保护状，此举大大规范了犹太人的金融服务业。但不久命运开始逆转：1246年6月，公爵弗雷德里克二世在莱塔河上作战时被匈牙利人杀死。最关键的问题是，他没有男性继承人。作为公爵权威之基础的“小特权状”规定女性继承亦可，但即使是女性继承，形势也不明朗。由于没有确保男性继承，巴奔堡家族犯下了欧洲封建政治中的一个重大错误。在几十年的危机和战乱之后，奥地利的政治生活中才出现另一个王朝：在一番错综复杂的斗争过后，哈布斯堡家族最终掌握了局面。

三、哈布斯堡时代的开端，1278—1439年

1278年8月26日，德国国王、哈布斯堡家的鲁道夫（Rudolf）的军队在维也纳东北马尔什原野（Marchfeld）上的迪恩克鲁特（Dürnkrut）附近击溃波希米亚国王奥塔卡尔（Otakar）的部队。马尔什原野之战是奥地利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因为它使得哈布斯堡家族成为了奥地利的统治者。从此直到1918年，奥地利的历史便与这个王朝的政治历程密不可分。哈布斯堡家族将积极为帝国皇权披上神权色彩，到后来又提出普世统治的主张。在哈布斯堡的世界中，奥地利通常是个很小的要素，它拖曳在王朝的荣光后面，既经历过令人炫目的成功，也有过屈辱的失败。哈布斯堡时代的来临将改变奥地利历史的意义。 26

马尔什原野之战的原因在于1246年巴奔堡家族男系继承人的灭绝，以及随之而来的继承权争端所造成的危机和混乱。为了恢复秩序，一批奥地利贵族于1251年邀请波希米亚国王奥塔卡尔充当这里的统治者。于是奥塔卡尔跟巴奔堡家族的一个女继承人玛格丽特（Margarete） 27 结婚，制服了那些曾邀请他的贵族，在奥地利、施蒂里亚、卡林提亚、卡尼奥拉、弗留里甚至阿奎莱亚（Aquileia）建立起了有效的统治（在此过程中，他为了与匈牙利联姻而同玛格丽特离婚）。由于在北方拥有波希米亚的领地，奥塔卡尔看来要建立一个从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的大帝国了。但这仅仅是一种可能，因为当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

于1250年死去后，神圣罗马帝国陷入崩溃的混乱之中。为了挽救乱局，德国的诸侯们于1273年选举哈布斯堡家的鲁道夫为德意志国王——奥塔卡尔的竞选努力失败了。

鲁道夫推行一项恢复帝国1250年后丧失的权利的政策，这项政策尤其针对其主要对手奥塔卡尔。面对鲁道夫聚集起来的占压倒优势的兵力，奥塔卡尔于1276年屈服了，把自己占有的奥地利领地交给了鲁道夫。但是，当鲁道夫想把这些奥地利领地授予自己的家族时，他的很多支持者，包括奥地利境内的支持者，都离他而去。奥塔卡尔重新联络了很多同盟者，看来鲁道夫的形势不妙。于是奥塔卡尔想在马尔什原野试试运气。但结果鲁道夫赢了，现在他可以为自己的家族要求获得奥地利、施蒂里亚和卡尼奥拉了。1282年，他将这些领地分封给两个儿子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和鲁道夫（Rudolf），两个儿子又在1283年达成协议，阿尔布雷希特成为单独的继承人。1286年，卡林提亚被封给迈因哈德二世（Meinhard II），此人是格里茨伯爵家族的后裔，实际上也是蒂罗尔的领主，曾在反对奥塔卡尔的斗争中支持过鲁道夫，这次封授是对他的支持的报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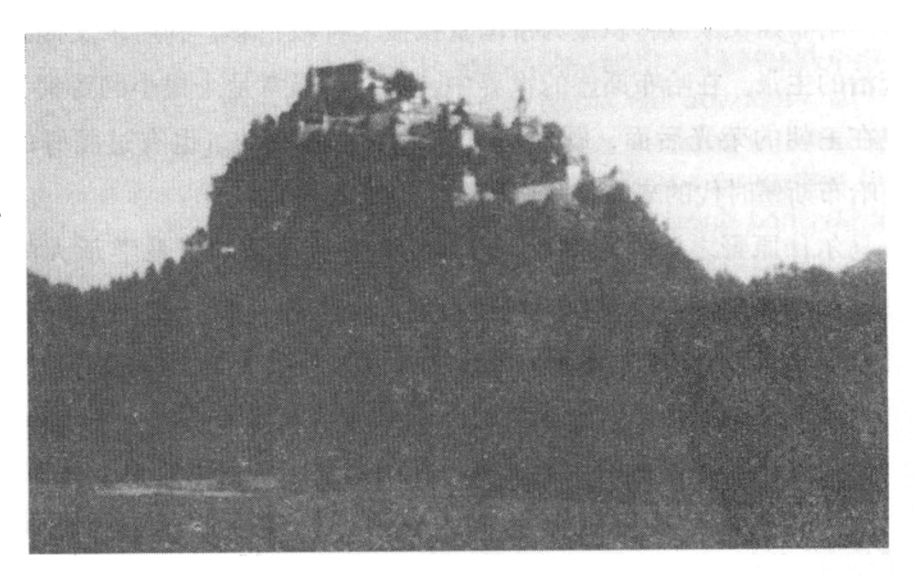


插图7　卡林提亚的霍赫斯特维茨城堡

对哈布斯堡家族来说，奥地利领地的获取是崛起的一个重大步骤。

这个家族还控制着上阿尔萨斯的森德高（Sundgau）和今瑞士北部的阿尔高（Aargau，哈布斯堡［Habsburg］就坐落在这里，这个词原形为Habichtsburg，意思是“鹰堡”），已经是南德施瓦本（Swabia）地区的重要领主。鲁道夫已经控制了通往圣戈达尔山口（St. Gotthard Pass）的多个通道，这个山口是中世纪欧洲最重要地缘政治要塞之一，而且已经在帝国政策中起着某种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过，在诸位选帝侯的眼中，他之所以能成为合适的（即易于操纵的）国王候选人，恰恰是因为他的地位相对虚弱。因此，他获得巴奔堡家族的领地大大提升了他的威望——以及实力。现在，由于获得了帝国皇权和王权，哈布斯堡倒有可能压制其他德国诸侯。

28

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几乎做到了这一点。当他父亲于1291年死去后，选帝侯们将他父亲的名号传给了他，1292年，他开始以武力手段确认自己当选为国王。他以当时法国的成功模式为榜样，利用自己在奥地利和施瓦本的基地，准备在帝国境内实现真正的皇权和王权。阿尔布雷希特的计划只是因为其在1308年被谋杀而告终，他死在自己被剥夺了产业的侄子手里，后来史书上称呼这个凶手为弑尊者约翰（Johann Parricida）。

选帝侯们对阿尔布雷希特在位期间出现的哈布斯堡统治前景甚为反感，他们选择另一个家族的成员、卢森堡（Luxemburg）家族的亨利七世（Henry VII）作为阿尔布雷希特的继承人。不过，卢森堡家族雄心勃勃的帝国政策给阿尔布雷希特的儿子弗雷德里克（Frederick）和列奥波德（Leopold）带来了积极的后果。亨利希望在罗马举行皇帝加冕礼，并希望为儿子赢得波希米亚的王冠，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与哈布斯堡家的两兄弟结盟，并使其停止叛乱，安享他们的奥地利领地。

亨利于1313年死去，哈布斯堡家族试图夺回皇帝的称号，但在选举问题上发生争端，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四世（Ludwig IV）比哈布斯堡家的弗雷德里克更有理由当选。巴伐利亚的维特斯巴赫（Wittelsbach）家族与哈布斯堡家族之间的冲突持续多年，直到1325年缔结慕尼黑条约时才得以部分解决，根据条约，路德维希和弗雷德里克作为

联合国王共同执政。这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一个失败，因为弗雷德里克仅仅是个名义上的国王，实际权力掌握在路德维希手中。当弗雷德里克于1330年死去时，他的两个弟弟阿尔布雷希特二世（Albrecht II）和奥托（Otto）都很愿意用哈布斯堡的帝国抱负去换取更多的局部利益。

由于被帝国问题的争端牵扯了精力，哈布斯堡在圣戈达尔山口以北的最初权力基地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哈布斯堡的野心导致了一个反对派的形成，这就是1291年成立的永久联盟（Everlasting League），这个联盟就是未来瑞士联邦的核心。瑞士人以警惕和愤怒的目光注视着哈布斯堡在该地区行使其封建权利的企图，更何况当时的瑞士社会并不遵从封建法则。1313年，瑞士人的军队洗劫了埃辛登（Einsiedeln）修道院，并于1315年在默加滕（Morgarten）大败列奥波德的军队。这是哈布斯堡和瑞士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瑞士联邦于1315年重组，并逐渐变成哈布斯堡势力的抗衡者，后来干脆成了接替者。到15世纪初，哈布斯堡家族实际上已被排除出自己的发祥地，1415年，这个家族被赶出哈布斯堡城堡。

弗雷德里克在位期间，哈布斯堡这个来源于阿勒曼尼语区的施瓦本家族开始称呼自己为“dominium Austriae”，即奥地利的统治者。弗雷德里克的继承者们集中经营以奥地利为中心的权力基地，因而忽视了他们在施瓦本以及帝国的利益。阿尔布雷希特二世和奥托同路德维希四世缔结一桩秘密交易：兄弟俩默许路德维希的统治，后者则纵容他们于1336年夺取卡林提亚和卡尼奥拉。从1339年起，作为哈布斯堡单独继承人的阿尔布雷希特二世回避帝国问题的争吵，全力巩固他对奥地利及在南方新获领地的控制，即便此时哈布斯堡在施瓦本的地位进一步弱化，卢采恩（Lucerne）和苏黎世（Zurich）双双加入瑞士，他也不去顾及。阿尔布雷希特二世在位期间，1348—1349年爆发了黑死病，接着又是一连串别的自然灾害，不过，他精心建立起来的强有力的财政和政治地位使他能有效地应付这些灾难，并制止了维也纳和其他地方对犹太人的攻击，一些迷信的群众认为犹太人对他们遭

受的不幸负有罪责。

阿尔布雷希特的继承人长子鲁道夫四世（Rudolf IV，1358—1365）继续父亲的政策，但他修复了哈布斯堡在施瓦本的地位，并对奥地利领地上的行政和税收体制进行了改革。他为自己在维也纳的公爵宅邸花了很多钱，并于1365年在维也纳创办了大学，还下令翻修圣斯特凡教堂的中殿，这些举措为他赢得了“建设者”的绰号。但是，这种大兴土木的热情部分原因来自哈布斯堡的相对虚弱，是对卢森堡家的波希米亚国王的举动的一种回应，后者于1348年设立布拉格大学，并重修了圣维塔（St. Vitus）大教堂，还于1348年成为了无可争辩的德国国王查理四世（Charles I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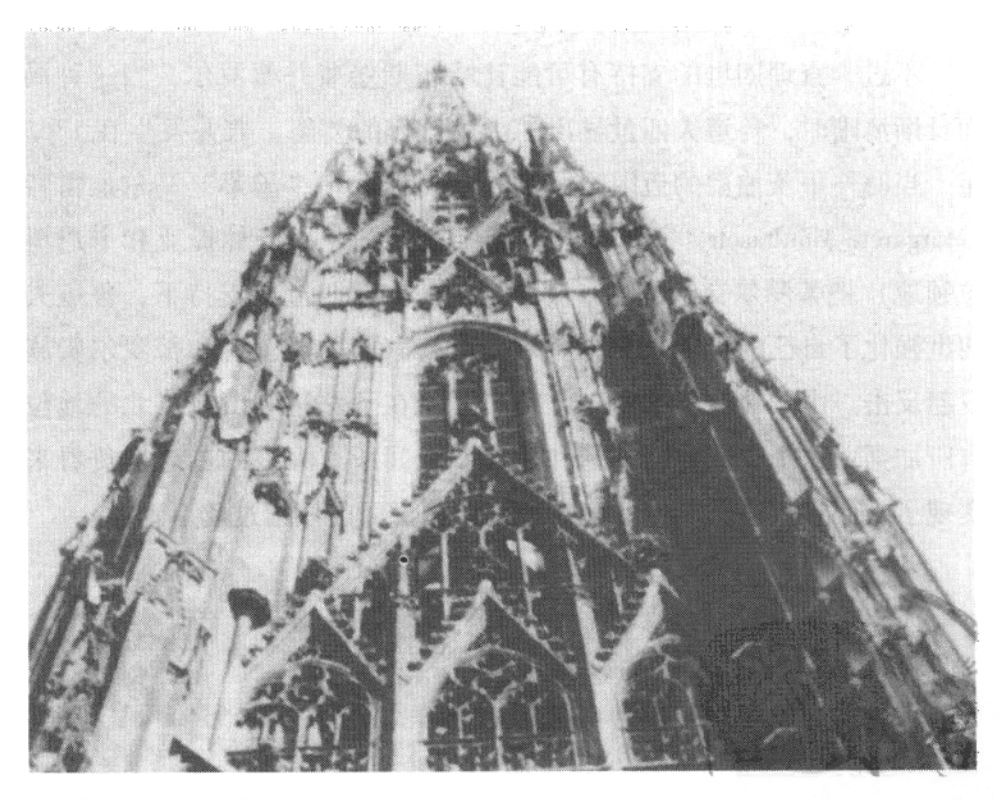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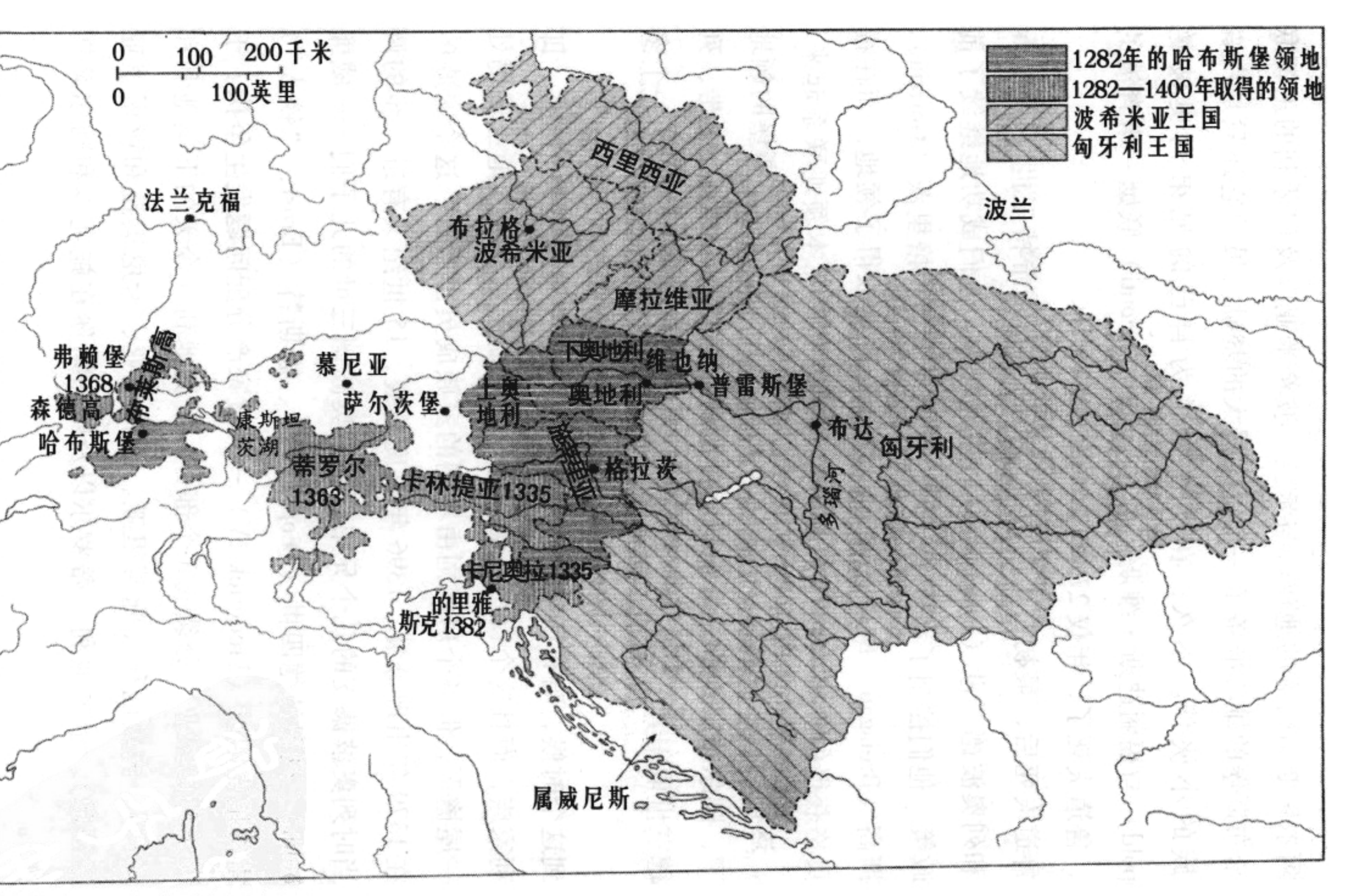
插图8　维也纳圣斯特凡大教堂

卢森堡也是一个来自德意志西部的家族，它在帝国东部的领地甚至更为富饶，如今已让哈布斯堡相形见绌了。鲁道夫四世于1353年娶了查理四世的女儿，但开始时他憎恶那位比他还强大的岳父。众所周

知的是，他反对查理四世1356年颁布的“黄金诏书”（Golden Bull），这份文件编订了帝国法，但也削弱了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地位（它们是卢森堡家族的竞争者维特斯巴赫家族和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鲁道夫为了反击，干出了中世纪欧洲最大的欺骗行为之一：大特权状（Privilegium maius）。这份伪造的文献集中有5份文件，于1359年被“重新发现”，其中提到了皇帝红胡子弗雷德里克授予巴奔堡诸公爵的一系列特权，这些特权大大提高了奥地利在帝国内部的地位；另外，大特权状还授予奥地利公爵以大公的头衔。查理四世拒绝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大部分要求，但接受了其中的一些条款。1442年，哈布斯堡家的皇帝弗雷德里克三世（Frederick III）承认大特权状是有效的，于是伪造的文献在一个世纪后变成事实。

不过，查理四世的支持有可能让哈布斯堡兼并蒂罗尔，当这种局面日渐清晰时，鲁道夫四世显出了更为合作的姿态。兼并发生在1363年，当时格里茨伯爵的迈因哈德支的末代继承人“汤菜”马尔加雷特（Margarete Maultasch，已经被哈布斯堡家族剥夺了卡林提亚和卡尼奥拉领地）把蒂罗尔交给了哈布斯堡家。在查理四世的支持下，鲁道夫四世强化了自己的行动，对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觊觎者和蒂罗尔贵族发起反击。由于掌控了蒂罗尔，哈布斯堡在圣戈达尔山口以北的地位有所加强，这个家族控制德国和意大利之间所有大道的古老抱负看来实现了，而且鲁道夫四世的确在威尼斯总督面前炫耀过此事。

31



地图2 1400年左右的哈布斯堡领地

与卢森堡家族的合作导致了1364年王朝继承条约的签订。与此同时，鲁道夫计划同米兰公爵维斯孔蒂（Visconti）家族联姻，以强化自己在阿尔卑斯山两侧的地位。与米兰、波希米亚以及匈牙利的王朝联姻为哈布斯堡的雄心准备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基础。虽然它还只是卢森堡家族的小伙伴。不久，在前往米兰为自己的兄弟列奥波德（Leopold）与福丽迪斯·维斯孔蒂（Viridis Visconti）联姻一事奔波的路上，鲁道夫死了，年仅27岁。

鲁道夫死后，最初是他的两个兄弟阿尔布雷希特三世（Albrecht III）和列奥波德三世（Leopold III）共同视事，他们成功地继续了前任的政策。他们控制了蒂罗尔，并在伊斯特里亚和格里茨（Gorizia）、布莱斯高（Breisgau）的弗赖堡（Freiburg）等地取得了领地，而在福拉尔贝格获得的土地则将他们的奥地利领地和施瓦本领地联系起来。但是，这种联合统治不能让列奥波德满意，1379年，哈布斯堡的领地分裂了，阿尔布雷希特三世获得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的中央地带，列奥波德三世取得其余的土地。哈布斯堡领地的分治状态延续了一个多世纪。

到这个时候，哈布斯堡的政治实体开始指"奥地利统治者"，即奥地利家族，而且这个说法是恰当的。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虽然仍处于同一屋檐下，但各个房间则由不同的家族成员占据着。这个家族的领地在1379年出现分裂，1396年再度分裂，15世纪又有进一步的调整，当时列奥波德支的几个兄弟，即列奥波德三世的儿子们——威廉（Wilhelm）、列奥波德四世（Leopold IV）、恩斯特（Ernst，"铁人"）和弗雷德里克四世（Frederick IV）——就家产分配问题发生争执。于是"奥地利的家业"分裂成3个部分：下奥地利（今天的下奥地利和上奥地利），内奥地利（施蒂里亚、卡林提亚、卡尼奥拉和亚得里亚海沿岸领地），上奥地利（蒂罗尔以及哈布斯堡在施瓦本和阿尔萨斯的产业）。

但是，当时的局势远比这种简单的三分法复杂：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的哈布斯堡家族就像在上演一幕肥皂剧。哈布斯堡的产业在持

续不断地分化，在各个兄弟之间交换着。不过，让这类争吵相形见绌并使其复杂化的另一场兄弟相煎发生在卢森堡家族内部，冲突的双方是查理四世的两个儿子：波希米亚国王温切斯拉斯四世（Wenceslas IV）和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Sigismund）。在这场大戏剧中，哈布斯堡家族实际上只能算个配角。1411 年，西吉斯蒙德取代他兄弟当上了德意志的国王，并于 1419 年成为波希米亚国王。

33

这些分裂对哈布斯堡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好处。列奥波德三世采取领土扩张的进攻政策，1382 年他获得的里雅斯特（Trieste），但是，在施瓦本战役期间，他于 1386 年战死在森帕赫（Sempach），而且 1388 年的纳菲尔斯（Näfels）战役实际上结束了哈布斯堡在瑞士的霸权地位。列奥波德三世的儿子分割了他的领地"上奥地利"，蒂罗尔及其以西地区给了弗雷德里克四世。在 1415 年的康斯坦茨公会议上，弗雷德里克安排教皇约翰二十三世（John XXIII）逃离了会议，这个鲁莽行动惹得西吉斯蒙德勃然大怒，他动用帝国皇帝的权威将弗雷德里克囚禁在康斯坦茨。当弗雷德里克身陷囹圄之时，瑞士联邦征服了哈布斯堡在瑞士的残余领地，包括 1415 年占领的哈布斯堡城堡。1416 年，弗雷德里克四世逃出康斯坦茨后，成功地恢复了他在蒂罗尔的地位，但对于瑞士他只得放弃。

与此同时，他的兄弟们继续为分割列奥波德的遗产而争吵着。1404 年以后，他们又因为幼弟阿尔布雷希特五世（Albrecht V）的监护权而发生争执，这个孩子是"下奥地利"阿尔布雷希特支的继承人。这些争吵导致奥地利的核心地带爆发内战。外来雇佣兵、匈牙利和摩拉维亚的武装团伙、当地贵族、维也纳等城镇，纷纷卷入这场带有毁灭性后果的冲突。1411 年，下奥地利的等级会议（estates）[①] 劫

① 下奥地利公爵领"等级会议"的组成是：当地教会的高级教士、领主、骑士和城镇，换言之是一批权力经纪人，他们堪称这个公爵领的国会或地方议会（Landtag）的雏形。其他的哈布斯堡领地也有同样的代表机构，而且这样的等级会议结构是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的政治模式。（作者在本书中有时用 estates 指这种原始的代议机构，但有时也用 diet 和 assembly，因此译文中亦据此有所变化，或译为"议会"。——译者注）

持了心甘情愿的阿尔布雷希特五世，并宣布他为公爵。

阿尔布雷希特五世的统治效果明显，他恢复了秩序，虽然他与西吉斯蒙德的紧密关系——包括他与西吉斯蒙德的女儿伊丽莎白（Elisabeth）的婚姻——使得奥地利卷入了胡斯战争（Hussite Wars），奥地利公爵领的北部地带一度陷入混乱。今日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的防区（Viertel）建制就是为了应付捷克胡斯派的威胁。1421 年，维也纳的犹太人之所以会遭受残酷迫害，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被视为胡斯派的同盟者，公爵支持了迫害行动，结果 212 个犹太富人被烧死（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不过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物质上的私利。

34

阿尔布雷希特五世只是卢森堡家族的一个小伙伴，不过，心甘情愿的臣服表现可能会得到美妙的报答。当西吉斯蒙德于 1437 年死去后，阿尔布雷希特五世继承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王冠，并当选为德意志国王。他于 1439 年 10 月死于腹泻，当时他正参加一场反击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新攻势的战役，如果不是这个变故，哈布斯堡在中欧的霸权的建立也许要早上一个世纪。他唯一的继承人拉迪斯劳夫（Ladislaw）是个遗腹子，这个事实对阿尔布雷希特支系来说是一场灾难，但对这个继承人的监护人、施蒂里亚的弗雷德里克五世（Frederick V）来说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这个监护人以前曾受蒂罗尔的弗雷德里克四世的监护，但如今他兼任拉迪斯劳夫和弗雷德里克四世之子希格蒙德（Siegmund）的监护人。在哈布斯堡家族的王朝博弈中，所有的牌一度都在他手中，他当然要好好利用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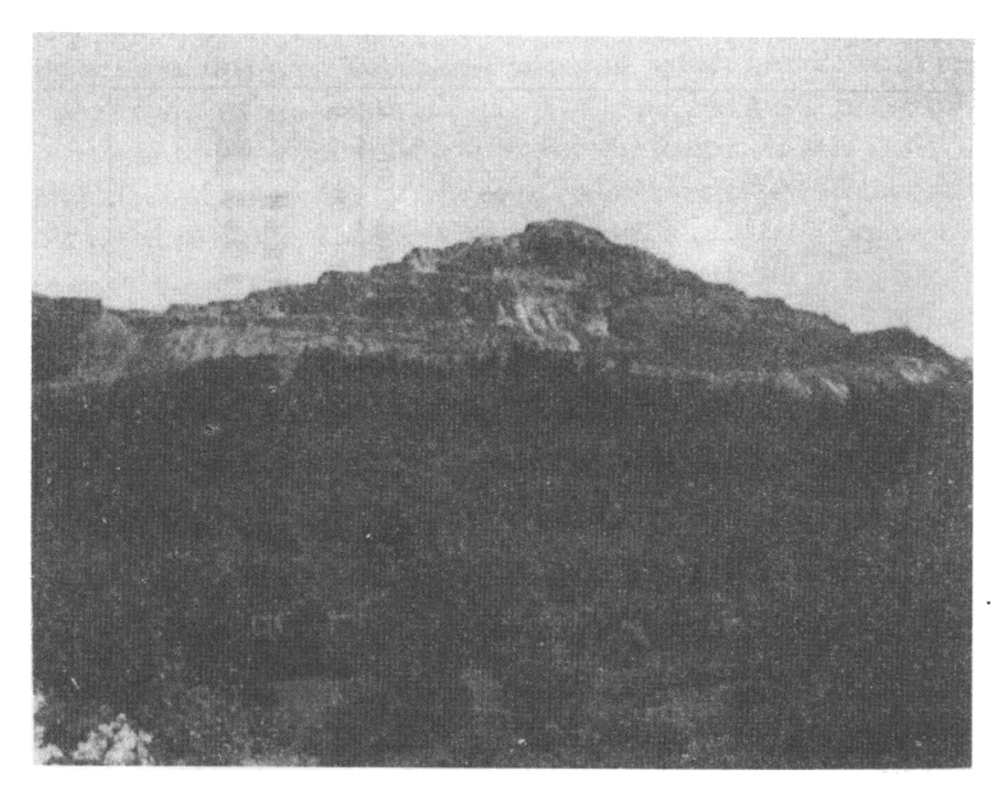


插图9　施蒂里亚的埃尔茨山

阿尔布雷希特五世死在同土耳其人的战斗中，此事很难说是巧合。 35
就在哈布斯堡和卢森堡家族的反复争吵时，发生了两个预示着未来的重大事件。扬·胡斯（Jan Hus）的出现、康斯坦茨公会议和随之而来的胡斯战争已经预示着随后几个世纪的宗教骚乱，与此同时，奥斯曼土耳其人已经抵达东南欧。这两个事件当时就被认为具有最为重大的意义：奥地利议会的首次会议就是因为土耳其的威胁而召开的。但是此事究竟"多么"重要直到后来才被人清晰地认识到。哈布斯堡对这些潜在力量的回应将决定奥地利未来3个世纪的历史面貌。

地图3 哈布斯堡在欧洲的领地，1556年

第二章　AEIOU[①]：普世君主国之梦，1439—1740年

施蒂里亚的弗雷德里克五世于1440年当选为德意志国王弗雷德里克三世（Frederick III）；1451年，他前往罗马；1452年3月18日，他在罗马遵照传统由教皇加冕为皇帝，从而成为哈布斯堡家族的第一个皇帝，也是最后一位在罗马加冕为皇帝的德意志国王。从弗雷德里克三世开始，哈布斯堡家族对帝位的垄断一直到1806年（只有1740—1745年除外），王朝政策几乎使弗雷德里克三世的后继者们走到了世界君主国的边缘。不过，弗雷德里克三世的奢华的加冕之旅弄得他差点破产，此举也没有给他带来多少领地。他无法支付旅途费用（实际上是教皇付的），在他前往罗马的途中，奥地利等级会议实际上处于反叛状态，它要求合法的统治者、弗雷德里克的侄子和监护人拉迪斯劳夫返回，那时后者已经被弗雷德里克带到了罗马。 37

因此，哈布斯堡成为世界大国的崛起之路开始于对帝国皇帝名号即对神授权威的要求，这种神权与有关政治现实的现代观念存在很大差异。在未来的3个世纪内，从1440年弗雷德里克成为家族首领直到1740年玛丽亚·特丽莎（Maria Theresa）继位，哈布斯堡家族试图让他们的

① AEIOU即拉丁语“Austriae est imperare omni universo”的缩写，意思是“世间万物皆臣属于奥地利”。——译者注

神圣统治权变成现实，这不仅是对他们自己的领地的统治，而且是作为神特选的王朝对整个文明世界（即基督教世界）的领导权。“奥地利的责任感”（pietas austriaca）——他们对这种特别的神圣义务、因而也是神圣权利的意识可追溯到鲁道夫一世，但最著名的表述是在弗雷德里克三世的首字母缩写 AEIOU 的说法中，这个说法甚至在他加冕为皇帝之前就提出来了（德语：“Alles erdreich ist Österreich unterthan”；拉丁语：“Austriae est imperare omni universo”；英语：“It is for Austria to rule the whole world”）。令人瞩目的是，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普世君主国的要求竟几乎成为现实。在危机四伏的时代，“奥地利”——奥地利家族、哈布斯堡王朝——的确在欧洲建立了它自认为理所当然的霸权；不管怎么说，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哈布斯堡可以声称对西方基督教世界拥有形式上的高级权威。

38

但是，这种在欧洲政治格局中的高级地位明显违背了近代早期欧洲的政治现实，而且与近代早期欧洲的大多数思潮相左。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哈布斯堡在中欧的“神授”霸权的三大要素，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王位，理论上说却都是选举产生的。

作为一个王朝，哈布斯堡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将上述 3 个选举产生的权威转变为世袭职位：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事实”上成为世袭的，而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王位“理论上”是世袭的。这一成就以出色的方式认可了那种勇敢的要求和持之以恒的努力，以及机会主义的干涉行为和对权益的维护——这样的做法在王朝的鼎盛时期司空见惯。哈布斯堡家族在事实和假想之间总是纠缠不清：弗雷德里克三世成为皇帝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确认伪造的“大特权状”为帝国法律。

在 1440—1740 年之间，哈布斯堡家族根据时局之必须，对其神授的普世统治权的理论依据作了明显改变，而且它的抱负到后来也有所收敛。此间出现了各种相互竞争的权力理论，它们与中世纪后期有关普世帝国的传统大杂烩学说没有关联，但哈布斯堡家族所认同的正是传统学说。新的权力和合法性源泉——如经济的、宗教的，最后还有民族的——最终将威胁到哈布斯堡君主国家的生存。

一、普世君主国，1439—1556 年

弗雷德里克三世对自己的职责和哈布斯堡的使命有十分崇高的见解。但他在位的头 20 年里，他被他的兄弟阿尔布雷希特六世（Albrecht VI）、匈牙利将军约翰·匈雅迪（John Hunyadi）和捷克人的领袖乔治·博迪布拉德（George Podiebrad）抢去了风头。在这个时期，弗雷德里克三世权威的主要来源是他对拉迪斯劳夫的监护权，而后者是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国王兼奥地利公爵。弗雷德里克顽固地拒绝放弃对拉迪斯劳夫的监护，即使是后者达到了奥地利传统的成人年龄 12 岁之后，再加上他对其受监护人的领地管理粗枝大叶，终于使得奥地利等级会议在 1451 年组成了迈尔贝格同盟（League of Mailberg），这个同盟要求弗雷德里克交出拉迪斯劳夫并恢复其合法统治。当弗雷德里克三世于 1452 年从罗马返回后，同盟也进一步壮大，匈雅迪和博迪布拉德参加了进来。于是，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其受监护者的臣民的围攻下，被迫于 1452 年 9 月释放了拉迪斯劳夫。

39

在以后的岁月中，弗雷德里克完全丧失了活动能力，他的折腾徒劳无功。拜占廷于 1453 年覆灭，土耳其人向匈牙利进军，但这位皇帝对保卫基督教世界的边境无甚作为。在贝尔格莱德（Belgrade）成功地抵挡土耳其人围攻的是约翰·匈雅迪；因此当拉迪斯劳夫于 1457 年死去后，匈牙利等级会议选举匈雅迪的儿子马提亚斯·科维努斯（Matthias Corvinus）为国王。在波希米亚，人们宁愿乔治·博迪布拉德当国王，而不要继续被哈布斯堡统治。弗雷德里克甚至受到他的兄弟阿尔布雷希特的挑战，当后者于 1461 年入侵下奥地利时，当地人热烈欢迎阿尔布雷希特将他们从过去的强盗国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直到 1463 年阿尔布雷希特死去后，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才重归弗雷德里克控制。

但在 15 世纪 60 年代，弗雷德里克对其领地的统治相当称职。他为维也纳（奥地利早有此心）、维也纳新城（Wiener Neustadt）和莱巴赫争（Laibach）取到了主教区的地位；他还狡猾地购得了阜姆（Fiume）港。但是他与奥地利贵族的关系却很糟糕，而且，对于如何应

付土耳其人对匈牙利和哈布斯堡东南边境地带发起的新一轮攻势，弗雷德里克几乎无所作为，除了在 1468 年成立圣乔治骑士团（Order of Saint George）以外。声望无法替代实际的资源，而弗雷德里克三世又没有提供这些资源。后来当地农民自行组织起防御部队，但是这些部队在 1478 年的葛罗高（Gloggau）战役中被土耳其人击溃。

那个时侯弗雷德里克三世关注的是另一个威胁：马提亚斯·科维努斯，后者对弗雷德里克阻挠他反击土耳其人的计划大为光火，他向弗雷德里克宣战，并在萨尔茨堡大主教的支持下横扫奥地利。维也纳于 1485 年陷落，维也纳新城也在 1487 年失守。弗雷德里克被迫逃往林茨，看起来他败局已定。

但弗雷德里克三世依然为哈布斯堡家族主持了一桩获益甚丰的事业：同勃艮第（Burgundy）的王朝联姻。勃艮第公爵的领地散布在法国和德国之间，从今天的法国南方一直到荷兰沿岸，而其中的尼德兰（Netherlands，意为“下部地带”，与勃艮第本身的“上部地带”Upperlands 相对）拥有一些欧洲最繁荣的地区。勃艮第虽然在法律上没有王国地位，而且被洛林分割成两个部分，但它在 15 世纪已经成为欧洲的强国之一，而且是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它期望实现自己的宏伟抱负。勃艮第公爵好人菲利普（Philip the Good）在 1430 年设立了金羊毛骑士团（Order of Golden Fleece），他的儿子大胆查理（Charles the Bold）于 1465 年继位，这位新公爵计划成立一个独立的勃艮第王国，这个王国将类似于中世纪的“中间王国”罗塔林吉亚（Lotharingia）。坐落在马林（Malines）的勃艮第宫廷是欧洲最奢华的宫廷之一，因此勃艮第应该是一个被考虑的势力，对于上莱茵地区尤其如此。

蒂罗尔的西格蒙德（Siegmund）之所以劝说他的堂兄弟弗雷德里克三世给后者的儿子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和勃艮第的查理唯一的女儿玛丽亚（Maria）说亲，其目的是为了争取勃艮第的支持，1473 年 9 月底，这一对年轻人在特里尔（Trier）订婚。但谈判久拖不决，西格蒙德改变了立场，1474 年在康斯坦茨以“永久解决”的方式同瑞士人签订了和约（从而结束了哈布斯堡在瑞士的权益）。不过，在勃艮第攻略遭

受这些挫折之后，谈判又重新开始，联姻最终于 1476 年 5 月达成。当勃艮第公爵查理于 1477 年 1 月在南锡（Nancy）被杀后，马克西米连匆忙赶往勃艮第，以确保同玛丽亚的婚约。8 月 10 日，马提亚斯·科维努斯入侵奥地利；8 月 19 日，马克西米连在根特（Ghent）与玛丽亚结婚，从此让哈布斯堡家族踏上了成为最强大王朝的道路。



插图 10　马克来米连一世（奥地利国家图书馆）

现在，马克西米连必须为保卫他妻子的领地而反击勃艮第的上级封君、法国国王路易十一（Louis XI）。玛丽亚于1482年死去，马克西米连在当年的阿拉斯（Arras）和约中被迫对法国作出重大让步。1486年，马克西米连当选为罗马人的国王（德意志国王）；1488年，他差一点被布鲁日（Bruges）的市民交给根特的市民处决；1490年，他终于收买了堂兄弟西格蒙德，为自己获得了蒂罗尔。

41

很显然，马克西米连喜欢蒂罗尔：他把因斯布鲁克当做自己的都城，因为这座城市坐落在勃艮第领地与奥地利领地的中点上。在那里，他还为自己的陵墓（不过他没有被安葬在里面）修建了一个精致的小教堂，这座建筑是一个三维的王朝宣传品，里面有哈布斯堡祖先的雕像，其中有一个是布列谷人的亚瑟王（Arthur）。不过，马克西米连很少能长期居留某地，他总是忙马停蹄地捍卫古老的权益和寻求新的权益。

在西方，他继续和法国人争夺勃艮第的遗产，并于1493年夺回了相当大一部分产业。在东方，由于马提亚斯·科维努斯于1490年4月死去，马克西米连得以收复被占领的奥地利，1491年，他与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国王、雅盖洛（Jagellon）家的弗拉迪斯拉夫二世（Wladislaw II）达成普雷斯堡和约，和约为哈布斯堡家族保留了对匈牙利的附属继承权，并使其享有对奥地利领地的完全控制权。1493年8月19日，弗雷德里克三世死去——他死时是个了不得的成功者，因为他留给儿子的是奥地利和勃艮第的两份家业。

马克西米连成为了事实上的皇帝，他继续父亲的宣传攻势，以言语和形象来坚称哈布斯堡成为帝国皇朝的神圣权利。他也是一位善于以联姻方式扩展哈布斯堡影响的高手，这一做法充分体现在一个经常被引用的格言中：

Bella gerant alii, tu felix Austria nube,

Nam quae Mars aliis, dat tibi regna Venus. ①

马克西米连缔结了两个婚姻联盟，一个是跟西班牙的卡斯蒂尔（Castile）王朝，另一个是跟中欧的雅盖洛王室，这两次联姻使得哈布斯堡家族获得了西班牙、美洲、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几乎整个中欧。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哈布斯堡家族自认为是与近代早期欧洲崛起的另两个强权抗衡的力量，这就是法国和奥斯曼帝国。不过，从战略上说，联姻只是哈布斯堡取得成功的部分原因。当两次联姻给哈布斯堡人带来的利益远高于起初的设想时，他们不仅能在宣传和仪式中，而且能在战场上声张他们的权利。不管我们上面提到的格言寓意如何，马克西米连和他的继承者们还是进行了很多战争。 42

如果说上莱茵地区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有助于哈布斯堡获得勃艮第的遗产的话，意大利更为盘根错节的格局则催生了西班牙的继承权要求。1494 年，法国人侵意大利，这一冲击使得意大利内部长期交战的各方于 1495 结成了神圣同盟（Holy League）。在与战争同时进行的谈判中，马克西米连和阿拉贡的费迪南德（Ferdinand of Aragon）缔结了婚姻联盟：1496 年马克西米连的儿子菲利普（Philip）迎娶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Isabella）的女儿胡安娜（Juana），1497 年，马克西米连的女儿玛格丽特（Margaret）嫁给西班牙的胡安（Juan）亲王。1497 年 10 月，胡安死去，菲利普和胡安娜成为西班牙领地的继承人。菲利普于 1506 年死去，他的寡妻悲伤不已，被宣告说精神疯癫，于是他们的儿子，根特的查理（Charles of Ghent，他于 1500 年生于根特）成为西班牙各领地唯一的继承人。这个事件是哈布斯堡权力上升的一个强大推进器。

马克西米连还试图把神圣罗马帝国改造成法兰西瓦卢瓦（Valois）王国的有效对抗者，但没有成功。他企图建立一个更有效率的帝国中

① 让别人去打仗吧，你，幸福的奥地利，结婚去吧！战神马尔斯给别人的东西，爱神维纳斯会赐给你。

央集权政府，但遭到反对派协同一致的抵制，他们试图将帝国邦联制的、权力分散的特征制度化。一个宪法制度的框架还是建立了起来，如帝国宫廷法院（Reichskammergericht）、帝国税收（Reichspfennig）和12个专区（Kreise）的邦联结构，不过，帝国虽然具有国家的一些外在形式，如当时正在法国、西班牙和英国所出现的国家形式，但这个国家缺少实在内容。

在自己的奥地利领地上，马克西米连也试图进行税收和行政改革，以图把这个世袭领地变成强化帝国权威的基地。奥地利矿产丰富，施蒂里亚的铁、蒂罗尔的铜和银，特别是施瓦茨（Schwaz）的矿山是他能获得贷款的关键，而这些贷款是他进行战争和推行帝国政策所必须的。于是他在管理委员会（Regiment，实际上是各个摄政会议）中将中央集权政府的草创措施制度化，1490年在蒂罗尔和下奥地利（即今天的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开展这项工作，1493年扩展到内奥地利。马克西米连是最早采取官僚统治的哈布斯堡君主之一，但是，当等级会议抵制这种新近时兴的行政机构的扩张时，他又向对手屈服，这样一来，更为激进的变革措施就只能胎死腹中了。

43 马克西米连之所以在国内改革问题上半心半意，部分原因是持续不断的战事牵扯了他的精力。1498年他在跟法国人打仗，1499年的敌人是瑞士。1504年，他介入巴拉丁（Palatinate）和巴伐利亚的冲突，顺便捞得了巴伐利亚的基茨别尔（Kitzbühel）等地方。1507年他与匈

44 牙利作战，不过这次行动只是一种谈判中的策略。威尼斯的敌视意味着这个至为宁静的共和国阻挡了他去罗马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道路。作为回应，马克西米连于1508年2月4日宣称自己“当选为罗马皇帝”，这是将德国政治与其最初普世主义的、以意大利为中心的传统分割开来的重大步骤。

马克西米连多年陷身于意大利战争的漩涡中，并为战事而在欧洲大陆来回奔波。1513年8月，他带领一支英国军队在基尼盖特（Guinegate）同法国人作战，几个星期后，他又于10月与西班牙人一起在维琴察（Vicenza）一起击溃威尼斯人。这些狂热的战争行动最终耗尽了

他的资源，但取得的成果并不大。1516 年同法国和威尼斯的和约为马克西米连带来了一些收获，如科尔蒂纳丹佩佐（Cortina d'Ampezzo）等地区，但也给他造成了损失，如维罗纳等领地。

他试图动员整个帝国的力量来反击法国人的威胁，而且堪称最早祭出德意志民族这张牌的德国君主，但是帝国的诸侯们并无多大响应。他是一位善于使用皇帝威严的高手，他甚至发表过一篇自传体诗歌《珍贵的思想》(*Theuerdank*)，以此来美化自己的形象。但他手中的资源无法满足他的追求，虽然他拥有蒂罗尔的矿山和勃艮第领地的财富。他在战争中花费了太多的时间，但没有用足够的时间去说服帝国的地方势力和他的各个领地去接受更有效的政府和财税体制。在民族国家崛起的近代早期的世界里，他更像个“最后的骑士”，而不是马基雅维利笔下的“君主”。

不过，他在安排王朝联姻方面确实有一套。就在他的统治行将结束之时，他又成功地缔结了另一桩双重联姻，联姻的一方是他的孙子费迪南德（Ferdinand）和孙女玛丽亚（Maria），另一方是雅盖洛家族的弗拉迪斯拉夫二世的孩子路易（Louis）和安娜（Anna）。在土耳其人威胁的刺激下，1491 年的相互继承权条约发展成 1506 年的王朝协定，进而又出现 1515 年的双重联姻。在订婚仪式上，马克西米连亲自充当安娜的代理新郎。直到 1516 年，他的孙子费迪南德才答应这桩婚事，婚礼最终在 1521 年举行。

马克西米连于 1519 年 1 月 12 日死于威尔斯，此前他已因为没有支付账单而被驱逐出因斯布鲁克。他甚至不能确保他的孙子查理能当选德意志国王，但他已经留给后者全套的家业，还有获取更多家业的机会。他与西班牙和中欧的联姻政策将铸就哈布斯堡未来 4 个世纪的命运。

45

马克西米连的继承人查理五世（Charles V）已经于 1506 年成为勃艮第公爵和卡斯蒂尔国王。他于 1515 年成年，1516 年阿拉贡的费迪南德死后，他成为整个西班牙的国王，并于 1517 年去那里享用这顶王冠。1519 年马克西米连死后，当年 6 月 28 年，查理经重金贿赂后被

一致推选为德意志国王，但直到1520年10月，他才从西班牙启程去亚琛（Aachen）加冕。与此同时，奥地利等级会议派出的一个代表团前往西班牙，要求废除管理委员会（Regiment）体制，但这个要求被严词拒绝；不过，各个世袭领地的等级会议还是纷纷向它们的新统治者宣誓效忠，这个统治者仿佛已经把世界踩在脚下。

除了西班牙、勃艮第领地和奥地利的世袭领地外，查理因为阿拉贡家族的继承权而成为意大利和地中海沿岸辽阔地区的统治者。在海外，西班牙已经在加勒比海（Caribbean）拥有殖民地，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ez）已经于1519年2月在墨西哥登陆（皮萨罗[Pizarro]则于1532年征服秘鲁）。在神圣罗马帝国，查理仅仅是国王和（当选的）皇帝，但是，当他在德国继位后不久，他便获得了符腾堡（Württenberg）。从领地名录上看，哈布斯堡看来已成为一个强大的联合体。现在看来，弗雷德里克三世的AEIOU一说中暗含的普世君主国的梦想看来并非不可能实现。当查理五世的大法官麦库里诺·加迪纳拉（Mercurino Gattinara）于1519年向他提出这个梦想时，查理的确觉得“踏上了普世君主国的旅途”，以至于要“将整个基督教世界联合在同一个权杖之下”。[1] 他的座右铭是“更进一步”（Plus ultra），这似乎表明，查理的确自信满满地要走上普世君主国的道路。

但这种普世君主国的诉求从来都是不现实的。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I）时期的法国不但同样雄心勃勃，而且拥有某些决定性的优势，如国内的交通联系和相对高效的行政体制。即使考虑到从新世界流入的金银，法国的收入仍然能与哈布斯堡的财政力量颉颃。哈布斯堡领地极度分散，实际上无法管理，无法为普世君主国提供一个协调紧凑的平台。甚至在查理五世当上皇帝以后，他的奥地利臣民仍拒绝承认维也纳过去的管理委员会，并自行设立了新的管理机构。地方统治阶层中间同样骚动不安，这些阶层试图保持他们的自治权，查理的

46

① Jean Bérenger, *A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Empire, 1273—1700* (Harlow, 1994), pp. 144—145.

很多领地享有这类自治，最明显的是在尼德兰。

还有两个因素限制了查理对普世君主国梦想的追求。一个是很现实的因素。如果说法国是基督教世界内部的抵制者的话，土耳其人则是一个巨大的外部威胁。另一个因素则更为抽象，但它的后果甚至更为重大，这就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登场。就在马克西米连发表他的骑士诗歌《珍贵的思想》的同一年，马丁·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在维滕堡（Wittenberg）城堡教堂的门口贴出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新教的兴起是对传统天主教世界观的直接而致命的威胁，但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威、因而还有哈布斯堡的权威，都是建立在这个传统世界观上的。对于路德派、加尔文派和新出现的其他教派，查理五世可以采取大规模的武力行动，但从精神上说，“将整个基督教世界联合在同一个权杖之下”的观念已是一句空话了。此外，土耳其异教徒的威胁和路德宗异端的挑战之间还有某种联系：当查理抵御前者时，他发现自己已不可能镇压后者了。

查理五世帝国的庞大规模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威胁，但是，这个帝国的极度分散和缺乏整合性使得它很难被用作权力工具。查理继续着哈布斯堡的传统，渺无边际地奢望世界霸权，因而使局面进一步恶化。如果他是个较为收敛的魅力型统治者，也许他会劝告他的诸侯说，法国人、土耳其人和新教徒的威胁是如此巨大（且不提下层人民的反抗），以致哈布斯堡的霸权对这些诸侯的安全而言是必须的。但查理五世从来没有让人喜欢过，而且，即便他在很长的时期内曾让人恐惧，但恐惧的时间还不足以长到让他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另一方面，马基雅维利式的国家理性（raison d'état）也不是查理五世的行事风格。

47

由于领地辽阔分散，查理五世不可能总是临幸这些领地，为了缓解这种不便带来的弊端，他采用了哈布斯堡家族的一个老办法，将这些领地分给各个家族成员去治理。这也是安慰其他家族成员，特别是他的弟弟费迪南德的一种方式。1521年，哈布斯堡最初的世袭领地“下奥地利”（恩斯河以上和以下的奥地利以及内奥地利）被当作安慰品给了费迪南德这个幼支。1522年，蒂罗尔及其银矿又补给了费迪南

德，但他的产业仍只是哈布斯堡庞大领地中一个很小的部分。不过在这个时候，将奥地利的原始领地封给费迪南德还只是暂时的做法，因为作为家族首脑，查理五世仍然是最高统治者。

查理五世的精力完全耗在领地的治理和为保卫领地而进行的战争上。他早年是在意大利与法国人的战争中渡过，在战争期间，查理手下没有领到军饷的部队为了取得补偿而在1527年洗劫了罗马。这个不光彩的事件削弱了查理的声望，但在军事上他仍占据上风。根据1529年的康布雷（Cambrai）和约，查理同意放弃勃艮第公爵领，但他迫使法国人放弃了米兰。1530年2月24日，教皇克莱芒七世（Clement VII）在博洛尼亚（Bologna）——因为罗马还没有从1527年的抢劫中恢复过来——加冕查理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米兰公爵。这是最后一位受教皇加冕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同样是在1530年，查理五世开始集中关注帝国事务，这还是自1521年他在沃尔姆斯（Worms）帝国议会（Diet）上质询路德以来的第一次。当皇帝不在的时候，路德宗广为传播，“尤其是”在哈布斯堡的奥地利领地上。在1530年的奥格斯堡帝国议会上，路德派已经成为帝国一个有组织的、牢固确立下来的因素，他们提出《奥格斯堡信纲》（Confessio Augustana）便可以为证。这个情形改变了帝国的政治生活，也改变了皇帝的政治角色。1531年1月5日，查理五世成功地让他弟弟费迪南德当选为罗马人的国王（因而成为他的继承人）；但是，由于查理拒绝承认路德派的地位，由于他的天主教徒弟弟的当选，新教诸侯和帝国的新教等级会议于1531年2月组建了施马克尔登同盟（Schmalkaldic League），这个同盟很快就得到了法国的支持。1532年，土耳其人推进到维也纳城下，危急局面成为帝国政治变革的新动力：查理五世被迫在纽伦堡（Nuremberg）召集帝国议会，以便组建一支帝国军队来保卫维也纳，他已经不能继续反路德派的政策了。但是，在帝国内部，新教军队在法国——还有英国——的支持下入侵符腾堡，迫使那里的哈布斯堡势力于1534年投降。

困境中的查理五世再次丧失在帝国内部的利益。1535年，他发起

了一个战略上很愚蠢、但表面看来颇为风光的行动，这就是入侵突尼斯（Tunis），因为这地方就在古罗马的敌人迦太基（Carthage）的遗址附近。查理继续以罗马皇帝的方式来庆祝自己的胜利：1536 年他在罗马举行凯旋仪式。到 16 世纪 40 年代，别的战场上的胜利让查理的胆子大了起来，他试图粉碎施马克尔登同盟，重建天主教的至上权威。1545 年，他敦促教皇在紧邻哈布斯堡领地的教会领地特伦特（Trent）召集一次会议，1547 年，一支帝国军队在缪尔贝格（Mühlberg）击败施马克尔登同盟。现在的查理看来已是德国的主人，于是他在 1548 年的奥格斯堡宗教临时协定中要求在整个帝国重建天主教。

但查理已经走得太远了。1552 年，新教诸侯与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在尚博尔（Chambord）结盟。查理以前的盟友、萨克森的莫里斯（Maurice of Saxony）带领一支主要由新教徒组成、但也有部分天主教徒的部队前来胁制皇帝。虽然查理避免了在因斯布鲁克被俘的耻辱，并能在 1552 年冬天以围困梅茨（Metz）作为反击，但这次局势的转变对他是个决定性的打击。1553 年 1 月围攻梅茨失败后，查理决定辞去他的政治头衔，他的退隐开始于 1555 年。

1555 年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在帝国范围内确立了“教随国定”（cuius regio, eius religio）的原则。这个文件需要费迪南德来签署，因为皇帝本人不能在这份终结天主教至上权威和宗教统一的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这种权威和统一是他的理想。1555 年，查理辞去了尼德兰统治者的身份；1556 年他又辞去了西班牙的王位。1556 年 9 月，他把帝位交给了费迪南德（但后者直到 1558 年才正式当选）。查理隐居西班牙，并于 1558 年死在那里。

但哈布斯堡家族并未因他死去而放弃建立普世君主国的实际步骤。查理的儿子、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Philip II）仍然在继续追求这个目标，而且还取得了一些成功。1557 年法国人在圣康坦（St. Quentin）战败，哈布斯堡得以控制意大利。由于法国陷入宗教内战，加上南美白银大量流入，菲利普二世显然成了欧洲最强大的统治者。如果事态像查理希望的那样，菲利普能继承他（至少是费迪南德）的神圣罗马

49

帝国皇帝的称号，如果菲利普1554年与英格兰的玛丽（Mary）的王朝联姻能有血脉延续，或者菲利普1559年对英国的伊丽莎白（Elizabeth）的示好能取得结果，也许某种类似于普世君主国的梦想真能变成现实，哈布斯堡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也会大为不同。但是，即便是西班牙国王的巨大财富和强大武力也无法抑制宗教革命，虽然他一度尝试过。

在查理五世的普世君主国计划失败之后，哈布斯堡的幼支承担了奥地利家族的很多责任，但给它的王朝资源并不多。费迪南德所依仗的家业，是哈布斯堡各领地中非常贫穷的一部分，他和他的继承者必须面对拥有大批新教徒、躁动不安的奥地利领地，必须应付帝国的分裂和土耳其的威胁。不过，他们迎接这些挑战的历程，正是为哈布斯堡君主国奠基的一部分。

二、基督教世界的堡垒，1521—1648年

查理五世给予费迪南德的领地——1521年已经给了他，但正式的授予是在1556年——并不是哈布斯堡庞大家业中最有价值的。与西班牙、尼德兰、哈布斯堡在意大利的领地相比，这个家族在德意志和中欧的土地价值较低，而且这些地方直接受威胁哈布斯堡的两大难题的困扰：土耳其人和新教徒。

从经济上说，与西欧相比，多瑙河地区衰落了，因为贸易已转向大西洋，而且同东方的贸易已因为土耳其的入侵而被阻隔。这里的采矿业仍然兴旺，虽然这个产业大部分被哈布斯堡家族的南德金融家控制着，而且不久就因为美洲金银的涌入而受到影响。奥地利的农业也有部分的商品化现象，这就造就了大土地所有者的繁荣，但对很多农民而言，这也是“再版农奴制”，并造成了严重的骚乱。即使与波希米亚比起来，奥地利领地的经济意义也要相形失色，更不要去跟哈布斯堡的尼德兰领地相比了。当费迪南德于1521年抵达奥地利时，他甚至要面对下奥地利等级会议的反叛。

50

不过费迪南德很快就稳定了局势，并证明自己是非常有能力的统治

者。虽然他没有按自己的愿望解决宗教问题，但他在 1526 年从雅盖洛家族那里收获了一笔意外之财，并且为奥地利君主国奠定了基本结构，这个结构经受了土耳其人、宗教纠纷和等级会议中的地方势力的考验。在最初的几年中，他忙于镇压下奥地利和其他地区的等级会议的反抗，以及 16 世纪 20 年代中期的农民叛乱，这两次行动都是相当血腥的。他不能抑制的是路德宗迅速传播到奥地利领地的大部分居民中间。

他的地位在 1526 年 8 月 26 日有了重大转变，那一天，匈牙利军队在莫哈奇（Mohács）战役中几乎被土耳其人全歼，年轻的匈牙利国王、雅盖洛家的路易二世（Louis II）也战死。根据 1515 年的王朝联姻，费迪南德成为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王位继承人。但这两顶王冠原则上说都是选举产生的，费迪南德只有在“赢得”选举（要么多数选举人的支持，要么依靠武力优势）后方，能行使他的权利。在波希米亚，费迪南德的当选很顺利，虽然花了不少钱。但在匈牙利，他的当选受到约翰·萨普雅（John Zápolya）的挑战，随之而来的权力斗争使得匈牙利大部分地区脱离了哈布斯堡家族的控制。

1528 年，在莫哈奇战役之后一度撤离的土耳其人再度展开行动。1529 年，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直逼维也纳，并于 9 月围困该城。10 月，因为土耳其人撤离过冬，围城结束。但 1532 年他们又发起了一次大规模攻势，查理五世被迫召集一支包括新教徒的帝国军队来保卫基督教世界。这时土耳其撤退，但他们仍然控制着匈牙利的大部地区。从 1537 年到 1547 年，费迪南德试图夺回自己的匈牙利领地，而土耳其则继续袭击奥地利，萨普雅派还以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作为他们的行动基地。根据 1547 年的停火协议，费迪南德每年须支付 3 万杜卡特作为维持和平的代价，匈牙利则大致分裂为 3 块：哈布斯堡王朝控制的匈牙利，即西部和西北部的一个长条地带，从克罗地亚（Croatia）延伸到斯洛伐克人占多数的匈牙利西北部；萨普雅的儿子约翰·西吉斯蒙德（John Sigismund）统治下的特兰西瓦尼亚自治区，位于匈牙利东北部；而匈牙利王国的大部分受土耳其人控制。敌对行动很快重启，但没有大的结果。1562 年的君士坦丁堡条

51

约承认了1547年的边界，并继续要求每年支付3万杜卡特。哈布斯堡的匈牙利和土耳其的匈牙利之间的地带这时被称为“军事区”，它的两侧都是森林。

费迪南德在1526年继承的只是他的部分“合法”权益，但他仍然争取到了很多利益。他已经遏制了土耳其人，他在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获得的土地大大改变了哈布斯堡幼支的领地的性质。它的领地上过去几乎完全是讲德语的居民（除了少数意大利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但如今已成为多语言的领地。在波希米亚获得的土地对哈布斯堡的力量而言也是一个重大的收获。这不仅是因为波希米亚的王位自动带来了选帝侯身份，而且因为它比奥地利的世袭领地富饶得多。在1542年为支付对土耳其战争的费用而召开的全国等级会议上，波希米亚地区被要求支付2/3的费用。

领地的扩张和土耳其的威胁使得哈布斯堡政府机构的重组成为必然。费迪南德以马克西米连的改革尝试为基础，以勃艮第政府为楷模，巧妙地引入了中央集权政府的关键要素。根据1527年的宫廷国务条例（Hofstaatsordnung）设立了枢密院（Geheime Rat），作为他新成立的联合君主国的最高执行机关；设立了御前议事会（Hofrat），作为最高法院；设立宫廷大臣公署（Hofkanzlei）了负责管理工作。1556年设立，御前战争议事会（Hofkriegsrat），来协调匈牙利的军事行动。

这种新型中央集权体制的成功建立表明，这位君主具有相当高超的政治智慧，而我们尤其要考虑到，费迪南德来到奥地利时还不会说德语，但他也知道步子不能迈得太大。他所设立的只是中央集权政府最低限度的骨架。1537年，波希米亚和匈牙利都不再属御前议事会管辖。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大法官公署仍独立于宫廷大臣公署，虽然后者于1556年成为一个帝国的而非奥地利的机构。直到1620年，一个专门的奥地利大法官公署才设立。最为重要的是，要想为昂贵的土耳其和匈牙利战争提供额外的税收收入，费迪南德的政府总是要依赖于各省的等级会议。这些由贵族支配的会议愿意合作（因为交税的是农民），但条件是费迪南德必须让他们控制地方政府，并在他的全部领

地上容忍路德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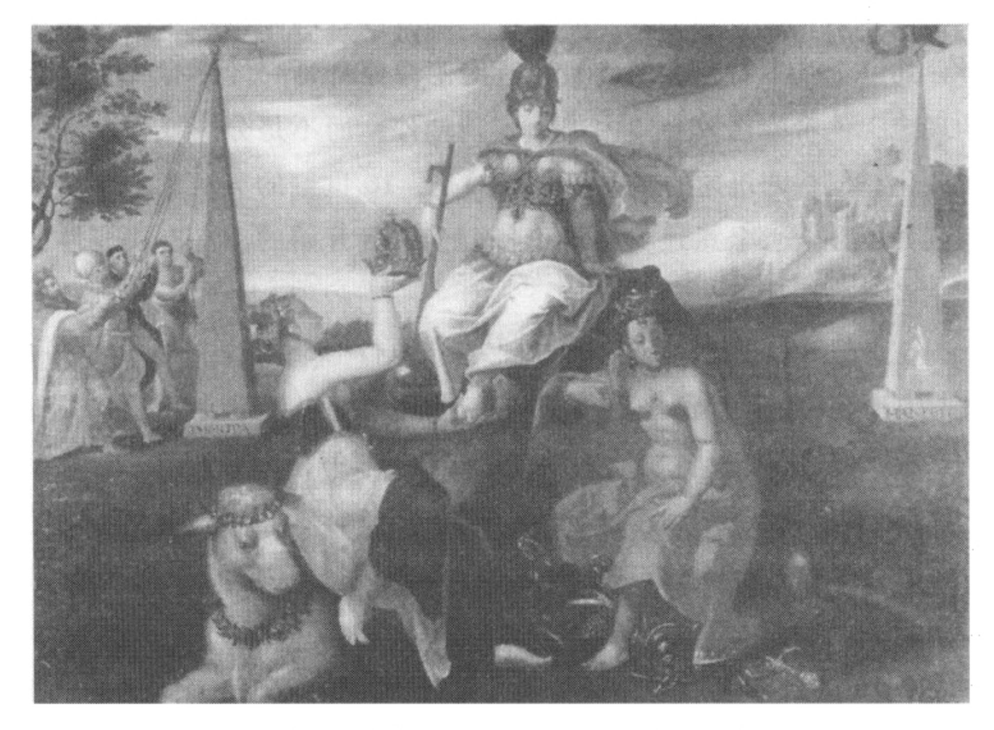


插图 11　“奥地利家族的喻意画”（林茨—诺迪科市立博特馆）

16 世纪 20 年代，路德的教义迅速传遍奥地利各领地，特别是在城镇和贵族中间。贵族的儿子纷纷前往德国北方的大学，那里讲授的是新的神学。哈布斯堡权威当局起初试图镇压新教，1524 年，卡斯帕尔·陶贝尔（Kaspar Tauber）因为其异端信仰而在维也纳被处决。但路德掀起的浪潮势不可挡。甚至再洗礼派（Anabaptists）也设法在摩拉维亚建立了一个社团，他们和那里的摩拉维亚兄弟会（Moravian Brethren）一样，一直维持到 17 世纪。

53

土耳其威胁的再起进一步支持了新教的事业。1541 年，当费迪南德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各省的联合等级会议上呼吁协助抵抗土耳其人时，会议则以要求宗教让步为回应。16 世纪 40 年代后期，费迪南德以查理五世的成就为基础重申他的王权，特别是在波希米亚。但是，新教仍在传播，甚至波及斯洛文尼亚人的卡尼奥拉地区。修道院很快人去庙空，因为修士和修女在听到新教的教义后纷纷离开了修会。

费迪南德的反应是复杂的。作为教会的支持者（advocatus ecclesiae），按说他应该捍卫天主教会，何况对母教的忠诚还是哈布斯堡神话的一个基本特征。的确，费迪南德像他哥哥一样怀有统一教会的理想，他希望在教会“内部”实现调停，而不是分裂或强制性的统一化。但跟西班牙的堂兄弟不同的是，16 世纪的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并不是全心全意地支持特伦特公会议后开始的、富有战斗性的天主教统一运动。

与查理五世相比，费迪南德更愿意在执行 1555 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时有所妥协，虽然这个和约规定领地统治者可以强迫其臣民接受他的宗教，但哈布斯堡各领地并没有这样做。实际上，费迪南德容忍了合体派[①]和路德派要求的两种圣体圣餐。1562 年，皇帝费迪南德在特伦特公会议上倡导和解政策，但他的“新教诉状”（Reformationslibell）被拒绝了。

从 16 世纪 50 年代以后，费迪南德在哈布斯堡领地上领导了一场天主教反改革运动，但这场运动主要依靠的是说服而非强制，它的核心力量是耶稣会士和布拉格克莱蒙特耶稣会学院（Clementinum）的创始人彼得·卡尼齐乌斯（Peter Canisius）。对于耶稣会这个新的天主教机构在 1563 年特伦特公会以后迸发出的全面的战斗精神，以及作为其标志的狂热的教义争吵，费迪南德并不喜欢。他于 1564 年死去，而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死前没有达成一个全面的宗教解决方案。

1554 年，费迪南德已经对他死后儿子们的领地分割事宜作出了安排。长子马克西米连二世（Maximilian II）继承帝位、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王位，至于奥地利的两个公爵领，由另外两个儿子费迪南德（Ferdinand）和查理（Charles）继承，他们分别获得上奥地利（蒂罗尔和前奥地利）和内奥地利。于是哈布斯堡奥地利又回归被分割治理的复杂形态，由此带来的常见的恶劣后果进一步削弱了奥地

54

① 合体派（Utraquists），又称圣杯派，主要是追随扬·胡斯的捷克信徒，之所以有这样的称号，是因为他们要求同时有面包和葡萄酒的圣餐礼。

利哈布斯堡家族应付土耳其人威胁和内部宗教危机的能力。西班牙的哈布斯堡支系不知比奥地利支系强大多少，但它仍然对后者有影响，这种影响有时是支持性的，但也可能削弱奥地利的政策或使其复杂化。当时有一种关于专横狂热的西班牙国王的“黑色传说”，说这位国王决意铲除新教徒的“自由”，这就使得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试图同“自己的”新教臣民达成谅解，因为它的新教臣民要难对付得多。

马克西米连二世希望达成这样的谅解。他年轻的时候曾被梅兰希顿（Melanchthon）及其追随者们（Philippists[①]）那种温和的路德派思想吸引，这些人曾试图将新教和天主教重新联合起来。这十分接近于马克西米连的立场，他反复对教皇特使吐露心声：“我既不是天主教徒也不是新教徒，我是基督徒。”[②] 在当上皇帝后，马克西米连并没有成为新教徒，而有些人的确认为（或担心）他会这样做，但是他拒绝反宗教改革的进攻策略。他对自己的新教臣民采取相对宽容的政策，这就导致了 1571 年许可令（Assekuration）的诞生，这份文献承认下奥地利贵族等级内部新教信仰的合法性。他在波希米亚也作出了同样的让步，而那里的新教徒占大多数。

马克西米连之所以愿意采取妥协政策，部分原因是他需要为在匈牙利重新开启的战争筹集钱款，在那里，特拉西瓦尼亚到 1568 年时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独立的诸侯国。虽然 1568 年以后相对和平的局面使马克西米连得以沉湎于一无所获的波兰王位的争夺中，但是，面对土耳其人持续不断的威胁，他仍需要额外的资金来增强边防力量，但掌握钱袋子的各等级会议主要由新教徒控制着。

土耳其人的威胁越是紧迫，反宗教改革就越难以推行。蒂罗尔的费迪南德由于远离土耳其人的威胁、由于其居民仍主要是天主教徒，因而尚能推行某种进攻姿态的反宗教改革。他的兄弟、内奥地利的查

55

① 梅兰希顿名为 Philipp Melanchthon，故他的追随者被称为 Philippists。——译者注

② Jean Bérenger, *A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Empire, 1273—1700* (Harlow, 1994), p. 222.

理虽然也很狂热，但查理的领地最易于受土耳其人袭击，因而不得不在1572年颁布“宗教和解令”（Religionspazifikation），给予贵族以广泛的宗教自由。不过，查理又于同一年在格拉茨（Graz）设立了一个耶稣会学院。各等级会议到底能在多长时间内遏制哈布斯堡家族内部的天主教狂热分子，奥地利家族的温和政策能持续多久，这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1576年，马克西米连二世的长子鲁道夫二世（Rudolf II）继承乃父职位。鉴于哈布斯堡家族的王位是选举产生的，鲁道夫也遵循一种确保王位之继承的做法，事先就当选为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国王和“罗马人的国王”。他在菲利普二世的西班牙哈布斯堡宫廷中长大，但他似乎更多地保留了查理五世的普世主义中的奥地利传统。因此，虽然他不愿意正式承认奥地利两个公爵领和波希米亚的新教徒权利，但他愿意支持当时的信仰多元化，并寄希望于将来的重新统一。

波希米亚显然对他很有吸引力，因为他把自己形态杂乱的领地的首都移到了布拉格。这个做法的部分原因是维也纳的路德派行为过激（骑马进入圣斯特凡教堂），但也因为布拉格坐落在他最富饶的省份的中心，而且远离土耳其人。鲁道夫建立了一个复杂精致的宫殿，将金色的布拉格带入了一个黄金时代。他成为哈布斯堡家族中最重要的艺术赞助者之一，而且是他命人制作了哈布斯堡家族的王冠（但没有哪个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戴过这顶王冠）。他对学术也表现出浓厚兴趣，无论是具有神秘色彩的学术还是自然科学，因为在那个时代，这两种学问之间的区分还不清楚。鲁道夫邀请当时两位最伟大的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和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前来布拉格，同时他也热衷于邀请占星家和炼金术士。



插图 12 奥地利家族的王冠（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

鲁道夫对皇帝的声望看得过重，并不切实际地认为哈布斯堡有成为世界君主们的首脑的权利，不过他并不关心实际的统治权。因此他将很多领地委派给兄弟们去治理，但麻烦也由此而来。像鲁道夫一样，哈布斯堡家的兄弟们，恩斯特（Ernst）、马提亚斯（Matthias）、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和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也都是在西班牙接受教育的。他们在 1578 年都收到了一份家业，并终于在家族事业中找到了一份工作。马克西米连成为条顿骑士团（Teutonic Order）的首领，随后当上了内奥地利——后来还有蒂罗尔——的摄政；恩斯特曾任下奥地利和内奥地利的摄政，后来担任菲利普二世的尼德兰总督，

56

直到1595年；阿尔布雷希特起初是个枢机主教，后来跟菲利普二世的女儿结婚，1598年任南尼德兰的联合总督。但有个兄弟，即马提亚斯，特别难安抚。1595年以前，他负责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的治理工作，但这个工作还不足以满足他的胃口。

57

鲁道夫二世的统治具有权力分散的特征，这就是奥地利哈布斯堡各领地的宗教政策何以呈现巨大差异的原因所在。鲁道夫早年是个温和派，但他的叔叔费迪南德（Ferdinand）在蒂罗尔全力推行反宗教改革。上奥地利的反宗教改革不是很激烈。这个地方的新教优势地位之所以被削弱，关键原因是农民叛乱的影响以及路德派内部神学上的分裂。下奥地利的反宗教改革步调较为一致，也比较成功，它的领导者是梅尔乔尔·克莱斯尔（Melchior Khlesl）。新教宣教师被驱逐出维也纳，很多城镇的和平皈依运动使得天平向有利于天主教的方向倾斜。

在内奥地利，查理和等级会议之间因为新的宗教妥协案“布鲁克和平法令”（Brucker Pazifikation）而发生对抗，结果引发了一场天主教的反击运动。这里的反宗教改革一开始比较温和，但是，当查理的儿子费迪南德于1595年到来后，运动变得严厉起来。他成立一些“改革委员会”，在军队的协助下强制对各教区实行再天主教化。虽然这场运动没有触动贵族，但它已逐步改变了这个地区的宗教性质，运动还于1600年波及两个省城：格拉茨和克拉根福（Klagenfurt）。由于费迪南德可能成为哈布斯堡所有奥地利领地的继承人，他这种坚决而严厉的政策因而更为重要。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费迪南德发起的这场斗争是在土耳其的威胁迫在眉睫的情形下进行的。1568年以后，土耳其人的袭击接连不断，而大规模的战争终于在1593年重新开始。战事开始时形势一片大好，1598年费迪南德占领了特兰西瓦尼亚，但是，强行在当地推行的严酷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引发了1604年的叛乱，这样一来，费迪南德不仅要同土耳其人、还要跟匈牙利人打仗。根据1606年底的和约，特兰西瓦尼亚实际上成为独立的新教堡垒，哈布斯堡还对匈牙利等级会议作出重大让步——其中包括宗教自由——以争取重建其王朝统治权；土耳

其人则首次承认皇帝跟他们享有平等地位，每年向他们缴纳的贡赋则变成了一次性“赠礼”。奥地利人在战争开始时曾有收复失地的梦想，但到头来只是对匈牙利边境稍稍作了修改，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获益的也应该是土耳其人。 58

对于令人失望的战争结局，对哈布斯堡家族的指责主要集中于鲁道夫二世身上，人们认为他不能胜任皇帝一职。鲁道夫在决策的时候的确举棋不定，1605 年，他对人们的批评做出了回应：将战争和议和的职责交给马提亚斯。但是，鲁道夫对随后的和约并不满意，并暗中破坏和约；1606 年 4 月 25 日，克莱斯尔安排几位大公举行秘密会谈，会议同意由马提亚斯接替鲁道夫担任家族首脑。

哈布斯堡家族内部的争吵（Zwist）打乱了哈布斯堡各领地上王朝与等级会议之间的脆弱平等关系。这场争吵导致了一些具有反讽意味的联盟的产生：马提亚斯本来支持克莱斯尔的反宗教改革行动，但现在他不得不寻求匈牙利、摩拉维亚和奥地利两个公爵领的等级会议的支持，而这些等级会议的领袖几乎全是新教徒。1608 年 2 月，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等级会议在普雷斯堡开会，会议支持马提亚斯，但它遭到天主教教士和贵族的抵制。而鲁道夫已经于 1600 年在波希米亚确立了亲天主教的“西班牙派”的地位，故他得以避免在波希米亚议会遭受挫败。在这场危机中，最大的得益者是等级会议和新教徒，他们现在可以待价而沽：两个哈布斯堡家族成员争相作出让步，这种让步在鲁道夫 1609 年 6 月 9 日的君主敕令（Majestätsbrief）中达到顶点，这份文件给予波希米亚的“合体派”——实际上是全体新教徒——以宗教自由。

于是鲁道夫和马提亚斯之间爆发了公开的战争，后者明显占据优势。鲁道夫指望他的堂兄弟、帕绍和斯特拉斯堡的主教列奥波德五世（Leopold V）前来救援，后者于是派遣他的“帕绍战士（Passauer Kriegsvolk）”，一支难以管束的雇佣军，前去攻打布拉格，以声援鲁道夫，但这次行动反倒使波希米亚议会转而支持马提亚斯，后者于 1611 年 5 月加冕为波希米亚国王。鲁道夫二世只剩下皇帝的头衔，留居在

布拉格庞大的王家城堡“赫拉欣”（Hradschin）中，并于1612年1月20日死去。

1612年6月，马提亚斯当选为皇帝。不久，他把宫廷重新设在维也纳，但哈布斯堡权威的重建则更为艰巨。在国内，各等级会议和新教徒的权威和特权已大为增强。马提亚斯没能在特兰西瓦尼亚重建哈布斯堡的权威，1615年，他与土耳其签订《维也纳条约》，哈布斯堡所获甚少，但它将和平局面延续了至关重要的20年。

59

由于1607年的多瑙沃尔特（Donauwörth）危机、1609年的尤里希（Jülich）和克莱夫（Cleves）继承危机，帝国正经历着严重的宗教力量的平衡危机，1609年，新教联盟与天主教联盟发生对抗。双方都对1613年克莱斯尔在雷根斯堡提出的妥协案（Komposition）不感兴趣。克莱斯尔于1614年担任维也纳主教，1615年任枢机主教，但是他的温和作风不再流行了，尤其是不对哈布斯堡家族当然的继承人、内奥地利的费迪南德二世（Ferdinand II）的胃口。

从政治、宗教和民族意义上说，波希米亚事态的发展首当其冲。1615年，波希米亚议会（diet）通过反德意志的立法，马提亚斯被迫接受。强硬的费迪南德二世可能成为皇帝和国王，这种前景使冲突进一步激化。1617年6月，费迪南德二世正式当选并加冕为波希米亚国王，但遭到议会内部激进派的强烈反对，而激进派很快就占据了上风。关于宗教权利的辩论不断升级，终于，1618年5月23日，愤怒的议会代表将两个王家官员及其秘书从赫拉欣的窗户扔了出去。这几个不幸的人都没有受重伤，他们都逃离了，但是，布拉格的掷出窗外事件成为了战争的引信。

马提亚斯最初的妥协尝试被费迪南德挫败，后者现已正式成为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国王。费迪南德下令秘密逮捕克莱斯尔，将后者关在蒂罗尔的安布拉斯（Ambras）城堡。马提亚斯现在发现，他和此前的鲁道夫兄弟一样，在面对僭越的继承者的挑战时无能无力。当马提亚斯于1619年3月29日死去时，费迪南德手下的主战派——他们得到西班牙的支持——已经发起进攻了。

三十年战争使中欧，特别是德国在人口和经济方面付出了巨大代价。不过，尽管波希米亚的王室领地，特别是西里西亚（Silesia），也受到严重破坏，但奥地利领地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战争灾难。但是，这场战争对哈布斯堡的发展方向造成了深刻影响。在曲折反复的战争进程中，哈布斯堡谋求政治霸权和宗教统一的雄心有时似乎快要实现，但是，它的摊子铺得太大，而且法国和瑞典在军事实力上占据优势，哈布斯堡在欧洲和帝国的宏伟抱负最终化为泡影。不过与此同时，这场战争也增强了哈布斯堡在中欧各领地内部实现此类抱负的能力。 60

人们对1619年战争的潜在意义的理解，与对1914年战争之意义的理解一样少。起初的波希米亚危机是否仅仅是一场内部争吵，这个问题甚至都不清楚。波希米亚等级会议选举新教联盟的首脑、巴拉丁的弗雷德里克五世（Frederick V）为波希米亚国王，但此举并没有赢得各大新教势力对波希米亚事业的支持。1619年8月，费迪南德二世被选帝侯们一致推举为皇帝，其中包括巴拉丁的弗雷德里克五世。1620年3月，新教的萨克森同费迪南德二世结盟，7月，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领导的天主教同盟与新教同盟缔结互不进攻条约，天主教同盟现在可以放开手脚支持费迪南德二世对波希米亚人采取的行动。

费迪南德需要巴伐利亚的帮助，因为波希米亚的反叛只是席卷所有哈布斯堡领地的等级会议反叛的一个部分。1619年夏天，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等级会议加入了波希米亚人的事业，这里的领导人物是格奥尔格·埃拉斯穆斯·冯·切尔南布尔（Georg Erasmus von Tschernembl），与此同时，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和劳济茨（Lusatia）等地的等级会议也纷起仿效，当年冬天，特兰西瓦尼亚的诸侯加布列尔·贝特伦（Gabriel Bethlen）占领了匈牙利的哈布斯堡控制区的大部分地带。1619年，费迪南德成功地遏止了波希米亚人对维也纳的进攻，并回绝了下奥地利等级会议的“请愿攻势”，但他的内部地位是虚弱的。他如此急迫地想要获得外部支持，以致他把巴伐利亚和萨克森占领的哈布斯堡领地（分别是上奥地利和劳济茨）作为抵押。他同样欢迎西班

牙的堂兄弟的帮助和指导。随之而来的战争更多的是西班牙在谋求欧洲霸权，对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来说，它更关心的是自己在各省和帝国内部的地位。

这种外来的帮助，再加上叛乱造成的混乱局势，为哈布斯堡家族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在收复上奥地利以后，1620 年 11 月 8 日，瓦隆人让·切克莱·德·梯里（Jean Tserklaes de Tilly）率领的天主教—帝国联合部队在白山（White Mountain）战役中半个小时就击溃了波希米亚军队。费迪南德二世并没有表现出“哈布斯堡的宽大”。1621 年 6 月 21 日，布拉格一天之内就处决了 24 名叛乱首领，更多的人则被剥夺财产，被迫流亡。他们的土地被分割成小块，作为奖赏分给效忠派和外来帮手。等级会议曾紧抓不放的所有特权都被视为无效。反宗教改革运动以最激烈的形式开展起来。根据 1627 年的“重振省区秩序条例”（Verneuerte Landesordnung），波希米亚王位改为由哈布斯堡家族世袭，议会的权力被削减到最低限度，成为没有实际内容的装饰品。1620 年的事件粉碎了波希米亚的抵抗力量。捷克文化和文学实际上消失了，德语成为官方语言；现在的波希米亚已成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绝对主义权威的主引擎。

61

接着，费迪南德二世在其西班牙和巴伐利亚盟友的催促下，把战争扩展到整个帝国。他对巴拉丁的弗雷德里克五世发动残酷无情的战争，巴拉丁人团结新教势力，将一场国内危机转变成了帝国范围的战争，荷兰联省共和国和丹麦为支持新教的事业而介入战争。再加上在匈牙利的战争，在瑞士格劳宾根（Grisons）和意大利曼图亚（Mantua）的军事行动——以便为西班牙军队取得一条从马德里经米兰一直通往布鲁塞尔（Brussels）的陆上通道，战火已经席卷中欧的大部分地区。虽然法国正在逐步卷入冲突，但西班牙和帝国军队仍控制着局面，而帝国军队现在有了新的首领，这就是华伦斯坦的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 of Wallenstein）。到 1629 年，费迪南德二世似乎成了欧洲的主宰了。

甚至将上奥地利抵押给巴伐利亚的做法也给哈布斯堡带来了积

极的后果。上奥地利公爵领新来的巴伐利亚统治者在发动再天主教化的同时，以极为野蛮的方式征收沉重的税赋（以弥补巴伐利亚的开支），这种野蛮体现在“法兰肯堡的骰子”（Frankenburger Würfelspiel）中，即农民头领们被强迫以投骰子的方式决定谁将被处决。这种暴虐统治导致了 1626 年的农民起义。磨坊区是起义的中心之一，莱昂菲尔登成为起义的主战场之一，8 月 30 日这里发生了一场大战。巴伐利亚和帝国的联合部队扼杀了起义，野蛮的镇压随之而来。1628 年，当这个地区交还给奥地利时，抵抗运动已经被粉碎，百姓几乎感激哈布斯堡统治的恢复，虽然后者带来了反宗教改革和绝对主义的双重负担。在奥地利的各个领地中，费迪南德二世只容忍下奥地利存在新教信仰，但这种容忍也仅仅是对效忠的贵族而言。新教在其他地方都被禁止，新教信徒必须作出艰难的抉择：要么皈依天主教，要么迁走。

62

因为胜利而得意忘形的费迪南德二世现在有些自不量力了。他于 1629 年颁布复教敕令（Edict of Restitution），试图让帝国重新回到 1555 年时的宗教状态。这一次，皇帝权威的声张太过分了，不仅新教势力这样认为，皇帝的同盟者也这样看。在 1630 年的选帝侯会议（Kurfürstentag）上，选帝侯们压制哈布斯堡的权威，并迫使费迪南德二世解雇华伦斯坦。但这个时候，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Gustavus Adolphus II）的军队已经在施特拉松德（Stralsund）登陆了。

一开始，德国的新教徒对是否欢迎瑞典人参战心存犹疑，因为瑞典受天主教法国的支持，而且它明显对德国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有所图谋。但是，1631 年 4 月，当梯里的帝国军队纵火夷平马格德堡（Magdeburg）后，所有的犹疑都消失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的军队已经控制了德国的大部分地区，布拉格和巴伐利亚也被瑞典人占领了。

于是奥地利也受到了威胁，费迪南德二世只得再次求助于华伦斯坦，后者现在成为最高统帅（supremo），负责挽救军事颓势。虽然古

斯塔夫·阿道夫1632年在吕岑（Lützen）战死，但瑞典人的战争行动仍在继续，而且法国的作用越来越大，战争中的华伦斯坦则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独立因素。后来的结局是，根据费迪南德的口头命令，华伦斯坦于1634年2月被谋杀。效忠于皇帝的帝国将军们兴高采烈地分割华伦斯坦的财富和辽阔的地产，但是杀害华伦斯坦的不光彩的方式对哈布斯堡的威望来说是个严重打击，因为这似乎证实了皇帝家族的卑鄙。

帝国军队在1634年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而且诺德林根（Nördlingen）战役的胜利本来能为哈布斯堡赢得一个有利的和约，如果这时战争仍主要是德国的事务的话。但是，1635年5月19日，法国向西班牙宣战，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对哈布斯堡家族而言，这是个灾难性的阶段。1636年底，德国北部再次被瑞典人控制。当费迪南德二世于1637年2月15日死去时，留给他的继承人费迪南德三世（Ferdinand III）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个更讲实际的皇帝必须将哈布斯堡的事业从他父亲的极端主义酿成的烂摊子中拯救出来。

63

哈布斯堡家族、天主教和帝国的力量都被迫退却。1639年，法国占领阿尔萨斯；瑞典军队游荡到德国中部和波希米亚，并于1642年进入西里西亚和摩拉维亚。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势力一度十分强大，但如今，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向其西班牙堂兄弟的求援已是徒劳无功了。西班牙受到法国的压力，莱茵河沿岸的供应线已被切断，加泰罗尼亚（Catalonia）和葡萄牙出现叛乱，作为军事强国的西班牙处于崩溃之中。

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和巴伐利亚只有依靠自己了。奥地利的北部边境地带匆忙之间建起了防御工事，今天还能在巴登—莱昂菲尔登城外见到这些工事的遗迹，不过当时它们并无效果。瑞典军队穿过波希米亚，1645年入侵下奥地利，占领克莱姆斯（Krems）。如果不是土耳其苏丹制止特兰西瓦尼亚军队的推进的话，瑞典军队有可能联合后者攻占了维也纳。巴伐利亚于1646年被占领；1647年，一支瑞典军队

攻占布雷根茨；1648 年夏天，另一支瑞典军队占领布拉格的赫拉欣城堡，将传说中的鲁道夫二世的珍藏洗劫一空。1648 年秋天，皇帝终于在闵斯特（Münster）和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分别同他的法国和瑞典对手签署了和约。法国和西班牙的战争一直拖到 1659 年，但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和约结束了中欧的敌对行动。

和约是按法国和瑞典的条件拟定的。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实际领地损失不只是阿尔萨斯大片受战火蹂躏、最后让与法国的地区。抵押给萨克森的劳济茨完全让了出去。奥地利的巴伐利亚盟友尚能保有上巴拉丁地区和第七个选帝侯席位。对哈布斯堡家族而言，更为严重的是帝国疆域的缩减和家族在帝国内部的地位的下降。瑞士和联省共和国完全脱离了帝国，剩下来的地方等级会议成员如今成为完全独立的政治因素：实际上，他们把这些等级会议改组成了真正的国家机构。从宪法制度上说，帝国已经蜕变为一个松散的国家联盟，这些国家仅仅因为皇帝、帝国议会和两个法院的选举而联系在一起。为实现帝国权威而进行的战争到头来掏空了皇帝的权威。对哈布斯堡帝国家族而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见证了帝国内部和外部各竞争性权力中心的增长。法国、瑞典和丹麦现在可以任意干涉帝国事务，而巴伐利亚、萨克森和勃兰登堡（Brandenburg）都获得了土地。

在欧洲舞台上，哈布斯堡的优势地位已经被法国波旁（Bourbon）王朝的霸权取代，而在帝国内部，哈布斯堡的势力大为削弱。不过在内政方面，这场战争堪称哈布斯堡绝对主义和天主教反宗教改革的胜利。64 波希米亚和奥地利各等级会议和新教势力被摧毁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只有在西里西亚的部分地区和下奥地利的贵族中间，新教仍然被容忍。大量人口从波希米亚和奥地利世袭领地迁走而不是改宗天主教，两地外迁的人口数量估计分别为 20 万和 10 万。留下来的新教贵族后来也皈依天主教，而哈布斯堡的领地（匈牙利除外）也成为巴洛克时代天主教统一的典范。普世君主国的宏愿已经失败，不过，哈布斯堡那种由神意选定、宗教统一的世界观如今可以在其领地上实现了，而实现的方式即使是在查理五世时代也不可能出现的：王朝、教会和贵族三位一体的哈布

斯堡君主国，其奠基工作现在可以认真考虑了。

这种新体制对奥地利历史的影响将十分深远。在奥地利的世袭领地上，很多原来的新教徒变成了“隐蔽的新教徒”（crypto-Protestants），他们表面上遵守天主教信仰，但其内心即使没有保留正式的新教信仰，至少也对天主教教义有强烈的怀疑或明显的敌意。这种“隐蔽的新教徒”传统，无论是在大众宗教中还是在高级的精神文化中，都一直延续到现代，它极大地推动了奥地利和维也纳的一种思想倾向的形成，这就是怀疑任何将外表与内在划等号的做法，怀疑外在的顺从和内心信念的一致性。从消极意义上说，在国外的新教徒中间，在后来的启蒙信徒和自由主义者中间，“奥地利”是个笑柄，因为它强迫人们服从巴洛克天主教这一迷信的宗教。

这种身份认同可能十分深入。1899 年，当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为他的《梦的解析》选择题词时，最初他挑选的是 Flavit et dissipati sunt（神吹一口气，它们就四散）。虽然最后他以《伊尼阿德》（*Aeneid*）中的引语取而代之，但最初的那句看来更适合于弗洛伊德的“谈话疗法”。然而，这句后来从原文中删去的话曾出现在一枚纪念币上，当时铸造这枚纪念币是为了庆祝 1588 年英国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在纪念币上，这句拉丁语出现在一副描绘菲利普二世的海军被大风摧毁的画面周围，画面上方则是以希伯来字母书写的“神”字。这画面描述的是希伯来神在吹气。因此，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可以看作争取精神自由的另一段故事，他以新教、英国和犹太的传统来反抗菲利普二世、西班牙、天主教、哈布斯堡和奥地利的压迫。①

65

① W. J. McGrath, *Freud's Discovery of Psychoanalysis: the Politics of Hysteria* (Ithaca, 1986), pp. 172—173.



插图 13　无敌舰队纪念币（伦敦国立海军博物馆）

三、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奠基，1648—1740 年

在 30 年战争之后的一个世纪中，哈布斯堡及其中欧领地的命运发生了另一场深远的变化。战争结束后不久，经济和人口迅速恢复，而我们所称的奥地利巴洛克时代的新政治、宗教和文化霸权也得以巩固。除了国内的局面稳定之外，外部的巨大胜利随之而来，尤其是在东南边境地带，到 1714 年时，这些胜利奠定了哈布斯堡君主国在欧洲国家体系中的强国地位。但是，这个君主国的力量和威望的根基很不牢靠，它仍然依赖于帝国和宗教正统性等传统观念，而在正在出现的理性国家观念中，这种依赖关系已经落后于时代了。 66

正是由于十分成功地适应了巴洛克时代的使命，奥地利哈布斯堡

家族发现自己很难与启蒙时代协调起来。实际上，早在哈布斯堡推行反宗教改革之前，“巴洛克”风格就已经出现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地区了，这就是不受哈布斯堡控制的萨尔茨堡。在当地一系列崇尚文化的大主教的支持下，沃尔夫·迪特里希（Wolf Dietrich）、马库斯·西提库斯（Marcus Sitticus）和帕里斯·罗德隆（Paris Lodron）等人把这个城市建成了“德国的罗马”。意大利建筑师们是一些建筑杰作的指导者，如大教堂（1628），如大主教的夏宫赫尔布伦（Hellbrunn）（1613—1619）及其著名的喷泉。1618年，赫尔布伦还成为第一个在阿尔卑斯山以北上演意大利歌剧的地方。

萨尔茨堡在整个三十年战争期间始终保持中立，而作为中欧的一种文化风格，巴洛克的成功与哈布斯堡在各臣服于它的领地上的胜利姿态并无必然联系。不过，巴洛克风格被传到了这些领地上，而且非常适合在那里发展。在布拉格的小城区（mala strana），来自旧贵和“簇新”家族（以前的冒险家和取得被剥夺的议会财产的商人）的富豪们建起了巴洛克式宫殿，这种建筑象征着他们在新秩序中的高级地位。这个新秩序的基础是强加给农民的“再版农奴制”（尤其是在被征服的波希米亚），是以小贵族的利益为代价的大贵族的崛起和反宗教改革的教会制度的确立。从此，聚集起来的大量资源被花费在宫殿和教堂上，花费在以石头和灰浆来表现哈布斯堡—贵族和教会的光辉神授秩序的其他建筑上。

67

巴洛克风格有这样一种作用，它对神的尘世秩序的颂扬是一个维持政治秩序的因素，而这种做法深深植根于哈布斯堡的传统之中。奥地利的巴洛克风格可以定义为：意大利艺术被哈布斯堡利用，以提升其在中欧的权威。这就使得意大利风格、德意志和中欧文化产生了新的交融，这种交融的痕迹依然可以在前哈布斯堡的领地上看得到。

虽然这种新哈布斯堡王朝的文化取得了种种成就，但它是一种建立在迷信和宗教不宽容之上的文化。由于顽固地相信幻术、炼金术等神秘学说，哈布斯堡各领地看起来像个犯了时代错误的怪诞之物。诚然，牛顿本人也涉猎炼金术，而一个屡受瘟疫和流行病困扰的时代也

的确喜欢钻研超自然的学说，但是，由于反宗教改革强调的是基督教的白色幻术，由于超自然的圣徒的介入和妄自尊大的天主教教义的影响，哈布斯堡的中欧地区看来偏离了“理性时代”。

正是在这个时期，各种基督教崇拜仪式发展到了极致，无论是圣体崇拜还是圣母玛丽亚崇拜。圣体崇拜尤其受哈布斯堡的喜爱，这体现在每年一度的圣体（Fronleichnam）游行中，直到 20 世纪初，弗兰茨·约瑟夫（Francis Joseph）还参加这种游行。1676 年，列奥波德一世（Leopold I）参观玛丽亚策尔（Mariazell）的圣母神祠，并将圣母作为帝国军队的最高统帅（generalissim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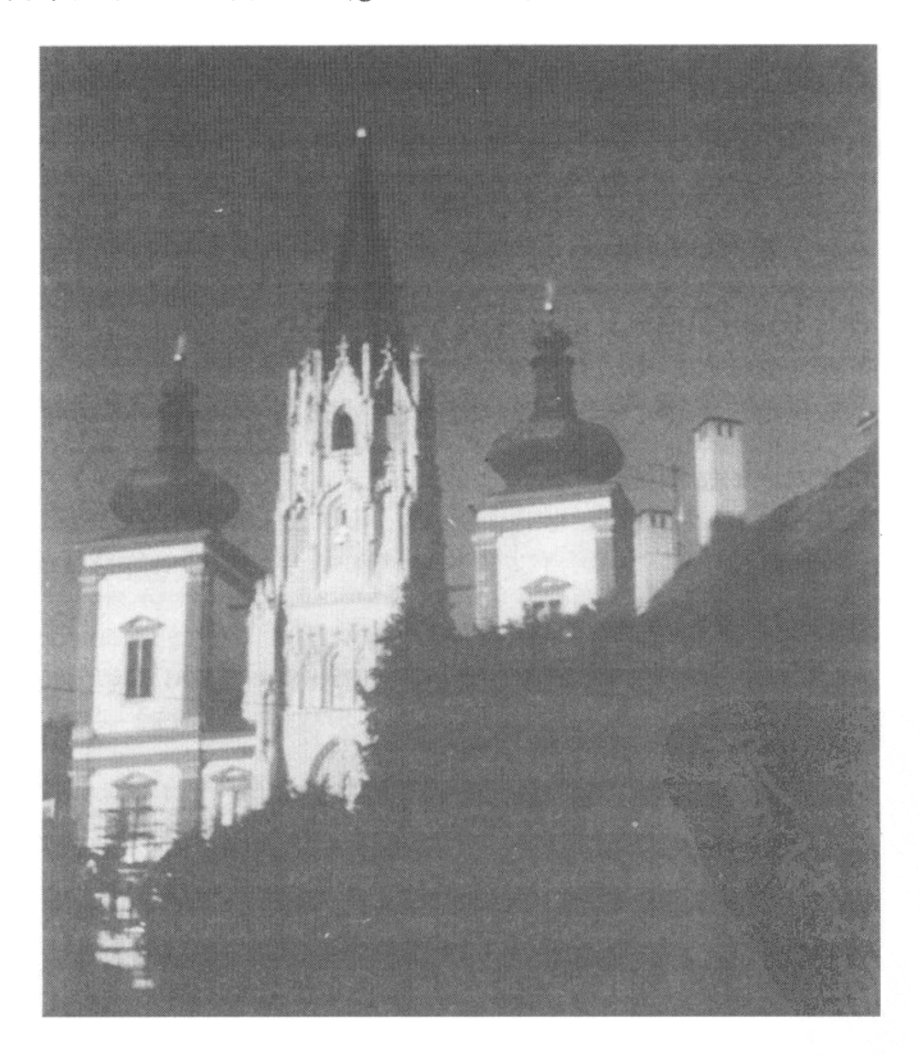


插图 14 玛丽亚策尔

宗教不宽容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英国和法国都是如此。但是，哈布斯堡的不宽容有一种特别明显的倒退性质。波希米亚和奥地利的宗教统一运动的推行异乎寻常地顺利，虽然民众的宗教转变到底有多深刻仍可存疑；但是，一俟各种反宗教改革委员会让人接受了对天主教的形式上的、外在的服从后，对广大民众的宗教教化职责再次被忽视。不过，在匈牙利，强制推行天主教统一的尝试从未取得完全的成功，而且还恶化了哈布斯堡和匈牙利的关系。

68 在奥地利巴洛克时代的阴暗面中，最恶劣的产物是蒙昧主义与仇外思想伴生的一种丑恶现象。1670 年，列奥波德一世驱逐维也纳的犹太人社团，此举部分是应维也纳商人的请求，但部分原因也在于满足他的西班牙妻子的天主教狂热。在文学方面，奥地利巴洛克时代最有力的倡导者是亚伯拉罕·阿桑科塔·克拉拉（Abraham a Sancta Clara），此人 1677 年后成为维也纳的宫廷布道神父。他生于施瓦本，69 原名约翰·乌尔里希·梅格尔（Johann Ulrich Megerle），后来以稀奇古怪的诙谐布道词而闻名，他那机智风趣的用语使人忽略了其布道中的缺乏条理之处。他的布道被赞誉为充满灵感的演讲术的典范，其中充斥着道德说教、牛皮大话和深刻的惶恐，这体现在他对新教徒、土耳其人和犹太人的猛烈抨击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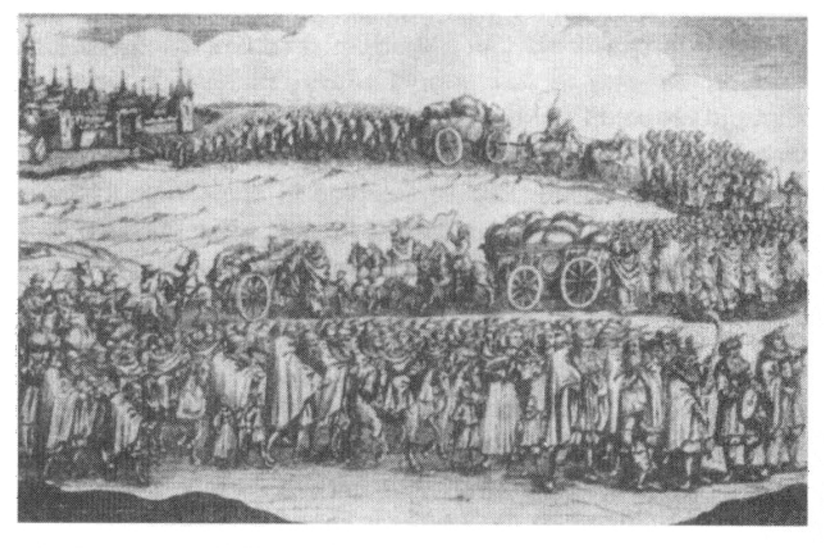


插图 15　1670 年维也纳等地驱逐犹太人（维也纳犹太博物馆）

奥地利巴洛克时代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信心与惶恐的奇特混合，这种混合部分来自哈布斯堡在大的国际格局中的脆弱而不和谐的地位。奥地利巴洛克时代的思想意识与其具体现实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的欧洲舞台上，哈布斯堡的皇帝几乎总是要依靠新教盟友来反击“天主教”法国对其地位造成的威胁。

法国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成为欧洲的支配性力量。费迪南德三世于 1657 年死去，他的儿子列奥波德只是在屈服于法国的压力并接受一项禁止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帮助其西班牙堂兄弟的投降条约之后，才于 1658 年当选为皇帝。1654 年，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Christina）放弃王位并皈依天主教——皈依仪式在因斯布鲁克的宫廷小教堂举行，这样一场天主教的胜利有可能导致一场奥地利可能会赢的战争，但是，法国人的外交手腕为瑞典赢得了 1660 年的和约。　70

最初，列奥波德一世试图抗拒法国霸权所带来的必然后果。在 1667—1678 年的遗产战争（War of Devolution）中，他没有与新教各国一起抵制路易十四（Louis XIV）的侵略战争，而是采取姑息路线。然而，1672 年法国进攻联省共和国，列奥波德不得不抵制。1672—1679 年的荷兰战争期间，天主教皇帝热情地与加尔文派和路德派结盟，以反对他的堂兄弟和作为天主教教友的路易十四，这种做法原因很简单，因为不这样做就意味着法国的全面霸权。实际上，1679 年的尼曼根（Nijmegen）条约标志着法国扩张时代的到来：法国以“合并”方式兼并其东部边境的土地，其顶峰则是 1681 年对斯特拉斯堡（Strasburg）的兼并。

哈布斯堡在西部的影响力受到其东方政策的拖累，特别是它在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领地的政策。为了击退土耳其人，列奥波德要求组建一支帝国部队，这支部队于 1664 年在施蒂里亚的圣戈达尔（Saint Gotthard）取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但是，由于担心法国在西部的威胁，列奥波德同意签订和约，但和约条款是如此不利，以致匈牙利的

领导阶层勃然大怒并发动叛乱。但这次天主教“贵族密谋”的抵抗一开始就没有什么效果，它很快就被发现，其策划者于1671年被处决。作为对这次密谋的反应，列奥波德强制推行绝对主义体制，并开展大规模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于是匈牙利北部各郡于1672年发生叛乱，叛乱很快就发展成为新教十字军（kuruc）和天主教效忠派的步兵（labanc）之间的全面内战。

1681年，列奥波德对匈牙利领导层作出重大让步，首先是恢复新教徒的权利。但是，新教十字军的反抗仍在继续，他们得到奥斯曼宰相（或称大维齐尔：Grand Vizier）卡拉·穆斯塔法（Kara Mustapha）的支持，而后者又受法国怂恿而攻打奥地利。因此，1683年的围攻维也纳发生在匈牙利的解放运动和法国的外交手腕的大背景下。1682年，新教十字军的行动仍然限于匈牙利，但是，卡拉·穆斯塔法决心利用哈布斯堡因此而出现的虚弱，派遣大军以图最后征服这个16世纪以来一直脱逃土耳其人控制的基督教堡垒。

71 对列奥波德和哈布斯堡家族而言，1682—1683年土耳其向维也纳的进军简直是天赐良机。虽然法国人施展了各种手腕，但帝国和中欧的绝大部分邦国都站到了皇帝一边。教皇英诺森十一世（Innocent XI）、意大利的大部分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提供了钱款。哈布斯堡的军队由洛林公爵查理（Charles）率领，起初它退到多瑙河北岸，让戒备森严的维也纳直面土耳其人的进攻。这座城市于6月中旬被围困。在城防司令恩斯特·吕迪格尔·冯·施塔亨堡（Ernst Rüdiger von Starhemberg）伯爵和市长安德烈亚斯·里本贝格（Andreas Liebenberg）的指挥下，维也纳人坚守城池，粉碎了土耳其人突破城墙的努力。与此同时，一支大军正在集结，除了哈布斯堡和波兰的军队，还有来自帝国各地的部队。1683年9月12日，这支军队从光头山发动进攻，击溃土耳其军队，并以持续的反攻追击敌军，终于大获全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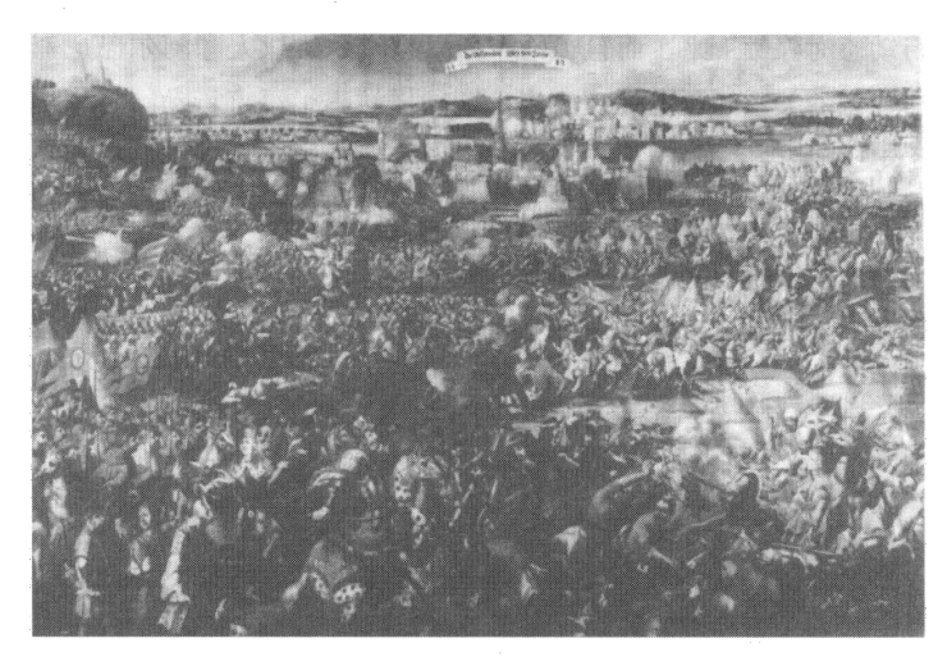


插图 16　“1683 年维也纳的围困与解围”（维也纳军事史博物馆）

据说，维也纳的第二次解围催生了两种饮食习俗，一是咖啡馆的出现，另一个则是月牙状早餐面点（Kipfel）的诞生，据说这种面点最初是维也纳为了庆祝战胜土耳其穆斯林而烤制的，后来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把它带到了法国。在巴黎，早餐面点仍被称作 viennoiseries——维也纳式小面包。

维也纳的解围对奥地利历史产生了变革性的实际效应。在 1683 年之前，捍卫哈布斯堡在帝国内部的地位免受法国的侵犯是头等要务。如今，土耳其的威胁已不复存在，哈布斯堡军队已深入到东南边境地带，这些都大大改变了哈布斯堡的力量源泉。洛林公爵查理是这种转变的象征。由于领地被法国占领，这位公爵投靠哈布斯堡，并在莱茵河地区作战；现在他正在多瑙河边成就辉煌的业绩。

这一成就是引人瞩目的。法国由于其土地“合并”行为得到确认而保持中立，于是神圣联盟的军队继续扩大战果。1685 年，波兰出于法国的压力而退出联盟，但勃兰登堡的加入取代了波兰的地位。联军于 1686 年攻陷奥芬（Ofen），1688 年占领贝尔格莱德。

1689 年，奥格斯堡同盟（League of Augsburg）战争使得东方的进

攻行动暂时停顿下来，而且，哈布斯堡与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在居住区的关系问题上处理不当，这同样妨碍了军事行动。贝尔格莱德于 1690 年再度失守，3 万多塞尔维亚人跟随哈布斯堡军队撤离，后来定居在匈牙利南部。1697 年，当萨伏伊的欧仁（Eugene of Savoy）亲王成为新的总司令后，哈布斯堡的命运迎来了一个新的上升期，这个西欧人最初为法国服务，但他是在“蛮荒的东方”成就了其辉煌的军旅生涯的。1697 年 9 月 11 日，他在曾塔（Zenta）大获全胜，而一度不可一世的土耳其军队则被烙上耻辱的印记。

73

1699 年的卡尔洛维茨（Carlowitz）和约为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带来了巨大收获。整个匈牙利王国，除了斯洛文尼亚（Slavonia）的一个小地带和蒂米什瓦拉（Temesvar）的巴纳特（Banat）外，全部归奥地利所有，特兰西瓦尼亚同样转归奥地利。在西方的战争中，列奥波德与新教和英国“光荣革命”的领袖、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结盟，1697 年，这个盟约也给哈布斯堡带来收获，但与东方的成就相比就不值一提了。

在军事上对土耳其人（及新教十字军 kuruc）的成功也大大增强了列奥波德在匈牙利的地位。一开始，他在这块新获得的土地上建立起一种相当严厉的体制，不过他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教训，设法与匈牙利领导阶层和解。在 1687 年的普雷斯堡帝国议会上，他同意维护匈牙利宪法并尊重新教徒的权利。作为回报，议会同意匈牙利王位由哈布斯堡家族的男系世袭继承，匈牙利人也放弃抵抗的权利。1690 年，列奥波德同样认可特拉西瓦尼亚的传统宪法，1691 年 12 月，他颁发“列奥波德诏书”（Diploma Leopoldianum），这份文件承认帝国议会中所有传统团体的宗教和民族权利（但罗马尼亚东正教徒除外）。到 1699 年，列奥波德的温和政策为他赢得了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的承认，哈布斯堡不可争辩的统治权扩展到一个辽阔的帝国。

与此同时，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由于查理二世（Charles II）没有男性继承人而面临王朝的终极噩梦：香火断绝。西班牙的王位继承问题支配着 17 世纪末的欧洲政治。当查理二世于 1700 年死去

时，真正有资格的继承人只有两个：或者是奥地利哈布斯堡家的，或者是法国波旁家的。查理二世直到最后的弥留之际才选择列奥波德的次子、奥地利的查理（Charles）作为他唯一继承人。但是，在他最后的遗嘱中，他被劝说将自己的帝国留给路易十四的孙子、安茹的菲利普（Philip of Anjou）。路易十四提出了一个瓜分西班牙领地的计划，但其条件是列奥波德不能接受的。结果就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74

从 1701 年到 1714 年，法国几乎和欧洲所有其他国家作战，虽然它遭受到耻辱性的挫折，但波旁家族仍控制着西班牙及其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不过，这场战争见证了哈布斯堡奥地利已成为欧洲新的大国均衡中的关键角色，以及新教英国和天主教皇帝结盟所产生的成果。随着盟军在布伦海姆（Blenheim，1704）、拉米里斯（Ramillies，1706）、奥登纳德（Oudenarde，1708）和马尔普拉盖（Malplaquet，1709）接连告捷，战争达到了高潮。在这些战役中，马尔波罗（Marlborough）的“英军”的胜利是以欧仁的奥地利军队的支持为条件的。战争不仅波及尼德兰，意大利、莱茵地区、西班牙本土、殖民地都有军事行动，甚至匈牙利的新教十字军也再次掀起叛乱。本来还有可能出现一个北方战线，但约瑟夫一世（Joseph I）于 1707 年在阿尔特兰施泰特（Altranstädt）向瑞典的查理十二（Charles XII）允诺尊重西里西亚的新教徒的权利，从而避免了这里的战事。

1703 年，奥地利曾面临严重危机，因为巴伐利亚对它发起进攻，而匈牙利又发生起义，不过当贝伦海姆战役迫使巴伐利亚于 1704 年退出战争后，军事行动进展十分顺利，以致让人看到了哈布斯堡的势力大为扩张，甚至恢复了西班牙—奥地利两个哈布斯堡家族联合霸权的境况。1709 年，路易十四已准备寻求某种条件苛刻的和约。然而，如果不是英国主和派的托利党人赢得大选的话，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的盟国也许不会同意议和。更为严重的是，1705 年列奥波德死去后继承帝位的约瑟夫一世也在 1711 年 4 月 17 日患天花死去，查理成为他的继承人。

1711年，查理当选为皇帝，由于当年匈牙利的新教十字军叛乱得以和平解决，他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但是，让帝国皇帝和西班牙王位由同一个哈布斯堡人兼任，这违反了两个海上强国，即英国和荷兰正在酝酿的新的大国均衡政策。查理六世（Charles VI）仍在固执地梦想着继承西班牙王位，但他被自己的盟友抛弃了，后者于1713年同法国人在乌德勒支（Utrecht）签订了和约。查理六世在战争继续了一段时间以后，也于1714年在赖斯塔特（Rastatt）签署了一个不是很有利的和约。

75

但查理和哈布斯堡家族仍然获得了很大的利益。“奥地利”在策略上已经承认失去了西班牙本土及其海外帝国，但它获得了西班牙在欧洲的大部分领地：意大利的大片地区，包括米兰、曼图亚、米兰多拉（Mirandola）、萨丁（Sardinia）和那不勒斯；此外还有西班牙在尼德兰的领地。意大利北部地区经济繁荣、战略位置重要，是名副其实的丰厚奖品，那不勒斯则要逊色一些。西属尼德兰领地的获取从一开始就是个难题，因为它而对荷兰人作出了难以忍受的让步，包括封闭斯凯尔特河（Scheldt）的商道，这个条款等于在经济上监禁了安特卫普。甚至在西属尼德兰并入之前，欧仁就曾尝试用它来交换巴伐利亚。尽管如此，赖斯塔特和约和卡尔洛维茨和约带来的双重收获已使哈布斯堡奥地利成为欧洲舞台上的一个强国。

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就伴随着经济上的扩张，这种扩张有利于豪强地主，如里希滕施坦因（Liechtenstein）和埃斯特哈齐（Esterhazy）等人。波希米亚和奥地利核心地带的庄园资本主义给农民带来了更为沉重的负担，不过也给大贵族带来大笔收入。与此同时，在被收复的匈牙利土地上，几十年的战争致使人口锐减，但大规模的殖民，特别是德意志人和塞尔维亚人的殖民活动，改变了这个地区的地理风貌和族裔构成，那些从封建领主向经营业主转变的土地领有者再次从中获益。哈布斯堡统治精英和哈布斯堡家族自己有很多事情要庆贺一番，如今他们有条件去搞庆祝了。这就是巴洛克盛期的成就，而比较具体的表现物今天依然俯瞰着奥地利的乡间田园。



插图 17　格拉茨的多瑙河施瓦本人纪念碑

1683 年以后，维也纳的面貌发生了重大变迁，因为大贵族们纷纷修建宫廷，无论是城墙内还是在城墙外。这一重建热潮的象征就是欧仁亲王自己的两座夏宫。建筑的设计者是卢卡斯·冯·希尔德布兰（Lucas von Hildebrandt），1723 年完工。上下贝尔维德宫（Upper and Lower Belvedere）至今仍是奥地利最珍贵的建筑遗产之一；堪与之称伯仲的是 1716—1739 年修建的卡尔教堂（Karl-skirche），设计者是约翰·伯恩哈德·费舍尔·冯·埃拉赫（Johann Bernhard Fischer von Erlach）。这两座建筑象征着贵族和教会的权威，但也见证着王朝的光荣，因为贵族在为王朝服务，王朝还是教会的保护者（虽然为这一建筑事业提供资金的是查理的犹太金融家萨姆松·维特海默［Samson Wertheimer］）。当巴洛克成为奥地利哈布斯堡领地上无处不见的风格时，它也就与环境浑然一体了。贝尔尼尼（Bernini）的学生费舍尔声望最高，申布隆宫（Schönbrunn）最初就是委托给他修建的；希尔德布兰负责以巴洛

76

克风格重修哥特维格修道院；不过，最富标志性、气势最宏伟的巴洛克建筑的设计者是奥地利建筑艺术中的第三位明星雅各布·普兰陶尔（Jakob Prandtauer），这件作品是位于梅尔克的修道院，它至今还威严地耸立在瓦豪河谷入口处的多瑙河谷地上，使人不会怀疑这里当年曾是权威和荣誉的所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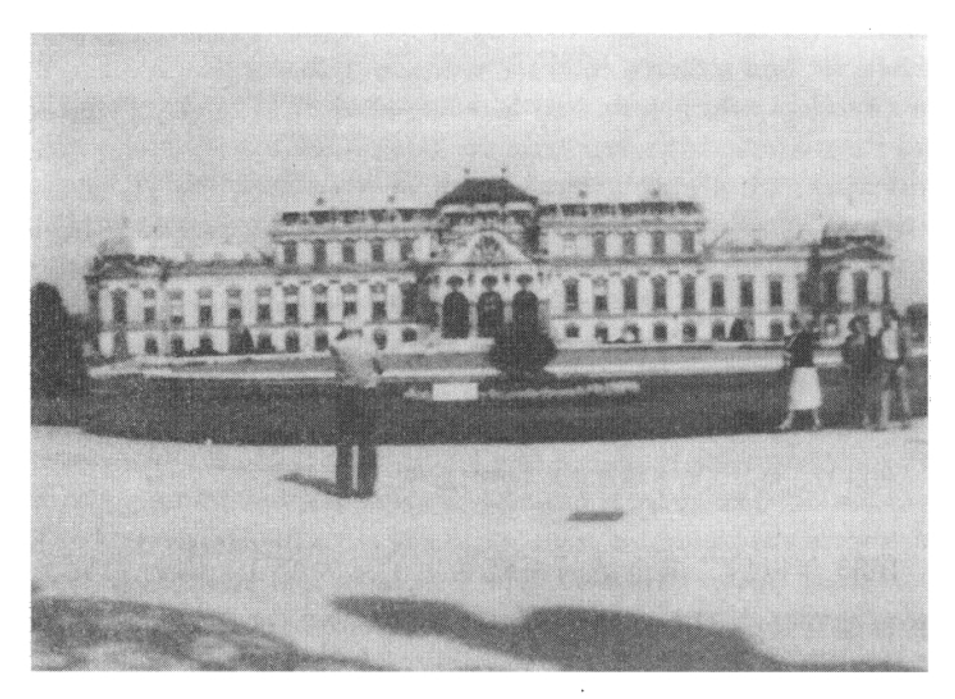


插图 18　维也纳的上贝尔维德宫*

77　鼎盛时期的巴洛克风格在奥地利领地的传播广泛而深远，成为哈布斯堡权威的一种潜在象征，而且这种文化也深入到普通百姓中。莱昂菲尔登也接受了巴洛克文化的一份不起眼的馈赠。1686 年，这个村子里的泉水神奇地治好了一个木匠的病，于是这眼泉水成了朝圣地，后来人们从玛丽亚策尔请来了一樽圣母玛利亚的神像。在这个朝圣地上最初建起的是一个木制小教堂；1761 年扩建为一个较大的、巴洛克风格的石砌教堂；到 1790 年，这座布伦德尔教堂（Bründlkirche）终于完成了最后的扩建。但是到这时，巴洛克已成为落伍的风格了。虽然哈布斯堡的盛期巴洛克艺术在 1714 年后十分繁荣，但这个王朝的政治、思想意识和财政基础上的裂缝已清晰可见。

1703 年，当巴伐利亚发起进攻时，列奥波德发现自己没有财力来保卫奥地利的心脏地带。数十年来，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收入远不足以应付几乎不曾间断的战争带来的巨额但必要开支。所缺款项只好通过金融家来解决，其中最著名的是萨缪尔·奥本海默（Samuel Oppenheimer），他在 1680—1703 年间充当了列奥波德的“宫廷银行家”。奥本海默既是金融家又是军事供应商。于是，一个居住在曾驱逐犹太人的城市里的犹太人，为那场将基督教世界从异教土耳其人手中拯救出来的战争提供了大量钱款和物资。当奥本海默于 1703 年 5 月死去时，哈布斯堡当局取消了欠他的大笔债务，并宣布他的银行破产。可以想见，此举将会让当局自食其果，实际上政府也破产了。直到哈布斯堡重组财政、从大贵族那里取得贷款并取得海上强国的资助后，危机才被摆脱。最后，哈布斯堡家族找到了另一位犹太金融家，这就是奥本海默的外甥萨姆松·维特海默，但是这个王朝的财政状况仍很脆弱。

78

查理六世深知税制改革的必要性，但这可能会扰乱贵族和教士的利益共同体，而哈布斯堡的权威依赖于这个共同体。1714 年以后，仍然掌握着钱袋子的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议会相对而言比较愿意合作，而维也纳对匈牙利军事边区和特拉西瓦尼亚的直接控制也帮助它增加了收入。然而，这个君主国的总体税收基础仍不充足，因而其财政地位也不牢固。当冈德查尔·施塔亨堡（Gundaccar Starhemberg）伯爵于 1715 年离开宫廷之后，财政改革的热情也随之消退。与正在形成现代财政体制的汉诺威王朝的英国相比，奥地利的财政看起来既陈旧又腐败。

奥地利的继承危机使得查理六世更加无力同君主制度中的既得利益阶层对抗。这场危机根源于君主国家王朝世系的延续问题，即便这种王朝是封建性的。从法律上说，哈布斯堡各领地仍只存在一种个人形式的联合。直到 1665 年，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各个领地仍没有一个共同的统治者，因为蒂罗尔当时由家族的另一支统治着。虽然统治者为加强各领地之间的联系而作出了各种努力，但从来没有形成完全

协调的局面。匈牙利直到1687年才由哈布斯堡男系世袭继承。在英国，1707年的合并法案解决了长期存在个人联合问题；在奥地利，人们也意识到，必须为哈布斯堡领地事实上的联合确立一个合适的法律基础。

1703年，列奥波德一世和两个儿子约瑟夫（Joseph）和查理（Charles）订立了一个秘密的“相互继承条约”，该约强化了长子继承权，既可男系继承也可女系继承；但有一点还没有明确，这就是：如果没有男系继承人，究竟是哥哥的长女还是弟弟的长女来承嗣大统。为了澄清这一点——也是为了即将出生的孩子们——查理在1713年4月19日公布了这份秘密继承条约，但是他在条约后面附上了一条简短的声明，声称哈布斯堡领地不可分割、不可分离（indivisibiliter ac inseparabiliter），并规定，万一他没有男性继承人，首选的继承人是他的女儿们，之后才是约瑟夫的女儿。

79

这份“国是诏书”（Pragmatic Sanction）是一份十分很不起眼的文件，但它后来为这个君主国领地的永久联合提供了法律基础。它改变了哈布斯堡君主制度的地位，使它从以神授权利和王朝继承为基础的体制变为一个法律上的单独实体。不过，这份文件要取得法律效力还需要被认可。然而，由于男性继承人断绝，这份文件要取得合法性就更为复杂了。1716年，查理六世的儿子在出生几个月后就死去，他幸存的两个孩子都是女儿，玛丽亚·特丽莎（1717年生）和玛丽亚·安娜（Maria Anna，1718年生）。因此，查理在其余下的岁月里一直致力于保障玛丽亚·特丽莎继承整个君主国的权利。

波希米亚和奥地利各世袭领地的等级会议较为顺从，争取它们的同意并不难，克罗地亚和特兰西瓦尼亚议会也表决承认了“国是诏书”。最重要、最艰难的是获得匈牙利的认可，不过，由于哈布斯堡在反击土耳其人的斗争中再获成功，由于匈牙利和哈布斯堡双方的谨慎态度，匈牙利等级会议最终于1722年一致投票通过了“国是诏书”。1723年12月6日，“国是诏书”正式成为各联合领地的法律。现在，争取欧洲列强承认这份文件成了哈布斯堡对外政策的主

要目标，像国内的形势一样，查理为此不得不作出一些通常不会作出的让步。

这个君主国以强国姿态进入 1714 年以后的岁月。1716 年，对奥斯曼的战争再起，1718 年的帕萨罗维茨（Passarowitz）和约为奥地利带来了更多的利益，特别是蒂米什瓦拉的巴纳特地区，以及贝尔格莱德和波斯尼亚（Bosnia）北部。在西方，奥地利的外交努力以及同英国的盟友关系使得西班牙于 1720 年承认哈布斯堡对意大利的占有。此后局势便逐渐恶化。

80

查理六世计划繁荣奥属尼德兰的经济，使其为奥地利的事业作出贡献，但他的计划造成了一个核心难题。他对 1722 年成立的奥斯坦德公司（Ostend Company）的赞助是奥地利殖民地贸易政策的一次扩张。1719 年，以的里雅斯特和阜姆为基地的第二东方贸易公司（Second Oriental Trade Company）成立，奥地利的“代理商”在印度和中国落脚。然而，英国人和荷兰人希望奥地利成为欧洲大陆的一支平衡力量，而不是成为英吉利海峡边的一个商业对手。结果奥地利在 18 世纪 20 年代遭受了一场外交大溃败，并因此失去了帕尔玛（Parma）、皮亚琴察和托斯坎尼（Tuscany），获得这些地方的是西班牙王后伊丽莎白·法尔内塞（Elizabeth Farnese）的儿子们，而且奥斯坦德公司也解散了。

18 世纪 30 年代，查理六世继续游说欧洲列强承认“国是诏书”，但是，由于疏远了从前的海上强国盟友，奥地利的外交处境不佳。查理把自己的继承人玛丽亚·特丽莎许配给了洛林的弗兰茨·斯特凡（Francis Stephen），以嘉奖这个坚定的盟友，但此举深深地触怒了洛林的邻国法国，从而使局面进一步恶化。1733 年，欧洲战事再起，表面上是为了波兰的王位继承问题，但这场战争对准备不足的奥地利军队而言是一场灾难。1738 年的和约使奥地利进一步丧失了在意大利的利益，不过托斯坎尼给了洛林的弗兰茨·斯特凡，作为部分补偿，但也仅仅是对洛林和巴尔（Bar）的补偿（两地最终于 1766 年并入法国）。法国终于承认了“国是诏书”。

在东方，哈布斯堡的境遇也不见得更好。1737—1739 年的第二次土耳其战争在军事上和外交上是一场灾难，奥地利丢失了贝尔格莱德和《帕萨罗维茨条约》中所得的大部分利益，虽然巴纳特地区保留了下来。这些挫折造成的声誉损失甚至比土地损失更为严重。1740 年查理六世死去时，欧洲的所有强国和国内主要机构都承认了“国是诏书”，但是，在 18 世纪中叶无情的王朝国家的政治博弈中，已为人察觉（且实际存在）的哈布斯堡君主制的弱点使这份文件的可行性成了问题。就玛丽亚·特丽莎而言，她可能拥有合法性，但查理已让他的女儿处于一个很脆弱的地位——如果这种合法性失去效力的话。

81

到 1740 年，巴洛克式的哈布斯堡君主国已经失去了动力，还有它的神秘色彩。与被称为启蒙的思想革命相比，哈布斯堡的反宗教改革文化显得过时了，因为那个时候，启蒙文化正风靡于奥地利北方和西方各邻国的沙龙和咖啡馆。德国启蒙之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是生于西里西亚的一个哈布斯堡臣民，但他被迫到国外去寻求发展，因为哈布斯堡的制度强烈阻碍着启蒙思想。

直到 18 世纪 20 年代，巴洛克文化，以及与之伴随的政治、军事和社会制度，都能很好地服务于奥地利的事业。但到 1740 年，情况已经改变了。1685 年，当萨尔茨堡大主教从德福雷根塔尔（Defreggental）驱逐 1 000 名隐蔽的新教徒时，此事没有引起多少注意；但是在 1731 年，当 22 000 名隐蔽的新教徒从萨尔茨堡的平茨高（Pinzgau）和彭高（Pongau）地区被赶出来时，人们不再认为这是一种文明的举动，而且这种自作自受的削减人力资源也不被认为是合理的做法。大约在同一个年代，哈布斯堡当局也从萨尔茨卡默古特（Salzkammergut）驱赶了 1 200 名新教徒，不过并没有造成人口损失，因为这些农夫（Landler）被遣送到了位于特兰西瓦尼亚的国内流亡地，那里仍然享有宗教自由。



插图 19　匈牙利伊格尔的小兄弟会教堂

哈布斯堡的宗教政策仍然极端的不宽容，而且经常很不人道。1726 年到 1727 年，查理六世在波希米亚地区颁布了残酷的家庭婚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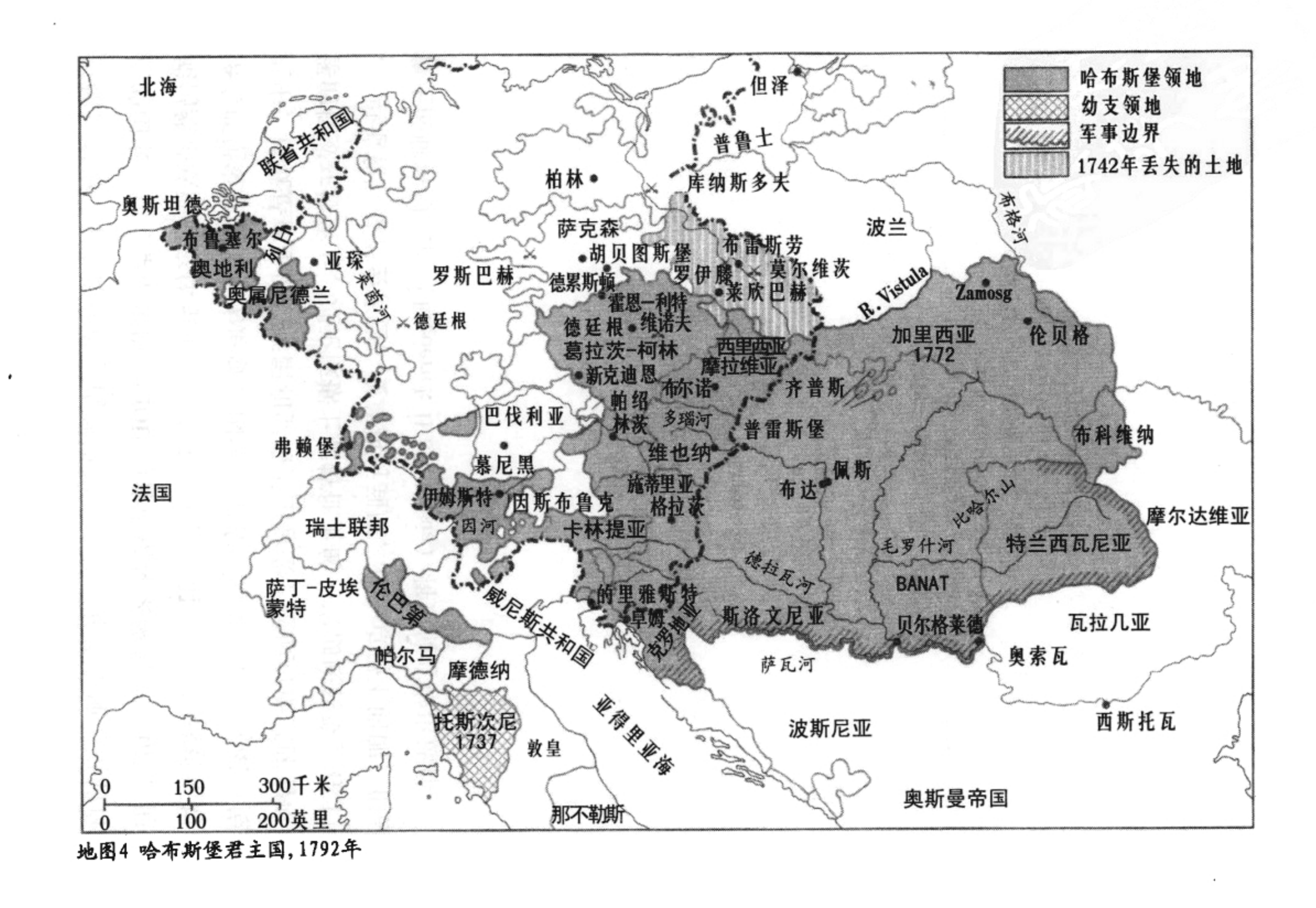
法（Familiantengesetze），规定犹太人家庭中只有长子有结婚权，试图以此控制犹太人的数量。查理六世倾向于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但没有通过，因为这可能对经济造成消极后果。尽管巴洛克的外表颇为华丽，但君主制度内部都有这样一种日益增长的意识：必须适应经济和社会政策中的理性主义发展趋势，而这种趋势主要源自西欧。

财政学思潮（cameralism）是重商主义思想的德意志形态，它对奥地利政策的影响长达数十年。这一思潮在奥地利有3个最著名的理论家：约翰·约阿希姆·贝谢尔（Johann Joachim Becher）、菲利普·威廉·冯·霍恩尼克（Philipp Wilhelm von Hörnigk）和威廉·冯·施罗德（Wilhelm von Schröder），3人全是这个已皈依天主教的帝国新教徒，他们于17世纪60年代开始发表政策性建议。这些建议效仿科尔伯（Colbert）在法国推行的政策，如抑制奢侈品的进口，83 鼓励发展国内的奢侈品工业，设立海外贸易公司，全面促进金银净流入量的增长。财政家们（cameralists）特别强调农民繁荣的好处，认为这是增加军事力量所必须的人力资源（人口）和增强经济自足的手段。

他们的有些建议得到了实施。如设立于1672年的林茨毛纺厂，到1725年雇佣了4 000多名工人，成为欧洲最大的工厂之一。贸易公司也成立了，在很多奢侈品行业中也成立了公司。然而，贸易公司被外交政策牺牲掉了，保护农民免受不正当剥削的法令虽然通过了，但没有执行下去，因为担心触犯贵族。霍恩尼克于1684年后发表*Österreich über alles, wann es nur will*一书，其标题便揭示了主要问题之所在："奥地利会超越一切，只要它愿意。"哈布斯堡的领地也许拥有成为霍恩尼克所迫切希望的强大国家的资源，但在1740年，作为统治者的王朝、贵族和教会的三位一体——这是"奥地利"的真正含义——是否愿意去作这样的努力，这一点仍不清楚。

财政家们关于奥地利的见解已经超越了巴洛克时代，超越了作为哈布斯堡统治根基的超验文化和权威。强调"自然"资源，强调促进"人民"福利的必要性，这与哈布斯堡坚持"神授"权利、依赖"精

英阶层”之共识的做法很不协调。要想跟上这种新思潮，哈布斯堡奥地利应该来一个自我转变，即从一个负有统治基督教帝国的神授使命的王朝，变为一个合理化的、内部协调一致的、并能实现力量的自我生产的国家。它可能不再以 AEIOU 的普世精神来统治“一切”，但它可能仍然是欧洲国家体系中的一个主要大国。但是，适应这种新思潮对哈布斯堡家族而言颇为麻烦，因为它陷在一对享有普世权威的传统制度中，这就是神圣罗马帝国和罗马天主教会。适应可能意味着哈布斯堡的权威在性质上、理论依据上和特征上的一次彻底转变。在1740年，“奥地利”是否会将这一变革执行到底，这一点仍不明朗；但是，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 of Prussia）将迫使它做出选择。



地图4 哈布斯堡君主国，1792年

第三章　困顿与改革，1740—1866年

1740年12月16日，普鲁士军队入侵西里西亚，尽管普鲁士人因此而陷入两场大规模战争。对哈布斯堡（这时正式称为哈布斯堡—洛林）王朝及其领地来说，西里西亚的丢失意味着一个深刻变革时代的到来。国是诏书已被证明不可能维护哈布斯堡领地的完整，玛丽亚·特丽莎及其顾问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在一个强权政治的年代保卫哈布斯堡的利益，而这种政治就体现在普鲁士身上。 85

最切近的目标是夺回西里西亚，摧毁普鲁士。当这个目标被证明不可能实现之后，哈布斯堡面临着如下的实际任务：为了在启蒙时代、一个行政合理化的时代求得生存，它应调整自己的统治体制及权威基础，应增强国家力量，应对传统进行理性化挑战。

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为了应对这种现代性的挑战，哈布斯堡王朝首先是根据新的局势来调整自己的制度和目标，接着是对局势之根本变化的反动，最后尝试的策略是在适应现代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同时又拒绝与之随行的政治变革。

这个过程，其中的主旋律、不和谐旋律以及旋律的转向，听起来就像一支奏鸣曲，它让人想起当时维也纳的音乐革命。但实际上，这个过程更像是奏鸣曲在哲学上的对应物，像黑格尔的辩证法，因为它没有悦耳的和声。在进步时代，哈布斯堡与普鲁士在波希米亚的另一

场战役，即1866年7月3日的科尼希格雷茨（Königgrätz）战役虽说是个不和谐的音符，但这个时代持续发展和变化的方式对这个王朝——以及这个君主国家——的利益是有害的。

86

在1740—1866年这个时期，哈布斯堡君主制度在迎接现代性的挑战方面是不成功的。然而它存活了下来，而就在维持哈布斯堡家族权威的努力失败之时，奥地利的文化和社会中发生了剧烈变迁，对于何谓“奥地利的”，人们的理解同样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开明国家，1740—1792年

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哈布斯堡统治者试图通过改革来重振1740年失去的王朝根基，当时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生存因为“国是诏书”达成的共识之崩溃而受到威胁。这场危机的主要肇事者是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他利用巴伐利亚的查理·阿尔贝特（Charles Albert）对玛丽亚·特丽莎继承权的抗议，对哈布斯堡进行名副其实的敲诈，当他的“提议”被拒绝后，他便入侵西里西亚。1741年，他在摩尔维茨（Mollwitz）战胜奥地利军队，这是个信号，它让欧洲众多国家都沉溺在吞并哈布斯堡领地的狂热中。签字和承诺都是毫无价值的，如果没有强大的军队来保证其履行的话。1741年，当查理·阿尔贝特于1741年占领波希米亚和上奥地利后，这些地方的贵族等级会议很愿意承认他。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唯一的例外竟然是匈牙利：1741年秋，匈牙利议会决定支持玛丽亚·特丽莎，这对恢复对哈布斯堡事业的决心和其合法性的意识至关重要。

但是不久之后，哈布斯堡的权威受到一次最严重的打击。1742年2月，查理·阿尔贝特当选并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从1440年到1806年帝国告终，他是唯一享有帝位的非哈布斯堡皇帝。但正是在1742年，得到英国资助的奥地利重新团结起来并与敌人进行战斗。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是一场复杂、凌乱、分散的战争，其中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西里西亚战争”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第一次在1742年结束，第二次终结于1745年圣诞日。尼德兰和意大利的战事、以及英

国和法国之间的殖民战争直到 1748 年才结束。

如果考虑到 1740 年危如累卵的困境，战争结束时，奥地利的形势有所好转。查理·阿尔贝特于 1745 年死去，在随后的选举中，玛丽亚·特丽莎的丈夫、洛林的弗兰茨·斯特凡当选为皇帝，哈布斯堡恢复了对其权威的传统根基的控制。在意大利丢失的土地很少。匈牙利人根据"国是诏书"提供了关键性的支持，这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查理六世政策的正确性。但是，普鲁士占据了几乎整个西里西亚以及波希米亚的葛拉茨（Glatz）县，而奥地利只控制了上西里西亚的 3 个县。

这是对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一次严重打击，并且对其未来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君主国家丧失的西里西亚是其最富有、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而且还有大量——且主要是讲德语——的人口。这个国家同样失去了一条主要商业动脉：奥德河（Oder），还有拱卫国家心脏地区的缓冲地带。但盗走西里西亚首先是对哈布斯堡威望的一种挑战，玛丽亚·特丽莎决心扭转局势，即便这意味着彻底的改革。

从很多方面看，玛丽亚·特丽莎更多的是代表奥地利巴洛克式的过去，而不是她所进入的启蒙改革的时代。她是个热忱的天主教徒，虽然她母亲是个新教徒，而且她抱有很多巴洛克时代天主教的偏见，如不能容忍臣民中的新教信仰，还有发自肺腑的反犹主义。对隐蔽的新教徒的内部流放，即把他们从世袭领地迁往特兰西瓦尼亚的行动仍在继续，如 18 世纪 50 年代上奥地利就流放了 2 600 人。

玛丽亚·特丽莎愿意容忍新教商人和金融家，如出生在瑞士、生活在维也纳的约翰·弗里斯（Johann Fries），但其中的原因是她急于摆脱父亲的那些犹太"高利贷"金融家。对哈布斯堡家族的事业而言，迭戈·达圭拉尔（Diego d'Aguilar）等犹太金融家仍是一个很重要的信贷来源，但玛丽亚·特丽莎反犹偏见使她在 1744 年下令驱逐布拉格的犹太人，随后又赶走了整个波希米亚王室领地的犹太人，理由是他们有所谓的叛国行为。当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大国进行干涉之后，这个驱逐令于 1748 年被废除，但这已是在布拉格的犹太人经历严重骚

乱之后的事了。玛丽亚·特丽莎对自己的仇犹情绪并无悔意："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比这类人更恶劣的瘟疫，他们欺骗、盘剥、聚敛钱财，把我的臣民逼到赤贫的境地。"①

88

然而，玛丽亚·特丽莎对新做法也表现出明显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如果这些做法能让哈布斯堡君主国家适应新挑战的话。为了恢复家族的威望和权力，她几乎愿意做任何事情，如1741年在匈牙利议会上的业余戏剧表演：当时她怀抱4个月大的儿子约瑟夫（Joseph），恳求匈牙利人的帮助。她也愿意听取出身卑微的顾问们的建议，如约翰·克里斯托弗·巴尔滕斯坦（Johann Christoph Bartenstein）和弗雷德里希·威廉·豪格维茨（Friedrich Wilhelm Haugwitz）（两人都是从路德宗皈依天主教的）曾说服她，她的"家业"必须根本改革行政和财政结构才能维持下去。

第一次改革浪潮的领导者是豪格维茨。作为残留的奥地利西里西亚省的省督，豪格维茨试图赶超普鲁士在西里西亚的新行政机构的成就。由于取得的成果令人振奋，他于1749年被任命为新的中央行政机构"总署"（Directorium in publicis und cameralibus：国务和财政总署）的首脑，而他的"方案"则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复制他在西里西亚的成就。这个新体制中的机构设置一直延伸到区公所（Kreisamt），是一种激进的中央集权化制度。以前，哈布斯堡王朝将筹款的内部适宜主要托付给其贵族和教士伙伴，如今一个新的中央政府官员阶层取而代之，到1760年，这些官员多达10 000人，他们监督等级会议的活动，如果岁入不足，他们有可能干预。

豪格维茨的改革存在局限性。与普鲁士的情况不同，豪格维茨不能完全绕过等级会议，他倾向于通过协商而不是强制的方式来增加各省的"贡献"（即捐税），而官僚机构的监管工作仍然很粗略。改革行动集中于世袭领地和波希米亚王室领地，伦巴第、奥属尼德兰和匈牙利几乎完全没有被触动。尽管如此，在列奥波德·道恩（Leopold

① Charles Ingrao, *The Habsburg Monarchy, 1618—1815* (Cambridge, 1994), p. 192.

Daun）的改革提高了军队素质的同时，豪格维茨的改革为玛丽亚·特丽莎提供了再次发动西里西亚战役的资源。

外交领域也因为“外交革命”而发生重大转变。玛丽亚·特丽莎对英国盟友感到不满，这时候，奥地利外交界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1753 年后担任国务大臣的考尼茨伯爵文策尔·安东（Wenzel Anton Count Kaunitz）劝告她说，奥地利应该转变其传统的外交政策，同法国结盟。作为最大的大陆强国，法国不足以强大到构成威胁，但它在制服普鲁士的斗争中仍将是决定性的。接下来，1756 年 5 月法国和奥地利的第一次凡尔赛条约对欧洲外交政策造成了一次“震荡”（bouleversement）。1756 年 8 月，腓特烈二世先发制人，入侵萨克森，考尼茨则借此说服法国于 1757 年 5 月将防御同盟转变成进攻同盟，随后瑞典和俄国以及大多数帝国邦国都加入了这个同盟。站在腓特烈二世一边的只有几个新教小国及英国的资助，看来奥地利重新夺回西里西亚只是几个月的事。

于是开始了长达 7 年的战争。虽然玛丽亚·特丽莎的君主国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但她的军队谨慎得过了头，无法取得对普鲁士的决定性胜利。柏林两次被占领，腓特烈二世有时更像个亡命者而不是君主，但他自己和他的部队幸存了下来。与此同时，法国在海外遭到英国的毁灭性打击，它对其奥地利盟友的热情也消退了。1762 年俄国的事变也不利于奥地利，新沙皇彼得三世（Peter III）与普鲁士结盟了。他的暗杀结束了奥地利的噩梦，但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II）选择了中立，这依然意味着奥地利在这场博弈中大势已去。

战争最后以法国的大片殖民地丢失给英国而告终。法国的盟友奥地利境遇稍好，1763 年的胡贝图斯堡（Hubertusburg）条约确认了此前的领土状况。但是，如果考虑到奥地利参与这场冲突的动机，这个结果是个难以承受的失望。哈布斯堡再度成为一支主要力量，但它雄心勃勃的全盘打算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西里西亚依旧是普鲁士的。

这次失败使人们对如何管理这个君主国再次进行反思。“总署”于 1761 年改组成奥地利和波希米亚联合总理署，另有一个单独的、独

立的司法系统，以及一些单独的财政机关。作为新的国务委员会（Staatsrat）——负责所有哈布斯堡领地的内部政策——的首脑兼国务大臣（外交大臣），考尼茨现在成了玛丽亚·特丽莎政府中的支配性角色，并一直维持到她的统治终结之时。他的支配性地位给奥地利的政策带来了质的变化。

考尼茨推行一种可被称为贵族启蒙的政策。这位前外交官对与等级会议打交道更有信心，并对豪格维茨的一些中央集权政策作了有利于等级会议官员的删减。不过，豪格维茨体制的中央集权特权特征依然保留着，而且中央行政机构的制度性力量在不断增长，这成为考尼茨在协商大量增加岁入时取得成功的后盾。到1780年，国家的年收入已达5 000万弗洛林，1775年，这个君主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收支平衡。

虽然贵族在地区和地方层次上重新获得了一些权力，但在中央，他们的风头逐渐被平民官员或新近封授为贵族的官员盖过了。这个新生的官僚阶层有一种新的管家型气质，他们还对君主制度进行彻底改组，尤其是在宗教、教育和农业经济方面。特丽莎的新政权强行对人民和教会及人民和贵族的关系进行干涉，从而改变了哈布斯堡王朝与其臣民之间关系的基调。这个新政权不再满足于让国内统治盟友去教育和统治人民，它现在坚定地认为，国家理性要求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建立一种新的直接联系。

这一政策转向早有先行者。玛丽亚·特丽莎自封为其所有领地的“共同的首席母亲”，这种母性主义加上她对“我的家业”的神授责任的认知，使她能听取关于其臣民、包括农民的福祉的辩论。[1] 财政家们认为、特别是人口学家（Populationistik）也论证说，人口的增长就是国力的增长。既然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既然他们提供了绝大部分税收（贵族享有很大的免税权），减轻农民负担看来是促进繁荣、实

① P. G. M. Dickson, *Finance and Government under Maria Theresa, 1740—1780* (Oxford, 1987), vol. II, p. 4; vol. I, p. 325.

现人口及收入增长的关键。然而，这就必须深入干预农民和领主之间的关系：实施彻底的土地清查，规范并削减农民的义务，如农民向领主负担的强制性劳务——徭役（robot）。根据这些宗旨对农民采取的尝试性保护措施在 18 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实施了。

宗教和文化事务也在发生根本转变。玛丽亚·特丽莎的天主教信仰笃诚且不宽容，不过，当问题涉及其领地上的教会与世俗政府的关系时，务实性和财产意识会平衡这种宗教情感。另外，巴洛克盛期的宗教统治正因为天主教改革运动而从内部受到损害。这场改革运动的领导者是路德维柯·安东尼奥·穆拉托里（Lodovico Antonio Muratori）等思想家，它强调理性和知识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并谴责将过多的世俗资源浪费在宗教仪式和"迷信"上——如耶稣会士那样。教会内部有很多改革潮流，而所有潮流累积起来的效应导致奥地利国内——最终还有整个欧洲——达成这样一种共识：耶稣会对宗教、精神和文化生活的影响力必须被遏制，那些"非生产性"宗教生活形式（如专事玄想的修会和过多的节日）应该压缩。在这个时期，维也纳的大主教们，如特劳松（Trautson）和米加茨（Migazzi）等人，一开始都是改革运动活跃的同路人，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

文化生活的世俗化开始于玛丽亚·特丽莎的荷兰医生盖哈德·凡·斯维滕（Gerhard van Swieten）1749 年后对维也纳大学的改革，以及 1751 年剥夺耶稣会士对出版审查委员会的控制权。为未来的国家官僚机构培养官员的教育机构也设立起来。教育贵族子弟的特丽莎学院于 1746 年建立。1751 年维也纳新城创办了一所军事学校，1754 年建立了培养外交官的东方学院。

到 18 世纪 60 年代，已经颇具声势的改革运动准备进一步向启蒙的方向迈进。在考尼茨和玛丽亚·特丽莎周围的顾问班子中，有凡·斯维滕、政治学和法学理论家卡尔·冯·马尔蒂尼（Karl von Martini）、博学多才的约瑟夫·宗南菲尔斯（Joseph Sonnenfels）（从犹太教皈依天主教）等人，他们较少从传统的王朝角度来考虑问题，他们更为关注的是国家及其人民的利益，以及为了获取这些利益所必须的理性化政策，

在这方面他们并不顾忌传统。

1760年设立的教育委员会（Studienhofkommission）的成员自称“启蒙派”，因为他们深信，必须以基础更为广阔的“启蒙”体系来取代耶稣会对教育的控制。不过，迫使玛丽亚·特丽莎接受启蒙派主张的，是1773年克莱蒙十四世（Clement XIV）解散了耶稣会。哈布斯堡当局没收了耶稣会的财产，并利用这些财产在1774年创办了一个全面普及化的教育体制，其中包括初等义务教育，大大扩展了中等教育体制及培养教师的“师范学校”。这种新的、世俗化的义务教育体制碰到了多方面的抵制，特别是贵族和农民的抵制，因为他们想让孩子在田间劳动，不过总体而言，教育改革十分成功，到1780年，已有6 000多所学校在运转。

92

这个计划的拟定者是普鲁士西里西亚省塞冈（Sagan）修道院的一个天主教修士伊格纳茨·菲尔比格（Ignaz Felbiger）。正如在行政改革方面一样，普鲁士为新教育体制提供了众多形式和精神上的启迪，而这种体制本身也渗透着新教虔信主义（Pietism）。玛丽亚·特丽莎也许希望新学校能讲授天主教正统教义，但课程设置则强调社会责任、社会纪律和工作伦理，以及如何让学生运用理性来理解问题，而不是死记硬背。新体制是对此前的社会控制形式的一个重大突破，因为以前是通过直观的威仪来强调无知百姓无条件服从的必要性。保守派说新课程不够虔诚，他们的抱怨并非全错。随之而来的识字率的提高将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形成新的挑战，何况新的初等义务教育还是以地方（民族）语言展开的。

另一个急剧变化出现在农业政策领域。财政家的学说已经敦促政府为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资源，为增强经济及军事力量而进行干预。政府在工业政策中采取了这样的政策：在失去西里西亚以后，政府设立了补助金制度和贸易保护壁垒，以鼓励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业迁往波希米亚北部，其他工业中也有类似的鼓励政策，尤其是生产奢侈品的工业。作为这一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行会特权被削弱，内部贸易关税被改革，而奥地利—波希米亚的内部关税则于1775年被废除。取消

贸易限制和个别特权以增强国家力量，工业政策中的这种趋向并非新颖事物。真正的新做法是政府在农业领域也以同样的原则进行干预。 93

农业政策中的关键是如何削减、至少是规范贵族的特权。财政家思想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强调农民福利的必要性，而启蒙时代的重农学派理论则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哈布斯堡的很多统治者曾发布法令，要求贵族克制对农民的苛求，但这些法令从意图上说就不会起什么作用。玛丽亚·特丽莎最初也不愿意插手此类事务，但是，人们日益意识到这是经济发展所必须，而正在兴起的官僚体制使得对领主—农民关系的干预成为可以设想、可行的事。

由于战争造成的影响，1770—1772 年的饥荒和贵族滥用领主权，农民的骚乱到处可见，这就使得此类干预更为容易了。虽然在匈牙利各县，规章还有待实施，但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奥地利世袭领地，限制劳役的“徭役”特许状还是在掌握了新的土地报告的国家地方官员的主持下得以实施。甚至劳役自身的效用也受到了质疑。1775 年以后，弗兰茨·安东·拉博（Franz Anton Raab）在波希米亚的两个王室庄园领导了一个试点计划，以货币租金形式来取代劳役制度，试点取得了成功，并于 1777 年开始推广。拉博体制揭示了如何以新体制来取代旧特权。

人们把更为激进的改革希望寄托在约瑟夫二世（Joseph II）身上，1765 年弗兰茨·斯特凡死后，他被玛丽亚·特丽莎提拔为联合执政。约瑟夫二世是在巴尔滕斯坦等温和改革派的培养下长大的，但他后来成为启蒙运动的热情倡导者——当然这里的启蒙采取的是中欧的国家主义形式。他的角色榜样（及主要对手）是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

作为联合执政，他在对外政策上享有最大的影响力。约瑟夫二世和考尼茨的班子在跟腓特烈二世和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进行一场理性主义“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博弈。虽然玛丽亚·特丽莎反对那种“违反一切神圣和正义标准的”行为，但她的儿子和首相一起劝说她参与了 1772 年对波兰的第一次瓜分，这为哈布斯堡带来了加里西亚和 260 万新臣民。1775 年以和平方式从土耳其人手中获得的布科维纳（Bukovina）有助于哈布斯堡的领地的整合。另一个步骤，即以奥

94 属尼德兰换取巴伐利亚，也出于同样的领土整合的考虑，同样的忽视传统条件的理性主义意愿。腓特烈二世对这种可能的前景提出警告，于是爆发了1778—1779年的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这场“土豆战争”（Plum Rumble）阻碍了奥地利财政状况的改善，奥地利最终仅收获了因河边区。

在国内事务方面，约瑟夫的同情究竟在哪一方显而易见。很早以前，约瑟夫就是个坚定的启蒙绝对主义者，也就是说，既是启蒙者又是绝对主义者。他的天主教信仰是激进的改革派天主教的一种形式，这尤其表现在国家对宗教的控制上。他同样追随启蒙运动关于“人民”的理想化观念，并先后在1766年和1775年将维也纳的两个主要王家公园，即普拉特（Prater）和奥加滕（Augarten）公园，向公众开放。奥加滕公园的大门口镶嵌着这样的题词：“一尊重人民之人将此休闲场所敬献给人民。”① 1776年，约瑟夫二世协助劝说玛丽亚·特丽莎废除酷刑，此举再次彰显了他的人道主义。在1780年以前，他母亲基本不让他参与实际的决策，他只好花费大量时间暗中巡访自己未来的国家，以便了解人民的真实状况，这时他经常化名为法尔肯斯坦伯爵（Count Falkenstein）。有时他甚至亲自扶犁耕田，此举在农民中造就了有关约瑟夫这位人民的皇帝的传奇。

他对人民和国家的忠诚是真诚的。1783年，他在致哈布斯堡官员的“牧人来信”（Hirtenbrief）中表态说，他觉得担任国家的首席仆人、为公共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是他的责任和特权。不同凡响的是，他真诚地相信君主与其臣民之间存在社会契约的观念。正是在这一点上，宗南菲尔斯可以宣称哈布斯堡的臣民已经是公民（Bürger）了。

这种治理国家的开明方式后来被称为约瑟夫主义（Josephism 或 Josephinism），它在约瑟夫二世成为单独的统治者之前就已显露出鲜明特征。1780年的维也纳是个24.7万平方英里、大约2 600万人口——几乎和法国一样多——的帝国的首都。维也纳城的人口也已达到20万

---

① T. C. W. Blanning, *Joseph II* (London, 1994), p. 65.

（布拉格为 8 万），而且正受益于当地的工业和经济发展。但维也纳又不止是哈布斯堡的首都：它已经成为承载整个德意志和中欧的启蒙希望的中心。 95

在联合执政期间，这个城市相对开放的氛围活跃了思想文化生活。医学院正在获得绝佳的声望；文学界，至少是出版界，正在发展之中。在德语戏剧领域，宗南菲尔斯在 1776 年将 1741 年开办的城堡剧院（Burgtheater）改造为“德意志民族剧院”，使其成为启蒙斗争中的一件思想武器，以反对传统、大众化的汉斯伍斯特（Hanswurst）喜剧院，他认为这个剧院是陈旧的巴洛克文化的一部分。

玛丽亚·特丽莎和约瑟夫二世都在宫廷生活中厉行节俭，但他们对艺术的赞助仍很慷慨，上层贵族和天主教机构也同样慷慨。建筑艺术持续繁荣。申布隆宫辉煌的内部装饰和埃德蒙特（Admont）本笃会修道院的精美图书馆，都是洛可可风格（Rococo）的典型表现，这种风格展现了巴洛克风格中更为鲜亮的一面。在这个时代，建筑艺术从以再现辉煌为重点转变为追求更为细小、或曰更为细致的品位。约瑟夫二世将宅邸从庞大但遥远的申布隆宫移到不太奢华但位居中心地带的霍夫堡（Hofburg）就是一个例证。 96



插图 20　埃德蒙特修道院图书馆（埃德蒙特修道院）

音乐生活走在了前列，克里斯托弗·维里巴尔德·格鲁克（Christoph Willibald Gluck）的歌剧为德国提供了一种堪与意大利歌剧媲美的艺术形式。维也纳成为德意志新音乐的中心。约瑟夫·海顿（Joseph Haydn）生于下奥地利的罗劳（Rohrau），起初是维也纳的一个唱诗班男童，并在这里接受音乐教育，后来在艾森施塔特（Eisenstadt）担任埃斯特哈齐家的音乐教师。海顿1790年才移居维也纳，但他一直与维也纳的音乐发展保持接触，在18世纪70年代，他与沃尔夫冈·阿马道伊斯·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的联系对两人都产生了积极影响。莫扎特生于并非哈布斯堡领地的萨尔茨堡，18世纪60年代以后成为德国音乐界的神童（Wunderkind）。在与其庇护人、萨尔茨堡的大主教亲王失和以后，莫扎特于1781年3月迁居维也纳。来到哈布斯堡的都城后，他便在那里立足，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作曲家。1787年，他成为宫廷作曲家，直到他于1791年不幸英年早逝之时，他创作的天才作品迭出。

当约瑟夫于1780年继位时，维也纳和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气氛是乐观的，人们期待着进一步的改革。约瑟夫二世没有让人失望。在受母亲控制这么久以后，他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改革浪潮，所有这些改革都遵循启蒙的原则，有些措施甚至带来了重大的自由化效应。

在成为单独的君主之后，约瑟夫二世最初的举措之一就是将出版审查置于哥特弗里德·凡·斯维滕（Gottfried van Swieten）的自由监控之下，实际上实现了哈布斯堡各领地的言论自由。出版物的数量呈指数增长。1781年的宽容法令大大扩展了新教各主要教派和东正教的宗教自由。

针对各地犹太人的宽容法令（1781年在波希米亚、1782年在摩拉维亚、1783年在匈牙利、1789年在加里西亚）则不够彻底全面。犹太家庭婚姻法依然保留着，大部分奥地利世袭领地仍不准犹太人定居。不过，一些针对犹太人的最屈辱的捐税和限制被废除了，犹太人也获得了更大的经济和教育机会。作为回报，这个君主国家的很多犹太社

区不得不放弃它们的很多社区和文化自治权，犹太儿童被迫到讲授世俗课程的德语学校就读。尽管如此，很多犹太启蒙运动的追随者（maskilim）仍然认为这些法令是个重大进步，在一些保守的反对派那里，这些法令甚至为约瑟夫二世赢得了具有讽刺意味的“犹太人的国王”的绰号。 97

约瑟夫的犹太人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将全体犹太人变为无害的，将其个人变为有用之人”。这种实用性同样指导着他重组天主教机构的全盘计划，这一政策标志着玛丽亚·特丽莎开启的变革的激进化。在约瑟夫看来，没有实际效用的修道院超过700个，大约占哈布斯堡领地上修道院总数的1/3，这些修道院全被解散了。解散修道院后获得的资金被用于改革和扩大在俗教士阶层。教区系统也被重新规划，新的教堂也修建起来，以保证人人都不会离教堂太远。教士必须达到一定的职业水准和文化水平，并领取固定的国家工资。为了便利于改革的实施，约瑟夫还主张，君主对教会各阶层拥有控制权，此举损害了教皇的权益。 98

约瑟夫渴望建立一种新的、“理性化”的社会模式。宗教兄弟会被解散，宗教游行、朝圣及很多节日被废除。代价高昂的葬礼仪式也被终结，死者被葬在袋子中，而不是棺材里，因为这种方式更为廉价，且有利于尸体分解。宗教机构被实用性、世俗化的对应物代替。在维也纳，1784年开办的总医院（Allgemeines Krankenhaus）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现代的医疗中心。在地方层次上，这些改革规模不大，但仍很有意义。1783年，解散宗教兄弟会和社团所得的钱款被注入一个创办和扩建学校的基金。1785年，在莱昂菲尔登，这个基金为扩建校舍提供了资金，而两所救济院（Bürgerspital）被解散出售后，所得的钱款也于1786年注入这个基金。同样，救济院的教堂、17世纪该城的新教活动中心也被世俗化，并转卖给当地市民，1787年这个中心变成了市政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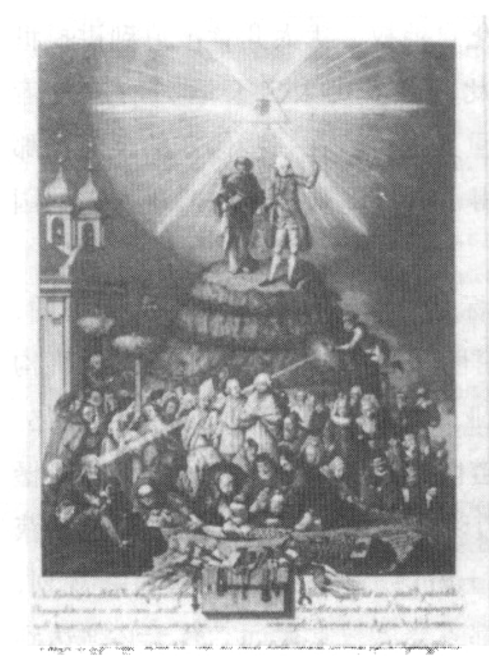



插图 21　约瑟夫二世和教会改革（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

法律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司法和行政被分开了，司法体制实行了专业化，并削减了领主司法权。《民法典》（Allgemeines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ABGB）的第一部分于 1786 年公布，新的《刑法典》则于 1787 年公布。《刑法典》不仅反映了受塞萨尔·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启发的更为人道的立场，更为激进的是，它宣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

在经济政策中，差异和特权等“非自然”的法律屏障的废除也很明显。诚然，约瑟夫推进其领地上的工业发展的一个做法是于 1784 年对多种商品强征禁止性关税；不过，关税壁垒政策之后的目标是清除企业发展的人为障碍——如行会，并允许个人创业者创造财富。这一思路还推动了工业补助金的缩减，加速了新贸易和工业对犹太人的开放进程。

农业改革同样引入了新思维：解放农民个人将促进生产，从而增强国力。1781 年 11 月 1 日，波希米亚的人身奴役制度被废除。奥地利的两个公爵领已经摆脱了农奴制，不过内奥地利和加里西亚的废除农奴制特许状直到 1782 年才颁布，匈牙利则要到 1785 年。农民进一

99

步取得购买永佃权的权利，1783 年的一份指令规定，农民（加里西亚除外）有权将劳役转变成货币或实物：这实际上废除了强制性劳役。

约瑟夫个人统治的早期阶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当然，宗教保守派有所抵制，宗教生活中的很多传统形式仍在继续，虽然官方已经废除了它们。很多贵族也有抱怨，不过政府政策的目的在于保护贵族的物质利益，反对的声音也就平息了。

在约瑟夫的国家，他最坚定的支持者是规模不大但颇有影响力的开明团体。一些秘密的结社团体，如光照派（Illuminati）和共济会，其成员当中有很多有权势的重要人物。莫扎特和海顿都加入了共济会支部，这些组织中盛行的对旧制度的不满和对未来的乐观主义，鲜明地体现在莫扎特与洛伦佐·达彭特（Lorenzo da Ponte，一个犹太改宗者和前耶稣会士）合写的歌剧中，尤其是体现在《费加罗的婚礼》(*Le nozze di Figaro*）（1786）和《唐·乔万尼》(*Don Giovanni*)（1788）中。

在莫扎特和艾曼努埃尔·施卡尼德（Emanuel Schikaneder）于 1791 年创作的歌剧《魔笛》(*Die Zauberflöte*）中，核心内容就是一个典型的关于开明社会的共济会版本，而自然神论礼仪和普世人道主义高于传统社会等级的信仰则使这一版本更为完善："他是位亲王吗?""不止是亲王，他还是个人。"更有甚者，剧中还有这样一种理念：明智而高尚的人（萨拉斯特罗，Sarastro）应该把人类从黑夜女王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将他们引入光明的世界，如有必要的话甚至可以使用强力。平民帕帕格诺（Papageno）的缺点可以被容忍，但不能被认为是有理的。

这很接近约瑟夫的理想，也许太接近了。约瑟夫在位时，这已不再是考尼茨的贵族启蒙，而是色彩浓重的"专制"启蒙了。约瑟夫自认为是个绝对君主，并准备像个绝对君主那样进行统治。支持他的共济会会员在脱离他的控制时也会受到怀疑。约瑟夫二世不仅要重塑管理其臣民的政府，而且还要重塑他们的行为。在玛丽亚·特丽莎在位的最后 10 年中，每年发出的法令将近 100 份，而约瑟夫在位时期，每

100 年发出近700份。

约瑟夫是个理想主义者，根本缺乏他母亲对于政策可行性的意识。他还深信，只要意图善良，只要忠实于理性，他就会知道什么东西最适合于人民。约瑟夫的理想是个官僚制国家（Beamtenstaat），在这样的国家里，一个忠诚、理性的官员阶层既管制（police）人民，又为人民提供保护其福利的"政策"（policy，在当时，policy和police是同义词）。政府应该是"为了"人们的，但它应该"通过"官员来操作，说到底政府是约瑟夫二世的政府。这种模式与当时哈布斯堡的旧制度很难协调起来。

不幸的是，约瑟夫初期的轰动性成就鼓舞他去尝试那些不可能的事情。犹太社团就是其中的一件——可以削除它的自治权，以使其变为"无害的"，因为它"已经"是无害的，已经无力抵制国家政策了。其他个别性权威的根基——如贵族的等级会议、教会和边远各省的"政治民族"——则要棘手得多。另外，约瑟夫改革的成功鼓励了更为激进的改革要求：出版审查的放松导致各种意见及批评泛滥开来。当改革的进程有可能脱离"自己的"控制时，约瑟夫对书报严加取缔，镇压叛乱，利用1782年组建、由培尔根伯爵约翰·安东（Johann Anton Count Pergen）领导的新警察部队充当密探，并再度采取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革命是可以有的，但只能是自上而下的革命。

约瑟夫二世想制服等级会议和省议会等传统地方机构，以便把哈布斯堡君主制国家改造成一个统一的合理化国家。1782年，他将奥地利—波希米亚核心地带和加里西亚的管理工作集中到共同联合管理处（Vereinigte Hofstelle）中，并下令合并各省的行政机构。王室领地及当时的省，都按合理化原则划分为区，匈牙利的县制则在1785年被废除。

约瑟夫二世对匈牙利的政策特别激进。尽管他的母亲在处理匈牙利问题时十分谨慎，但约瑟夫坚决不能让匈牙利阻碍他在全国范围内的改革。他从未召集过匈牙利议会（因而也从未加冕为那里的国王），他试图仅凭理性治理匈牙利。1784年，他下令以德语取代拉丁语作为

匈牙利的官方语言，因为这会形成一种管理意识；而传统和民族意识 101
则无关紧要。

当问题涉及其他边远省份，涉及神圣罗马帝国和整个对外政策时，约瑟夫对传统也表现出同样的理性主义的蔑视。对于地方精英，他以强制政策取代了考尼茨相对细腻的劝诱策略。在蒂罗尔，他强制推行兵役制；在米兰和曼图亚，地方制度机构被废除。在神圣罗马帝国，他试图利用自己的皇帝特权来牟取哈布斯堡国家的一己私利，但他很少考虑如何巩固帝位，何况皇帝的权力仍然是相当不正式的。

在处理比利时即奥属尼德兰问题时，约瑟夫表现得至为草率。在荷兰拒绝他开放斯凯尔特河口的要求后，约瑟夫再度于 1785 年尝试以比利时换取巴伐利亚。当腓特烈二世组成了一个德意志诸侯同盟（Fürstenbund）以阻止这笔交易时，约瑟夫又决定开发比利时。1787 年，他在那里强行设立一个新的行政体制，同时废除古老的地方机构和自由，甚至包括布拉班（Brabant）1355 年的宪法（这份文件名为“幸福的开端”［Joyeuse Entrée］）。这种对地方特权的正面攻击在奥地利—波希米亚也许是可行的，但在比利时，它先是引起了一场叛乱，接着是 1789 年的革命。

对于比利时的叛乱，约瑟夫最初的反应是重申控制权，再次实施出版审查，并更加依赖培尔根伯爵的警察部队。1788 年以后，这位皇帝患上了结核病。但他决心继续撑下去。1784 年，他曾下令编订全面的地籍调查簿（Kataster），以便为将来深入的税制改革提供基础。1789 年 2 月，在地籍调查簿还未完成时，土地税改革法就出笼了。这个法律大大削减了农民因耕种土地而向领主缴纳的捐税，教会领地上的负担看来将是第二个被削减的，但这对贵族收入的影响甚至更大，如果考虑到以上因素的话，这的确是革命性的措施。连一向驯服的奥地利—波希米亚贵族也抗议这项新法律，在匈牙利，税收改革和对地方制度的侵犯引发了贵族的反叛。甚至农民也拒付税款，因为他们觉得更好的政策马上就要到来。税收改革法于 1789 年 11 月正式实施，但它从未真正运转过，因而成为约瑟夫二世统治灾难性谢幕的一个牺 102

牲品。

就在比利时和匈牙利发生危机的时候，外交政策上的失当使奥地利在 1788 年与土耳其发生了战争，约瑟夫二世亲临战场指挥，但他在那里感染了结核病，不久于人世。1789 年，战争的态势向有利于奥地利的方向发展，但就在这时，普鲁士的新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二世（Frederick William II）见约瑟夫身陷困境，便与土耳其、比利时叛乱者和马扎尔贵族结盟，并准备入侵波希米亚。面对接踵而来的危机，再加上自己的结核病已入膏肓，约瑟夫来了个戏剧性的大转变。1790 年 1 月 28 日，他收回几乎所有在匈牙利推行的改革，并在其所有领地暂缓事实土地税法令。2 月 20 日，约瑟夫二世死去。

他的继承者列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比他的哥哥更为温和。他从 1765 年起担任托斯坎尼大公，也曾尝试开明改革，不过措施更为渐进、更讲策略。他甚至想引入一些宪政要素。面对 1790 年的危机，他的回应是退却，但并非不顾代价地退却。他废除了新的税收法，并对有关劳役的立法作了有利于领主的修改。列奥波德还将征税的权力交还给各个省的等级会议。当核心领地上的贵族被安抚之后，列奥波德又于 7 月解决了同普鲁士的争端，这一举措保证了他于 9 月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接着是与土耳其的和约。剩下来的就是比利时和匈牙利的叛乱，列奥波德利用高超的手腕，在叛乱者当中制造分裂，从而挫败了这两场叛乱。蒂罗尔由于恢复免于兵役征召的自由而平静下来。在宗教生活方面也对传统作了让步，一些修道院得以恢复，曾一度被禁止的某些宗教习俗又被允许。

不过，总体来看，列奥波德取得的成就相当可观。哈布斯堡君主制度的地位恢复了，大部分改革措施保存了下来，特别是在宗教和教育方面。某些方面甚至还有进步：列奥波德重新开放出版自由，遏制了警察的监控行为，并用宗南菲尔斯取代培尔根，前者削弱了社会控制，并重新强调约瑟夫最初观念中健康的一面。

不过，到这个时候，国内的改革已经被法国的事变抢去了风头，而且这里面还牵涉到家族关系：身处困境的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

特是列奥波德的妹妹，这是哈布斯堡以联姻来缔结同盟的传统做法的又一实例。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约瑟夫二世在 1789 年曾欢迎刚刚开始的法国大革命，他认为这场革命是对自己原则的确认。即便是到 1792 年，列奥波德二世可能仍想同法国的革命当局达成妥协。然而，列奥波德二世在位时的承诺由于他于 1792 年 3 月 1 日的猝然去世而作废。随着他的儿子弗兰茨二世（Francis II）的继位，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在这个时代，哈布斯堡的当务之急不是改革，而是如何应对法国大革命释放出来的巨大力量。

103

约瑟夫二世在弥留之际曾口授他的墓志铭曰："这里长眠着一位君主，他的意愿至为真诚，但他不幸亲眼看到自己的所有计划都尽付东流。"这番话别具一格，但说得太过头了。约瑟夫的改革在他母亲在位期间的成就的基础上实现了巨大的转变：哈布斯堡君主制国家第一次拥有行之有效的官僚体制，到 18 世纪 90 年代，官僚数量增长到近 14 000 人。国家和公民/臣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君主的形象也是如此：他现在被视为改革的源泉和"人民"的保卫者。对权威的这种认识以及国家作为改革的积极推进器和人民福利之支柱的意识，都已经打下十分深刻的印记。在奥地利的政治文化中，对福利国家的信赖依然十分强烈。对哈布斯堡社会中的很多进步分子而言，约瑟夫二世已成为"出色的哈布斯堡人"——无论是作为农业改革者还是作为犁田者，抑或是作为自由德意志的中央集权者。强调国家控制和理性主义的约瑟夫主义在官僚体制和天主教领导层中依然很有影响力。

约瑟夫二世的遗产超越了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疆界。贝多芬（Beethoven）的歌剧《费黛里奥》（Fidelio）是歌颂人类自由的最伟大颂歌之一。贝多芬通常被认为是典型的德意志作曲家，但他创作生涯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在维也纳渡过的。即使是他在波恩（Bonn）的童年生涯，也是在来自哈布斯堡家族的科隆选帝侯、约瑟夫二世的幼弟马克西米连·弗兰茨（Maximilian Franz）的治下渡过的。贝多芬于 1792 年定居维也纳，《费黛里奥》就是在那里创作，并于 1805 年首演

的。歌剧主题的素材最初很可能正是《魔笛》的作者艾曼努埃尔·施卡尼德建议的。

约瑟夫二世的世界和贝多芬之间的联系还可进一步深挖下去。当贝多芬还在波恩的时候，他曾受读书会（Lesegesellschaft）——光照派的一种继承社团——的委托，创作一支《约瑟夫二世之死合唱曲》。合唱有一部的音乐是献给死去的约瑟夫的："人类走向光明"（Da steigen die Menschen an's Licht），这个合适的主题后来被贝多芬收入《费黛里奥》中，作为"这样一个瞬间"（Welch' ein Augenblick）中的音乐。这是歌剧中的倒数第二个合唱，当时剧中正在虔诚地歌颂开明君主的恩典使人摆脱了地方专制主义的暴政。

104

二、正统帝国，1792—1848 年

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在其《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中已敏锐地意识到，法国大革命的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义、对过去的拒斥和对中央集权式的民族统一性的强调，将对英国经验主义的、渐进的和以成例为基础的自由特征构成根本性挑战；但革命的法国对哈布斯堡君主制国家造成的威胁甚至更大。哈布斯堡王朝事业的核心是如何统治那么多居住着很多种族群体的领地。一个像革命的法国那样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不仅仅是大国角逐中的对手，而且是奥地利意识形态上不共戴天的仇敌。

对奥地利来说，来自法国的革命威胁实际上终结了任何重启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希望。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的创痛经历，使得奥地利最终放弃了将其权威奠基于现代性之上、奠基于服务于人民的有效性和能力之上的努力，相反，它退回到几乎一个世纪前就曾试图摆脱的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正统性（legitimacy)。它在最初几十年内尚能发挥效力，但是，在一个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进步——这些价值就体现在法国大革命中——盛行的时代，它最终是个不合适的根基，人们无法根据它来证明一个超民族的王朝帝国的合理性，不管这个帝国多么"正统"。

一开始，法国大革命对奥地利的冲击似乎很微弱。在国内，约瑟夫二世的改革虽然有其不完善之处，但改革仍起到了某种预防更激进之变革的作用，而且，1789 年之后巴黎的事变也没有阻碍列奥波德二世设想他的下一步改革。当他的儿子弗兰茨二世继位时，很多人以为他会继续进行温和的改革，尤其是在农业政策方面。弗兰茨很快采取了一条更为保守的路线；但约瑟夫时代的官僚体制仍在运转，奥地利历史上两个大规模的、具有进步意义的法律改革，就发生在弗兰茨时代：1803 年宗南菲尔斯的《刑法典》，以及 1811 年的《民法大典》 105 (Allgemeines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ABGB)。宗教政策方面同样如此，虽然弗兰茨可能是保守的，但他保留了约瑟夫式的国家对教会的控制，以及很多约瑟夫主义的宗教机构。

弗兰茨看来曾真诚地相信法治，虽然他再度任命培尔根为警察部门的首脑，并且一开始压制着打击异议的行为。这种局面由于 1794 年夏发现"雅各宾密谋"而发生改变。随之而来的雅各宾审判（其名称来自法国的激进革命派别）判处 9 人死刑，其中包括弗兰茨·赫本史特莱特（Franz Hebenstreit）、匈牙利激进分子伊格纳茨·冯·马丁诺维奇（Ignaz von Martinovics），另有 31 人被判监禁。这次密谋一度引起统治阶层的警惕，并被视为奥利地存在革命可能性的证据，但实际上，奥地利当局几乎感受不到激进派的压力。即便是奥地利的雅各宾派，也更像是失意的约瑟夫主义者，而不是真正的革命派。对约瑟夫体制的抵制大多是保守性的，当弗兰茨的右倾调整政策满足了统治阶级之后，哈布斯堡的统治在国内已没有重大威胁。

一开始的时候，来自法国大革命的外部威胁似乎也是无关紧要的，奥地利受到的威胁主要是在反对普鲁士和俄国时失去了法国这个盟友。当法国的局势不断向左转时，列奥波德二世和普鲁士一起在 1791 年 8 月 27 日发表了皮尔尼茨（Pillnitz）宣言，并于 1792 年 2 月 7 日同普鲁士结盟，但后来是法国人于 1792 年 4 月 20 日向奥地利宣战。此前，弗兰茨是哈布斯堡统治者，但没有任何危机的迹象。人们曾以为，同

法国的战争易如反掌，秩序很快就会恢复。普鲁士和俄国都更关心再取得一些波兰的领土，而奥地利则再次准备以比利时换取巴伐利亚。

但是，对法战争是一场重大灾难。1792年9月20日，法军在瓦尔密（Valmy）击败奥普联军。次日，法国国民公会废除君主制度，革命军队继续进攻，占领了比利时和整个莱茵河左岸地区。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Louis XVI）被处决。两天后，1月23日，俄国和普鲁士缔结了第二次瓜分波兰的密约，但奥地利没有参加，并且反对瓜分，因为现在它已经意识到法国带来的致命威胁。

106

1793年3月，奥地利领导很多欧洲国家（但不包括普鲁士和俄国）组成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最初取得了成功。但1793年8月巴黎革命政权下达“大规模征兵令”（levée en masse），形势发生逆转。旧制度各国的军队根本抵挡不住法国人的新型公民大军，结果造成大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1793年10月16日，玛丽·安托瓦内特被处决，旧制度的统治精英们惊恐万分，但法国在军事上的进展甚至更令人焦虑。到1794年底，法军重新占领整个莱茵河左岸地区，并征服荷兰联省共和国。作为回应，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于1795年10月第三次瓜分波兰，但是，对欧洲一个历史大国的最后掠夺，其背后的无所顾忌的国家主义与法国人的进展比起来全然是个不合时宜的做法。

1797年的康波福米奥和约（recte Campofordmido）为革命的法国赢得了前所未有的领土收益，但它仅仅是一个休战期。法国的进一步进攻导致了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但也给奥地利带来了进一步的灾难，1800年，当法军在马伦哥（Marengo）和霍亨林登（Hohenlinden）取胜后，维也纳受到直接威胁。1801年2月9日的吕内维尔（Lunéville）和约见证了哈布斯堡王朝地位的进一步衰落。萨尔茨堡终于有了第一位哈布斯堡统治者，但这只是因为托斯坎尼的哈布斯堡统治者被驱逐、法国占领了整个意大利半岛。吕内维尔和约也预示着哈布斯堡对神圣罗马帝国控制的劫数，因为它规定帝国的领地须在法国的监护下重组，这就导致1803年的选帝侯院里第一次出现了新教占多数的局面。

吕内维尔和约是个耻辱，但是，奥地利的地位只会随着法兰西光荣（gloire）的现代版本对其权力和威望的传统根基的摧毁而进一步恶化。1804年5月，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自称为法国人的皇帝。这显然是对哈布斯堡家族的一个挑战，因为作为皇帝，后者在传统上是欧洲各国君主中的长者。神圣罗马帝国本身也被削弱和重组，看来 108 它已不能保证选举哈布斯堡家族的候选人当皇帝，而且它自身能否维系下去也成了问题。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弗兰茨二世于1804年8月11日宣布自己为弗兰茨一世，即第一位“奥地利的世袭皇帝”。



插图22　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

要以这个新称号为基础建立一个“帝国”是很古怪的。实际上，皇帝的称号并没有创建一个新的、统一的奥地利帝国。它适用于所有被“奥地利”——即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土地，但它又保证这些土地上的任何宪法和权利都不会受到影响。新的皇帝宣言中涉及的不是一个奥地利国家，而是多个奥地利国家。皇帝头衔的法律基础是可疑的，而且忽视了传统制度。不过从象征意义上说，它的正统性很大程度上可以依赖于神圣罗马帝国。新的帝国纹章是奥地利纹章上加罗马帝国皇冠，新的帝国色黑色和黄色与以前的帝国色黑色和金色是一致的，甚至奥地利的帝国鹰徽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双头鹰徽。因此，从纹章礼仪上说，世袭的奥地利帝国简直是选举制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翻版，后者当时仍然存在，因此弗兰茨既是弗兰茨二世又是弗兰茨一世。

新帝国有自己的皇冠，哈布斯堡的家族皇冠是鲁道夫二世命人制作的，但这顶“奥地利”皇冠从来没有哪位奥地利皇帝戴过。当拿破仑·波拿巴于12月2日自己加冕为皇帝后，弗兰茨做出的回应是在12月7日的一个正式仪式上宣布自己为奥地利皇帝，但当时没有举行加冕礼。采用这个称号实际上是承认失败，它意味着哈布斯堡权力和威望所依赖的传统世界图景的终结。

1805年的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中，英国人于10月21日在特拉法加（Trafalgar）海战中取胜；但欧洲大陆的战事戏剧性地确立了法国的优势地位。拿破仑进入维也纳，人们欢呼他的到来，他更像是个名流，而不是敌人。11月20日，当贝多芬的《费黛里奥》首演时，稀稀拉拉的观众中大多是法国占领军的军官。接着，在1805年12月2日的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战役中，拿破仑以压倒性的胜利结束了战争。

在随后签订的普雷斯堡和约中，奥地利获得了萨尔茨堡（从哈布斯堡家族的一个幼支手中取得），但是丧失了大片土地，包括蒂罗尔和福拉尔贝格（给了巴伐利亚）和哈布斯堡在施瓦本的领地（归符腾堡）。109 1806年7月，拿破仑在德意志组建了莱茵同盟，实际上取代了神圣罗马

帝国。弗兰茨二世（一世）对这一“既成事实”的反应是于 8 月 6 日放弃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并宣布帝国解体。1806 年，法国在耶拿（Jena）和奥尔施塔特（Auerstädt）战役中大败普鲁士。但这对奥地利并非特别的慰藉，因为它正在拿破仑时代的新欧洲中寻找自己的出路，而这个欧洲已经失去了曾一度是奥地利权威之核心的帝国传统制度。

奥地利已不再是完全独立的，它不得不听命于法国，于 1808 年加入大陆体系——即拿破仑对英国的封锁。这一强加的政策对奥地利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实际上，纺织工业由于战时需求（军服）和免于英国的竞争而有所发展。战争造成的巨额赤字——大部分时期内的开支约为收入的两倍——导致通货膨胀，城市居民因此陷入贫困化；不过，由于军队需求的增加，很多农民的实际收入有了提高。

从文化上说，这同样是个矛盾的时代。这个深受创伤的政权压制不同意见，奥地利的思想生活因而日渐贫乏。在战时大部分时间里，弗兰茨仍坚持法治和合法程序的原则，但他也在 1803 年设立了一个“再审查委员会”。然而，维也纳也是贝多芬创作伟大作品的地方，包括 1805 年上演的《英雄交响曲》，以及 1808 年 12 月同时上演的第五和第六交响曲。

弗兰茨的反动似乎也没有安全窒息约瑟夫主义的改革精神：1805 年以后，新任外交大臣约翰·菲利普·施塔迪翁（Johann Philipp Stadion）伯爵说服弗兰茨一世尝试一种新的约瑟夫平民主义。这种思想的灵感来自西班牙，拿破仑对西班牙的占领已经激起了民族反抗。施塔迪翁断言，法国人将会自食其果：对付拿破仑的一副有效解毒剂就是激发奥地利“民族”去摆脱法国的桎梏。

但是，奥地利“民族”究竟是何含义、“奥地利”与“德意志”究竟是何关系却从未被言明过。施塔迪翁自己是施瓦本人，他的主要宣传者弗雷德里希·冯·根茨（Friedrich von Gentz）是西里西亚人。在聚集于维也纳以唤醒公众舆论的作家当中，有德国浪漫主义者弗雷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虽然很多宣传建构起了哈布斯堡所有臣民的共同历史，但这种宣传主要是面对这个君主国的德语 110

臣民的，而且正是在这些人中间，奥地利的“民族观念”才有最热烈的反响。当施塔迪翁以法语宣称“我们已经组成一个民族”时，他脑海中的“民族”是一种爱国主义观念，而非民族主义观念。尽管如此，很多德意志人，包括奥地利德意志人、甚至还有约翰（Johann）大公，都认为，奥地利可以利用施塔迪翁的“民族”起义来充当“德意志”民族的反革命领导人。

政府在各省建立历史博物馆，以提升“奥地利”各民族的爱国自豪感；然而，奥地利“民族”动员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公民中征召民兵（Landwehr）——主要集中在讲德语的世袭领地上。加里西亚的波兰人被视为太亲法了，波希米亚的反应不冷不热，匈牙利议会则拒绝了征召民兵的提议。

我们甚至不能确定施塔迪翁的政策是否真的追随约瑟夫主义。奥地利的两个大公，约翰和查理（Charles），都是约瑟夫主义改革者。查理在军队中进行了大规模的、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约翰既领导战争，又组建民兵，而且是“民族”宣传运动的领导者，他还在约瑟夫·冯·霍尔迈尔（Joseph von Hormayr）的协助下，暗中支持煽动蒂罗尔反对巴伐利亚占领者的行动。这个政权显然把约瑟夫的遗产当作唤起人民的一种手段。如今座落在维也纳约瑟夫广场上的约瑟夫二世的雕像，是1807年矗立在那里的，为的是振奋“民族”事业。然而，尽管两位大公希望推进约瑟夫的中央集权政策，施塔迪翁的政策却在其浪漫主义的、保守的顾问们的影响下走向权力分散化，并援引君主制度中的传统权威——等级会议。

除了中央行政机构中的某些改革、军事改革、民兵和大规模的宣传战之外，施塔迪翁的计划绝不会走得更远了。它绝没有普鲁士的施坦因—哈登堡（Stein-Hardenberg）改革所具有的那种彻底性，虽然施塔迪翁的政策在精神源头上与前者类似。在农业经济、削减警察权力和让更多民众参与国家事务等方面没有认真的改革意图。奥地利的“民族化”运动是在准备不周的情形下仓促开展起来的。

111　不过，最初的这些努力在唤起公众抵抗法国方面还是有效的。由

于军事改革和民兵的创建，到1809年初，可以动员起来保卫这个君主国、抵抗法国进攻的潜在兵力超过70万，能够在奥地利境外作战的军队则超过30万。不幸的是，1809年2月，在改革尚未完成时，战争的决策便已做出，因而破坏了上述努力的成果。第四次反法同盟的企图也化为泡影。当奥地利于4月9日宣战时，它只能独自对抗拿破仑及其德意志盟友，包括巴伐利亚。

在安德烈亚斯·霍菲尔（Andreas Hofer）的领导下，约翰大公和霍尔迈尔策划的蒂罗尔起义在克服巨大困难后取得了重大成功。霍菲尔反击巴伐利亚和法国军队的战役、蒂罗尔人于1809年春夏在贝尔吉赛尔（Bergisel）取得的4次胜利成为了蒂罗尔（和奥地利）传奇的一部分。但是，在8月的第4次贝尔吉赛尔战役中，蒂罗尔人是在没有奥地利支援的情况下战斗的；而到11月1日的第五次战役时，法国人和巴伐利亚人获胜，奥地利则已签订了和约。这时大部分奥地利人所能做的只是为起义者请求大赦，而不够明智的霍菲尔仍继续抵抗，最后于1810年2月20日在曼图亚被处决，这时的奥地利人仅仅是个看客了。

之所以会有这种“出卖”蒂罗尔的行径，是因为法国人再次在主战场上痛击了奥地利人。但奥地利的努力赢得了一次体面的失败：1809年5月21—24日，查理大公在阿斯培—埃斯林（Aspern - Essling）让拿破仑吃到了第一场大败仗，此事经常被引为一次精神胜利。但这时拿破仑已经占领维也纳，并在那里住了158天，而他7月在瓦格拉姆（Wagram）的胜利使得奥地利完全由他发落。10月14日的申布隆条约将奥地利缩减为一个二等国家，实际上成为法国的卫星国。拿破仑本来可能完全肢解奥地利，只是因为塔列朗（Talleyrand）曾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后劝告他说，奥地利“对文明世界未来的安康来说必不可少”[1]，他才宽容处置。他只是割去了奥地利重要的枝蔓，留下一个内陆躯干，并强迫奥地利缴纳大笔赔款，限制奥地利的军事力量，以使奥地利永远不会　112

① Ingaro, *The Habsburg Monarchy*, p. 237.

成为法国霸权的威胁。

弗兰茨一世把1809年的溃败归咎于改革计划。他的兄弟，即两位大公，被撤离一切责任岗位，施塔迪翁则被梅特涅伯爵克莱门斯·文策尔·罗塔尔（Clemens Wenzel Lothar Count Metternich）取代。梅特涅来自莱茵地区的一个开明家族，他信赖（开明绝对主义的）改革，但认为首要的职责是要服从他的主人，即皇帝。在国内推行镇压政策的同时，他发动一场高超的外交战役，其最初的目标是要与法国和解。施塔迪翁试验过程中新生的爱国主义被抛到一边，民兵被解散；当霍尔迈尔和约翰大公被发觉正在策划另一场蒂罗尔起义时，前者被逮捕，后者则被软禁，接着被放逐到施蒂里亚。虽然弗兰茨对屈辱的现状深感憎恶，但他的女儿、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大侄女玛丽·露易丝（Marie Louise）还是于1810年3月11日嫁给了拿破仑。

1811年3月20日，玛丽·露易丝生了个儿子，于是巩固了奥地利同新法国的同盟关系。这件事看来令人欣慰，因为在2月20日，奥地利国家由于不堪战争开支、法国的占领和战争赔款的重负而最终宣布破产。到1811年，奥地利帝国是个战败的、破产的法国的附属国。当拿破仑决定进攻俄国时，奥地利别无选择，只好在1812年3月完全与之结盟，并在当年夏天组建一支3万人的部队，由施瓦岑贝格亲王卡尔·菲利普（Prince Karl Philipp zu Schwarzenberg）率领，参加拿破仑的“大军”。

拿破仑的部队在1812年的俄国战役中遭受惨败，欧洲力量对比的天平完全改变，奥地利的前景也随之改变；但是梅特涅对于如何利用这一新局面表现得极端的谨慎。当普鲁士于1813年3月加入俄国的“解放战争”时，梅特涅提议对交战各方进行“武装调停”，直到8月，奥地利才参加第五次反法同盟。在10月14—18日的莱比锡“民族大会战”中，奥地利是盟国当中提供兵力最多的，但即使是在这场战役之后，梅特涅在立场上仍然倾向于法国，部分原因是出于王朝利益的考虑。但由于拿破仑拒绝任何妥协，法国最终于1814年5月遭受全面失败。

奥地利在 1812 年时已彻底战败，但由于梅特涅的外交手腕，战争结束时它成了胜利方，看起来还是胜利方的领袖。在数十年的革命动荡之后，重新团结欧洲的会议于 9 月在维也纳召开。虽然奥地利人主持着维也纳和会，但显而易见的是，实际上是俄国和普鲁士在英国和 113 西班牙的协助下赢得了这场战争。当拿破仑从厄尔巴岛（Elba）返回并建立百日王朝时，是英国和普鲁士的军队于 1815 年 6 月 18 日在滑铁卢（Waterloo）击败了他。诚然，在 1813—1814 年的战役中，奥地利提供了 56．8 万人的军队，但它来得太迟了，而且军队的供应和训练都很差。因此，梅特涅在谈判时的底气是虚弱的，他始终要依靠英国的支持和自己大国平衡观念的说服力。

维也纳和会于 1815 年 6 月 9 日结束（即在滑铁卢战役 9 天之前）。与 1792 年的状态相比，俄国和普鲁士获得了最多的土地（英国获得的海外利益最大）。奥地利获得的土地相对较小。这反映了奥地利的相对虚弱，但也体现出梅特涅更具战略性的外交思维。以比利时和哈布斯堡在施瓦本和布莱斯高的土地换取威尼斯、萨尔茨堡、布里克森（Brixen）和特伦特以后，哈布斯堡君主国成为一个坚实的、连成一片的领地实体，正如当初约瑟夫二世设想的那样。占据伦巴第－威尼斯以及哈布斯堡家族的君主出现在托斯坎尼和摩德纳（Modena），这意味着奥地利将再次支配意大利。在德意志，虽然神圣罗马帝国没有复活，但奥地利成为新的德意志邦联的主席，尽管这时的普鲁士比以前更大了。另外，梅特涅还确保对法国宽大处理，从而建立起作为他外交理想的大国均衡。为了与这种均衡相匹配，某种联盟体系将成为欧洲和谐的基础，欧洲各大国将通过这一机制举行定期磋商，以处理悬而未决的事宜。因此，这个君主国取得了一种相当有利的安全位置，在此基础上，它将可以从战争年代的创痛中恢复过来。

对奥地利来说，维也纳和会没有达到的目标是旧制度时代的传统结构和忠诚的回归，而这种结构和忠诚曾是哈布斯堡权威的主要来源，或者说，这次会议没有为后革命时代的奥地利指出一条找回正统性和权威性的道路。找回正统性已是不可能的了，而权威性只能依靠奥地

利当局自身的作为。然而，弗兰茨一世就是不愿意适应这个正在形成的新的现代世界；而梅特涅也不愿拿自己的权位去冒险，相反，为了114 增强哈布斯堡的权威，他向保守的浪漫主义乞灵，而浪漫主义则以宗教和秩序的力量来反对1789年的革命精神——不管革命精神出现在哪里。1815年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缔结的，后来大多数欧洲国家参加的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成为梅特涅“体系”的象征——任何反对“正统”秩序的运动都要被当作革命的感染物加以消灭。梅特涅不太像“欧洲的马车夫”，他更像欧洲的消防员，哪里有“革命”他就得去哪里扑灭。

英国在维也纳会议上是梅特涅最有力的支持者，但是他那压迫性的干涉主义政策疏远了英国，后者最终撤销了对他的支持，这就损害了梅特涅所珍视的大国均势。反动转向有害于奥地利的形象——它再次成为镇压和落后的象征，而且损害了其内部政策和政治方面的声望。在经济和社会快速演变的欧洲，复辟后的奥地利却信奉静态的平衡，这几乎注定了梅特涅体系的最终瓦解。

虽然有1813—1815年的成功，但奥地利从来没有从1809—1811年的灾难中真正恢复过来。在外交事务方面，一系列的会议——1818年在亚琛（Aix-la-Chapelle）、1820年在特罗包（Troppau）、1821年在莱巴赫（Laibach）、1822年在维罗纳——开始时令人鼓舞，因为法国在1818年重新完全融入了欧洲大国体系——五国联盟（Quintuple Alliance），但会议随后蜕变为镇压变革的论坛，最初的镇压发生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梅特涅并不在意“神圣同盟对四国联盟[①]的胜利”，因为这确认了他的“正统”原则，而且看起来还让他可以控制整个欧洲。然而，1821年希腊的起义表明，他对欧洲事务的权威徒有其表。作为主要的东正教大国，俄国对保卫希腊人在奥斯曼帝国的权益一事极感兴趣，而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广泛弥漫的亲希腊的浪漫主义情怀使得希

① 这里的四国联盟（Quadruple Alliance）指的应是维也纳和会上的四大战胜国：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译者注

腊的民族事业赢得了公众的热情支持。对于这种局面，梅特涅关于正统性和大国均势的论调是没有说服力的，尤其是在希腊的起义被穆罕默德·阿里（Mehemet Ali）无情地镇压之后。1827 年，俄国、法国和英国介入这场冲突，1830 年，希腊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独立了。

到这时，梅特涅的体系受到了严重损害。英国已经利用它的海上霸权纵容南美脱离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并为葡萄牙建立自由政体提供了条件。不过梅特涅在中欧更为成功。他把德意志各国纠集在他的反动纲领下，要求它们压制此前在“解放战争”中激发起来的德意志民族主义。1817 年的瓦特堡（Wartburg）大学生节、1819 年奥古斯特·科策布（August Kotzebue）被刺杀，这两件事导致了 1819 年 8 月的卡尔斯巴德法令（Karlsbad Decrees），法令限制言论自由，并试图镇压已经在德国大学中成熟的德意志民族主义。1820 年的维也纳最后法令授权德国诸侯可违反 1815 年决议中仍然认可的宪法制度。但是，德意志民族主义仍然在发展，其表现形式虽然更为隐蔽，但对抗性更强了。

115

1830 年，法国再次发生革命，并成为一个自由立宪君主国，比利时也在英国的保护下独立了。虽然意大利和波兰的民族自由运动被成功镇压，但奥地利越发被视为进步的主要敌人。当然，梅特涅仍然可以依靠俄国，而且西方列强在东方问题上的争吵也对他有利。但是，1840 年，东方问题间接引发了德意志民族情感的大爆发，其最著名的表达形式是战歌“莱茵河边的哨兵”，这表明梅特涅压制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努力徒劳无功。另外，普鲁士领导的关税同盟（Zollverein）于 1834 年成立，这是在开创没有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统一事业。

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正在全欧洲兴起，包括奥地利帝国境内，但是，奥地利国家对此几乎毫无反应。经历革命战争的弗兰茨一世不敢挑战哈布斯堡社会的现状：享有最绝对之权力的哈布斯堡君主也是最无用的君主。

当然改革行动还是有的，尤其是在财政领域。国立银行于 1816 年成立，为的是恢复 1811 年破产之后奥地利的信誉。但是，在税收政策方面，相对而言，当局没有触动哈布斯堡社会的既得利益阶层。税收

仍主要由省级机构管理和分派；贵族只缴纳很小一部分税收，帝国各地的税收负担仍然极不平衡——匈牙利的捐税在帝国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过小。军队长期经费不足，而没有一支经费充足的军队，梅特涅的外交到头来经常是一场徒有其表的空头游戏。

116

行政改革进展甚微。1817 年加里西亚建立了议会，但是，梅特涅彻底重组君主制结构的计划被弗兰茨一世束之高阁。土地改革更是毫无进展，劳役和领主司法权仍然是绝大部分哈布斯堡农业社会中的特征。农民觉得对约瑟夫主义的背叛伤害了他们，而贵族则对一个扩张中的官僚机构的强制政策心怀怨恨。国家的税收困难导致私人经济行为中信贷稀缺，农业只能缓慢发展，并落后于人口的增长。

“官僚绝对主义”既不能让农民满意，也不能取悦于贵族，但是能镇压政治上的不满情绪。奥地利有一个庞大的安全机构，其头目是约瑟夫·泽尔尼茨基（Joseph Sedlnitzky）伯爵，但它受梅特涅的个人控制，可以压制任何不恰当的东西，包括宗教激情。虽然梅特涅积极推动与教廷的接近，并以此作为王权和祭坛的权威联盟的一部分，但他感兴趣的只是宗教作为权威之支柱的功能，因而依旧保持着约瑟夫式教会的国家主义结构和文化。克莱门斯·玛丽亚·霍夫鲍尔（Clemens Maria Hofbauer）集团那种浪漫主义的、激越的天主教精神对奥地利的影响是有限的。伯恩哈德·博尔扎诺（Bernhard Bolzano）对天主教的解释十分激进，以致受到教廷的谴责，并受到当局的迫害，但是他在波希米亚教会“内部”找到了保护力量。

梅特涅的奥地利在很多方面仍然是一个约瑟夫主义国家。官僚机构仍在扩张，虽然官员的地位和薪水有所下降。教育体系也在发展之中，除了男童之外，女童也接受到教育。但是，教学内容、人们所读所言，都受到严格限制，至少官方政策如此。康德哲学的教学被禁止，因为有人觉得它是对宗教信仰的威胁。对于一个要求其“公民”首先是服从然后才是思考——如果实在要思考的话——的国家来说，德国的唯心主义总会被投以怀疑的目光。

1821 年，弗兰茨一世对一个教育工作者说：“周围的新观念是我

不能、也绝不会赞同的。远离这些观念，留下你的知识，因为我需要的不是学者，而是诚实的公民。你的职责是要教育年轻人成为诚实的公民。任何为我服务的人都要按我的命令从事教育；任何不能这样做的人，或者与新观念有牵连的人，都可以离开，否则我就安排他离开。”① 既然最高层持这样的看法，这个君主国的思想生活落后于北方和西方邻国也就不足为奇了。出版审查制度的确千疮百孔，很多“被禁”文字得以流传——当然是在不合法地流传，但出版审查制度依然十分严厉。政府的镇压和无能给公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抑制效应，造成一种政治和思想上的停滞感。

117

弗兰茨一世于1835年死去，他的死使得奥地利国家的运转更加没有目的感和方向感。出于对正统性的尊重，弗兰茨的长子费迪南德（Ferdinand）承继大统，虽然他在精神上和体力上都不能担当这一重任。起初，梅特涅试图从他那里获取独掌政局的权力，但约翰大公的介入挫败了他的企图，由路德维希（Ludwig）大公领导的“枢密院会议”建立起来，以领导政府事务。这个机构被其两个成员之间的冲突左右着，这就是梅特涅和1826年后主管内政的弗兰茨·安东·克罗夫瓦特—里普施坦因斯基（Franz Anton Kolowrat – Liebsteinsky）伯爵，他们的冲突显然造成了僵局。在三月革命之前（Vormärz），即1848年3月之前的13年中，奥地利的政策主要由两部分构成：抵制各省的变革，商讨这个银根日益紧张的国家如何为抵制行动埋单。

这个君主制国家确实有政治生活，特别是在匈牙利，但是，梅特涅的警察统治压制一切异己政治行为。复辟时代奥地利的主导精神是政治上的寂静主义。在19世纪10年代和19世纪20年代，在经历了最近的动荡之后，这种寂静主义几乎是一种受人欢迎的喘息，而文化世界则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尽管梅特涅的奥地利看起来很反动，但人类自由的颂歌、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还是于1824

① Helmut Rumpler, *Eine Chance für Mitteleuropa* (Vienna, 1997), p. 212.

年首演于维也纳。爱乐协会（Gesellschaft der Musikfreunde, the Musikverein）成立于1812年。弗兰茨·舒伯特（Franz Schubert, 1797—1828）在这个时期写下了他所有的成熟作品，优雅和激情近乎完美地交融在他的创作中。

舒伯特的艺术格调更为谦逊、更重主观感受，这是“比德麦尔”（Biedermeier）时代侧重私人世界和家庭空间的典型反映。这个时代的另一个名称是“烤鸡时代”（Backhendlzeit），这个说法形象地表现出简单的生活愉悦的回归，人们已不操心宏大的政治和思想问题。费迪南德·格奥尔格·瓦尔德缪勒（Ferdinand Georg Waldmüller）和约瑟夫·丹豪泽（Josef Danhauser）等画家，他们集中关注的是肖像画以及取自乡村生活及富足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田园牧歌式画卷。在这种了无牵挂的逃避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愉悦氛围中，华尔兹也成为当时奥地利生活中的一个主要支柱。

118

在文学方面，这个时代已有几位奥地利大作家崭露头角。首先是弗兰茨·格里尔帕策（Franz Grillparzer, 1791—1872），他将冷嘲热讽的批判风格、对王朝的忠诚和对世俗生活的厌倦结合在一起，被视为哈布斯堡奥地利性格的完美化身。阿达尔贝特·史蒂夫特（Adalbert Stifter, 1805—1868）生于波希米亚的奥博普兰（Oberplan），离莱昂菲尔登边境地带只有几英里，他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其文学生涯的。费迪南德·雷蒙德（Ferdinand Raimund）和约翰·内斯特罗伊（Johann Nestroy）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剧作家，前者采用了童话般的寓意手法，后者恣意挥洒辛辣而高明的讽刺才能，而且还有很多让审查官员摸不着头脑的即兴发挥。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奥地利的德语文学对梅特涅政权持更为尖锐的批判态度。查理·希尔斯菲尔德（Charles Sealsfeld）（或称卡尔·波斯特尔：Carl Postl）在1828年于境外发表的《真实的奥地利》（*Austria As It Is*）中猛烈抨击梅特涅体制，但该书在奥地利被禁止。很多奥地利自由派和作家前往国外，或至少是前往其他德意志邦国，这些地方能相对安全地逃避梅特涅的警察统治。1841年，犹太自由记

者伊格纳茨·库兰达（Ignaz Kuranda）在布鲁塞尔创办期刊《边境信使》(*Grenzboten*)，这份刊物被偷运到奥地利，以传播德意志自由主义纲领。奥地利境内和境外的作家们越来越大胆，越来越敢于批判。甚至一些贵族，如维克托·冯·安德里安—维尔堡（Viktor von Andrian-Werburg），也撰文猛烈抨击奥地利的传统。老一辈作家，如格里尔帕策，也变得更加尖锐。当爱德华·冯·鲍恩菲尔德（Eduard von Bauernfeld）的戏剧《成年》(*Grossjährig* ）于 1846 年上演时，剧中掩饰不住的、要求奥地利家长制国家放松对公众控制的诉求已成为普遍的社会见解。

从接受到不耐烦——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虽然当局持反动立场，但奥地利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已经发生转变。经济变革尤为明显。这个君主制国家，尤其是临近德意志和大西洋市场的西北部，经历了 19 世纪前半叶第一次全面的工业化浪潮的洗礼。1811 年的国家破产，再加上战争结束时不可避免的混乱，使得奥地利遭受了严重的经济萧条，其延续的时间要长于其北部和西部的邻国。从 19 世纪 20 年代末期开始，奥地利的经济走向复苏，此后则以更为可观的速度增长，它的经济虽然还赶不上西欧各国，但堪与德意志关税同盟各国持平。但是，各个地区和产业的增长速率非常不均匀。纺织工业增长最快，波希米亚在经济发展中一马当先。相比之下，匈牙利的工业化水平很低。 119

技术进步大大促进了经济增长。纺织工业的发展依赖于蒸汽机和机械化；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制铁工业的飞速发展，特别是 19 世纪 30 年代萨罗蒙·罗特希尔德（Salomon Rothschild）在维特科维茨的工厂的发展，依靠的是从英国引进的新技术。由于蒸汽动力运输的发展——汽船和铁路的使用，交通也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多瑙河汽船公司于 1831 年开始运营，1832 年，奥地利和欧洲大陆的第一条铁路在伏尔塔瓦河边的布德维斯（Budweis）和多瑙河边的林茨之间运营，这条铁路在莱昂菲尔登以东几英里的地方穿过。但这条铁路以马为牵引动力，并未取得多大成功。真正的铁路时代开始于 1838 年动工的费迪

南德皇帝北方铁路（Kaiser Ferdinand Nordbahn）。该工程由萨罗蒙·罗特希尔德投资，连接维也纳和北边的奥尔缪茨（Olmütz），以及罗特希尔德在维特科维茨（Vitkovice）的制铁工场。维也纳往西及往南的铁路也在这个时期开工，1841 年，政府控制了正在发展中的铁路网。

罗特希尔德在这个君主国的两个最重要的产业即铁路和制铁产业中扮演着先锋角色，这一点表明，犹太企业家在奥地利的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约瑟夫主义仍保持相当大影响力的一个领域是政府的工商政策，这一政策是相当进步的。当局致力于推动实用技术知识：奥地利很多最著名的技术机构，如维也纳综合工科学校（即后来的高等技术学院）就是在这个时期创办的。技术进步和经济事业受到欢迎，只要它们对国家不构成威胁。在一个信贷和金融专门知识相对匮乏的经济中，而政府又常年需要财政支持时，犹太人的投资受到欢迎，特别是那些表现出政治忠诚的犹太人。罗特希尔德家族尤其受到国家的照顾，因为它曾屡屡帮助后者摆脱战时和战后的困境，国家对此深为感激。因此，犹太人成为工商业的主要投资者，尤其是在棉纺业等发展最快的行业中。一个富裕且拥有巨大影响力的犹太金融和工业精英集团形成了，其中还有几个带有贵族头衔的家族。

与此同时，波希米亚的犹太人仍在屈辱的限制下艰难营生，除了一些受到特别容忍的例外，官方仍禁止犹太人在维也纳居住。尽管如此，1848 年的维也纳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犹太人商业中心，犹太居民实际上有数千人。当局意识到这种商业价值，因而容忍这种不合法的存在，但是，臭名昭著的犹太管理局的腐败官员经常利用这种制度进行敲诈，强迫“不合法”的犹太人行贿。

奥地利国家同其他族裔集团的关系经常产生一些反常的结果。尽管这是个政治寂静主义的年代，但也是个民族主义兴起的时期，而且政府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民族主义。虽然政府取缔了政治生活，但它允许“文化”生活存在，其中包括“研究”这个君主国的不同“民族”的历史。由于政府不愿与议会发生对抗，文化发

展因而通常得到某种官方支持。弗朗基舍克·帕拉斯基（František Palacky）是波希米亚出资创办的波希米亚博物馆的领导人，他将这个波希米亚地方爱国主义机构改造成一个以捷克语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堡垒。

在这个君主国的各个“历史民族”中，具有民族意识和公认的高级文化的领导阶级，如意大利人、马扎尔人和波兰人，他们已形成清晰的历史“权利”意识。在知识分子和贵族中，文化民族主义很容易和政治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由于奥地利公开的中央集权化政策疏远了地方精英，伦巴第－威尼斯和加里西亚的民族主义进一步受到推动。不过，民族主义的影响至少在加里西亚仍然是有限的：1846 年，当这里的波兰贵族发动民族主义起义时，当地农民以激烈的反叛乱来对抗之。在匈牙利，梅特涅在 1811—1825 年间没有召集议会，从而压制了政治生活，但马扎尔语言和文化复兴一直在继续。当迫切的税收需求迫使弗兰茨一世于 1825 年重召议会时，议会会议变成了马扎尔民族主义改革运动的讲坛，马扎尔文化民族主义正在为匈牙利人的权利要求提供政治动力。

121

对于君主国内部民族主义情感的涌起，国家的反应是含糊的。梅特涅并不反对挑起一个民族反对另一个民族的做法，这就是为什么有时会在“没有历史的民族”中鼓励文化民族主义的原因，这样的民族如斯洛文尼亚人和斯洛伐克人，之所以这样称呼他们，是因为他们被视为没有统治阶级或成熟的高级文化的农民。但是，当新的民族运动发展起来后，梅特涅又日益视之为威胁，并开始强调君主制度的德意志本质，因为国家一体化的根基在于德语这一“共通的语言”（lingua franca），这种语言不仅在政府部门使用，而且通行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主要商业中心，包括布拉格和布达佩斯。

作为一种行政、学术和商业语言，德语在这个时期的使用大为扩展。德意志启蒙时代和浪漫主义时代的思想，特别是约翰·哥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著作对民族主义的发展也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不过，如果这个君主国 1815 年以后的政治生活

更为开放的话，德语可能成为通用的、超民族的政治辩论语言，从而推动帝国范围内的认同，并削弱文化民族主义的分裂趋势。

但实际情况绝非如此，因为在1815年以后，梅特涅的主要打击目标是“革命”，一场自由形态的革命。由于自由主义政治活动的中心是在说德语的城市中产阶级中间，因此最主要的镇压对象就是他们的政治生活。然而，帝国中枢缺乏统一的、超民族的、全国范围的公民政治文化，这就为地方民族主义的发展敞开了道路，而这种民族主义将使君主制度陷入瘫痪。这个体制本身也酝酿着奥地利政治的族裔化（ethnicization）进程。

三月革命之前的维也纳，公民社会也有了发展。政治生活的某种替代形式已在文化和商业社团中被实践着，尤其是在1841年成立的法学—政治读书会（Juridisch-politische Leseverein）中。正是在这个社团、文学沙龙、咖啡馆团体、个人和商业交往圈相交织的世界里，鲍恩菲尔德向政府发出的、让社会成长起来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但是，这个以维也纳为中心的奥地利公民社会受到当局的长期压制，从来没有健壮成长起来，它的影响力也十分有限——仅仅涉及德语地区和城镇中的市民（bürgerlich）阶层。[①]

122

由于帝国中枢没有一个强大统一的“奥地利的”公民社会，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地方公民社会及政治生活便独自发展起来。人民主权的自由理念，与民族主义对于特定地区的特定人民的忠诚的强调融合起来。体制之外的政治辩论不是集中在这个君主国全体公民的人民主权上，而是集中在各个民族群体的民族主权之上。到1848年，对奥地利的各个政治民族而言，忠诚主要面向的是民族，而不是国家。

---

① 对于Bürger和bürgerlich，没有更好的翻译方式：Bürger可能既是资产阶级又是公民，但这个词也延伸指传统城市商业和手工业中的小资产阶级。关于这一点，请参阅John W. Boyer, *Political Radicalism in Late Imperial Vienna, 1848—1897*（Chicago, 1981）。——译者注



插图 23　帝国鹰徽（维也纳军事史博物馆）

即便如此，奥地利国家还没有面临致命的威胁，因为这个国家代表一种超民族的原则，看起来还是各民族之上不可或缺的仲裁者。然而，除了昧于时势地援引神授的、历史的王朝权利之外，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在论证其权威的合法性方面几乎毫无作为。施塔迪翁构建奥地利“民族”认同的努力已在 1809 年被放弃，而 1815 年后的体制从未开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让人民来支持这个君主制度。当弗兰茨一世被告知，某个要求谒见他的人是个爱国者时，据说他会反问说：“那他是一个拥护我的爱国者吗?”但没有关于谒见者回答的记录。

梅特涅的“体系”所能提供的唯一答案是没有任何选择，因为当

局已经杜绝了此类选择；国家应被寄予提供安全和过得去的生活水平的希望，同时还应该跟上经济现代化的步伐。但是，到19世纪40年代后期，这一相当功利主义的权威依据并不牢靠。公民社会的兴起就是国家控制松懈的表现。君主国家的财税难题仍在延续，尤其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国营铁路网的扩张需要大笔资金。由于人口增长超过了农123业增长，工业区和城市，尤其是维也纳，涌入了大量拼命想找个营生的贫民。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歉收和土豆收成的锐减进一步加大了当局的压力。

这种情况远非奥地利独有。1848年革命发生在西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它也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一场过渡性危机。但这场危机在哈布斯堡君主国特别严重，因为它所打击的这个体制既不能以推动124经济繁荣来赢得国内和平，实际上其也不相信自己能做到这一点。奥地利作为一个超民族国家是必要的，这一观念被证明仍具有明显的活力，但是梅特涅以专横的正统性来维持帝国的方式却不能被证明是有活力的。

“人民”，或者人民自封的领袖，认为自己已经成熟了。他们曾被当作孩子，被放置在不同的托管所里，这种经历是否影响他们采取富有责任感和协同一致的行动的能力，这个问题要到以后的几十年里才有答案。但是，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将一直困扰着这个君主国余下的岁月。

三、进步的挑战，1848—1866年

1848年3月13日，一群学生及其支持者为提交改革请愿书而向下奥地利议会所在地赫伦巷（Herrengasse）进军。军队向群众开火，造成5人死亡并引起群众骚乱，于是抗议变成了革命。黄昏时分，梅特涅被解职，15日，当局答应公布宪法。1848年的“人民之春”破除了梅特涅的反动政策。哈布斯堡当局不得不设想一条符合进步精神的道路。它只取得了一半的成功。

维也纳的三月革命并非空穴来风。哈布斯堡君主制度内部的骚动

正在酝酿，米兰 1 月已发生骚乱，匈牙利议会也比以往更为坚定。而此前，维也纳各银行已发生挤兑风潮——“银行骚动”，因为人们担心哈布斯堡国家的清偿能力。当 2 月 24 日巴黎再次发生革命的消息向东传播时，它在中欧找到了乐于接受的听众。德国西部发生一系列的骚乱，但另一系列导致维也纳政权倒台的事件在这个君主国的其他地区触发了次生的“民族”革命。3 月 3 日，路易·科苏特（Louis Kossuth）在佩斯呼吁对整个君主国进行彻底改革，此举进一步激化了维也纳的革命，而后者反过来又点燃了匈牙利和君主国其他地区的革命，这些革命同时也声援了德国的革命。

在很短的日子里，欧洲大部分反动政权似乎都转变成一系列自由自治的宪政国家，其动力不是来自武力，而是来自思想的力量。事后看来，这场革命主要是统治阶层意志薄弱和意识形态上的破产所导致的。在当时，革命似乎必定会成功，因为“人民的意志”和“自由”等观念是如此强大。 125

观念，或曰意识形态，的确预示着并部分创造了现实。由于通讯的进步，再加上两次、如今是三次法国革命的榜样作用，叛乱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大众的民族主义原则引领着各地的起义——即使那些没有多少资产阶级和“大众”民族情感的地方也像维也纳和佩斯一样了。

当时弥漫着一种高涨的乐观主义，几乎所有群体都期待自己的解放，并认为这是全人类解放的一部分。3 月 15 日，犹太人拉比伊萨克·诺亚·曼海默（Isaak Noah Mannheimer）在为 3 月 13 日遇难者举行的葬礼上为犹太人获得全部权利而申辩——既然全体奥地利人的解放已指日可待。波兰革命者弗洛里昂·齐缅尔科夫斯基（Florian Ziemialkowski）在回忆录中描述了 4 月维也纳的各民族庆祝活动，当时波兰的国旗与黑红金的德意志三色旗和蓝白绿的匈牙利三色旗比肩而立：“我们都仿佛活在一个美丽的梦里。”①

① *Neue Freie Presse*, 12 March 1898, p. 3.

问题是如何把这个梦想转变成行动，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就算只考虑旗帜问题。这个君主国的众多其他民族的旗帜摆在哪里？奥地利的旗帜在哪里，如果应该有的话？维也纳的革命究竟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的还是德意志的，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不清楚。在更为激进的革命者中间，德意志民族主义情绪十分强烈。4 月 1 日，德意志的黑红金三色旗升起在圣斯特凡教堂的尖顶上。第二天，这面旗帜被带到"德意志"皇帝约瑟夫二世的雕像前，然后飘扬在霍夫堡宫殿的上空。维也纳和君主国境内的德语区完全投入了法兰克福德国议会的两次选举，而这个议会则挑选哈布斯堡家族的约翰大公作为德国的"帝国摄政"。但是哈布斯堡君主国到底有多少地区会加入这个新的立宪德国，这一点仍不清楚。匈牙利应该自行其是吗？加里西亚应该成为重组的波兰的一部分吗？

有些维也纳革命者赞成这样的民族"解放"，但反对的人也很多。126 很快形势便再明朗不过："没有历史的民族"的领导人并不愿意依靠那些"有历史"的民族的慷慨大度。捷克领导人帕拉茨基拒绝参加法兰克福议会的邀请，因为他不认为波希米亚是"德国"的一部分，但他认为奥地利适合于捷克人。在 4 月 11 日的一封信件中，帕拉茨基这样说："的确，如果奥地利帝国不复存在，我们也会赶忙创建它，既为了欧洲的利益，也为了全人类的利益。"[①] 帕拉茨基的奥地利—斯拉夫主义来自这样一种见解：捷克人在一个斯拉夫人占多数的国家接受维也纳的统治，要比在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接受法兰克福的统治好得多。

对于奥地利的德意志派来说，这种情感是相互的。当阿尔弗雷德·温迪希格拉茨（Alfred Windischgrätz）亲王于 6 月镇压布拉格革命、驱散斯拉夫人大会时，维也纳的普遍反应不是担心哈布斯堡势力在军事上的复苏，而是对捷克人应得的惩罚感到满意。1848 年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革命因为彼此目的及自身目的的冲突而失败。

---

① Helmut Rumpler, *Eine Chance für Mitteleuropa*, p. 294.

这一年不仅见证了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虚弱，同样也见证了它惊人的韧劲。它的民族多样性和地区破碎性使得任何协调一致的叛乱思想几乎成为不可能，而由此导致的利益和观念冲突困扰着这个君主国内部的民族关系，且不要说德意志人和境外意大利人的关系了。一旦哈布斯堡当局惊魂甫定，利用这些分裂来重掌权威就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

军事上的控制是关键。格里尔帕策曾这样致信 1848 年驻意大利的奥军司令约瑟夫·拉德茨基（Joseph Radetzky）伯爵："奥地利就在你的军营里（In deinem Lager ist Österreich）。"拉德茨基 7 月在库斯托萨（Custozza）的胜利与奥军占领布拉格一起恢复了哈布斯堡的王朝利益，军队是政治漩涡中的主导因素，是"秩序"的聚集点。在各种民族利益竞相角逐的汪洋中，军队的忠诚成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重振权威的保障，但"奥地利"如何在处理革命时使用这种权威，这仍然是个问题。

在维也纳，以大学生、中产阶级下层和工人阶级联盟为基础的激进主义骚乱呈周期性的高涨趋势，并导致 3 月 15 日的起义，皇帝一家仓皇逃往因斯布鲁克；5 月 26 日再次发生起义，随后一个安全委员会控制了这座城市。委员会的领导人是阿道夫·费什霍夫（Adolf Fischhof），此人原是个犹太助理医生，曾是 3 月 13 日革命中的一个领袖，为人相对温和，到 7 月时，温和自由派巩固了自己的控制。

127

128

7 月 22 日，"奥地利"议会（Reichstag）在维也纳召开。383 名议员在男子普选权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他们代表除匈牙利之外的整个君主国：几乎一半的代表（190 人）是斯拉夫人，代表中 1/4 是农民。议会辩论过很多问题，并于 9 月 7 日通过一项立法：完全解放农民。革命的这一重大成果有一个颇具反讽意味的后果：当革命力量和君主"秩序"派的冲突日渐激烈时，农民竟成了一支中立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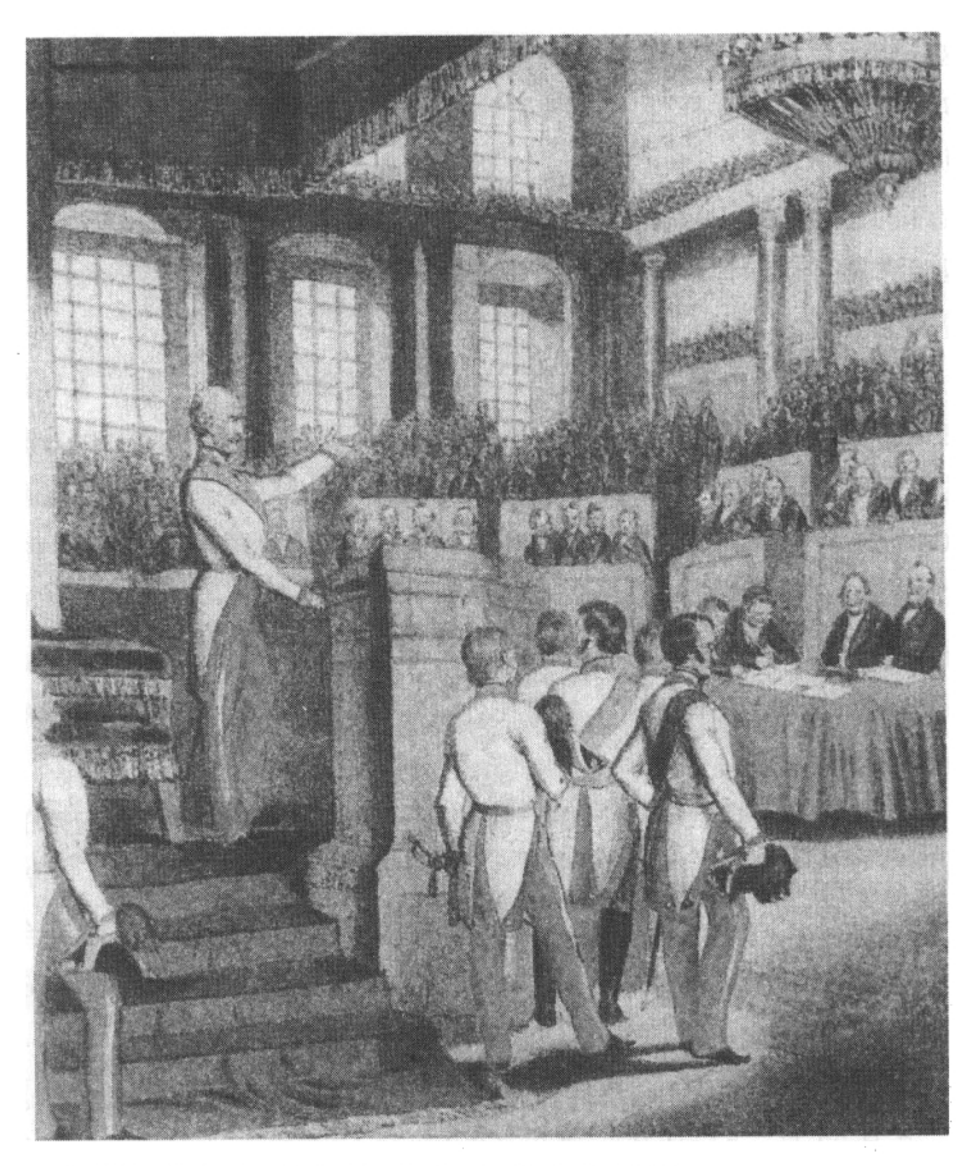


插图 24　1848 年帝国议会开幕（奥地利国家图书馆）

9 月 11 日，克罗地亚军区总督约西普·耶拉契奇（Josip Jellačić）率军进入匈牙利时，事态已完全失控。奥地利，特别是维也纳错综复杂的力量角逐的最后结果是，革命被复苏中的哈布斯堡势力摧毁了。由于担心被派去和匈牙利人打仗，维也纳在 10 月 6 日发生兵变和激烈的起义。宫廷再次逃亡，跑到了奥尔缪茨，而议会中人数可观的议员则逃到了布吕恩（Brünn）附近。几个星期后，10 月 31 日，第二次革命被温迪希格拉茨和耶拉契奇的军队镇压，十月革命的几个领袖被处

129

决，其中包括文策尔·迈森豪泽（Wenzel Messenhauser）和赫尔曼·耶里内克（Hermann Jelline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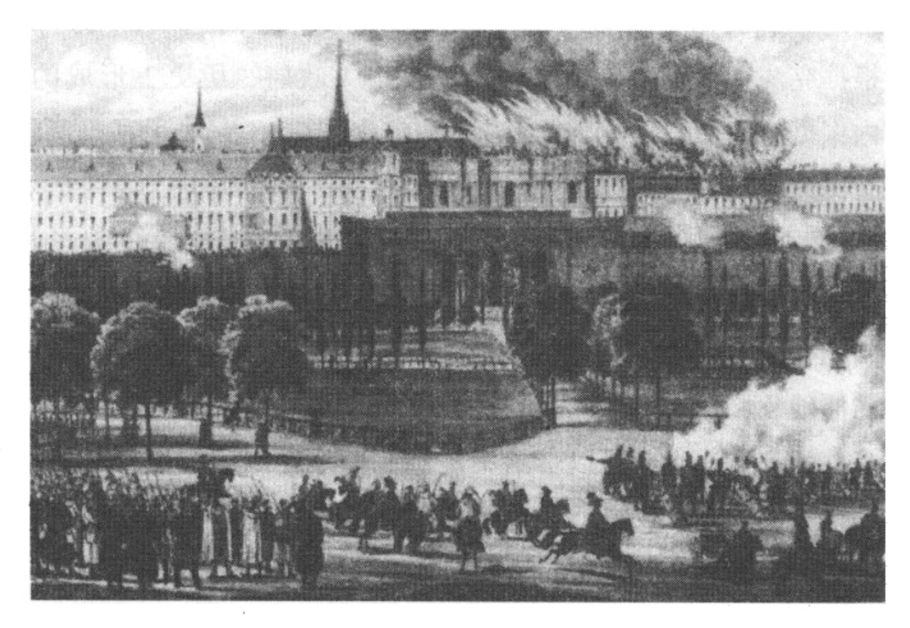


插图 25 1848 年革命期间攻陷城堡门（维也纳军事史博特馆）

得胜还朝的哈布斯堡宫廷虽然急于镇压匈牙利的叛乱，但看来它仍然忙于复苏奥地利国家的事务。11 月 22 日，议会再次在克莱姆齐（Kremsier）开会，继续商讨新宪法问题。新任首相施瓦岑贝格亲王菲利克斯（Prince Felix zu Schwarzenberg）表面上愿意同革命所唤起的群众力量合作。12 月 2 日，斐迪南被劝说逊位，由他 18 岁的侄子弗兰茨·约瑟夫（Francis Joseph）继位，这被视为哈布斯堡对现代化之必要性的认可。这位新皇帝的名字把弗兰茨一世的传统主义和约瑟夫二世所谓的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然而，宪政改革的倡导者们不久就感到失望。弗兰茨·约瑟夫有太多的真实的约瑟夫二世的气质，他渴望现代化，但都是绝对主义方式的现代化。

重振哈布斯堡力量的目的是巩固哈布斯堡的权威。当这个政权感觉自己在军事上有了保障时，军队便于 3 月 7 日强行驱散了克莱姆齐议会，弗兰茨·约瑟夫则强加了一部“御令”（oktroyiert）宪法。驱散选举产生的议会、拒绝议员们准备在 3 月 15 日通过的宪法，这很可

能是弗兰茨·约瑟夫最富悲剧性的错误。

130 克莱姆齐宪法除了保障通常的自由外，还在中央集权派（主要是讲德语的）和联邦主义者（主要是斯拉夫人）之间达成了巧妙的妥协。根据宪法，权力由3个层次分享：中央政府、历史上形成的省、在省内根据族裔原则划分出的区（Kreise）。同时，宪法还宣布帝国境内所有民族权利平等，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大约是一种尽可能细致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而且它是由群众选举的议员制定出来的，因而具有合法性。由于复辟的哈布斯堡当局摧毁了这部宪法，民族问题在随后的20年中没有得到确切的表达，而20年后，各种立场都已僵硬化，任何诸如此类的妥协都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克莱姆齐宪法本来可以带给奥地利一种议会制度，而皇帝的权力将受到很大的限制。议员们还拒绝将匈牙利和伦巴第—威尼斯纳入他们的计划，尽管这位新皇帝以“权力统一”（Viribus unitis）为座右铭——因为他的主要优先目标是保持帝国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克莱姆齐宪法是新政权所不能接受的。诚然，为了替代克莱姆齐的宪法，一部更为保守的“御令”宪法被公布出来，但它没有得到群众的支持，也从来没有实施过。一开始它就因为持续的危机而被束之高阁，当危机过去之后，当局又自行其是，逐渐向纯粹的绝对主义体制转变。

维持“御令”宪法的主要倡导者是施瓦岑贝格，他带有一种拜伦式的厌世主义的悲观情调，认为宪法是个有用的外壳，宪法规定的内阁政府制则是保障其作为首相的权威的杠杆。到1850年，弗兰茨·约瑟夫本人则认为必须废除宪法，强制推行绝对主义。1851年，在卡尔·屈贝克（Karl Kübeck）的建议和鼓励下，皇帝于3月设立了一个帝国议政会（Reichsrat），这一复辟绝对主义的进程在1851年的除夕夜颁布的“除夕特许状”（Sylvester Patent）中达到顶峰。

到这时，在军事成功和施瓦岑贝格无情的外交手腕的保障下，当局的权威已经大为恢复。1849年，拉德茨基已重建哈布斯堡在意大利的霸权，威尼斯也于8月投降。8月，随着阿图尔·戈尔盖（Arthur Görgei）将军向前来干涉的俄军投降，匈牙利的叛乱也结束

了。俄国人是应奥地利的邀请而来的。1849 年初，匈牙利叛乱者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弗兰茨·约瑟夫只得丢开面子，于 5 月向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寻求军事援助。这个请求带来了双重后果：奥地利在外交上欠了俄国一笔灾难性的债务；另一方面，奥地利对匈牙利特别具有报复性的血腥占领行为深深地疏远了马扎尔的民心。

哈布斯堡唯一尚待恢复的权威是对德意志的权威。1849 年 4 月，当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四世（Frederick William IV）拒绝担任统一德国的立宪君主时，法兰克福议会便失去了它的主要意义，残存的议员在 6 月被强行驱散。不过，1850 年 2 月，当有人在埃尔福特（Erfurt）筹划一个君主版的德国统一方案时，普鲁士欣然同意充当德国的首领。不过，在 1850 年 11 月的奥尔缪茨《草约》（Punktation）中，施瓦岑贝格还是能够强迫普鲁士放弃这种德国统一形式。当创建一个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联盟的诸多谈判于 1851 年破裂时，最后的结果是恢复德意志邦联，奥地利继续担任主席。 131

哈布斯堡的权威恢复之后，弗兰茨·约瑟夫按施瓦岑贝格的建议治理国家，他对那些传统权威中心不予理睬，废除了各省的贵族等级会议，完全依靠其官僚机构、警察和军队的权威去推行自己的皇帝意志。这是向极端绝对主义的演变，将不带有任何巴洛克时代的优雅，但这也是一种带有现代化之紧迫使命的现代形式的绝对主义：新绝对主义（neo-absolutism）。

有这样一个说法，在新绝对主义时代，弗兰茨·约瑟夫以 4 支军队进行统治：走路的军队（军事力量），坐着的军队（官僚），跪着的军队（教士）和爬着的军队（暗探）。这个说法相当准确。这个王朝现在不再依靠传统权威，而是依赖于对臣民的强制来实现哈布斯堡权威的最大化。新绝对主义的另一个步骤是要建设约瑟夫二世的理性国家，但是不带有开明的理想主义。哈布斯堡权威的恢复，依靠的应是秩序、效率、繁荣，因而某种程度还有民众对参与政治事务的一点渴望。经济以及财政权力应取代传统和先例成为权威的基础；另外，一

个现代化的行政体制和军队应让这个君主国在面对欧洲其他现代化大国时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说到底，关键目标在于对外政策而不是对内政策：应给君主国家提供足够的军事力量，以便维持它在欧洲国家体系中的大国地位。换言之，新绝对主义是1740年开始的、对君主国家进行理性化改革、以便维持哈布斯堡威望和权力之进程的高峰。

当施瓦岑贝格于1852年4月去世时，已为内政工作找到了一位最有能力的继任者，这就是亚历山大·巴赫（Alexander Bach），他原来是位革命者，现在任内政部长。新绝对主义的内部施政纲领的基础是承认农民的解放，承认所有臣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废除贵族免税特权、领主司法权和封建捐税。新绝对主义以一种有效的、集权化的官僚制度取代这些封建体制，这种官僚制度一直划分到区一级，它将维也纳的行政权威扩展到君主国的所有地区，包括匈牙利。君主国全境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直接受维也纳的德语官僚机构统治。

132

巴赫的制度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奥地利是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度——每个人都服从于皇帝（及其官僚机构）。然而，这种印象具有欺骗性，有一些具有讽刺意味的后果。1848年，克罗地亚曾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持，但它和匈牙利一样，处于军事管制之下。在这里，平等相待的政策似乎是对忠诚的一种“奖赏”，奖赏的多寡要看忠诚的具体表现了。同样，虽然除夕夜特许状宣布了公民的法律平等，但它明确否定了克莱姆齐宪法中对各民族平等权利的保证，强行派遣德语官僚也显然有利于德意志人。

宗教政策同样损害了法律平等的观念。弗兰茨·约瑟夫后来被认为是最亲犹太人的皇帝，他授予犹太人平等权利（在“御令”宪法中）就是明证。但是，在除夕夜特许状中，弗兰茨·约瑟夫拒绝承认犹太人的解放。因此，在19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犹太人缺乏一些基本权利，如拥有自己土地的权利，或在某些省定居的权利。

弗兰茨·约瑟夫之所以在1851年拒绝解放犹太人，很可能是因为他深刻的天主教保守信仰；同样由于这个原因，作为传统机构的天主

教会的地位在这个时期大大强化。1855年，弗兰茨·约瑟夫在自己生日那天和教廷签订教务专约（Concordat），将奥地利境内天主教会的大部分控制权交还罗马，另外还有对初等教育和婚姻行为的控制权。由于交出了思想教育的讲坛，教务专约堪称一次重大的权力转让。它还严重损害了当局关于自己是进步的现代力量的说法。自由派现在结成了抵制“教权主义”胜利的反对派。

中等和高等教育也由教务专约的热情支持者列奥·图恩（Leo Thun）控制着。不过，新绝对主义的迫切需求、中欧的社会和文化现状把奥地利教育引向了一个大为不同的方向。为了弥补君主国的中等教育水平与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邦国之间的巨大差距，再加上合格教师的极度缺乏，奥地利当局从非哈布斯堡之外的德意志各国招募了很多教师。这些新教师大多是天主教徒，但他们大多怀有自由主义、甚至德意志民族主义信仰。因此，文化上保守的新绝对主义政权最后让德意志自由派支配了奥地利的高等教育。 133

经济领域也展现出同样的活力。卡尔·冯·布鲁克（Karl von Bruck）是新政权中经济和财政政策的主要决策者，在他的推动下，政府在工商业上采取了“自由放任”（laissez – faire）政策，并扫除了很多既得利益者的特权。1854年，铁路建设的管制被撤销，1859年的“产业令”（Gewerbeordnung）实际上废除了行会。由罗特希尔德家族及其联合者组建、由国家支持的信贷局（Credit – Anstalt）为信贷提供了方便。经济自由化和谨慎的税收政策导致19世纪50年代的经济迅猛增长，铁路运输等部门获得了关键性的战略收益。不过，经济繁荣的主要获益者是城市职业阶层和中产阶级，他们支持政府的自由派对手。资助经济增长（以及政府）的资本主要来自犹太人，尤其是罗特希尔德集团，这个事实也让年轻的皇帝对当初反对犹太人的完全解放感到不安。

犹太企业家在新绝对主义的宏伟工程——维也纳环城大道（Ringstrasse）——中也有突出表现。修建环城大道的决策是1857年做出的，

它将按照“奥斯曼（Haussmann）[1] 的方式”拆除旧城中心的城墙，这既是为了“现代化”，也是为了便利镇压群众骚乱（骚乱者能利用旧城区的地势和两个营房），但环城大道的主要财政支持者改变了这个工程的意义：这条大道顶多具有模糊的政治象征意味，而 1860 年以后，它被普遍视为“自由”进步和理想主义的象征物。

虽然新绝对主义增强了自由派对这个体制的批判，但这还不是它最大的毛病。它最大的弊病应在防御和对外政策中去寻找。虽然当局进行了很多改革，但是，对于自己的权威，它从来没有自信到敢于将税收提高到足以使其成为真正的大国的水平。然而，国家收入应该是充足的——如果军队要想提高效率、外交政策要想更为得力的话。

134

军队由弗兰茨·约瑟夫亲自领导，但军队的改革并不成功，它承担了很多国内责任，而且开支浩大。在 1854 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即便是“武装中立”，奥地利当年的军事预算开支在头 3 个月就花光了。财政状况依然脆弱，难以承担动员的费用，这又成为军队的一个弱点而非优势。

奥地利军事上的这种脆弱状况，梅特涅也曾遇到过，但是他设法与俄国保持着盟友关系，尤其是在 1833 年以后。施瓦岑贝格不太喜欢打这张俄国牌，但在 1848 年的国际外交中，他采取了无情但必须的欺骗战术。对新绝对主义的内政而言，他 1852 年的辞世并非灾难性的，但在外交政策方面是这样。

他的继任者卡尔·鲍尔—绍恩斯坦（Karl Buol-Schauenstein）伯爵并不适合于这个“现实政治”的新世界。弗兰茨·约瑟夫对这位外交大臣的政策的事后指责和阻挠也于事无补。将于 1871 年改变欧洲格局的一系列事件，在反动政策的绝妙化身尼古拉一世的推动下加速演变。鉴于自己已从革命中挽救了欧洲，尼古拉要求得到补偿——补偿的代

[1] 这里的奥斯曼是指法国第二帝国时期的塞纳省长奥斯曼，曾主持巴黎的大规模改造工程。——译者注

价来自土耳其。他甚至邀请弗兰茨·约瑟夫一起分享未来的战果，但弗兰茨·约瑟夫拒绝了。虽然他对前庇护者的不近人情感到苦恼，但他相信鲍尔的看法：维持土耳其符合奥地利的利益，而且正如皇帝所言："我们首先是个奥地利人。"[①]

但俄国一意孤行，在接下来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奥地利设法维持自己的中立立场，在足够长的时间里避免与俄国发生冲突，但它最终还是站到了即将取胜的英国和法国一边。1856 年，战争以俄国耻辱性的失败而告终。奥地利亲西方的中立立场、作为调停者的大国角色看来取得了成功。但从长期来看，这种政策是灾难性的，因为奥地利的骑墙策略严重疏远了原来的主要盟友俄国，而它从英国和法国那里得到的尊重微不足道。

不久，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与萨丁—皮埃蒙特（Sardinia-Piedmont）的首相卡米罗·加富尔（Camillo Cavour）伯爵密谋，计划于 1858 年将奥地利从意大利驱逐出去。弗兰茨·约瑟夫和鲍尔于 1859 年 4 月向皮埃蒙特宣战，结果正中了为他们设下的圈套。法国于是和皮埃蒙特一起组织防御。接下来的法奥战争中发生了两次大战役：马让塔（Magenta）和索尔福里诺（Solferino）战役。战争的血腥促成了红十字会的成立。奥地利在两场战役中均惜败给对手。一个拥有雄厚的权力基础和信贷资源的政权也许能渡过两次失利后的难关；但弗兰茨·约瑟夫的新绝对主义政府倒台了。甚至在战争开始之前，银行就发生了挤兑，而战争的失败更是摧毁了对这个政权残余的信心。从 1859 年底到 1860 年初，几乎所有的政府要员都被解职。 135

战争失败的弗兰茨·约瑟夫失去了他最富有的省伦巴第（Lombardy），他的南边出现了一个新兴的意大利民族国家，而且他已经没有任何盟友（普鲁士曾提议支持它，但条件是与奥地利共同担任德意志邦联主席）。1859 年的溃败迫使这位皇帝放弃他所珍爱的绝对

① Steve Beller, *Francis Joseph* (Harlow, 1996), p. 65.

主义。鉴于公众对自己的统治已失去信心，鉴于匈牙利陷入骚动之中，他不得不寻找另一条道路来统治这个依然很庞大的帝国。

几年之后这个君主国才重新获得平衡。内外事件紧密交织在一起。1860 年 5 月 31 日扩大帝国议政会之后，各种代议制和宪政模式都曾被尝试过，为的是应对各种内外利益要求，反过来说，它们的创立和解体都对内外政策产生了影响。

弗兰茨·约瑟夫很不情愿地接受了立宪主义的咒语。由于财政危机所迫，他没有别的选择，因为维也纳的银行家集团——其中很多是犹太人——是唯一现实的资金来源，但安瑟姆·罗特希尔德（Anselm Rothschild）在 1860 年已表明了他们的立场："没有宪法便没有钱。"这一年也是犹太人真正获得解放的一年，犹太人取得了拥有地产的权利和迁居的自由。考虑到"时代精神"以及财政和政治处境，确实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自由宪政制度了。然而，皇帝持续的保守主义抵制立场损害了哈布斯堡领导德意志的努力，而自由观念已成为德国人的共识。到 1866 年，一个轮回已经结束，奥地利再次搁浅在进步的对立面上。

136

这个君主国家的第一次重大改组体现在 1860 年 10 月 20 日的十月敕令中，这是一个保守的联邦主义方案，它将恢复匈牙利的传统自治，而国家的其他地区也以这样的非中央集权化原则进行改组。但这个方案失败了，原因在于马扎尔人持续的反对，在于德意志自由派及其财政支持者对于新体制的虚假立宪性质的不满。弗兰茨·约瑟夫于是求助于德意志自由派，任命安东·冯·施默林（Anton von Schmerling）为首相。施默林关于十月敕令的"授权立法"，即 1861 年 2 月 28 日的特许状，对敕令进行了彻底修改，使其带上了中央集权和日耳曼中心主义的色彩，但这同样是一个更具议会制和立宪特征的方案。

二月宪法将 1851 年屈贝克的帝国议政会改组成了帝国议会。尽管这个议会仍由各省议会间接选举产生——某种"选举几何学"保证德意志人占压倒多数，尽管德意志人只占奥地利总人口的 1/4，但新的

帝国议会享有大部分立法权，并控制着中央集权化的行政机构。皇帝掌握军事和外交事务方面的特权，但帝国议会决定预算方案，包括军队的预算。这已经不只是较具立宪色彩的议会政府，而是一个接近于立宪议会制的政府了，而且自由派认为这个制度可以经历时间的考验。到 1918 年之前，它一直是奥地利政府的基础。

"施默林的剧作"以及新德意志自由派的支配地位大大提升了奥地利在德意志的地位，这位首相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实现奥地利作为"7 000 万人帝国"的大德意志之领袖的目标。鉴于当时普鲁士正因为 1862 年的军事法案而出现危机，这个策略看来是可行的，1863 年 8 月的法兰克福诸侯会议上显而易见的友好气氛就证实了这种前景。8 月 18 日，弗兰茨·约瑟夫在法兰克福过生日，周围团聚着其他的德国君主，他们都站在象征德意志自由和民族统一的黑红金三色旗下。在经历意大利的灾难后，哈布斯堡在德意志的地位也许可以通过顺应自由化和民族统一的温和要求而有所提高。

137

但这种德意志导向的政策碰到了难题。有一位君主没有出席法兰克福会议，他就是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William I），他的新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对奥地利在德意志的领导权不感兴趣。由于普鲁士在德国北方和关税同盟中的支配地位，德意志的很多新政策如果没有普鲁士是极难达成的。在君主国内部，德意志自由派对于奥地利的看法与所有其他民族群体相对立。马扎尔人、捷克人和波兰人全部抵制新议会；匈牙利发生民族起义，这损害了奥地利自由主义的新形象。另外，由于匈牙利处于德意志邦联之外，因而将奥地利地区并入倡议中的大德意志的想法就更显得麻烦了。

弗兰茨·约瑟夫拒绝交出威尼斯也使奥地利在外交上继续陷于孤立。最后，由于他拒绝接受担任一个立宪君主的角色，施默林的政策被彻底破坏。正是因为弗兰茨·约瑟夫从保守立场出发、坚持要求普鲁士的合作，1863 年的法兰克福会议才会被视为一个失败，虽然会议在德国舆论中取得了成功。1864 年，他严厉谴责施默林的一次颂扬奥地利立宪主义的演讲，然而对德意志各中等邦国来说，这种立宪主义

正是奥地利领导地位中有吸引力的主要东西。

1864年，弗兰茨·约瑟夫再度改弦更张，采取了一种更为保守的战略。在国内，他绕过施默林及其“我们可以等”的政策，开始与马扎尔贵族进行直接对话。1865年初，费伦克·德雅克（Ferenc Deák）提出了“二元主义”的复活节条款，谈判进行得十分顺利，以致弗兰茨·约瑟夫在夏天解除了施默林的职务，接着在9月又搁置了二月宪法，因为他指望着同匈牙利的协议。

在外交和德意志事务方面，弗兰茨·约瑟夫及其新任外交大臣约翰·本哈德·莱希贝格（Johann Bernhard Rechberg）伯爵同样改变了策略，他们转而和俾斯麦的普鲁士合作。但这种合作的唯一结果是落入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 – Holstein）的陷井中：普鲁士在1864年联合奥地利入侵丹麦治下的这两个省，之后两省的奥普联合管理体制这些只是帮助普鲁士取得了德意志民族事业的领导权。

1866年6月，当俾斯麦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设下的陷阱突然合上时，战争爆发了，大多数德意志邦国支持奥地利。但是，奥地利在真正起决定作用的领域，即在各大国之中是完全孤立的。决定性的难题是弗兰茨·约瑟夫拒绝交出威尼斯，虽然有英国和法国的恳求，甚至有建议让意大利购买该地。弗兰茨·约瑟夫的荣誉不容许这样唯利是图的交易，而且他仍计划夺回伦巴第。结果奥地利在1866年只能独自对抗普鲁士。意大利于4月同普鲁士结盟；法国直到6月12日条约签订时才保证中立，奥地利在条约中答应，如果奥地利能从普鲁士获得土地——很可能是西里西亚，它将把威尼斯交给意大利。但是在1866年，奥地利军队仍拼死保卫那块弗兰茨·约瑟夫答应如果奥地利“赢得战争”就会交出来的土地。

理论上说，即使是单独面对普鲁士和意大利，奥地利仍能在陆上和海上战胜意大利，例如陆上的库斯托萨战役和威廉·冯·特哥托夫（Wilhelm von Tegethoff）在里萨（Lissa）海战中取得的重大胜利。在北方，从数量上看，奥地利也有可能取得胜利。但是，路德维希·奥

138

古斯特·冯·贝尼戴克（Ludwig August von Benedek）指挥的奥地利军队在战略上被入侵的普鲁士人占据了优势，并于 7 月 3 日在科尼希格拉茨（又名萨多瓦：Sadowa）被击溃。

普鲁士之所以会胜利，是因为它成功地适应了现代工业时代，而奥地利没有。普鲁士军队可以利用铁路系统，因而效率更高。更为关键的是，普鲁士步兵使用的是后膛来福枪，而奥地利人仍然使用前膛枪。后膛枪虽然不是毁灭性的，但它射击速率更快，敌军会像割草一样成排倒下，这种心理冲击力是巨大而至关重要的。奥地利军队已在 1851 年放弃了后膛枪，因为后膛枪的使用必须有灵活的战术，但奥地利军队教育水平低下，难以训练，纪律松弛，兵源语种众多，训练起来困难很多。这种技术差距是由一个更为重要的差距造成的，这就是军队组织和训练水平的差距，间接来说也是国家的差距。

从表面来看，1866 年 8 月 23 日的布拉格和约相对而言并无痛楚。奥地利失去了威尼斯，但俾斯麦并没有为普鲁士提出领土要求。他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奥地利答应组建北德意志联邦和一个南德联盟，但二者与奥地利均无牵连，这一做法的完整意义直到 1871 年普鲁士组建德意志帝国时才显现出来。但对奥地利来说，1866 年的战败显然意味着从 1740 年开始的竞争终于以普鲁士的完全胜利而告终。它也标志着哈布斯堡涉足德意志事务几个世纪的历史的终结。奥地利的德意志人，甚至包括格里尔帕策，曾认为他们是德国人，但从政治上说，现在的奥地利不再是德意志的一部分，这对奥地利的德意志认同造成了深刻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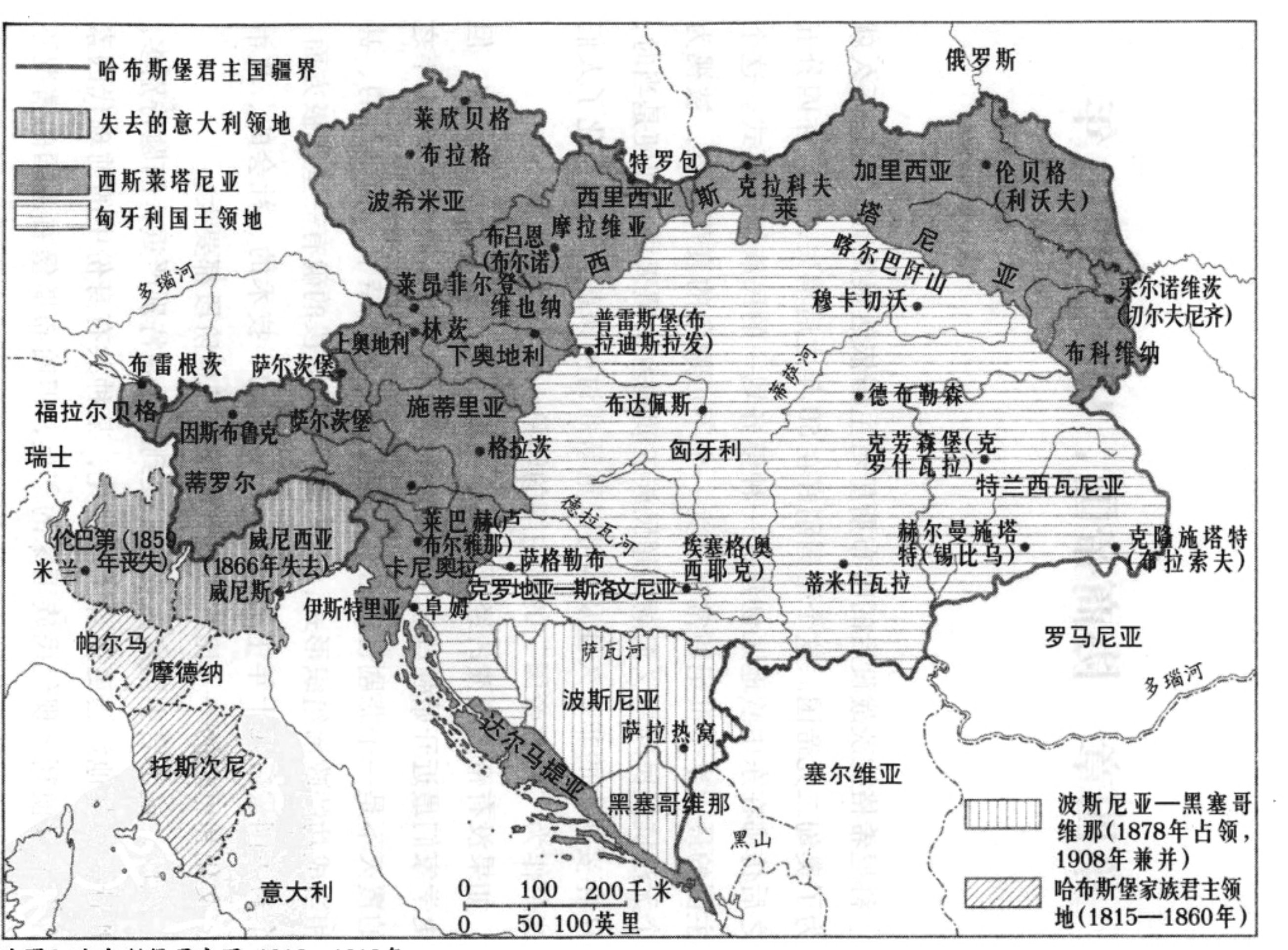
139

1866 年标志着一个改革进程的结束，这一改革曾试图把哈布斯堡王朝聚合体改造成一个可以参与欧洲之国家竞争的单一国家。1866 年以后，奥地利再也没有恢复作为头等强国的声望和信心。它在外交礼仪中仍能占有头等强国的地位，但作为一个二元君主国和德国的小伙伴，它重新找回自己立足点的旅途以它中欧霸权地位的终结而告终。

不过，玛丽亚·特丽莎开启的改革道路还是改造了奥地利的国家

和社会。教育制度、公民社会、经济基础和初生的政治生活——这些方面虽然落后于北德和西方，但比南方和东方邻国先进得多。官僚制国家和法制结构也较为发达。从形式上说，公民和国家不再因为领主司法权这一封建层次而处于分离状态，某些地区，尤其是维也纳周围和波希米亚，几乎和欧洲西北部一样现代。改革的成就可以从最切近的现实中看得到。

然而，落后地区仍很广大，对改革的抵制仍很强烈。对自由主义和立宪主义的抗拒首先来自皇帝。这个君主国基本上还是个农业社会，虽然结构上具有现代外形，但社会现状是前现代的。它对现代世界的适应远不是彻底的。这个君主国如何重组，如何适应自己在欧洲事务中被降低了的新角色，这一点仍有待观察。在外部，它已经被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打败，在国内它也不得不面临同样的民族主义问题，同时还要在国际舞台上生存下去。科尼希格拉茨的溃败看来是又一道以牺牲王朝利益来争取现代自由宪政的进军令。但表面现象可能是骗人的。



地图5 哈布斯堡君主国，1815—1918年

第四章　协商帝国，1866—1918年

141 科尼希格拉茨战役后的哈布斯堡君主国依然很庞大，但它不久就变为了奥匈二元帝国。这个帝国刚好在50年之后消失，并且在四分五裂之后仿佛在东中欧地区创建起一种整齐划一的民族国家模式。这个君主国的最后半个世纪通常被视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衰落过程，被视为一个无法抗拒民族主义浪潮的超民族王朝国家的覆灭史。即便是当时，1867年妥协案的非永久性及其可以重新商讨的条款，已然强化了人们对这个作为“协商帝国”的君主国的印象。

如果没有帝国崩溃的经历，奥地利随后的历史是不可想象的，但历史学家们最近开始强调这个君主国的持久耐力，强调它在1914年之后的覆灭不是一个悲剧性的必然，而是过早地终结了一种可行的、甚至相当成功的政治组织形式，它的最后一个阶段的确有一些积极方面。这个君主国最后几十年中的变迁——经济的、技术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和思想的——比其历史上的任何其他阶段都要大。

然而，这个君主国家的现代化受到的抵制特别严重，问题特别多。有些社会比其他社会更适合于现代化，某种共有身份中的前现代因素的存在大大便利于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但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情况不是这样。它的农业和传统因素比其他社会更强大、更难以驾驭，而君 142 主国的族裔多元性使得产生某种共进退意识的努力变得十分困难。在

一个传统权威资源日渐式微的年代，当人民主权成为主导性的权威代理者时，哈布斯堡君主制确实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王朝的原则从来不承认人民主权，它的皇帝在 1914 年宣战时不是根据人民的权威，而是依据自己的权威，这个君主国家从来都不知道如何转变自身以便在现代世界里生存下去。

在这个时期，这个君主国的历史显得特别复杂，其间展现出多姿多彩的意识形态和权威论据，既有新的也有旧的，它们争相成为缔造忠诚的因子。由此而来的思想文化骚动在这个君主国的民众中间产生了大量富有想象力的回应。作为现代文化的一个主要中心、“开创了 20 世纪”的思想发源地，“维也纳 1900”或“世纪末的维也纳”早已闻名于世。在我们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对于这个君主国的多民族经历，已能从新的、积极的视角来审视。然而，正如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所言，奥匈也是个“世界毁灭的实验场”。

这个君主国在其最后的几十年中呈现出两面性。一面是世界主义的、多元的、发达的现代文化，它指向未来；另一个则是同一社会中的阴暗面：民族冲突、政治和社会压迫、权威主义、种族主义和猖獗的反犹主义，这一面指向的是过去，如果说它指向未来的话，那也是反现代的、极端反自由的未来——这个未来将在希特勒第三帝国的死亡营中以骇人听闻的方式实现。这两张面孔都是奥地利人给 20 世纪的巨大“贡献”的组成部分。

一、妥协君主国，1866—1879 年

在与普鲁士的战争中遭受灾难性失败之后，弗兰茨·约瑟夫很快与马扎尔领导集团达成协议。令他颇感宽慰的是，德雅克没有在他已答应的要求之外再提出新的要求。随后就是 1867 年的平衡（Ausgleich）或“妥协”，根据这个妥协案，奥地利帝国改组成奥地利—匈牙利二元帝国。

这个妥协案的意图是将哈布斯堡君主制转变成德意志—马扎尔人共治的体制，马扎尔人统治匈牙利，奥地利德意志人统治帝国其他地区。弗兰茨·约瑟夫将继续担任帝国两部分的准立宪君主——匈牙利的国王 143

和君主国其他地区的“皇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奥地利”作为一个正式名称消失了。虽然二元君主国整体上是“奥地利—匈牙利”，而且匈牙利的官方称呼仍然是匈牙利，但是非匈牙利的“半个帝国”（占全部人口的57%强）并不称奥地利，而是被称为“在帝国议会中有代表的地区”。这片地区的非正式名称为奥地利，半官方名称是“西斯莱塔尼亚”（Cisleithania），莱塔河是下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间的界河。直到1915年，西斯莱塔尼亚才正式被允许称作“奥地利”。

妥协案忽视了君主国的其他族裔群体，这一点当时就很清楚。在1867年那次关键的大臣议事会上，保守的联邦主义者理查德·贝尔克莱迪（Richard Belcredi）伯爵主张，君主不应该依赖于某些特定的民族，而应该超越于所有民族之上，而且君主肯定不应该忽视这个国家的斯拉夫人。但帝国首相弗雷德里希·博伊斯特（Friedrich Beust）男爵的看法不同：“君主国的斯拉夫人将对新政策持不信任态度，这一点我很清楚；但政府不可能始终对所有民族都公平相待。因此我们必须依靠那些最有活力（Lebenskraft）的民族的支持……这就是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弗兰茨·约瑟夫对争论的回答别具一格，但后果是致命的：“贝尔克莱迪伯爵提出的方案也许是最不容反对的，但博伊斯特男爵的方案应能更快地达到预期目标。”①

弗兰茨·约瑟夫首先关心的是王朝的权力和声望。他在1866年的全部政策，包括奥匈妥协，其目标都是为了报复普鲁士并重新涉足德意志事务。当普鲁士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取胜、并于1871年建立德意志帝国时，这个政策也就归于无效了。但是，贝尔克莱迪表达的内部政策思路却再次被提出来，于是弗兰茨·约瑟夫任命保守的霍恩瓦特（Hohenwart）内阁负责对西斯莱塔尼亚进行联邦化改组。

144

1871年的“基本法案”本来是要这样做的，尤其是要给予波希米亚的捷克人以更大的权力。法案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捷克人要求更多的让步，因为新德国政府的压力和奥地利德意志自由派的抗议。关键

① Steven Beller, *Francis Joseph* (Harlow, 1996), p. 98.

的一点是，匈牙利领导集团认为法案违反了二元主义，因而威胁撤销他们的支持。对弗兰茨·约瑟夫而言，没有必要为满足捷克人和其他联邦主义者的要求而冒丧失权力的危险。这样，1867 年的奥匈妥协一直是 1918 年之前这个君主国家的基础。

奥匈妥协的基础呈现一种奇特的不对称。这是皇帝和匈牙利议会中的马扎尔领导集团达成的一个协议。维也纳的奥地利德意志自由派领袖只好面对这一“既成事实”，并被迫于 1867 年 12 月的宪法中确认之。弗兰茨·约瑟夫决不愿有一部奥地利宪法强加到自己头上，至少从官方意义上说，宪法应该是蒙他的恩典赐予的。

这种不对称性就是上述名称问题的背景——奥地利—匈牙利与“西斯莱塔尼亚”，而不是奥地利。同样，它也是以下用语之争的背景：这个二元君主国的各种联合机构究竟是称为“k. k.”（kaiserlich-königlich：帝国—王家的）还是“k. und k.”（kaiserlich und königlich：帝国和王家的）。前一个称呼意味着还有一个总体帝国，匈牙利只是帝国中的一个王国；后一个称呼则意味着存在两个独立的国家实体，一个帝国形态的奥地利和一个王国形态的匈牙利。后一个称呼标志着匈牙利观念的胜利。

除了这些细微之处，奥匈妥协条约由两个部分组成，这就是“国是”（pragmatic）部分和“二元”（dualist）部分。国是部分以国是诏书为基础，因此它是一种恒久的要素，并违反直观意识，声称哈布斯堡和匈牙利的联系是“不可分离、不可分割的”。这种联系包括设立联合外交部、军事部和财政部。同样，两个议会也将轮流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举行代表联席会议，但马扎尔人要求这种会议决不可变成帝国议会。君主国的联合事务由一个从来没有得到正式承认的机构——御前议事会（Crown Council）负责协调。作为非正式的帝国内阁，御前议事会的构成并不固定，但通常包括诸位联合大臣、西斯莱塔尼亚和匈牙利的首相、总参谋长，以及弗兰茨·约瑟夫挑选的任何其他参与协商的官员。对外政策和军事事务仍是皇帝的特权。 145

“二元部分”主要由经济和财政协议构成，它们保留了君主国的

关税同盟，但规定每10年重订一次。军事安排也是10年重订一次：共同的军队即k. u. k陆军和海军仍然存在，但西斯莱塔尼亚和匈牙利也有各自的军事力量，即民兵（奥地利的Landwehr和匈牙利的Honved）。正是因为二元部分的条款，这个君主国才被称为“协商中的帝国”（empire on notice），因为一些共同关心的关键问题，如关税税率和国防开支，每10年都要重新进行漫长的商讨，而这种商讨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危局。共同的k. u. k. 军队和匈牙利向公共开支上交的“配额”——最初定为总额的30%——是争论的主要焦点。

局势很快就明朗起来：奥匈妥协使得匈牙利对君主国的事务拥有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君主国两部分对另一方的影响力也出现不平衡的发展势头。一方面，匈牙利国王弗兰茨·约瑟夫给予马扎尔领导阶层在匈牙利境内的自由权利，并克制奥地利皇帝（也就是他自己）的干涉；另一方面，马扎尔人在1871年表态说，他们对西斯莱塔尼亚宪法结构的任何重大变迁拥有实际的否决权，而且他们经常使用这一权利去影响对方的政策。当然，这是因为匈牙利因缺少民族独立而备感气馁，不过马扎尔人对奥匈妥协的不满一直是奥匈政治中一个反复发作、耗费精力的主题。

不过在奥匈妥协后的几年中，这个君主国的两部分都取得了自由化的成就。在西斯莱塔尼亚，德意志自由派的领袖们——他们的代表者是公民理事会（Bürgerministerium）——继续推进自由主义的国家建设。1867年的12月宪法实际上是一系列的“基本法”，它保障了基本自由和宪政国家的基本准则。一个关键条款是，所有个人，不论其宗教信仰如何，在法律面前均一律平等，这便实现了奥地利犹太人的完全解放。关于民族权利的条款则直接借用自1848年的克莱姆齐宪法。德意志自由派系统地实施他们的纲领，这个纲领部分以约瑟夫主义传统为依据，部分以欧洲其他地方的自由主义模式为基础；三月革命前新生公民社会的历练同样具有影响力，它为奥地利的自由主义提供了土生土长的面孔。

146

自由派建立了真正的法治原则，他们确立独立的司法系统，其最

高机构为1869年设立的帝国最高法院（Reichsgericht），这些措施使奥地利首次成为完全的法制国家（Rechtsstaat）。1875年的行政法院（Verwaltungsgerichtshof）进一步完善了这一工作，该法院负责审理针对官员的上诉。1868年的军队法令同样规定了重要的军事改革，尽管弗兰茨·约瑟夫的抵制阻挠了彻底的现代化进程。

德意志自由派以约瑟夫主义传统来增强反教权主义的斗争力量，他们在削减教会权力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1868年的5月法令撤销了1855年教务专约中关于婚姻和教育权的转让。自由派最大的成就之一是确立了全体儿童的8年免费义务教育。1870年，弗兰茨·约瑟夫自己废除了教务专约，此举是对教皇无谬论宣言的回应，而这个宣言是对哈布斯堡权威的威胁。



插图26　维也纳议会大厦

在自由派得势的早年，经济在自由放任政策的推动下，前景十分乐观，投资规模巨大，这些因素导致了当时令人惊讶的增长速率。这些年堪称“奠基年代”（Gründerjahre），很多工业、金融和商业事业就是当时创办的。维也纳环城大道的扩建既是增长的象征，又是增长的

一个推进器。君主国首都的象征性主干道两侧矗立着犹太银行世家的“宫殿”，如埃普斯坦（Epstein）和托德斯科（Todesco）家族的宅邸，这既说明犹太企业家在新经济中取得的成功，也表明社会对犹太人成就的认可——如果局势发展良好的话。

在匈牙利，马扎尔自由主义机构也进行了类似的立法工作，如 1868 年与克罗地亚的妥协条约（Nagodba）以及民族与教育法。虽然这两项法律在很多方面的确是自由主义的，但它们也试图把匈牙利王国（马扎尔人只占总人口的 40% 左右）转变成一个马扎尔语的民族国家。正如在西斯莱塔尼亚——那里的德意志人只占总人口的 37%——一样，没有多少德意志自由派怀疑他们的现代国家应该是说德语的。 147

但这种理想建筑在幻觉之上。在西斯莱塔尼亚，德意志自由派的支配地位依赖于 1861 年施默林的“选举几何学”。直到 1873 年，帝国议会的议员仍是间接选举产生，即他们都是省议会委任的代表。每个议会都有至关重要的团体选举规则，它们向各个选举单位分派席位，这种选举单位有些是地域性的，但有些是机构性的，如商业会所和“大土地所有者”阶级。即便在地域选举单位内部，选举权也仅限于纳税很高的阶层。自由派对省议会的控制保证了其在帝国议会中的支配地位。当帝国议会于 1873 年实行直接选举时，这种选举结构被移植到新的选举体制中，以确保受过教育的、说德语的中产阶级的自由派代表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在 1873 年的帝国议会中，2/3 的席位由德语选举团掌握。 148

民族政策也对德意志自由派有利。他们给予加里西亚及其波兰人占主导的议会以实际上的自治权，从而争取到波兰议员的支持。加里西亚从 1868 年起便像一个形成中的波兰国家在运转，虽然波兰人实际上不到人口的一半。但捷克议员曾在 1863 年抵制帝国议会，1867 年他们再次进行抵制，以抗议自己的民族权利被否认。但 1871 年的失败只是进一步表明他们的无能，而他们持续缺席帝国议会有利于德意志自由派对权力的控制。

但是，皇帝也是一个要应付的对手，因为弗兰茨·约瑟夫的权力比

一般的立宪君主要大得多。《十二月宪法》第 14 条规定，当帝国议会休会时，皇帝可凭敕令颁布紧急立法。更关键的是，内阁对帝国议会并不负有真正的责任。当然，大臣是有责任的，但他们是向弗兰茨·约瑟夫负责。西斯莱塔尼亚的政府是他的政府：他挑选大臣并撤销他们的职务。对外政策和军事事务是他的领域，西斯莱塔尼亚的内政也是如此。为了获得税收方面的支持，他将这个地区的事务交付给自己的自由派大臣，但他仍然——形式上而且经常事实上——是负责人。西斯莱塔尼亚的官僚机构仍然是 1867 年之前的帝国官僚机构，它忠诚于自己的皇帝。

弗兰茨·约瑟夫同样享有上层贵族的忠诚。这个集团已经退出中心舞台，但他们依然十分富有，政治影响力仍很强大。他们控制着帝国议会上院贵族院（Herrenhaus），但在选举产生的帝国议会下院，这个“大地主”元老集团的势力较为逊色，353 个议席中他们只占有 85 个，1873 年后仍然如此。作为自由派的最高层，议会中的多数派属于温和的自由派，即忠诚于宪法（verfassungstreu）。但他们的自由主义 149 容易被说服，如果他们的对皇帝忠诚与对自由主义信仰发生矛盾的话。在欠发达的农业社区，支持自由主义的力量也很脆弱。如果波兰人改变立场而捷克人返回的话，帝国议会的面貌也许大为不同。

1870—1871 年的插曲是个警示，随后的自由派政府比其前任要谨慎得多了。到 1873 年，由于经济高涨和维也纳准备筹办世界博览会，一切都好像步入了康庄大道。但是，5 月 9 日股市崩盘，自由派的乐观主义世界观也随之而去。回过头来看，这次崩盘（Krach）是多年的狂热投机后一次必然的矫正，而且是欧洲范围内的经济衰退的一部分。经济最终恢复了，但不少行业破了产，经济自由能造就无限的进步——这一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受到了严重损害。

在 1866 年的军事溃败后不久，小约翰·施特劳斯（Johann Strauss Jr.）的华尔兹舞曲“在那美丽的蓝色多瑙河上”似乎曾带来几分慰藉。而现在，维也纳中产阶级则在施特劳斯的轻歌剧《蝙蝠》中安慰他们经济上的悲伤，该剧首演于 1874 年。剧中最著名的一首咏叹调中的歌词与此直接相关：“幸福在于忘却那些不能改变之事（Glücklich

ist, wer vergisst, was doch nicht zu ändern ist)。"

即便是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自由派的主导地位虽然受到挑战，但看来仍是稳固的。财政和腐败丑闻进一步败坏了自由派的声誉，但实际可行的替代者看来很难找。政府的反对者主要来自自由派内部：这些更激进、具有社会导向和民族主义色彩的"青年"对现存秩序进行抨击。当外交政策占据中心舞台时，一切都将发生改变。

1871年以后，奥匈的外交政策集中于它在巴尔干的残存的势力范围，这里是欧洲最贫穷、最混乱的地区之一，而主要的竞争大国是难以调和的俄国。1871年后担任外交大臣的久拉·安德拉西（Gyula Andrássy）伯爵起初选择了一条与俄国坚决对抗的路线，但是俾斯麦的新国际秩序使他三思而行，1873年，奥匈与德国和俄国组成了三皇同盟。1875年，当波斯尼亚起义再次点燃东方问题时，三国的合作仍在继续。只有当俄国于1878年实际上强迫土耳其投降时，奥匈才与东方问题的另一个主角英国一起表示反对，这时德国提议充当最诚实的掮客。

150

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奥匈的主要目标是兼并或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Bosnia – Herzegovina），这些以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为主的奥斯曼省份就坐落在奥地利达尔马提亚（Dalmatia）丘陵的另一边。弗兰茨·约瑟夫倾向于直截了当的兼并，以部分补偿他曾遭受的灾难性损失，但安德拉西劝他接受占领的方式。这其中的原因是，作为马扎尔人的安德拉西并不希望这个君主国接纳更多的南斯拉夫人，这会使得人口的天平更不利于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另外，如果匈牙利不需要波斯尼亚，西斯莱塔尼亚同样不能要，因为这将会使二元体制更加失去平衡。因此，当波斯尼亚被占领时，管理它的既不是匈牙利也不是西斯莱塔尼亚，而是由联合财政部对它实行古怪的控制。

西斯莱塔尼亚的德意志自由派领袖们甚至反对占领波斯尼亚，认为这是一种恣意乖张的帝国主义冒险行径，而且会带来更多的斯拉夫人，但这种人口增长并不是好事。爱德华·赫普斯特（Eduard Herbst）还认为这是一个剥夺皇帝的外交权，从而把奥匈至少是西斯莱塔尼亚转变成一个真正的立宪君主国的机会。

为议会要求控制外交政策之权力的努力遭受了灾难性的失败。在1878—1879年的政治危机中，弗兰茨·约瑟夫没有退缩；帝国议会批准了对波斯尼亚的占领，但多数自由派议员投了反对票。弗兰茨·约瑟夫认为自由派已经破坏了与自己达成的协议，于是他任命了一个新政府，其首脑是他儿时的好友爱德华·塔费（Eduard Taaffe）伯爵。现在，弗兰茨·约瑟夫决心自行统治西斯莱塔尼亚，而塔费看来十分适合于履行他的意志。最初，塔费在自己的政府中保留了温和自由派，但他也劝说捷克人重返西斯莱塔尼亚的政治生活，并争取到波兰人的支持，依靠贵族来支持皇帝反对那些自由派暴发户们。在1879年的选举中，此前帝国议会中自由派的压倒多数已不复存在。

自由派失败的原因正是过去曾帮助过他们的选举几何学，他们在大地主选举集团中的失利是决定性的。但他们仍占据着几乎一半的席位，很多人仍认为下一轮选举中他们将重新掌权，虽然这要经过一番磨难。但他们错了。自由派此后再也没有在帝国议会中重获多数，塔费的“钢铁集团”（Iron Ring）时代将摧毁任何让西斯莱塔尼亚成为德意志自由国家的想法。 151

奥托·冯·俾斯麦生平绝无仅有地对西斯莱塔尼亚政坛的动荡以及安德拉西当年秋天的辞职感到不安。为了防止奥匈变成一个亲斯拉夫的敌对大国，俾斯麦向即将离任的安德拉西提议缔结防御同盟，该同盟将维持这个君主国与俄国的联系，并维系德国在该君主国内部的影响。弗兰茨·约瑟夫一直希望两个“德意志”大国缔结一个保守同盟，虽然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可能不尽一致，而马扎尔人安德拉西则欢迎德国支持奥匈反对俄国。两国同盟条约签订于1879年10月7日。就在德意志人在奥地利境内失势的时刻，奥匈的命运和德国联系在了一起。在当时，这两个事件看来都不是不可逆转的，何况1914年之前还有那么多变化无常的事件。然而，后来的情况表明，决定这个君主国未来命运的充满矛盾的参数已然确定下来。

二、变革中的奥地利，1879—1908年

1879年8月12日，塔费组成新内阁，内阁得到帝国议会中各种

五花八门的集团的支持，如捷克人、波兰人、德意志教士和德意志保守派、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罗马尼亚人。这个联盟由从前奥地利政治中的“在野派”或称“右派”构成，他们直接控制的席位（168个）少于德意志自由派或曰“左派”控制的席位（174个），但双方都不能取得353席中的多数，于是，在皇帝的支持下，塔费的“钢铁集团”一直掌权到1893年。

德意志自由“左派”和钢铁集团“右派”之间的斗争发生在帝国议会复杂而不稳定的背景局势下，议会中的思想分野模糊不清，而塔费的内阁中直到1881年还有温和的自由派，此外还有一些自由派民族主义者，如支持右派的老捷克派。塔费竭力利用这种复杂局面和皇帝的支持：他恰恰是利用政府的脆弱地位向议会联盟成员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克制自己的要求并消弭内部分歧——否则自由派会卷土重来。

152

塔费让每个人都处于“有分寸的不满”状态，这个策略颇为奏效。当塔费下野的时候，德意志自由派这个一度掌权的奥地利党派，在已经大为改观的政治舞台上已经能被削弱为众多利益集团中的一个，这些团体性质差别更大，它们更关心的是狭隘的民族和集团利益。政治从讲原则的绅士风格，转向政策成为各利益集团之间可交易的货物，这种转变在当时欧洲的大部分国家是个普遍现象，在意大利这被称为trasformismo（改头换面、旧瓶装新酒）。虽然塔费的统治还远没有像意大利那样腐败，但它确实把奥地利的政治引上了一条“菜市场政治”（politics of the bazaar）的道路。由于奥地利民族利益和集团利益的异质性，塔费的“得过且过”（Fortwursteln）使得奥地利的代议制政府对他的后继者而言简直是一件不可能成功的复杂事务。

在19世纪80年代，塔费的政治日程上满是显而易见的政治交易，虽然其间也有一些进步的现代因素，但也有迎合钢铁集团中更为保守的成员的因素。为了同俾斯麦竞争，在一个改宗天主教的犹太人埃米尔·施坦巴赫（Emil Steinbach）的建议下，塔费通过了一大堆社会立法，旨在解决新经济中最糟糕的极端问题。工作时间、童工和女工的使用都有了限制；产业工人的事故和疾病保险制度开始实施；1859年的自由产业

法典在 1882 年被新法典取代，后者对行会和同业公会的限制性规章要严厉得多。塔费还强行通过了一项反社会主义者法，以图取缔工人阶级的抗议组织。1891 年，出于自由派的压力，这项严厉措施最终被撤销。

塔费的进步主义社会立法，几乎全都以牺牲工商业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支持者为代价；对工人的保护和保险远少于农林工作者，因为塔费的支持者就来自保守的地主阶层。教育政策也更多是为了满足保守派支持者，而不是为了适应现代化的需要。1883 年的教育法令撤消了自由派的改革措施，允许农民在孩子上学 6 年后让其辍学务农。教士同样得到奖赏，因为所有教师都被要求对大多数学生信奉的宗教具有“专门才具”，而这种宗教就是天主教。这项法律不适用于加里西亚，因为那里的很多学校中犹太和鲁赛尼亚学生占多数。满足民族利益、特别是捷克人的民族利益，同样是优先考虑的事务。1882 年，布拉格查理士大学（Charles University）在语言上分成两半，而塔费行政当局在波希米亚地区广设捷克语中学的做法也深受欢迎。 153

获得捷克人（还有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人）的支持也是以牺牲政治和行政政策中的自由主义为代价而换来的。1882 年波希米亚议会选举制度改革后，这个从前德意志人占主导的机构被转交给了捷克人，正如 1881 年大量创设贵族议员，把过去的自由派上院交给保守派一样。最富争议的是 1880 年的施特雷迈尔法令（Stremayr Ordinances），该法令规定捷克语是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政治官僚机构（即维也纳直接领导的帝国官僚机构，而非各省议会领导的省级“平行”行政体系）的“对外”语言之一。表面来看，这些规定相当合理，因为官员可以用申诉人的语言同后者交流，不论是捷克语还是德语。官员之间的“内部”行政语言，以及各地与维也纳之间的“最为内部的”语言仍然是德语。然而，由于大部分捷克官员都会说德语，但大部分德意志官员拒绝学习被视为低劣的农民语言的捷克语，这些措施因而大大削减了德意志人的官僚工作职位。另外，德意志人担心这仅仅是捷克人控制波希米亚政府的过渡期的开端。

表面看来有进步主义倾向的措施也会抑制进步，并削弱政治上的

自由色彩，比如扩大选举权就是这样。1882 年的选举改革将纳税资格降低到 5 古尔登，因而地位较低的中产阶级也被纳入奥地利的政治生活。但是，作为经济现代化的牺牲品，中产阶级（Mittelstand）是反自由的，他们易于为塔费更具社会色彩和国家导向的政权拉拢。

154 现代化和政治空间的扩展极大地改变了奥地利的政治。德意志中产阶级内部有一种明显转向，即转向德意志自由“左派”的更具社会导向的民族主义目标。1882 年的林茨纲领在更为强调社会福利的同时，也以更为尖锐的口吻捍卫奥地利德意志人，反对西斯莱塔尼亚其他民族。这个纲领成为格奥尔格·冯·许尼勒（Georg von Schönerer）领导的德意志民族运动的基础。在许尼勒的领导下，这场运动很快就接受了激进的反犹主义，尽管它的纲领主要是海因里希·弗里德容（Heinrich Friedjung）等犹太人起草的。未来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维克托·阿德勒（Victor Adler）也是纲领最早的签字者。

在 1884—1885 年的北方铁路事件中，许尼勒取得了重大成功，当时他对塔费政府续订一家罗特希尔德公司经营的铁路的运营合同大加挞伐，不过他的政治生涯在 1888 年受到严重挫折，因为他攻击一家（犹太人经营的）自由派报纸《新维也纳报》(*Neues Wiener Tagblatt*）的办公室，结果被判监禁，并终生不得参与政治生活。不过，他的学说以更为温和，但在反犹方面更为激进的形式，被其他的前自由派，如奥托·施坦因温德（Otto Steinwender）及其“德意志人民党”，成功地采纳了。

其他民族的政治生活中也有类似的发展趋势。在 19 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选举中，“老捷克人”被青年捷克人排挤到了一边，后者代表着左翼社会政策与民族主义的联合——这种民族主义与其德意志民族主义对手一样刺耳。正是由于青年捷克人的成功，19 世纪 90 年代的波希米亚妥协方案才搁浅。

在资产阶级左翼走向激进化的同时，基督教社会运动（Christian Social movement）改造了奥地利的下层中产阶级、教权主义和保守的德意志右派。这场运动最初是维也纳的一种手工业者抗议运动，它既反对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的严酷后果，也反对所谓的“犹太”自由主义——卡

尔·冯·福格尔桑（Karl von Vogelsang）等理论家被指责为这种自由体制的推动者。1887 年，德意志民族主义反犹分子联合起来成立“基督教联合会”（United Christians），但决定性的时刻是在原民主左翼的政客卡尔·卢阿格（Karl Lueger）成为该组织的领导人后才到来。

155

卢阿格是奥地利政治史上的超级机会主义者，他认为，把“犹太人”当作现代性之苦难的替罪羊，能以独一无二的方式将各种反自由势力凝聚在一起。他把一大堆意见纷纭的团体捏合起来，既有来自右翼的（如下层教士和文化保守派），也有来自左翼的（如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民主派和德意志民族主义中的反犹种族主义者），他的这一工作如此成功，以致自由派在维也纳的支配地位从 1891 年起开始瓦解，在 1895 年的市政选举中，基督教社会党人（Christian Socials）取得了市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弗兰茨·约瑟夫拒绝批准卢阿格当选为市长，对此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发表了著名的颂词，但卢阿格还是在 1897 年当上了市长。这时基督教社会党人已控制了维也纳的政治生活，此种局面直到 1918 年都没有改变。他们的势力从维也纳扩展到下奥地利，接着他们又与教权主义者和保守势力结盟，渗透到阿尔卑斯山区的奥地利各省。

这些新兴的群众政治运动相互之间都是最激烈的竞争对手：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和青年捷克人在民族意识上是对立的，而基督教社会党人则反对民族主义者的反教权主义（这是自由主义的遗产）。不过，它们都敌视犹太人。

对奥地利的历史而言，19 世纪 80 年代反犹主义的兴起将是一种致命的发展势头。个中原因是复杂的，但其中一条是犹太人与自由主义的一体性。从自由主义的统治地位中得益最多的集团就是奥地利的犹太人。犹太人更善于适应现代经济：19 世纪 50 年代他们还是个受迫害的、相对贫困的少数民族，如今他们在诸多领域内都表现杰出，尤其是在文学界、出版业、音乐和自由职业领域；另外，犹太人在银行、商业和工业中同样确立了声望。1873 年的股市崩盘使很多犹太人成为受害者，但也有很多犹太人挽救了自己的产业，而嫉妒针对的只

是成功者而非失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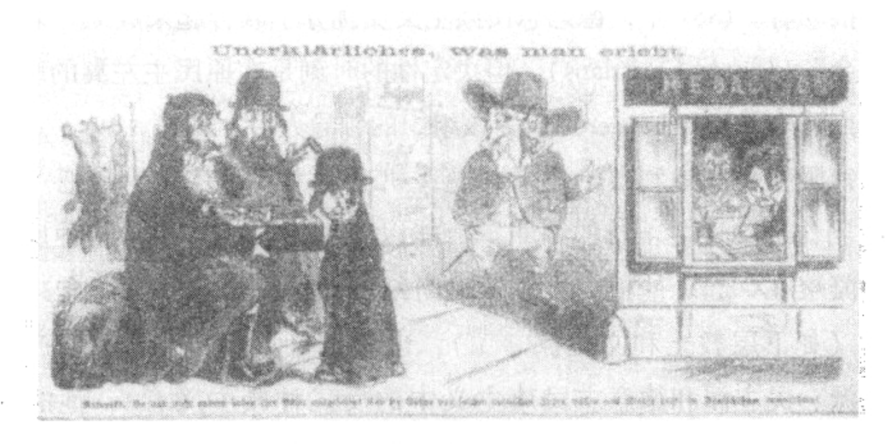


插图 27　反犹主义（奥地利国家图书馆）

反犹主义的很大一部分力量来自广大天主教徒的嫉妒，他们难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在基督教神学中被斥为卑鄙者的犹太人竟能合法地享受新经济的繁荣带来的成果。另外，在如此众多的基督徒忍受痛苦的同时，犹太人的成功被视为违背了一个不成文的契约，即犹太人的解放将为所有人带来繁荣。繁荣的终结，自由主义支配权的终结，严重损害了犹太人的社会地位。

156

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被远为狭隘的民族主义世界观取代，这也不利于犹太人的融合。如果犹太人仅仅被视为一个宗教团体，他们在各个民族中的融合也许是可行的。然而，中欧民族主义中始终存在种族因素，除了马扎尔人这个主要例外，这里的民族主义运动很早就把犹太人当作一个外来的种族集团。德意志和捷克的民族主义者虽然相互仇恨，但双方都一致认为犹太人是个有害的、外来的因素。另外，捷克人还将犹太人视为德意志—捷克冲突中德意志人的第五纵队。随着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加剧，各种划分变得更为绝对，而由于伪达尔文主义的生物学说用种族概念取代了民族概念，犹太人的地位变得更加不安全。过去他们只是一群贱民，虽然地位低下但尚能被容忍，如今他们则成为一个有可能被驱逐或灭绝的外来种族。

基督教社会党人更忠实于帝国奥地利的观念，民族主义的模式对

他们不是很契合。他们意识形态的根基在于天主教社会思想，而后者带有超民族的价值观，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反犹主义基本不是以种族或族裔为模式的。卢阿格最著名的说法之一是“我会确定谁是犹太人”。这表明了他的机会主义，但也反映出基督教社会党反犹精神的某种弹性。然而，反犹主义对基督教社会党的意义比对民族主义者的意义更为重要，因为基督教社会党没有各自的民族认同作为支撑，唯有他们反对的事物——犹太人——作为他们团结的根本。即便教权主义也不是个统一因素，因为他们的很多支持者，尤其是维也纳的支持者，持反教权主义的立场。这就是该党派之所以称“基督教”而非“天主教”的原因——在当时的背景下，“基督教”即意味着“非犹太人”。反犹主义是基督教社会党的核心本质。

157

回过头来看，反犹主义在奥地利的迅速崛起并非看起来的那样具有必然性。19世纪80年代早期，反犹主义在匈牙利也很盛行，但政府马上采取了针对性行动，匈牙利因而成为一个具有相对亲犹太情感的孤立岛屿。相反，在奥地利，反犹主义的兴起没有受到塔费政府的抵制，后者试图利用这场运动来恫吓维也纳的犹太领袖，使其不要去支持德意志自由派。诚然，面对仇犹情绪的复苏，维也纳的犹太人组织开始并不了解，也没有采取应对行动。但不管怎样，奥地利政治生活中反犹主义不受遏制的崛起，部分来说是奥地利风格的政治交易的一个产物。

在19世纪80年代的奥地利，有一场没有走上反犹道路的群众政治运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这场运动虽然也持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它保留了自由主义的普世人道主义，犹太人个体被视为运动中的平等一员。社会主义有自己的反犹主义遗产，而奥地利的社会主义在同民族主义和基督教社会党竞争时特别容易利用反犹主义的言论和想象物。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直接针对犹太宗教（和基督教），而且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抨击威胁到大多数犹太人的生计。不过，社会主义承认犹太人个体是人类的一员，并拥护很多为解放后的现代犹太人所珍视的启蒙价值观。从维克托·阿德勒以降，奥地利社会主义的领导者中很多人是犹太人出身，而社会主义的思想领导者则更多，如马克

158

斯·阿德勒（Max Adler）、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和鲁道夫·西法亭（Rudolf Hilferding），这些现象都不是偶然的。

19 世纪 80 年代是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的危机和重建时期。塔费的打压成功地分散了刚刚兴起的工人运动，但是新领导者们锲而不舍的工作最终使得社会主义运动于 1889 年 1 月 1 月在海因菲尔德（Hainfeld）重建，这些领导者多是原德意志民族主义左翼中怀有幻灭感的抗议者，如维克托·阿德勒和恩格尔贝特·培纳什托费（Engelbert Pernerstorfer），两人都曾是许尼勒的支持者。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将和基督教社会党一起支配 20 世纪的奥地利政坛。

由于社会主义者的迅速崛起，最初激进民众主义的基督教社会党人开始充当“体面”阶级的捍卫者来反对“红色分子”了。但中产阶级有一部分人觉得很难去支持基督教社会党，这就是犹太人社团。这种局面可以解释奥地利政治随后的诸多困境，以及思想文化上的高度繁荣。

19 世纪 80 年代末奥地利的政治格局更为破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情况有利于塔费政府。正如施坦巴赫在 1893 年指出的，帝国议会缺乏强有力的稳定多数实际上保障了“王权的全部主权”。塔费可以凌驾于各政治党派之上进行统治，他像是皇帝的大臣，仅仅对皇帝负责。

在外交事务上，皇帝本人也像在内政问题上一样，以保守的方式“得过且过”。波斯尼亚危机之后的目标是要维持现状，紧跟德国但不和俄国对抗（1881 年的三皇同盟），于是奥匈跟着德国一起与意大利结盟（三国同盟，1882 年），并和巴尔干的各新兴君主国结盟，但同时又要讨好英国（1887 年的地中海协定）。

奥匈政策路线的一位批评者是皇位继承人、皇储鲁道夫（Rudolf）。1888 年，他不指名但富有远见地警告他父亲，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是“一只脚踩到了坟墓中”。但对他的父亲而言，鲁道夫本人就是一个难题。鲁道夫反对同德国结盟，他的周围聚集着左翼自由派，如犹太记者莫里茨·蔡普斯（Moritz Szeps），跟他母亲、皇后伊丽莎白（Elisabeth）一样，他也有亲马扎尔的立场，这些都可能引起皇帝近臣的不安。不过对于皇位继承人来说，这也是一种正常行为，它可以向现行的君主

159

政策注入一些抵制因素，但在方向上还是忠诚于王朝的。

但鲁道夫的个人行为远不能让人接受，而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他日益增长的挫折感，因为父亲拒绝让他负担任何重大责任。不管是因为疾病所致还是由于心理错乱，1889 年 1 月 29 日，鲁道夫所受的痛苦和折磨最终使他在维也纳森林中的迈尔林（Mayerling）杀死了自己的情人玛丽·维泽拉（Marie Vetsera），然后自杀。



插图 28 迈尔林（雷山茨）

鲁道夫的死是对哈布斯堡王朝的重大打击。他是弗兰茨·约瑟夫唯一的儿子，不管怎样，皇帝非常宠爱他。皇帝心胆俱碎，但他竭尽全力不要让皇储的死看上去是自杀，这样能保证儿子体面地下葬（遗体葬在嘉布遣修会的墓地中）。但是，过分的掩饰使得谣言四起，以致迈尔林也成为一个神秘之所，从电影到精美蛋糕，各色物什都以这里为题材，但在当时，这意味着王朝的精神权威受到了严重损害。

与此同时，民族冲突进一步加剧。波希米亚的斗争难以遏制。

1890 年，德意志和捷克的政治领袖达成了波希米亚妥协条约，条约规定该省的政治控制权将交给捷克人，但德语仍作为（帝国）政治官僚机构的内部语言，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实行地方自治。但是，由于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青年捷克人在选举中战胜老捷克人，这个条约作废了，因为新捷克人曾在竞选中要求拒绝妥协条约。到 1893 年，议会受到抵制，布拉格戒严。“得过且过”的策略导致了政治混乱。

面对这种局势，塔费的回应是于 1893 年提出了一个选举改革法案，法案给予所有 20 岁以上的识字男子以投票权，试图以此来削弱资产阶级 160 民族党派。此举虽然还不是平等的普选措施，但由于选区结构的影响，选民人数急剧增加。这严重威胁到那些地位稳固的党派，其结果是德意志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奇特政治联盟，联盟中还有波兰人和其他既得利益者，联盟把塔费赶下了台，建立起自己的内阁，其首脑是保守派的阿尔弗雷德·温迪希格拉茨，但内阁的实际领导者是自由派的恩斯特·冯·普列纳（Ernst von Plener），皇帝虽然不情愿，但也只能接受。

温迪希格拉茨内阁是弗拉次·约瑟夫在位时的最后一届议会制内 161 阁，对执政联盟的各派别来说，这是一场灾难。由于自由派无法为官僚结构提供较好的薪水和待遇，很多心怀怨愤的官员投了基督教社会党的票，使后者在 1895 年 4 月 1 日的维也纳市政选举中取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胜利。这次选举使卢阿格走上了通往市长之路，使特奥多尔·赫茨尔（Theodor Herzl）走上了犹太复国主义的道路。自由派重掌奥地利政局的努力没有成功。1895 年 6 月，执政联盟因为另一个民族冲突问题而瓦解：当时有人试图在施蒂里亚的采列城（Cilli 或 Celje）高中设立一个平行的斯洛文尼亚班。

弗兰茨·约瑟夫挑选以行动坚决著称的加里西亚总督卡西米尔·巴德尼（Casimir Badeni）伯爵为自己的首相。巴德尼一开始干得不错，他安排了另一次波希米亚妥协条约谈判，并对塔费的选举改革法作了修改，这项于 1896 年通过的法案创立了一种新的带有男子普选权的“第五选举法”。这就使得德意志人在帝国议会中被削弱为少数派（425 席中占 202 席）；而且，正如 1897 年 3 月的选举所显示的，德意

志族议员中的左派势力也被削弱。

巴德尼曾希望与青年捷克人和德意志自由派的进步联盟共同视事，但最后他面对的是新议会中的右派多数，而且波希米亚也没有达成德意志—捷克协议。但他决心继续推行其个人版本的“妥协协议”。对德意志人的让步，即波希米亚德意志人的行政自治，只能通过捷克人占主导的波希米亚议会来实施，而在行政语言权利问题上对捷克人的让步则应通过行政法令来实现。因此这位行事果断的巴德尼在1897年4月发布语言法令，规定捷克语和德语同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行政语言，二者地位相等，并要求所有官员到1901年必须熟练掌握这两门语言。

巴德尼的法令打破了西斯莱塔尼亚的政治系统。德意志左派举行了政治怠工。语言法令看起来很合理，但它造成了巨大喧嚣，因为这两种语言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而且德意志人（正确地）认为，波希米亚议会不会履行自己在这一交易中承担的责任。1880年施特雷迈尔法令引起的恐慌如今变成了现实，因为这一法令预示着波希米亚政府机构的捷克化——但不会有任何回报。 162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德意志左派、自由派和进步主义者（这些人甚至比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还要多）发起了一场彻底抵制议会的运动。11月25日，右派多数试图制订一部新的程序法“法金汉法”（Lex Falkenhayn）以打破这种僵局，这时危机达到了顶点，政府甚至派遣警察来驱逐议员，而德意志抗议者则走上了街头。由于宪政受到威胁，社会主义者也投入德意志阵营，甚至卡尔·卢阿格，这个4月被皇帝确认为维也纳市长以报答他对巴德尼计划的支持的人，现在也背弃他的盟友了。巴德尼于11月29日辞职，但危机才刚刚开始。

在随后的几年中，一系列的官僚制内阁（Beamtenministerien）统治着奥地利，但谁都不能使之恢复常态。德意志派的抵制一直持续到巴德尼法令被搁置（最终于1899年被撤销），但接踵而来的是捷克人的抵制。政府利用宪法第14条勉为其难地维持国家的运转，因为这个宪法条款允许在帝国议会空缺时以政令形式来颁布紧急立法。抵制使得皇帝宣布议会休会，于是政府根据第14条通过紧急政令，接着议会被召回，以

便事后追加批准这些法令，短暂的间歇之后抵制又重新开始……

1900—1904 年的恩斯特·凯尔伯（Ernst Koerber）内阁有一定的稳定性，甚至在这种运作模式下取得了一定的效率。凯尔伯注意改善“菜市场政治”，调制出一种新型的、塔费利益政治模式的改进版。政府也提出了一个详尽的公共工程和刺激经济的投资计划，其用意十分明显，就是要以此吸引各政治派别，使其对政府态度更为友好。文化和教育政策，如设立捷克语综合工科学校，其目的也在于此。

这类为支持者牟取实惠的策略起初相当成功，但它对政策和奥地利的政治健康而言是个严重的弊病。政府可以利用第 14 条运转下去，但就广泛的政治共识来说，“以外在于立法程序”（ex lex）的政令形式是不能通过重要立法的，比如关于税收改革和扩大军队规模的法律；然而这样的立法又日渐显得必要。新的政府运作方式对政治健康也至为有害。议会政治的停顿导致了新的“官僚绝对主义”：政治派别不再彼此磋商或追逐现实权力，而是彼此争相与官僚化的政府做交易。这样它们就把政府完全交给了官僚，而自己仅仅是设法满足利益要求。这是利益政治中最糟糕的一种方式，是毫无政治责任感的极端做法。

163

各政治派别之间还有一些国家主持的妥协。摩拉维亚妥协案解决了当地德意志人和捷克人之间的冲突，但它也是以民族分裂而不是以民族合作为基础的。波希米亚的局势没有进展，1904 年，鉴于经济方面的折冲导致的是收入缩减，文化上的交易产生了更多的对抗，凯尔伯辞职了，而全面对抗又重新开始。

这时，西斯莱塔尼亚的政治已经完全“改观”。巴德尼危机过后，议会中的德意志集团不再走“国家民族”（state nation）的路线，而是作为另一个民族利益集团行动着。奥地利德意志人的“民族化”甚至反映在建筑等文化领域中。1892 年，莱昂菲尔登的大火摧毁了那里典型的哈布斯堡巴洛克式的洋葱形圆教堂顶，但此后重修的教区教堂有了一个新哥特式的尖顶。这部分是将宗教和哥特风格一体化的历史学认同，但是，考虑到这里与波希米亚和语言分界线十分接近，它也是

一种民族主义的表现，因为哥特风格也代表着“德意志”精神，而哈布斯堡的巴洛克风格并没有表达出这种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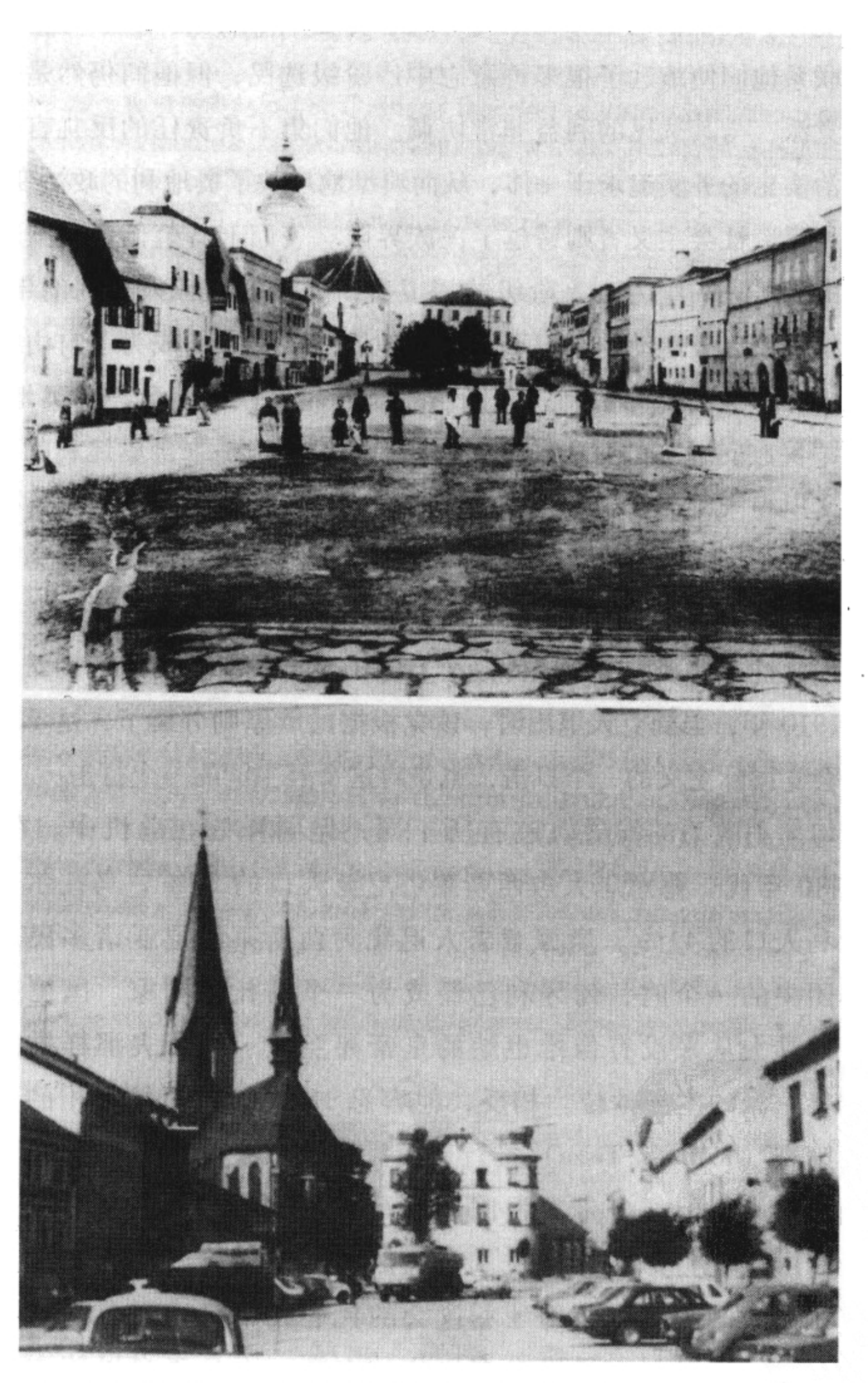


插图 29 1892 年大火前后的莱昂菲尔登（巴德—莱昂菲尔登同乡会）

基督教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人都反对这种民族化趋势，但各自的因由不同。基督教社会党人自认为是个带有“奥地利”特性的“帝国”党派，但他们的主张仍是局部的、有地域限制的。虽然与教权主义的联系他们使疏远了很多德意志中产阶级选民，但他们仍然是个德意志党派，与其选民的利益非常协调。他们集不负责任的反犹言论与对政治实惠的务实追求于一体，从而典型地反映了奥地利的政治变迁。

165 相反，社会主义者则跨越了民族界限。表面上看他们是最具利益导向的党派——作为工人阶级的捍卫者，但他们为工人权利的申辩、他们植根于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使得他们在某些方面成为了自由派的继承人，如他们倡导法制、责任制政府和超民族的宪政。在奥地利，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最富创新意义的思想正是来自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如卡尔·雷纳（Karl Renner）和奥托·鲍威尔。作为一个在理论上致力于推翻哈布斯堡君主制的政党，社会民主党为这个超民族的政治组织之运转所作的工作比任何其他派别都更努力。由于其超民族性，社会民主党成为这个君主国继续生存下去的最佳希望之一。1910年，当捷克人退出时，该党根据民族原则分裂了，这不仅是对社会党国际主义的一个打击，也是对这个君主国的一个打击。

匈牙利政治的发展轨迹有所不同，但同样处在危机中。在19世纪80年代，德意志人占西斯莱塔尼亚人口的37%，马扎尔人占匈牙利人口的41%。当德意志人退化为西斯莱塔尼亚诸多民族利益集团中的一个时，匈牙利已经成为一个马扎尔国家。国王弗兰茨·约瑟夫从来没有像维也纳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那样推翻匈牙利自由派的主导地位。相反，他容忍1875年后担任首相的卡尔曼·第查（Kálmán Tisza）推行自由派反教权主义的政策，以及一项相当宽大、但部分带有强制性的马扎尔化政策，结果马扎尔人在人口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布达佩斯甚至在自治的克罗地亚也享有相当大的控制权。匈牙利议会的代表几乎是清一色的马扎尔人。第查的反对派不是来自多民族的右翼，而是来自民族主义的左翼，后者要求获得对维也纳更大的独立。

在第查于1890年辞职后，匈牙利的政局很大程度上是在同一路线上发展。温和派（labanc）和激进派（kuruc）（这两个标签取自17世纪的叛乱）之间的斗争在1898年因为经济妥协法的续订而加剧，接着又因1902年的联合军队问题而进一步激化。为了取得真正的国家地位，有人要求联合军队中的匈牙利部队应以马扎尔语作为指挥语言。像巴德尼危机中一样，语言也是随后冲突中的中心问题；而且，虽然这是个匈牙利问题，但它击中了"奥地利"观念的核心。

166

联合军队危机不牵涉军事上的实际问题，只是个民族象征问题：是匈牙利拥有一支（或一部分）说匈牙利语的军队，还是皇帝—国王继续控制他那支统一的、说德语的哈布斯堡军队呢？这里也涉及一个至关重要的"民族"实践问题：在19世纪的欧洲，很多民族认同都大大受惠于军队招募，因为军队就是"民族的学校"。同样，弗兰茨·约瑟夫也有理由担心，联合军队的民族划分可能预示着超民族的、王朝性质的"奥地利"特性的终结，而这种特性不仅将他的军队、而且将这个君主国的人民捏合在一起。

这就是为什么在1903年的赫罗皮（Chlopy）法令中，弗兰茨·约瑟夫拒绝任何对德语作为指挥语言的挑战的原因所在，这同样是马扎尔政治民族感到愤慨的原因。1905年爆发了反对温和自由派的群众选举骚乱，国王只得强行任命一个"忠诚"政府；此举又引发抗税运动，为了应付局势，国王颁布了一项大规模扩大选举权的计划，将选民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高到16%，选民当中还包括很多非马扎尔人。鉴于马扎尔人的权力垄断受到严重威胁，马扎尔反对派屈从了，于是达成如下协议：弗兰茨·约瑟夫掌握军队和王权，作为回报，他将选举改革适宜托付给一个新的联合政府，实际上也终止了改革一事。

选举改革无非是迫使马扎尔人就范的一个策略。但是，当此事在匈牙利被提出后，它又被采纳为解决西斯莱塔尼亚政治困局的一个方案。在匈牙利危机之前，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已经发起了一场争取男子普选权的联合斗争，而1905年俄国的革命进一步突出了这个问题。不

过，直到皇帝本人支持这个措施时，关键时刻才到来。这个老派绝对主义者何以奇怪地与社会主义力量结盟，这个问题至今仍不明了。可能他想借选举改革来恐吓民族主义派别，迫使它们采取更为合作的态度，另外也可使马扎尔人保持顺从。不管原因究竟如何，皇帝的支持是西斯莱塔尼亚获得男子普选权的关键。

167 选举法于1907年1月20日通过，新的民主主义帝国议会选举于5月举行。旧的选区结构已不再通行（虽然它们仍适用于省级和地方议会）。德意志族代表数量在新议会中有了惊人的增长：虽然德意志族只占总人口的36%，但根据一项计算，他们贡献了63%以上的税收，并在议会中分得了45%的席位。不过，德意志代表的构成有了显著变化，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联合会取得重大胜利，但民族主义者和自由派遭受损失。民族主义的青年捷克人也丧失了一些席位，而得益的是一些新党派，如农民党。

初看起来这是个令人鼓舞的现象，因为非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和“忠诚于帝国”的基督教社会党人似乎会提供一条走出民族问题僵局的路径。然而，社会主义者是新议会中唯一的多民族党派，而议会中总共分为30个党派。因此，议会需要极端高超的手腕才能有效运转。首相马克斯·弗拉基米尔·贝克（Max Vladimir Beck）在这方面一度取得成功，但到1908年，波希米亚和加里西亚再次发生危机，而兼并波斯尼亚的过程中又产生新的冲突时，贝克的任务变得十分棘手，于是他在1908年11月辞职了。他的继任者理查德·冯·比纳特（Richard von Bienerth）试图缓解各民族的争执，但这时捷克议员再次发起抵制，于是只好又回到宪法第14条。到此为止，民主制作为救治西斯莱塔尼亚政治难题的实验宣告失败。

就在政治体制看来风雨飘摇之时，奥地利的经济却表现得相当出色，奥地利社会也在迅速走向现代化，整个君主国，首先是维也纳，成为一个巨大的思想和文化创新中心。乍看起来这有点矛盾，但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同时代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虽然政治制度变化无常，但经济和社会却很稳定甚至很繁荣。在奥地利，民族冲突与

经济、社会和文化进步甚至可能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

在 1900 年前后，奥匈的经济增长相当迅速，比英国的经济增长要快。与西欧相比，奥匈还有一些方面要急起直追，但这样高的增长率让人吃惊，而且在君主国较为发达的西部，尤其是在波希米亚和维也纳周围，发展水平正逼近西欧。 168

临近德国这个强大的经济实体给奥匈带来了好处。经常有德国企业投资奥匈的新兴工业，如电力机械和汽车工业。这个君主国的经济同样大大受益于 1867 年妥协案中规定的关税同盟。关税同盟和扩展的铁路系统促进了多瑙河谷地经济的专业化和一体化，而这种进程又推动了全国经济的增长，甚至包括那些偏远地区。在当时，奥匈的地区经济差异要明显小于美国。

这种相对成功的一个关键或许在于民族冲突和“维也纳”与匈牙利的冲突。促进匈牙利经济独立的民族主义措施催生了相对自由化的工业政策，以及对企业主阶层相当宽容的政策，而这个阶层主要是犹太人。在西斯莱塔尼亚，政府和各民族集团在基础建设、设立教育机构和其他鼓励措施方面的交易带来了经济上的刺激效应，即便是在加里西亚这样的边缘地带。某种程度上说，凯尔伯的“菜市场政治”导致了 20 世纪初的经济繁荣。反过来说，很多压力也牵涉到民族主义，不管是来自人口迁徙、提高识字率以及附带的突出民族语言和民族性的压力，还是要求按民族原则区分劳动者的压力，它们都是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引起的。

类似的辩证发展也体现在教育中。到 1900 年，奥匈的教育体系堪称全欧最完备、最广泛的体系之一，这也是奥匈突出的思想成就和出色的经济表现的部分原因。在这个领域，民族主义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匈牙利对学校的大力投资直接与马扎尔化相关。在西斯莱塔尼亚，政府政策和民族主义目标协同促进了教育机会的扩大。为了安抚波兰族政治人士，克拉科夫（Cracow）和伦贝格（Lemberg）设立了波兰语大学，而采尔诺维茨（Czernowitz）设立的德语大学则是个平衡。布 169 拉格的查理士大学成为两所大学，规划中的捷克语综合工科学校和意

大利语法科学校也是政府的一个交易筹码。

1895年，政府曾因为采列城的斯洛文尼亚语班问题而倒台，如果考虑到学校是民族斗争的一个主战场的话，我们对此事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民族主义者认为教育是民族斗争中的一件强有力的武器。捷克人尤其善于利用资助民族语言学校的制度，他们设立私立的捷克语中学，根据法律规定，这种学校若达到的一定的学生规模就可获得政府的资助。为了应对捷克人的策略，德意志人，无论是自由派还是民族主义者，都纷纷向德语学校联盟投入巨资，以便增加波希米亚地区德语学校的招生数量。最后的结果是导致激烈的竞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比通常期望的、甚至比实际需要的更多。过量的合格人才加剧了国家职位的竞争，而这种竞争反过来又加剧了民族冲突。巴德尼事件的背后实际上是为工作职位而战斗。

民族斗争通常能对思想文化生活产生积极影响。民族主义者为提升民族文化的声望而倾注精力，为安抚各民族选民，哈布斯堡当局也经常支持这一事业。克拉科夫发展为波兰民族文化的首都，在波兰各大城市中，它是波兰文化和民族特性没有受到迫害的一个，这与德国和俄国控制的波兰城市不同。与此同时，哈布斯堡当局对这样一种主论点持开放态度：高级文化，甚至现代高级文化，可以成为民族主义差异的一种必要的制衡力量。因此，维也纳分离派起初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艺术是高于和超越民族差异的“奥地利”艺术。

世纪之交的政治危机可被视为文化创造的推进器。卡尔·E. 朔尔斯克（Carl E. Schorske）指出，虽然自由主义在维也纳的危机中被基督教社会党的大众政治运动湮灭，但这场危机导致维也纳自由资产阶级的子孙对政治的疏离，他们转而退隐到艺术和心灵的殿堂中，从而创造了让世纪末的维也纳荣享盛名的文化大繁荣。

170

不过进一步的观察后会发现，以民族冲突和自由主义的政治危机来解释文化创造力，这种做法至多只有部分的合理性，但经常会误入歧途。像布拉格、布达佩斯和克拉科夫这样的城市，民族主义抱负确

实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它们的文化繁荣，但作为超民族帝国首都的维也纳却不是这样，以“奥地利”文化来作解释绝不会有多少可信度。同样不能肯定的是，维也纳自由中产阶级的政治疏离感真的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具有重要意义。奥地利的政治和法律结构仍然是自由派奠定的结构（多少与今天相似）；同时，维也纳的“自由”中产阶级对政权的疏离还没有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们不再是自由派并全体转向反自由但仍属资产阶级性质的基督教社会党。因此，以自由主义的政治危机来解释维也纳 1900 的文化繁荣是不可信的。

那么原因究竟在哪里呢？到 1910 年，维也纳已经是欧洲最大的中心城市之一，人口超过 200 万，而且很多世纪以前，这里就是重要的政治权力和文化赞助中心。因此它是欧洲的主要文化中心之一，音乐方面尤其突出，戏剧、歌剧和医学同样很出色。另外，与其他地方相比，维也纳的现代文化在很多方面不是那种革命性的发展。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和分离派、奥斯卡·柯柯什卡（Oskar Kokoschka）和伊贡·希勒（Egon Schiele）等人的艺术在今天得到了高度评价，但是，这种艺术并不像毕加索（Picasso）和布拉克（Braque）的立体主义或康定斯基（Kandinsky）的抽象艺术那样与过去完全断裂。奥托·瓦格纳（Otto Wagner）的建筑艺术颇为前卫，但其中的很多创新来自瓦格纳与美国建筑师的交往。瓦格纳的标志性建筑，如邮政储蓄银行（Postsparkasse）和施坦霍夫（Steinhof）教堂，对古典建筑成规的保留就像其功能主义一样引人瞩目。

实际上，世纪末的维也纳不能被视为现代性的风口浪尖，它与巴黎、德国和美国不同。当时的大多数人，包括维也纳人，都认为这座城市是个闭塞的地方。维也纳只是后来才被视为“20 世纪的首都”。当然，这个说法的理由很充分。 171

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会出现大量新颖的文化和思想运动，以及与上面提到的艺术家和建筑师不同的、真正彻底改变西方文化和思想的人物的出现。在这个非常长的人物名单上，领风骚的是两位思想巨匠：心理分析的奠基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现代最富影响力的哲学家之

一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随后是其他人物，如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他对无调性及十二调音乐创作的探索给现代古典音乐带来了一场革命；如阿道夫·卢斯（Adolf Loos），他的建筑功能主义理论具有瓦格纳的理论所不具备的激进性。

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为法学理论带来了革命；奥地利经济学派对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维也纳小组”（Vienna Circle）的哲学家们发展了逻辑实证主义，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是这场运动的主要评论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发展了个体心理学，他是众多反叛弗洛伊德正统学说并创建自己学派的人中的第一个；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新的再阐释。维也纳还是文学革新的强大源泉：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胡戈·冯·霍夫曼施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赫尔曼·布罗赫（Hermann Broch）、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weig）、弗兰茨·魏菲尔（Franz Werfel）以及后来的埃里亚斯·卡内提（Elias Canetti），这些只是一大批作家中最为知名的而已。维也纳1900给人印象最深的可能是其思想深度与才华。杰出的人物不仅仅是弗洛伊德及其弟子，还有很多反叛的旁支学说；不只是勋伯格，还有他圈子内及圈子周围的艺术家，如阿尔班·贝尔格（Alban Berg）或亚历山大·冯·策姆林斯基（Alexander von Zemlinsky）。思想界和文化界的活力和创造力甚至比个人的成就更为引人瞩目。

在这场多姿多彩的创造力大爆发中，很多人物对于我们的思维方式来说是非常古怪的，因此在现行的范畴体系下很难去理解他们，然而他们是当时思想潮流中的关键人物。比如，奥托·魏宁格（Otto Weininger）在今天被指责为一个自怨自艾的、厌恶女人的犹太人，但勋伯格、克劳斯、维特根斯坦以及斯特凡·茨威格都很欣赏他。要总结维也纳对现代文化的贡献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过我们可以分辨出3个主要趋势。

172

和当时欧洲其他地方一样，维也纳也有一种唯美主义和印象主义

潮流，这种潮流以强调表面经验、审美形式和非理性心理取代了对个人意志和理性的关注。世纪末维也纳的“现代主义”的根源在于法国的“颓废派”、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的实证主义及其“无法复原的自我”的观念，以及德国的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和弗雷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文化非理性主义。当然还有一种更为明显的进步性的现代主义，其代表者如约瑟夫·波普尔—林寇斯（Joseph Popper-Lynkeus）和路德维希·波尔茨曼（Ludwig Boltzmann）（还有马赫）。此外还有弗洛伊德，尽管他在强调非理性、灵魂中的性取向时具有“尼采式”倾向，但他坚定地站在进步、理性的现代主义立场上；施尼茨勒同样如此，虽然他具有唯美主义的表象。

20世纪初维也纳现代文化中最有趣的表现形式是阿兰·雅尼克（Allan Janik）所称的“批判性的现代主义”。批判性现代主义者有卢斯、勋伯格、克劳斯、格奥尔格·特拉克尔（Georg Trakl）、布洛赫以及别具一格的魏宁格等人，他们的特征在于不仅拒斥已成型的历史主义文化，而且在于反对唯美主义的现代主义。他们不像传统主义者那样从外部批判现代性，而是从新艺术的内部展开批判。首先，在拒绝传统的“陈规”的同时，他们试图恢复现代艺术的某种“伦理”责任，以便艺术品能成为一篇表达艺术家“思想”的论文。在这方面，勋伯格对音乐作了最简洁的表述，音乐“不应该是一种点缀，它应该是真实的”。维也纳的批判性现代主义者都是反传统的，但这里的反传统既拒绝传统的虚假偶像，同样也拒斥非历史的现代主义的偶像，拒斥所有与这种偶像相伴的意识形态，包括信仰无限进步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他们认识到，现代世界只有意识到现代科学技术世界观的局限性才可能成功。正是批判性现代主义的创作——如卢斯在米夏尔广场的建筑，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勋伯格的音乐（在歌剧《摩西与亚伦》［*Moses und Aron*］中达到高峰）——世纪末的维也纳（维也纳1900）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173　世纪末的维也纳的确是一个激进的文化和思想创造中心，其创造成果的震撼效应贯穿整个20世纪。不过，维也纳作为文化中心的声誉此前就已经与这种“激进”的创造性联系在一起了。但我们仍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是1900年前后的维也纳？

首先，维也纳1900的一个显著现象是，这是一个非常城市化的处所，实际上几乎完全是维也纳人的维也纳。“奥地利”内地也有一些贡献。格奥尔格·特拉克尔来自萨尔茨堡，罗伯特·穆齐尔来自克拉根福，“烧火匠”路德维希·菲克尔（Ludwig Ficker）则是来自因斯布鲁克的重要人物。在绘画艺术上，莱昂菲尔登甚至也贡献了一位列奥波德·福斯特纳（Leopold Forstner），他也是维也纳现代主义世界中的一员，属于分离派，是施托克莱特宫（Palais Stoclet）和施坦霍夫教堂的主要创作者。但是，奥地利世袭领地上的外省城市在文化上是保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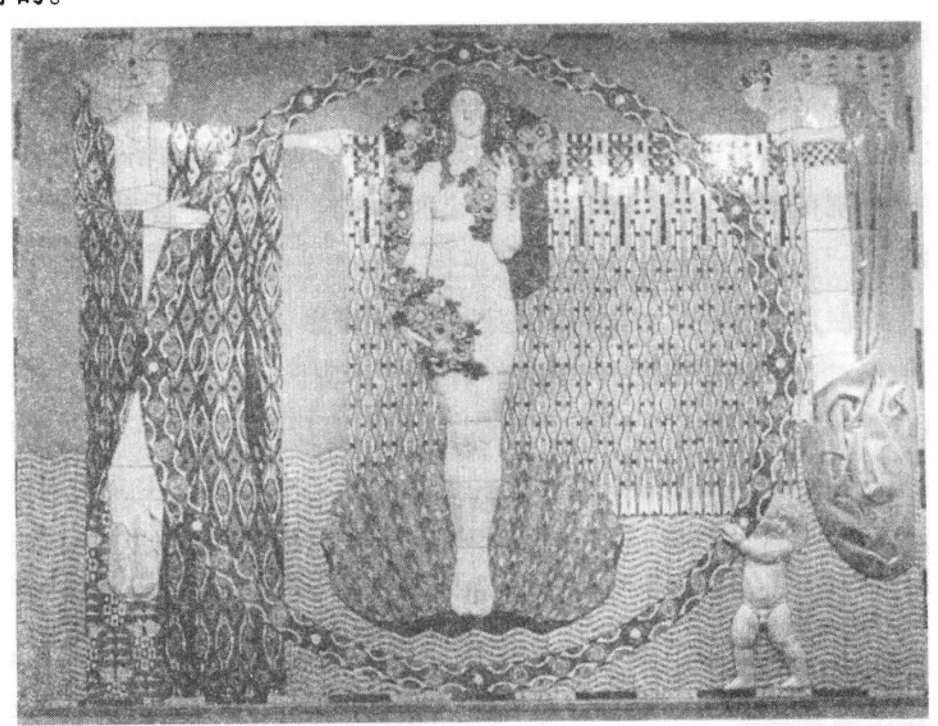


插图30　福斯特纳（格拉茨威斯勒大公馆）

174　维也纳1900的氛围与布拉格和布达佩斯有更多的共同之处，虽然

这里没有捷克人和马扎尔人的民族主义现代文化，而仍是德语（或双语）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文化。一个非正式的中欧网络将这些城市中类似的文化圈子联系在一起，这个交流网络中还有德国的柏林、布雷斯劳（Breslau）和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奥匈边缘地区的伦贝格、采尔诺维茨和克拉科夫，以及俄属波兰的罗兹（Łódź）。中欧现代性联系网后面的驱动力量是犹太资产阶级。

犹太人在维也纳的作用尤其显著。我们上面提到的维也纳现代文化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如阿道夫·卢斯和格奥尔格·特拉克尔、恩斯特·马赫和路德维希·波尔茨曼，他们并不是犹太人，但大部分重要代表是犹太人。造型艺术方面，富有创造性的作者中犹太人不占多数，虽然艺术赞助者、艺术批评家和宣传者以及艺术史家中犹太人的地位很突出。但是，在其他大部分现代文化领域，特别是上面提到的运动和圈子中，如心理分析、维也纳小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及文学上的青年维也纳派，其参加者中大部分是犹太人或犹太后裔。自由职业者——律师、医生和记者——也大部分是犹太人，人们还经常指出，维也纳现代文化面向的公众很大程度上也是犹太人。犹太人优势地位的基础在于坚实的社会经济根基，因为维也纳现代文化的社会发源地，即该城资产阶级自由派中受过教育的那一部分人，大部分是犹太人。

犹太人只占维也纳人口的10%左右，不到西斯莱塔尼亚人口的5%，甚至更少，在后来奥地利共和国的人口中大约只占3%。但是，犹太人在维也纳"自由"社会经济领域中所占的比例很高，维也纳个体经商者中30%是犹太人。他们对教育的重视也远超过一般人。维也纳各高中（Gymnasien，一种精英型中学）的学生中，约1/3是犹太人。综合这些因素后，犹太人在维也纳现代文化中的优势地位不仅可以理解，而且简直是能预测到的：1870—1910年，从维也纳各中心高中毕业的有自由资产阶级背景的男生当中，将近2/3是犹太人（这个比例在女生当中更高）。

175

犹太人的主导地位不仅是一个努力上进的少数民族取得的巨大成功，而且是对奥地利文化、思想和社会的一个新的、异质的贡献。维

也纳 1900 之所以显得如此独特，是因为中欧的犹太人融入了历史的主流。

犹太人在哈布斯堡君主国生活了许多世纪，但直到 19 世纪后期，他们才开始融入更大的非犹太世界。在约瑟夫二世改革的压力下、在犹太启蒙运动（Haskalah）的影响下，哈布斯堡的犹太人慢慢获得了一种新的现代形式的犹太身份特性，这种特性将犹太价值观与启蒙运动、自由主义和德意志文化融为一体。根据犹太解放的思想观念，传统的犹太价值观，如宗教学识和强调人生的伦理方面而非审美方面，被逐步改造或被有选择地吸收到一种世俗教育和人性改良的思想取向中——这让犹太人可以进入纯粹人性化的现代世界中，而这个世界的所有人都可以分享犹太价值观的“精华”。犹太解放的亚文化与主流的德意志自由主义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它们有不同的源头，犹太价值观也有其独特之处，因而双方也就产生不同的回应方式。对维也纳现代文化做出贡献的犹太人都是以某种不同的方式从这一文化解放中成长起来的。

中欧犹太人解放的经历在维也纳表现得尤其突出。犹太价值观若认同于德意志启蒙运动、认同于新教对话语的重视以及康德的绝对律令，那可能有助于犹太人融入新教的柏林。而维也纳是个具有天主教巴洛克风格的城市，它强调的是形象、美学上的荣耀和对等级制度的服从，因而这里的效应有所不同。19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反犹主义为一场真正的文化冲突提供了素材。对于在传统天主教心态中成长，又在现代经济中迷失方向的民众来说，他们都很愿意接受这样一个虚妄的控诉：“犹太人”应该受到谴责，因为解放了的维也纳犹太人是一个完全将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念与新的现代世界等同起来的群体。很多犹太人从前的政治、社会、甚至思想盟友也转向了反犹主义，不管这是出自信念还是出自利己主义。当时“科学的”的生物学和种族思想，以及种族—民族主义观念，甚至促使很多过去的自由主义进步派也将犹太人孤立为一个“非我族类”的群体。

176

19 世纪 90 年代，维也纳在政治上陷入反犹主义，犹太人受到了在社会生活中被放逐、在政治上被疏离的威胁，而且维也纳面临着回到巴

洛克时代的天主教文化的风险，虽然这种回归戴上了现代的面具。而在解放了的维也纳犹太人中间，很多教育程度较高、更善于表达的人则以进一步投身到新生的现代文化中作为回应手段，这既是为了超越纯粹的种族和政治问题，也是一种求得解放，有时甚至还能求得权力的方式。因此，维也纳 1900 的新生现象是对当时关于进步和现代性之臆断的一种强有力的再审视，一种对现代思想和现代社会之基础的犀利批判。

对于世纪之交维也纳的这种“人性的骚动”，最出色的描述出现在 1908 年。施尼茨勒的《通往旷野之路》(*The Road to the Open*) 探讨了维也纳社会平静的外表下令人焦虑的现状，探讨了他主要的支持者——犹太人所尝试的种种可能的“自由之路”：心理学、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种族同化、移民、文学讽刺，甚至还有犹太复国主义。施尼茨勒的代言人、小说中的海因里希·波尔曼（Heinrich Bermann）所设想的一条尚有可能的通往自由之路是批判性的内省之路，即深入审视人的灵魂，完全忠实于自己，这种内省也是一种伦理立场：“是的，每个正派之人每日都要这样祈祷：绝不让自己误入歧途。”[①] 维也纳 1900 文化成就的核心正是这种信念。

年轻的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于 1908 年在维也纳渡过了整整 1 年的时光，他的性格正是在这里发生了转变，这一年也是弗兰茨·约瑟夫登基 60 周年大庆，人们歌颂这个君主国不同寻常的民族和种族多元性，以及国家仍在继续这一事实。虽然希特勒的出场预示着阴森的未来，而当人们回头看时，此事也证实了施尼茨勒关于生存危机中以犹太人为主体的文化精英的描述，但是同样确定的是，当时的希特勒还不是个真切的实体，施尼茨勒则因为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而受到猛烈批评。在 1908 年，人们仍可以乐观地看待犹太人的危机，正如可以乐观地看待西斯莱塔尼亚和匈牙利的政治危机一样：危机虽然很严重，但不必忧心忡忡，因为帝国的权威可以阻止任何过激的事，情况会以某种方式、某种途径发生某种积极的转变。但接下来 10 年的 177

---

① Arthur Schnitzler, *Der Weg ins Freie* (Frankfurt, 1978), p. 205.

经历证明，这种乐观主义是错误的。



插图 31　维也纳米夏尔广场的建筑

三、分崩离析的帝国，1908—1918 年

在 19 世纪的欧洲外交中，哈布斯堡君主国最大的优势是它作为“欧洲之必须”的地位。作为大陆中央的一个大国，它有助于维持其他大国之间的平衡，并可控制这个民族错杂的地区。因此这个君主国能够经历各种事变而存活下来，这其中包括 1866 年的溃败，这样的失败可能会导致其他政治结构的解体。然而，使得这个君主国成为“欧洲之必须”的因素，即这个国家内外事务之间独特的、错综复杂的关联也导致了它的瓦解。

178

在 20 世纪初，这个君主国被内部民族冲突折磨得筋疲力尽。绵延日久的捷克和匈牙利危机特别具有伤害性，但二者都不致导致君主国的覆灭，因为它们在国家体制内尚可控制。致命的是民族危机扩展到

了君主国的边境之外，因为这种危机使得国家的内政和外交纠缠在一起，无法厘清。民族统一和领土收复运动（irredentism），即民族同胞及同胞居住的土地应"重新归于"民族主义祖国的愿望，最终摧毁了哈布斯堡君主国。

表面上看，这似乎不应视为一个难题。奥匈帝国境内的 3 个民族，德意志人、罗马尼亚人和意大利人，他们的民族国家都是奥匈帝国的盟国。虽有一些内部政策——如马扎尔人迫害特拉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可能损害盟友关系，但这种结盟还是防止了这个君主国遭受到民族主义的全部冲击。鲁赛尼亚人的事业由于俄国人选择镇压政策而受到抑制，而加里西亚的波兰人更加喜欢奥地利人，而不是德国或俄国的压迫性统治，1914 年之前他们没有表现出多少民族统一运动的兴趣（当然，如果存在一个波兰民族国家，问题将是另一回事）。

对哈布斯堡君主国来说，关键的难题来自它的南翼，来自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维尼亚人混居的地带。君主国内部这几个族群的关系已经足够麻烦，而意大利人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存在又导致局面进一步恶化。二元体制进一步火上浇油，因为君主国境内的南斯拉夫人分散在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管区内。卡尼奥拉、伊斯特里亚和达尔马提亚（居民大部分是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是西斯莱塔尼亚的一部分，而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主要是克罗地亚人，但塞尔维亚人数量很大）则是匈牙利王国的一部分。1878 年以后，被占领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区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穆斯林使得局面更形混乱。这个斑驳复杂的民族和管理体制内已然存在各种敌意，但这种敌意之所以会演变成给这个君主国带来致命灾难的南斯拉夫问题，是因为它的南边与"巴尔干的皮埃蒙特"塞尔维亚（Serbia）为邻。

19 世纪塞尔维亚从奥斯曼帝国分离出来，以前它还不被视为哈布斯堡的严重威胁。塞尔维亚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奥匈帝国的卫星国。然而，1900 年，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Alexander）背离奥地利而转向俄国；他于 1903 年被刺杀，接着奥布列诺维奇（Obrenović）被更 179

具民族主义色彩的卡拉杰奥尔杰维奇（Karageorgević）集团取代，这些变故只能加剧事态的恶化。塞尔维亚现在成了个难题。

对于哈布斯堡君主国来说，塞尔维亚难题既牵涉到外交，也关系到内政。在外交政策方面，塞尔维亚处于奥匈最后一块势力范围——巴尔干的中心，而作为俄国的卫星国，它可能阻碍奥地利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和利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也有大量塞尔维亚人，而奥匈对这个地区的占领给它与塞尔维亚政府的关系造成致命的麻烦，因为这个政府把这个地方视为理所当然的塞尔维亚领土。

在内政方面，与一个充满敌意的南斯拉夫政权为邻甚至更为凶险。塞尔维亚被视为奥匈境内的南斯拉夫人可以投靠的另一个权力中心，就如当初皮埃蒙特在意大利的地位一样。实际上，这个君主国的南斯拉夫人（共700万，其中包括210万塞尔维亚人）远比塞尔维亚的南斯拉夫人（260万）多，因此力量本来可以倒转过来，即塞尔维亚加入奥匈帝国的南斯拉夫各省以组成三元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第三部分，这样便可成为欧盟东扩运动的先声。但君主国的内部政策阻碍了这种前景。相反，很多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甚至斯洛文尼亚人，都把塞尔维亚看作南斯拉夫人的希望。内政外交问题叠加在一起，终于使塞尔维亚成为君主国生存的威胁——至少哈布斯堡的政策制定者是这么看的。

君主国内部的南斯拉夫人问题又因为匈牙利政府对1868年马扎尔—克罗地亚妥协案（Nagodba）的滥用而发展。布达佩斯强行任命亲马扎尔的总督（bans）、颁布亲马扎尔的铁路政策以及培植塞尔维亚少数派等做法，都惹恼了整个克罗地亚的民族情绪。作为匈牙利国王，弗兰茨·约瑟夫没有能够保护传统上忠于哈布斯堡的克罗地亚人免受马扎尔人的歧视，此事也让克罗地亚人深感怨恨。作为奥地利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同样拒绝为匈牙利治下的克罗地亚人的利益而进行干预，即使1903年奥地利治下达尔马提亚和伊斯特里亚的克罗地亚人请求他这样做时，他仍然拒绝，理由是干涉匈牙利国王的事务并非他的份内之事。

180

因此，克罗地亚人因为马扎尔人的政策而责难哈布斯堡当局。这就导致南斯拉夫人的政治在1905年发生了一场革命，在那一年，这个君主国两半部分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领袖结成联盟，共同推进君主国境内的南斯拉夫人自治。这个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人联盟甚至支持马扎尔民族主义者同弗兰茨·约瑟夫的权力作斗争。但马扎尔民族主义者很快就背弃了这场交易，不过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人的“南斯拉夫人”联盟依然保留着，并让哈布斯堡政权深感困扰。同时，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因为穆斯林地主阶级表面上享受的优待而心存怨恨，他们也期待塞尔维亚的支持，于是，维也纳当局开始担心塞尔维亚会成为南斯拉夫民族统一运动的核心。

1903年，奥匈外交大臣、波兰人阿格诺尔·格鲁霍夫斯基（Agenor Goluchowski）伯爵就曾提出“斯拉夫大洪水”（Slav deluge）的警告，他认为，这场巨变将可能把巴尔干变成一个超级南斯拉夫国家，而这个国家会对奥匈的外交以及内部局势构成危害。当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于1905年底宣布成立关税联盟时，维也纳准备发动贸易战，以迫使塞尔维亚暴发户安分下来。但“猪的战争”（1906—1910）——因对塞尔维亚出口的生猪设置贸易壁垒而得名——是奥匈帝国外交上的一个灾难。塞尔维亚人找到了新市场，他们对奥匈帝国的怨恨更为增长，而维也纳则因为连有效的恫吓也做不到而大跌颜面。然而，这还只是一个更大、更要命的错误的序曲，这个错误就是兼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兼并波斯尼亚是1906年后担任外交大臣的列科萨·冯·艾伦塔尔（Lexa von Aehrenthal）男爵的意思，此举被视为以外交政策来振奋凄凉的国内局势的战略的一部分。由于此前俄国分心于其他事务，巴尔干的局面相对平静。甚至1905—1906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也见证了奥地利和俄国人依然保持着某种地区缓和关系。现在俄国正将注意力转向巴尔干，但是，艾伦塔尔“积极有为的”外交政策有内政方面的考虑，他下定决心推行这一政策。

艾伦塔尔是皇位继承人、贝尔维德宫中的皇储弗兰茨·费迪南德

(Francis Ferdinand) 周围的“新人”集团中的一员，这个集团信任一181 种更为强有力的政策，艾伦塔尔也不例外。他认为，一种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可以重振这个君主国的外部地位，降低对盛气凌人的德国的依赖；在国内，伸张哈布斯堡的权威也可凝聚君主国家的各族人民，增强他们对哈布斯堡的忠诚与认同。在艾伦塔尔“社会帝国主义”的实施中，一个关键的前提是他的这样一种观念：这次兼并将使君主国按三元路线进行重大改组成为可能，一个自治的南斯拉夫王国将被囊括进来。这是个悲剧性的不切实际的计划，因为马扎尔人肯定会反对。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位的正常化还有更为实际的理由。青年土耳其党已经在伊斯坦布尔取得成功，他们已提出制订奥斯曼宪法和选举议会的计划，这就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前景：波斯尼亚将举行一种既不是为西斯莱塔尼亚，也不是为匈牙利，而是为了土耳其议会的选举。然而，对波斯尼亚人来说，在哈布斯堡的庇护下投票需要某种宪法结构，这就要求兼并。艾伦塔尔还把波斯尼亚问题的解决看作一个更大的、巩固与俄国的地区缓和关系的交易中的一部分。虽然他的表面政策是要提升某种积极形象，但其实际目标很有限：新帕扎尔桑查克 (Sanjak of Novibazar)[①] 实行非军事化，正式兼并已经属于非正式的奥匈领土的地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俄国人也有意进行合作，1908 年夏天的谈判过后，艾伦塔尔和俄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 (Alexander Izvolsky) 在布赫劳 (Buchlau) 达成了一笔交易。10 月 5 日，艾伦塔尔宣布兼并波黑，但他没有通知其他大国，也没有向伊兹沃尔斯基进行澄清，仅仅是向保加利亚的费迪南德 (Ferdinand) 透露了此事。这是个灾难性的错误：其他列强深感恼怒；更为严重的是，伊兹沃尔斯基还没有让俄国政府和公众对奥匈宣布兼并波黑做好准备，愤怒的俄国公众认为这是对他们的塞尔维亚“小兄弟”的进攻。伊兹沃尔斯基于是否认同意兼并。

---

① 桑查克是奥斯曼土耳其的次级行政区，新帕扎尔桑查克位于今塞尔维亚西南、科索沃北部及黑山的部分地区。——译者注

这次旨在巩固奥俄谅解的举措最终以摧毁谅解而告终。

短期来说，主要是在德国的支持下，奥匈帝国才得以体面地摆脱随后的危机。艾伦塔尔甚至吹嘘说，奥匈帝国不可再被人“不当一回事”了。但长期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这个君主国更加依赖于德国，俄国人更加怒不可遏，西方列强也被严重疏远了。1909 年的萨格勒布（Zagreb）叛国罪审判及随后弗里德容（Friedjung）诽谤案的审判表明，哈布斯堡当局以伪造的文件来诬告南斯拉夫领导人，因而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这大大败坏了奥匈在西方自由派舆论中的形象。上述审判是奥地利的斯拉夫领袖们“借此扬名的案件”，并使得皇帝—国王和他的南斯拉夫臣民之间的信任进一步破裂。与此同时，熬过“猪的战争”并摆脱经济依附的塞尔维亚也更加憎恨奥地利，它急切地利用民族统一这张牌来进行反击。 182

到 1911 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时，艾伦塔尔才意识到他的“进取”政策给奥匈的处境带来的危害。他在解释奥地利之所以不愿支持德国时所带的嘲讽口吻便很能说明问题：“我还能怎么做？我们可不能追求世界政策。”对于这个曾属于查理五世的王朝帝国的外交大臣来说，这个表态已经完全承认哈布斯堡地位削弱的事实了。

甚至在巴尔干，局势也正在脱离奥地利的控制。摩洛哥危机和兼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导致巴尔干及其周围地区一系列的土地争夺。意大利于 1911 年夺取的黎波里（Tripoli），而巴尔干各国则盯着土耳其在欧洲的残山剩水。艾伦塔尔于 1912 年 2 月死去，而奥地利的巴尔干政策全面崩溃的苦果将由他的继任者列奥波德·贝希托尔德（Leopold Berchtold）伯爵来品尝。首先是巴尔干同盟的形成，接着是第一次巴尔干战争，这场战争使得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在 1912—1913 年冬天从地图上暂时被抹去，大量好处被巴尔干同盟的全体国家瓜分，而塞尔维亚得到的尤其多。1913 年夏天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塞尔维亚与希腊、罗马尼亚和土耳其结盟，对手保加利亚完败，结果塞尔维亚更为庞大，其声望在南斯拉夫人——包括哈布斯堡的南斯拉夫人——中间越发高涨了。

弗兰茨·约瑟夫和他的顾问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外交政策冰消瓦解。1911 年，康拉德·冯·赫岑道夫（Conrad von Hötzendorf）曾呼吁对意大利发动一场预防战争，但这既违背艾伦塔尔的政策，也不符合“和平皇帝”弗兰茨·约瑟夫的想法。与土耳其结盟以对抗所有巴183 尔干基督教国家也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为了达到弗兰茨·约瑟夫那一点不能再小的要求，即建立一个独立的阿尔巴尼亚以阻止塞尔维亚获得出海口，奥地利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动员，还跟俄国和塞尔维亚对峙了一番。弗兰茨·约瑟夫的顾问以及皇帝本人现在都认为，只有用武力威胁，必要时使用武力才能遏制塞尔维亚的进一步扩张。

哈布斯堡在巴尔干地位的崩溃更因为持续的国内危机而恶化。克罗地亚的宪法于 1912 年被搁置；在波斯尼亚，新议会还没有找到有效的多数；塞尔维亚激进分子的恐怖行动与日俱增；在匈牙利，议会改革和与维也纳的关系所引发的政治冲突导致了伊斯特万·第查（István Tisza）领导下的“议会绝对主义”的建立；在西斯莱塔尼亚，德意志人和捷克人之间的冲突再次导致波希米亚议会的完全瘫痪，随后帝国议会也停止运转。1911 年 11 月后担任首相的卡尔·施图尔赫（Karl Stürgkh）伯爵的应对手段是于 1913 年解散波希米亚议会，接着又于 1914 年 3 月解散了帝国议会，这样西斯莱塔尼亚又回归“官僚绝对主义”。

国内危机本身还是可以处理的。在加里西亚和克罗地亚，甚至有迹象表明，为缔结某种妥协的努力正在取得进展。然而，哈布斯堡政治生活中的机能障碍，再加上恶化中的经济和财政局面、为人洞悉的军事上的虚弱，使得塞尔维亚民族统一运动的威胁越来越严重。

塞尔维亚不仅威胁到哈布斯堡的实际利益，而且损害哈布斯堡王朝的荣誉感。如果哈布斯堡连塞尔维亚都摁不住的话，那它恐怕也不配成为大国了。然而，很多世纪以来，作为大国是其全部的“存在理由”；另外，担心丧失声望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意识会产生后果，塞尔维亚的民族统一和收复失地运动的威胁是实在的。塞尔维亚则因为两次胜利兴奋不已，现在又再次得到俄国的支持，所以它把奥

匈境内的塞尔维亚人居住区看作扩张的目标，特别是波斯尼亚。罗马尼亚虽然是奥匈帝国的盟国，但它对匈牙利治下的特兰西瓦尼亚虎视眈眈。甚至连意大利盟友也再次对南蒂罗尔的意大利人居住区和亚得里亚海沿岸表现出民族主义兴趣。奥匈在两次巴尔干战争后的虚弱地位鼓励了这种收复失地的想法。

贝希托尔德最初的应对措施是采取外交攻势，但这样一来德国的支持就更加重要。6月份，作为外交渠道的马切科（Matscheko）备忘录开始正式劝说德国帮助奥匈恢复外交地位。这份备忘录的功能只有到另一个加强哈布斯堡在巴尔干的声望的步骤到来之际才发生根本性改变，这个步骤就是弗兰茨·斐迪南和妻子1914年6月28日对萨拉热窝的访问，这次访问的结果是皇储夫妇被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加弗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刺杀。 184

一个月后，弗兰茨·约瑟夫签署了对塞尔维亚的宣战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自战争开始以来，对于究竟是谁发动了这场战争曾有过激烈的争论。主流的看法仍然认为，主要的挑动者是德国，它试图作为一个世界强国追求“日光下的地盘”。但事实仍然是，战争实际上是哈布斯堡君主国首先发起的，这是它对巴尔干局势的一种回应，虽然它的动机远不是那么野心勃勃。

这些“动机”中包括捍卫王朝荣誉和威望免受对其核心价值观念之攻击的必要性。即使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塞尔维亚政府应对哈布斯堡的继承人遇刺负担责任，塞尔维亚的暴发户行径也应该受到惩罚。粉碎塞尔维亚对企图染指哈布斯堡领土的其他民族统一主义者来说将起到威慑作用。此前跟德国这个不可靠的盟友相处的经历也给了奥匈一个强烈的动机，就是要在威廉二世（William II）于萨拉热窝事件后开出的“空白支票”再次被收回之前利用一下这张支票。但是，明知道向塞尔维亚宣战至少会使欧洲罹遭战祸但还要宣战，这的确是很不理智的行为。

考虑到奥匈帝国内部（和外部）的脆弱局面，1914年的大战将成为一个独立的大国自我毁灭的行为。哈布斯堡的很多当权者已经

看到了这一点，包括弗兰茨·斐迪南。作为保守派的头面人物，这位皇储也意识到君主国内部的虚弱以及缓和民族问题的必要性，但缓和的手段主要是打击马扎尔人的特权地位。他还想与俄国和解，俄国的沙皇政体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同盟者。但是，萨拉热窝事件不仅激化了哈布斯堡对塞尔维亚人的敌视情绪，而且去除了哈布斯堡当局内部一个主要的主和派。哈布斯堡的政策于是退化到街头标语的层次上，标语曰："塞尔维亚必须灭亡。"（Serbien muss sterben）
185 德国则确认这是一个发动蓄谋已久的战争的恰当时机，它可能诱导或哄骗奥地利人参战，不过，如果说维也纳是柏林的配角的话，那也还是个心甘情愿的配角。

奥匈帝国应该竭尽全力避免战争，因为它有一些亟待解决的内部难题。弗兰茨·约瑟夫很长时期内仍深信君主国需要和平，1911年，他曾公开对康拉德说，"他的"外交政策是"和平政策"。但弗兰茨·约瑟夫现在也相信，奥匈二元君主国必须对塞尔维亚做出反应，因为只有这样，维护哈布斯堡王朝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之意图方能实现。正如贝希托尔德后来说的，皇帝参战的主要动机是"对他所继承的世袭遗产之延续的关切之情"。在7月29日向"朕的人民"发布的皇家—王家战争宣言中，战争的理由就是这些："朕的君主国"之荣誉必须维护；这样才能在列国中保持其良好声望与地位；国家之利益必须得到保护。奥匈帝国1914年参战的理由在于王朝权威政治，因为正如贝希托尔德写的："如果我们怯懦地听任命运遂其所愿，我们在世界历史上的角色就会告终。"①

但这种逻辑是错误的。对这个君主国来说，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唯一办法不是发动战争。而且，弗兰茨·约瑟夫之所以走向战争，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命中注定要这样做：正如战争宣言中说的，萨拉热窝事件背后是天意。最初，他觉得弗兰茨·斐迪南被刺是上天对这位

① Leopold Berchtold, 'Der Herrscher wie ich ihn bekannt', in E. von Steinitz (ed.), *Erinnerungen an Franz Joseph I* (Berlin, 1931), pp. 313—314.

皇储与庶民结婚的惩罚，皇帝 7 月末的想法中充满宿命论色彩。在签署战争宣言时，他对亚历山大·冯·克劳巴亭（Alexander von Krobatin）说："就这么办吧，我没有别的可做了。"而几天前他还告诉康拉德："如果这个君主国一定要死去，那它至少也应该死得体面。"但在 1914 年，有个问题仍不清楚：有多少皇帝的臣民会与这个君主国一起死去——以保卫它的体面？

战争从一开始就是场灾难。7 月 28 日宣战后，欧洲大部分国家到 8 月初都已先后卷入冲突，但奥地利人和德国人对此并不感到意外。186 德国人声称对英国支持协约国感到失望，他们认为英国人本不应该这么做；另一方面，三国同盟的第 3 个成员意大利没有立即参战，这个情况倒是可以料想到的，因为三国同盟仅仅是防御性的，但奥匈对塞尔维亚而言是入侵者。

在君主国内部，民众最初对战争的反应看来掩盖了此前没完没了的民族冲突。其他民族国家公众之中流露的那种战争热情，在这个多民族君主国中同样很明显，甚至很多斯拉夫人地区也是这样。哈布斯堡军队曾是众多民族主义争吵的焦点，但总体而言，它现在表现得十分团结。当然也有一些兵变，特别是捷克人的部队，但其数量要远少于当初的预计。直到战争结束之时，军队的纪律和统一性仍保持在令人吃惊的高水平上。

奥匈帝国在战争中最初的灾难性缺陷是军队训练低劣，供应不佳，特别重要的是指挥不力。民族主义造成了很大的间接性损害。战前的民族冲突使得武装部队多年来经费严重不足，在各主要大国中，这个君主国与意大利的军事开支是最为欠缺的。1912 年的军事法案部分地 187 改变了这种局面，但到 1914 年，长期忽视军事开支造成的突出后果仍然很严重。哈布斯堡的部队参战时，训练和装备都很糟糕，其结果也可想而知。最高统帅部，特别是其首脑康拉德的严重错误更加放大了这种外在缺陷。在与塞尔维亚和俄国两线作战的态势下，康拉德对谁应作为主攻对象迟疑不决，致命的犹豫导致一场混乱的军事动员，这种局面已在雅罗斯拉夫·哈谢克（Jaroslav Hašek）的《好兵帅克》

(*The Good Soldier Švejk*) 中传诸久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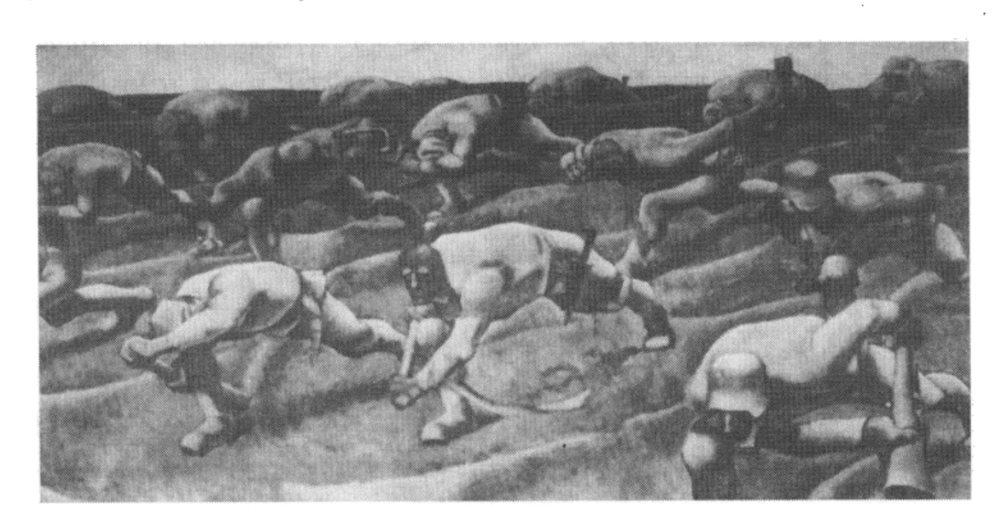


插图 32　伊格尔—列茨："通往无名的 1914"（维也纳军事史博物馆）

哈布斯堡军队没有在 8 月占领塞尔维亚，接着，由于德国人没有兑现曾许诺的支持，哈布斯堡军队被俄国人击退，9 月份伦贝格丢失，军队撤回到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s）内侧。直到 12 月的利马诺瓦—拉帕诺夫（Limanowa-Łapanow）战役，直到德国人的支援到来时，俄国人的势头才被遏制。到 1914 年底，战线稳定了下来，但是，开战后头几个月中哈布斯堡军队损失惨重：丧失了 4/5 受过训练的步兵和原军官团中一半的军官。哈布斯堡军队的老底子实际上已经在加里西亚的战场上被摧毁，奥匈军队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接下来的几年中，这个君主国的命运好坏相济。在外交战线上，弗兰茨·约瑟夫再次拒绝向意大利出让领土，结果这个前盟友于 1915 年 5 月向奥匈宣战。不过在军事战场上，1915 年奥匈在加里西亚和巴尔干战线双双告捷。在东线，奥德发动戈里茨—塔尔诺夫（Gorlice - Tarnow）联合攻势，取得重大战果，6 月份收复了伦贝格。在巴尔干战线，另一支奥德联军在保加利亚的协助下于 11 月占领塞尔维亚。但这些胜利都是在德国的支持下才取得的。康拉德在 8—9 月发动的里夫韦（Rovno）"黑—黄"单独攻势以失败告终。到 1915 年底，奥地利人看来是胜利者，但代价是日益依赖于德国。

在国内战线上，内部政治关系因为匈牙利向维也纳供应谷物等问题而发生摩擦。奥匈的基础设施已不足以应付现代战争的需要，尤其是在向主要人口中心供应食物和燃料问题上。当局在战争开始时推行 188 严厉的出版审查，这个做法也不利于战争努力，因为这导致人们对官方许可的消息抱有很大的不信任，于是谣言四起。官方对媒体的指令只会使民众对哈布斯堡政权的信任度进一步下降，克劳斯曾在《火炬》（*Die Fackel*）及随后抨击战争的力作《人类的末日》（*The Last Days of Mankind*）中记载下了这些接受指令的媒体。对民族主义领导人——如捷克人卡列尔·克拉马尔（Karel Kramář）——的压制同样激化了民族怨恨情绪。即使是继续支持战争行动的奥地利人，他们在大战早期也表露出一种几乎是缺乏自信的态度，从比德麦尔式的世界退回到私人的家庭空间中。不久，报纸评论中的浮夸之词在日益感到厌倦和阴郁的大众中间便找不到什么反响了。

1916 年，康拉德对意大利发动的 5 月攻势以失败告终。6 月，俄国人发动勃鲁西洛夫（Brusilov）攻势，一开始便横扫奥地利军队。8 月初，另一个前盟国罗马尼亚倒向俄国一边并占领特兰西瓦尼亚，形势变得更为严峻。德国军队再次介入：9 月，俄军的进攻势头被遏制，12 月，德军进入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到这时，奥匈帝国几乎不成其为一个独立的大国了。德奥联合统帅部设立后，由德国人担任领导，奥地利军队正式服从于德国。德国和奥地利议员——仅有德意志族议员参加——签署的萨尔茨堡协定是这个君主国逐步变成德国卫星国的又一标志。

就在奥匈独立地位逐渐削弱、经济日益暗淡和混乱的时候，国内要求和平的压力也逐步增大。弗兰茨·约瑟夫避居申布隆宫，1916 年春天他接到和平的请求，10 月，甚至外交大臣斯特凡·布里安（Stefan Burian）伯爵也要求和平，于是皇帝也主张迅速和解。当奥地利首相施图尔赫于 10 月 21 日被弗雷德里希·阿德勒（Friedrich Adler，维克托·阿德勒之子）刺杀后，已是风烛残年的弗兰茨·约瑟夫表达了回归宪政政府的愿望，他试图恢复其最为成功的首相凯尔伯的职务以

189 寻求和平。但是，几周之后，1916 年 11 月 21 日，皇帝去世了。

弗兰茨·约瑟夫的葬礼于 11 月 30 日举行，这是哈布斯堡排场的一次大表演，但它无法排遣皇帝驾崩带来的悲怆之情。虽然弗兰茨·约瑟夫犯下了各种错误，但他漫长的一生和他在君主国境内无所不在的形象给他带来了一种基于亲切和习惯的威望。但这种威望主要附属于他个人。他的继承人查理（Charles）并没有同样的威望。他也不具备其前任处理君主国之复杂事务的经验，何况国家此时正处于生死攸关的严重危机之中。如果他更为足智多谋、性格更为坚强，经验的欠缺也许不成问题，但随后的事态表明，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一开始，查理继续推行自由化政策，这或许可以视为哈布斯堡事业的复苏。查理受他妻子齐塔（Zita，出自波旁—帕尔玛王朝）的影响，并在外交大臣奥塔卡尔·采尔宁（Ottakar Czernin）伯爵的襄助下推行对外寻求和平、对内恢复宪政的方针。这个方针字面上很好，但实践中一团糟。1917 年 3 月，哈布斯堡当局通过齐塔的兄弟西克图斯（Sixtus）秘密向法国发出试探性信号，但没有任何积极成果。在国内，由于维也纳和各省的动荡与日俱增以及俄国革命的消息传来，查理释放了克拉马尔等重要政治犯，并于 5 月重新召集帝国议会，但唯一的结果是，议会变成了各民族议员争相号召成立事实上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论坛。6 月，查理解除行事固执的第查的职务，但第查的继任者甚至更主张对匈牙利治下各民族进行重大改革或做出重大让步。

1917 年，中欧集团在军事上取得了成功，但德国对奥匈的支配程度越来越大，外交局面也日益凶险。在东线，俄国的沙皇体制已在 2 月革命中覆灭。7 月，俄国新的立宪政府应西方盟国的要求发动攻势，但德奥部队击退了进攻，最后导致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政权于 1917 年 12 月签署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Brest-Litovsk）预备和约，1918 年 3 月签署正式和约，实际上已向中欧集团投降。德国和奥匈已

190 经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仅仅是在东线。

在南线，意大利对伊宋佐河（Isonzo）发动的攻势在 1917 年夏

天停滞下来，10 月，德奥在卡波雷托（Caporetto）取得重大胜利，意大利人一直撤退到皮亚夫河（Piave）畔（正如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所描述的那样）。到现在，奥匈军队几乎不能没有德国的支持和指导，而德国人在东线的和平安排几乎没有考虑到对奥地利人的补偿。与此同时，这个刚愎自用的德国盟友于 1917 年 2 月开始在大西洋发动无限制潜艇战，结果导致美国于 4 月参战，这就决定了德国及奥匈的命运。

面对日益逼近的灾难和盛气凌人的德国，查理和采尔宁继续暗中与英国和法国展开和谈，谈判一直持续到 1918 年。然而，当谈判停止，德国人又在 3 月调动全部力量在西线发动进攻时，采尔宁决定改变策略，将哈布斯堡的命运和德国捆绑在一起。在 1918 年 4 月 2 日的谈话中，他声称奥匈将全力支持德国，包括德国人对阿尔萨斯—洛林的要求。法国领导人乔治·克莱蒙梭（Georges Clemenceau）怒不可遏，为了报复奥匈，他披露了查理在 1917 年 3 月提出的和平建议。

接下来的西克图斯事件彻底破坏了哈布斯堡君主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信誉。奥地利与德国的关系被彻底损害。德国人坚持要“奥地利人的卡诺沙觐见（Canossa）”，5 月 12 日，奥匈在施帕（Spa）向德国人交出了所有仅存的独立。哈布斯堡向霍亨索伦（Hohenzollern）家族的投降使得西方协约国不再把哈布斯堡君主国视为“欧洲的必须”，因为如果它仅仅是德国的一个傀儡国家的话，它就不可能成为“欧洲的必须”。直到施帕投降后，西方协约国才开始认真考虑按民族原则分解这个君主国。

到 5 月份，战争的走势也在发生转变。奥地利 6 月份在皮亚夫河的攻势遭受丑陋的失败。在巴尔干，保加利亚的垮台导致中欧集团的全面退却。在西线，春季攻势的失败标志着德军耗尽了最后一口气，协约国军队在新到的美军的增援下采取了新的战术，取得开战以来从未见过的进展。

191

在国内，哈布斯堡君主国正在分崩离析。战时混乱引起的食品和燃料供应困难已经造成严重的劳工骚动，1917—1918 年冬天爆发罢工浪潮，街道上和面包店前的群众骚乱不断加剧。1918 年夏天的事变导致各民族自治要求的激进化。这类要求很多集中在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的“十四点计划”上，计划发表于 1918 年 1 月，它要求哈布斯堡君主国各民族实行广泛的自治。为了应对这种民族主义压力，查理于当年秋天提出了一个广泛的联邦化计划。然而，当查理的 10 月 16 日宣言发表时，很快就被事态的发展吞没。

10 月 18 日，威尔逊拒绝奥地利的和平呼吁。10 月 26 日，查理退出与德国的同盟；但是，10 月 28 日，捷克斯洛伐克宣布在布拉格建国；10 月 29 日，萨格勒布的克罗地亚议会宣布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联合。查理的宣言导致的一个后果是马扎尔领导集团的抗议，后者认为这是在修改 1867 年妥协案，于是他们宣布该妥协案无效，并退出二元君主国：这是 11 月 1 日革命的一部分，而协商帝国也终于走到了尽头。

11 月 3 日，哈布斯堡当局签署了停战协定，不过到此时，这个君主国基本上已不复存在。哈布斯堡王朝甚至在维也纳也不受欢迎。10 月 21 日，帝国议会中的德意志议员组成“德意志奥地利临时国民议会”，30 日，议会通过临时共和宪法，宣布德意志奥地利是德意志共和国的一部分，并以巴奔堡家族的红白红三色旗为奥地利国旗。11 月 1 日，在一派革命气氛中，社会民主党人要求建立共和国。哈布斯堡家族在共和国没有任何位置；11 月 11 日，查理宣布放弃皇帝的权力。1919 年 3 月 23 日，查理及其家人离开奥地利，流亡到瑞士。当匈牙利的复辟尝试失败后，他因健康原因移居马德拉群岛（Madeira），1922 年 4 月 1 日死在那里。查理的死也终结了奥地利作为哈布斯堡家族之中心的 6 个多世纪的历史，以及哈布斯堡君主国半个世纪的适应现代世界的努力。

192

哈布斯堡不是唯一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的君主国。德国的霍亨索伦王朝、俄国的罗曼诺夫（Romanov）王朝都已覆灭；奥斯曼帝国

解体。在意大利，立宪君主制很快就被法西斯主义篡夺。但在这些国家中，没有哪一个像哈布斯堡君主国那样，遭受完全消失的命运。小亚细亚仍有一个相当庞大的土耳其国家；德国仍然是个庞大的民族国家；布尔什维克的苏联依然是个幅员辽阔的大国。相反，留给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看来什么都没有。

两个派生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只关心如何争取那些属于它们民族遗产的东西。匈牙利的政体实际上是一种摄政体制，但它坚决不要哈布斯堡君主。这个君主国的大部分剩余土地并入了周边的“民族国家”：新复国的波兰、罗马尼亚、意大利和新建立的南斯拉夫。被视为前君主国的主要继承者的那一部分是几个德语省份的组合，它们在 1918 年 10 月底曾自称“德意志奥地利”。然而，即便这个实体最初也自认为只是另一个民族群体，认为自己的目标是要加入新的德意志共和国。在 1918 年，甚至连我们今天所称的“奥地利人”也不想与哈布斯堡君主国有任何瓜葛。

一个帝国怎能如此彻底地瓦解，这是一个经常被探讨的问题：是这个君主国自行解体，还是被外部力量撕裂的呢？显然是两方面力量协同作用的结果，因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压力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协约国的政策，但哈布斯堡君主国向德国出让实际主权，因而也就放弃了被视为“欧洲之必须”的权利，这就使得协约各国最终认可了它的解体。这个君主国是“自我”毁灭的。

1914 年 6 月 6 日，贝托尔德·摩尔登（Berthold Molden），一位同弗兰茨·斐迪南的贝尔维德集团联系紧密的记者，曾谈到如何改善与君主国境内塞尔维亚人关系的问题。在论及哈布斯堡的早期经验时，他写道：“过去威尼斯人经常说，他们不希望奥地利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统治——因为奥地利根本就不应该统治。”[①] 对哈布斯堡君主国而言，核心难题是它不能将帝国传统与现代化导致的自治要求协调起来。 193

① Solomon Wank, ‘Desperate Counsel in Vienna in July 1914’,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26 (3), p. 308; Beller, *Francis Joseph*, p. 158.

在过去，帝国作为仲裁者的角色对哈布斯堡来说是有利的，因为，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及后来的奥地利皇帝，这个家族可以充当其复杂帝国中各种要素的调停者和仲裁者。

但是，现代化产生了人民主权观念、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利，因此，作为一个帝国，这个君主国无论是不是调停者都已时日无多，除非它按联邦制的原则、按立宪和代议制的方式进行政治调整。但它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它的确做了一些重大调整，但其中的一些措施，如 1867 年的妥协案，很可能导致局势的恶化。这个君主国的领导层，特别是那位“老皇帝”，从没有放弃把国家视作哈布斯堡家产的观念，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维护王朝的权威和地位。这与要求自决的现代化原则是不可调和的。

所以，哈布斯堡君主国虽然在前现代曾享有权威和合理性，但它绝不可能为这种权威和合理性确立现代形式，因此也不可能以培养有效的超种族或超民族的“奥地利”忠诚或认同来寻求国民的忠诚。当然，在君主国的很多居民当中，这样的认同某种程度上存在过，而且对王朝，甚至对个人的忠诚也依然有强大的残留，至少对弗兰茨·约瑟夫是这样；但是，对更大的奥地利国家——且不要说奥匈帝国了——的认同感却很不发达。

当人民没有更好的选择时，哈布斯堡君主国也能满足需要，只要它能继续保持相对的繁荣、相对良好的秩序和安全以及相对的容忍。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在 1918 年夏天和秋天，这种平衡彻底改变了。在战时危机导致的混乱中，君主国不能提供过去的经济、社会，首先是政治效益，甚至食物和燃料这样基本的物质条件都不能保障；与此同时，在俄国革命后激进的思想环境中，政治自决的时机喷薄而出，不管是民族主义意义还是社会主义意义上的自决，但这种自决更符合当时的“现代”精神，而不是君主国的陈腐遗物。君主国最终无法运转，被弃置一旁以让位给更好的替代品。

195



插图33　行刑者朗格和塞萨尔·巴提斯蒂（维也纳军事史博物馆）

对于未来的中欧，很多民族主义民主制或社会主义共和国之类的希望都被证明是悲剧性的错误。很多人开始为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消失而惋惜，特别是惋惜它作为地区经济联合体的角色，作为防止本地区各弱小民族免受德国和俄国侵犯的保护者的角色。但这时一切都太迟了。

德意志人
捷克人
斯洛文尼亚
马扎尔人
鲁塞尼亚人
意大利人
克罗地亚人
塞尔维亚人
罗马尼亚人
斯洛伐克人
波兰人
1921年的国界
奥匈帝国疆界
0 100 200千米
0 50 100英里

地图6 中欧的民族化，1918—1921年

第五章　失根的国家，1918—1945 年

1930 年，罗伯特·穆齐尔发表《无根之人》（*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的第 1 卷。小说的背景是 1913 年的维也纳。小说的主人公乌尔里希（Ulrich）是个没有身份或特质的人，因为他拒绝在功能失调的哈布斯堡社会被进行模式化改造。他决心做完全的自我，而这种追求性别和心理特性的趋向可被视为典型的“维也纳”风格。《无根之人》不仅仅是一部有关战前维也纳的历史小说，它同样是其创作年代，即两次大战之间一场关于奥地利（和德国）的辩论。它不仅是一部有关无根之人的故事，同样也涉及一个无根之国，一个处于严重的认同危机中的国家——危机既是思想上、经济上的，也是政治上的——自从其帝国特性在 1918 年被剥去之后，这个国家再也没有从这一创痛中恢复过来。 197

1918 年，奥地利成为一个虽有意志但无根基的国家。1918—1945 年的奥地利历史是一部为解决哈布斯堡君主国覆灭造成的深刻难题而斗争并且失败的历史。这段故事中不仅包括奥地利共和国创建新的“奥地利”认同的失败历程，还有坚持以“民族”为首要政治单位的政治逻辑导致的毁灭性后果。“奥地利人”之所以在 1938 年轻而易举地成为“德国人”，是因为他们已经自认为是德意志民族的一部分了。一直到作为第三帝国一部分的奥地利遭受第二次灾难性失败时，它的

198 居民才认为，他们从民族上说毕竟是“奥地利人”。

现代“奥地利”史上的这个关键时期是奥地利民族认同第一次成型的时代，但也是奥地利作为纳粹德国的一部分的时期。然而，1945年以后，新的奥地利认同是个未曾言明的共识：那就是将纳粹时期从奥地利历史中排除出去。两次大战之间和“希特勒时代”的惨痛经历深刻地锻造了现代奥地利的身份特性；而这种身份特性竟成型于奥地利及奥地利人严重的认同危机的时代，这正是最近奥地利政治中的尖锐问题的历史成因。

一、孤儿共和国，1918—1927年

像欧洲大陆的其他大部分地区一样，1918年以后的中欧也是一片混乱。1914年开始的危机并没有随1918年11月的停火协议一起结束，而是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战败导致俄罗斯、奥斯曼和德意志3个帝国垮台，而且3个国家都发生了革命。甚至在一些“战胜”国，危机也导致急剧变迁，如意大利走向了法西斯主义。不过，没有哪个地方的变化像前哈布斯堡治下的中欧地区这样深刻。魏玛共和国仍然是德国，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也收回了原俄罗斯帝国的大部分土地。即使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也是一个规模可观的土耳其民族国家。只有哈布斯堡君主国消失得无影无踪。

它的取代者被称为“民族国家”。一部分土地被并入邻近的民族国家：意大利、罗马尼亚和波兰。哈布斯堡君主国南部的大部分土地转归新的南斯拉夫王国。完全从君主国内部产生的国家有3个：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奥地利”。

“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成立于1918年11月12日，创建者是原帝国议会中德意志族议员组成的议会。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被视为哈布斯堡君主国遗留下来的孤儿，是个没有人要的国家。

根据结束一战的《凡尔赛和约》，协约国战胜者英国、法国和美国对曾站在它们一边反对奥匈的民族领袖和国家给予奖赏。正如同德
199 国的《凡尔赛条约》是对德意志帝国的继承者的惩罚一样，1919年9

月10日强加给德意志奥地利的圣日耳曼（St. Germain）条约、1920年6月4日强加给匈牙利的特里亚农（Trianon）条约，分别是对哈布斯堡帝国表面上的二元继承人的惩罚。这两个条约粗暴地牺牲德意志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利益来迎合协约国的盟友，很多方面也违背了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虽然和约表面声称以这类原则为基础。匈牙利被缩减到原有领土面积的1/3，很多马扎尔人处于国境线之外。圣日耳曼条约虽然算不上是灾难，但它强加给德意志奥地利的条件仍然是非常苛刻的，从民族的意义上说也是非常不公平的。

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北部边界保持了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历史边界，除了捷克人要求或获得的一些“战略性”和“民族”调整以外。这就意味着，很多说德语的“奥地利人”生活在波希米亚南部、摩拉维亚各“语言孤岛”，以及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北部的“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他们发现自己没有处在民族疆域之内。

在南方，斯洛文尼亚人比例很高的卡尼奥拉成为南斯拉夫的一部分，但施蒂里亚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并入南斯拉夫则争议较多。南斯拉夫还占领了卡林提亚的大部分地区，或提出领土要求，不过它的行动受到当地临时民兵组织——“卫乡团”（Heimwehr）的抵制，问题最后在1920年10月的全民公决中解决。斯洛文尼亚人占多数的A区投票选择了奥地利，因此奥地利在卡林提亚的领土损失相对较小。

在奥地利人眼里，圣日耳曼条约最丑恶的“罪行”是对意大利的奖赏，因为意大利人得到的不仅是原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意大利语地区，还有卡林提亚的卡纳塔尔（Canaltal），更不能容忍的是他们还得到了布伦纳（Brenner Pass）山口以南完全说德语的蒂罗尔地区。“强夺南蒂罗尔”使民族自决成了一个笑柄，它没有什么重要依据，仅仅是对意大利受伤的民族自尊心的一个慰藉。意大利也走上了法西斯道路——但从此南蒂罗尔将困扰着奥意关系。

在东部边界，由于德意志奥地利和匈牙利都被协约国视为敌人，因此两个国家都没有受到特别照顾。捷克人曾建议在奥匈之间留出一个南北向的斯拉夫走廊，但这个建议因为太具挑衅性而被拒绝，不过　200

民族原则多少还是得到了遵守。这样，德意志奥地利取得了匈牙利西部的土地。但是，即使是在这里，后来成为布尔根兰省的地区的取得直到 1921 年才达成协议，而且厄登堡（Ödenburg，或称索普隆：Sopron）被排除在外，因为这里的全民公决受匈牙利控制——很可能是操纵，投票结果难以置信地选择了匈牙利。

在 1050 万要求归于维也纳治下的“德意志奥地利人”中，最后落在德意志奥地利境内的只略微超过 650 万，几乎有 400 万人生活在非德意志国家。

一些“德意志奥地利人”似乎有自愿离开这个国家的愿望。在 1919 年 5 月的一次非正式全民公决中，大约 80% 的福拉尔贝格投票者选择加入瑞士。但瑞士人对此不感兴趣，维也纳和协约国都不承认这个决定，于是这次公决没有实际意义。但是，它表明哈布斯堡君主国瓦解后“奥地利”的身份认同程度何等之低。

1918—1919 年，大部分“奥地利人”并不希望有一个独立的奥地利共和国。他们把“德意志奥地利”看作融入更大的德意志共和国的一个跳板。只有“德意志奥地利”加入德国，1918—1919 年波希米亚北部的 200 多万德意志人加入“德意志奥地利”才有意义，于是新选举产生的制宪国民议会在 1919 年 3 月 12 日公开宣布“德意志奥地利是德意志共和国的一部分”。但协约国，尤其是法国，是不会接受的。

协约国否决 1919 年德意志奥地利与德国的合并（Anschluss）的理由很明显：德国是负有罪责的战败者，让它变得比 1914 年更大更强是很荒谬的事。然而，禁止奥地利德意志人和德国联合违背民族自决原则，并对中欧政治产生灾难性影响。在两次大战之间，合并的目标一直是奥地利政治中挥之不去的伤痛——直到 1938 年实现这个目标。

更为直接地说，禁止合并推翻了这个国家赖以建立的根基，即便它的名字根据协约国的要求从“德意志奥地利”改为“奥地利共和国”。1919 年 10 月 21 日确认更名的法律也公开否认新的奥地利共和国是“奥地利”（西斯莱塔尼亚）的法律继承人，虽然圣日耳曼条约含有此意。然而，这个国家的“民族的”、德意志的基础既然被否认，

201

另一个可能的身份就是作为哈布斯堡奥地利的“残留物”。这样，奥地利共和国被当作旧奥地利的继承者，不管它是否承认这个事实，它都必然按照这个身份行事。

这就导致某种不同于“新教”德国的、巴洛克时代的天主教奥地利身份观念的复苏，这尤其表现在保守的天主教右派当中。萨尔茨堡艺术节就是为了灌输这种新身份认同，首届艺术节于 1920 年 8 月举办。然而，即使这种最富“奥地利”特色的文化活动也明白无误地将奥地利文化置于更大的“德意志”民族文化的范围内。很多保守派不愿披上哈布斯堡奥地利的超民族外衣，于是，为了寻求新的奥地利身份，他们回溯到中世纪的巴奔堡时代。由于新共和国的边界恰好与巴奔堡时代的奥地利、至少是与哈布斯堡初期的边界接近，这种做法就更显得可行了。不过这种中世纪“奥地利”身份的可笑之处在于，巴奔堡家族甚至是一个更为明显的“德意志”王朝；另外，这个新共和国的很多领土根本不曾属于巴奔堡奥地利，而这些领土中包括一些最富“奥地利”气质的省份：蒂罗尔和萨尔茨堡。

另一些主要的政治集团甚至没有创建独立的奥地利身份特性的兴趣。德意志民族主义阵营从本质上说对这个问题是冷淡的，而在更具国际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者看来，没有什么客观理由让奥地利独立于更为先进的德国。从根本上说，奥地利社会中没有哪个群体对新生的共和国能够或的确应该生存下去抱有重大信心。

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大部分地区，包括奥地利的边境地带，都处在一种接近于大混乱的危机中。匈牙利的革命导致了贝拉·库恩（Béla Kun）领导的苏维埃体制，随后是海军司令米克罗斯·霍尔蒂（Miklós Horthy）领导的一场报复性的反革命运动。1919 年，巴伐利亚建立激进的左翼政权，但它在匈牙利革命之前就被右翼势力残酷镇压。柏林的斯巴达克斯团（Spartakist）革命被绞杀，但德国深受各种右翼政变图谋的困扰，1923 年希特勒在慕尼黑的流产政变——啤酒馆暴动（Beer Hall putsch）就是这类图谋活动的顶点。1919 年，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宣扬的“持久革命”似乎一度真的到来，奥地利也

202 没有免于这场表面上的共产主义浪潮。工人阶级的骚动达到骇人的地步，而从俄国军营里返回的战俘更是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1918—1919 年冬天，罢工甚至骚乱此起彼伏，领导者通常是自比为俄国“苏维埃”的工人或士兵委员会。



插图 34 克里姆特:“阿玛丽·苏克坎德尔”,1917—1918 年(贝尔维德奥地利美术馆)

在这种全面的政治危机之下，一场严重的、在有些地方是毁灭性的经济、社会和医疗危机席卷全欧洲，而奥地利的情况尤其严重。1918—1919 年的西班牙流感造成重大损失，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奥托·瓦格纳和伊贡·希勒等人被流感夺去性命。由于某些地区的居民 203 几乎陷入忍饥挨饿的状态，流行病造成的后果因而更加严重。战时的困难已经让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经济和交通基础设施不堪重负，而帝国

的解体只能加剧这种混乱。

哈布斯堡君主国按民族原则解体对维也纳的打击尤其严重。作为帝国的首都、君主国自由贸易区的核心，维也纳的食物供应依赖于匈牙利，大部分工业原料、特别是煤炭依赖于波希米亚。现在，维也纳与这些地区的经济联系，与跟奥地利共和国内部的联系相比已处于次要地位。新的民族边界割断了维也纳的经济生命线。从前的供应国利用它们对维也纳的控制来报复昔日的仇怨并试图为将来争取更好的境遇，因此维也纳的处境更加恶化。匈牙利拒绝向维也纳供应粮食已经造成战时危机，但1918—1919年严冬之际捷克斯洛伐克实施的煤炭禁运造成的打击尤为严重。很多奥地利人之所以能熬过这个时期，靠的是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领导的协约国食品援助。另一个办法是将孩子送到荷兰等国，以逃避这个被称为奥地利的困乏的地狱之国。储蓄公债的大幅贬值和失控的通货膨胀使得很多奥地利中产阶级遭受前所未有的经济困窘。通货膨胀在战争期间就已开始，因为当时印制的纸币数量越来越多，但战后的危机又加剧了通货膨胀。虽然通胀远没有达到魏玛共和国超高通胀的荒诞地步，但它仍然带来了深刻的社会骚动，因为它实际上摧毁了作为奥地利中产阶级主要收入来源的资本收益。于是，激进的工人运动与失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怨恨之情交汇在一起。

虽然共和国成立于危难关头，但危局的最初阶段迎来过各政治党派的出色合作，当时社会民主党人卡尔·雷纳担任10月31日成立的全体党派联合政府的总理，接着，共和国于11月12日宣布成立。第一届联合政府的主要成果之一是避免了类似于布达佩斯和慕尼黑发生的激进革命，这一成果主要归功于政府外交部长、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托·鲍威尔的手腕。鲍威尔在弗雷德里希·阿德勒等激进左派领袖的协助下维持住党的纪律，更为关键的是，他采取了激进左翼的思想立场，因而他能战胜共产主义者，确保工人阶级忠诚于民主共和国。然而，鲍威尔虽然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中拯救了共和国，但他也造成了很大的风险，因为他的激进思想言论和他务实的立宪民主实践 204

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



插图 35　克莱斯基纪念鲍威尔（布鲁诺·克莱斯基档案馆）

最初，民主政治似乎是在激进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下向前摸索。在1918—1920年的危机中，很多进步主义措施曾被考虑过，如扩展工人对企业的控制权，但得到执行的寥寥无几。8小时工作制成为法律，工人带薪休假的权利被确定下来。在1919年2月的制宪国民议会选举中，妇女在奥地利历史上首次获得投票权。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成为最大的党派，而且继续是联合政府中的首席成员。

205　1920年10月1日通过的宪法是个进步文献，虽然社会民主党的妥协和基督教社会党的影响很明显：天主教会仍保留了相当大的法律特权，实际上维护了它作为奥地利国教的地位。宪法大部分是汉斯·凯尔森起草的，它规定奥地利共和国是个联邦制国家，各省在联邦议院（Bundesrat）中有代表，该议院与国民议会（Nationalrat）并列，后者的议员是根据一种相当复杂的比例代表制、由全国选举产生的。这是一种相当集权的联邦体制，联邦议院只对国民议会的法律决议具有延缓否决权。宪法还规定总统为国家首脑，但他的职责主要是代表

性和形式上的。[1]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奥地利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国民议会的控制者手中。

从这些方面来看，在 1919 年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虽然仍是最大的党派，但已预示着该党是为革命的希望的终结，因为左派在这次选举中成为少数，而“资产阶级”政党成了多数。基督教社会党由于持天主教的保守社团主义路线，最初也与社会民主党一起通过了某些进步的社会和经济立法。基督教社会党自身有一个由列奥波德·昆沙克（Leopold Kunschak）领导的工人派系，这个派系也积极推动劳工立法以便与社会主义者竞争。但是，在大多数问题上，他们与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尖锐对立。一旦共和国立足之时的危机度过最严峻的阶段后，基督教社会党人便开始要求削弱社会民主党那些更为进步的政策，比如教育领域内的政策。

甚至还在 1920 年宪法通过之前，这两大党派就已在政府中停止合作。当基督教社会党在 1920 年 10 月 17 日的选举中成为最大党后，社会民主党转为了反对派。他们以为，必然的社会变革不久会再度使他们成为多数派，到时他们能以民主的方式推行他们的“革命”，并在奥地利社会中实行 1919—1920 年未曾实现的激进改革。像 1879 年进步的德意志自由派一样，社会民主党人也不恰当地认为历史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但他们直到 1945 年才重掌政权。 206

在失去国家权力后，社会民主党在他们的新堡垒维也纳继续推进关于进步的社会主义的未来的计划。1920 年的宪法使维也纳成为一个独立的联邦省，脱离了下奥地利。普选意味着维也纳的政权从基督教社会党手中转为受社会民主党控制。于是，市长卡尔·塞茨（Karl Seitz）领导下的“红色维也纳”成为两次大战之间社会主义展现其政策方针的橱窗。尤里乌斯·坦德勒（Julius Tandler）建立了一个非常先进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奥托·戈洛凯尔（Otto Glöckel）在

---

① 1929 年奥地利的宪法“改革”稍微增加了总统的权力，并规定总统由全国选举产生。在经过这次修改之后，1920 年的宪法在 1945 年之后又被重新采用，至今仍是奥地利的宪法。

被迫放弃他的联邦教育改革计划后，继续在维也纳进行建立更为开放和平等的学校体制的努力。社会主义领袖们深受马克斯·阿德勒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也深受德意志（及犹太）自由主义的进步遗产的感染，他们也大力推进工人教育计划。约瑟夫·卢特波尔德·斯特恩（Joseph Luitpold Stern）、大卫·约瑟夫·巴赫（David Josef Bach）等活动家致力于创建一种新型的、人道主义的无产阶级本位文化，一种适应社会主义新世界的社会主义新人正在维也纳全面（in nuce）发展。

这个新世界最伟大的表现形式是市政府的建设纲领。基督教社会党时期，维也纳的住房极度短缺，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战前维也纳人口的迅速增长，但部分原因也在于，业主几乎全都倾向于提高租金而不是投资建造新住宅。业主集团是基督教社会党依靠的关键选举人团体，所以该党几乎不鼓励建设新住宅，虽然这种需求显而易见。但是，战时的紧张局面，包括数千加里西亚流亡者的涌人，使得本已窘迫的局面更加岌岌可危。

既然市场道路行不通，社会民主党便确立政府推行的建筑计划来解决住房紧缺问题。维也纳的财政首脑胡戈·布莱特纳（Hugo Breitner）设立累进房产税和奢侈税，为该计划提供了大部分资金。从1919 207 年到1934年，维也纳共建造了6万多套住房，包括像卡尔—马克思大楼这样的展现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经典建筑，大楼坐落在圣洁城（Heiligenstadt），是个像兵营一样的套房建筑，阅览室、洗衣房和托儿所全都位于大楼的宽大庭院里。

对这类住房的设计者和很多居住者来说，这种堡垒般的设计是一种保护，而且住房计划也是社会主义自豪感的一个来源。批判者则把它们视为社会主义控制力的堡垒，布莱特纳的税收是一种不合理的负担，而住房计划则扭曲了房产市场。诚然，到1934年，无房者的数量实际上增加到8万人，而且新住房中的设施相当简陋。不过，无房者的增加，大部分原因在于两次大战之间奥地利持续的经济危机，相比以前的条件，住房设施也有了很大改进。总体而言，住房计划是个很

大的成就，也是红色维也纳市政社会主义的一个表现。

但这毕竟是个很脆弱的成绩。尽管红色维也纳的自我形象中不乏英雄色彩，但它只是个社会主义的孤岛，周围的汪洋大海都是“资产阶级”的，甚至更糟。这个新生联邦省份的管区边界还不能保证维也纳这个社会主义的世外桃源不受奥地利民族主义的政治洪流的冲击。

1920 年后，就全国层次而言，统治奥地利的是一系列保守的“资产阶级”联盟，它们最初的主要目标是恢复“常态”。不过，在经历如此悲怆的变迁后，这个任务看来很困难。奥地利也像德国一样，甚至连确保通货基本恢复稳定的财政资源都很缺乏。20 世纪 20 年代初，奥地利政治的支配性主题是控制通货膨胀与恢复国家信用。奥地利的信用问题是双重的。从财政方面说，它缺少足够坚挺、能抑制通货膨胀的资源和信用；从政治上说，奥地利境内外很少有人真正相信这个国家在经济上能维持下去。要求德奥合并的压力仍很大，在 1921 年春天，蒂罗尔和萨尔茨堡的非正式全民公决都几乎一致赞成与德国合并。

奥地利的独立之所以能在财政上被挽救回来，其原因在于它可以防止出现一个更大的德国，而这是法国人的噩梦。根据 1922 年 10 月的日内瓦协定，协约国向奥地利政府提供大笔贷款以资助它进行货币改革，但该协定的一个主要条款是，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各签字国都应保证奥地利的独立，奥地利不得加入德国。 208

但是，即使有日内瓦协定的帮助，奥地利的财政问题也没有完结。1924 年秋天，通货膨胀达到最高值。日内瓦协定将奥地利的国家财政置于国联代表阿尔弗雷德·齐默尔曼（Alfred Zimmermann）的监督下，奥地利实际上成了“国联的殖民地”。这时奥地利在财政和税收方面执行严厉的通货紧缩政策，终于造就了一种强势通货——先令（schilling），它于 1925 年取代过去的克朗，比率为 1：10 000。到 20 世纪 30 年代，奥地利人吹嘘先令是“阿尔卑斯山的美元”（Alpendollar）。然而，奥地利在国联监护下推行的保守货币政策意味着失业危机从未解除过，通货紧缩对需求造成冲击，即便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相对良好的年份也是如此。不过，跟魏玛共和国不同的是，两次大战之间的

奥地利经济没有真正的“景气年份”。

其他领域恢复“常态”的努力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并且带来了更多的难题。最明显的失败是在安全问题上。圣日耳曼条约对奥地利军队的规模和性质作了严格的限制。社会民主党人尤里乌斯·道伊奇（Julius Deutsch）在战争结束后尚能组建一支小规模的、忠于共和国和宪法的职业军队。但是，他的继任者卡尔·佛高英（Carl Vaugoin）则对军队进行政治化改造，这样一来，1920 年的左翼军队变成了一个右翼机构，它更多忠诚于一个党派，即基督教社会党，而不是忠诚于共和国。

另外，国家从来没有实现对武装力量的垄断控制权。即使在国家及边境地带安定下来后，私人武装仍继续存在。在左翼，社会民主党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保卫共和联队（Republikanische Schutzbund），其领导人是前军事部长尤里乌斯·道伊奇。右翼最初有“先锋战士”（Frontkämpfer）团体，后来它被卫乡团（Heimwehr）取代。

卫乡团这种民兵武装声称起源于大战刚结束时的自卫武装，但实际上，它们已成为一种新组织，其基础是地方右翼集团，它们的主要目标不是为了保卫共和国免受外国军队的侵犯，而是为了保卫“奥地利”免遭马克思主义革命力量的攻击。有时候，卫乡团还成为直接的政治行动者，而平时则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右派提供武装后

209

盾。它还与国家军队建立了强有力的非正式联系，不过它仍然是一个独立的、通常是难以琢磨的政治角色。

与卫乡团相比，民族社会主义者（National Socialists①）最初很不起眼。不过，很多熟谙政治纷争和派系打斗的卫乡团武装通常同情纳粹思想。即使卫乡团中有反对纳粹的人，他们大多数也同样敌视议会民主：1930 年的卫乡团科尔诺伊堡誓词（Korneuburg Oath）从意识形态上说显然是法西斯主义的。对很多卫乡团成员而言，共和国更像是对手，而不是应该保卫的事业。

① 在德国，同名的党派又译为国家社会主义者，即纳粹。——译者注

私人武装是两次大战之间奥地利最棘手的核心问题：国家分裂成两大政治集团，即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同时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也在积聚力量，变成一支较小的前哨势力。社会民主党为支持其无产阶级本位文化而建立起广泛的支持系统，文化建设扩展到体育、艺术和娱乐等领域。社会主义工人可以完全生活在这种文化世界里。右翼势力大量存在于天主教会的基督教社会党人当中，而所有这类涉足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人也都为资产阶级的保守天主教徒提供了一种自足的生活方式。

在这两大阵营之间，正常的“公民社会”没有多少地位，剩下的就只有断裂了。自由资产阶级仍然存在，特别是在维也纳，但犹太人在其中占有很大比重，他们面对着自大战最后阶段以来不断增长的民众反犹情绪的威胁。一切来源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东西、大战期间的“背后一刀”[①]、经济腐败、甚至现代性本身，都被归咎于犹太人，或“犹太民族”。大量加里西亚犹太难民出现在战时的维也纳，这件事也加剧了反犹情绪；但是，甚至在大部分难民于 1918 年离开之后，几乎所有人，有时还包括社会民主党人，都把奥地利的弊病怪罪于“犹太人”。

德意志民族主义阵营比自由资产阶级阵营大得多，这个阵营同样披上了奥地利自由主义的外衣，并是大部分自由主义中产阶级选民阶层的后继者；然而，到两次大战之间，它过去的自由主义信条，如反教权主义和自由贸易经济学，被纳入某种充满反犹主义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而且德意志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追随者充当了反犹控诉运动的排头兵。 210

因此，奥地利政治中本来可能出现的“自由主义”阵营被反犹主义分裂了，维也纳的犹太人的大部分选票投给了基本不持歧视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但德意志民族主义阵营大部分支持和他们一样反对“犹

---

① “背后一刀”指的应是德奥右翼集团，特别是军方把大战失利归咎于国内左翼革命势力的一个说法，这种传说在德国尤甚。——译者注

太”现代性和“犹太”马克思主义的基督教社会党人。两次大战之间的奥地利政治很少或根本没有中间派的空隙。

由此造成的“反马克思主义”右派和奥地利社会主义左派之间的对抗，实际上阻碍了奥地利任何新的“全国性”政治共识的形成，因为双方都采取极端立场，而右派的表现尤其明显。鲍威尔因为坚持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受到批判——这在1926年的林茨纲领中表现得很明显，虽然他的实用主义行动实际上长期背离了自己的革命言论，但是他仍公开赞同共和民主制的程序。他的对手，基督教社会党领袖、天主教士伊格纳茨·塞培尔（Ignaz Seipel）的“反马克思主义”同样激进，不过，正如1929年他在蒂宾根（Tübingen）的一次演讲中表明的，他认为“议会主义”和民主制度可以被抛弃，如果某种天主教版本的社团主义能取而代之的话。因此，唯一真正支持第一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政治阵营，恰恰是“反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社会民主党。

政治分裂发生在更加灾难性的经济状况之下。战前的一些经济联系得以重建，但民族仇恨使得区域经济处于严重的割裂状态。捷克斯洛伐克既有发达的工业基础，也有必须的资源，故能在新的民族化形势下保持繁荣；但对奥地利来说，由于从前的经济腹地离它而去，必要的重建工作就显得既艰难又不完善。水力发电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对捷克斯洛伐克煤炭供应的依赖，但它的发展因为缺少投资而步履蹒跚。通货虽然在1925年稳定下来，但经济发展仍然深受信贷不足之苦。

工人与资方的阶级战争使得经济局面进一步恶化，但我们不清楚错误到底在哪一方。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把奥地利的经济困境归咎于社会主义和过度的管制措施，并认为维也纳的住房危机是房产税和房租控制措施导致的。但是，正如上面提到的，这些措施是社会主义者应对此前就已存在的危机的一部分，而这种危机正是因为市场手段失灵而造成的。资本投入之所以不足，原因与其说是社会主义和工会力量的阻碍效应，还不如说是缺乏企业家进取精神，而这种精神的缺乏则是对奥地利的未来缺乏信心导致的。

211

结果就是经济停滞。在 1925 年到 1929 年短暂的相对“繁荣”时期，奥地利经济的确有所增长，1929 年达到了战前 1913 年的水平。然而，经济复苏比德国更为脆弱和无力。银行体制从来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在国际信贷方面，奥地利依然依赖于国联。这就使得奥地利的内外政策听从于国联债主，尤其是法国的指令。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连串的“资产阶级集团”联合政府以相当保守的方式统治着奥地利。一个重要的争论焦点是天主教会在政治上的持续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塞培尔个人身上。作为天主教士的塞培尔曾数次担任总理，即使他不是总理，他在整个这段时期都是政府中的主导角色。相反，红色维也纳则受保守派的憎恨，因为它对后者在全国政治中的主宰地位构成挑战。布莱特纳和坦德勒被抨击为阶级敌人，几个左派人士，如作家胡戈·贝陶尔（Hugo Bettauer），甚至被右翼狂热分子刺杀，但中产阶级的陪审团经常听任凶手逍遥法外。由联邦政府任命的维也纳官员，特别是警察部门的首脑约翰内斯·朔贝尔（Johannes Schober），日益在社会党人的市政府面前强调自己的权威。虽然经济在 1922 年后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劳资关系仍然糟糕，思想上的紧张关系清晰可辨，左翼和右翼的私人武装仍处于对抗状态。共和国终结过程的发端就是以这样一种对抗为标志的。

1927 年 1 月，保卫共和联队和先锋战士在布尔根兰的夏滕多夫（Schattendorf）交火，一个男子和一名儿童丧生。在随后的谋杀罪审讯中，陪审团宣布被告先锋战士无罪，这种对法律的嘲弄激怒了维也纳的工人阶级。7 月 15 日爆发的群众示威脱离了社会民主党的控制，有人纵火焚烧了司法部。当警察无法恢复秩序时，朔贝尔请求军队支援。212 平日里优雅文明的环城大道变成了内战的战场，当天有 89 名示威者殒命，600 人重伤。为了表示抗议，社会民主党号召 7 月 16 日举行全国总罢工，但是反响很小，而政府在卫乡团武装的支持下顶住了罢工的冲击。社会民主党在国内遭到失败，政府的力量进一步强化，卫乡团同样如此。共和国遭受这次重大打击后便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二、文化战争，1927—1938 年

同样是在 1927 年，路德维希·希尔什菲尔德（Ludwig Hirschfeld）发表《贝德凯尔外的另一个世界：维也纳和布达佩斯》（*Was nicht im Baedeker steht : Wien und Budapest* ）。在这部风趣幽默的旅游手册中，有一章讲述的是在维也纳“必须习惯的怪癖”。其中一个怪癖是这样一个问题：“他是犹太人吗?”（Ist er ein Jud?）根据希尔什菲尔德的说法，在维也纳，人们询问一个杰出人物的第一件事是他是否是犹太人。只有问过这个问题后，人们才能确定如何去考察他。为了证实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希尔什菲尔德直言不讳地引用了这一事实：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我们最伟大的学者”，仍然不是大学的正教授。他接着警告那些计划去维也纳旅行的人不可表现得太过“好奇或别具一格，否则你在别人那里很快就变成了犹太人”。①

维也纳 1900 的“犹太”现代文化与奥地利社会的保守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因为战争和战后的危机而更为加剧。在大多数奥地利人眼里，奥地利文化中的犹太因素是低劣的，是某种外在于“奥地利”的东西。然而，在奥地利，不仅高级“现代”文化，而且“奥地利”身份特性所必备的大众文化，很大程度上也是犹太人创造和推动的。

实际上，很多为维也纳 1900 带来声望的作品诞生于两次大战之间，而且犹太人在高级文化生活中的存在甚至比战前比重更大。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许多重大发展发生在 1918 年之后，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的鼎盛期也是在这个时候。两次大战之间维也纳的文学界是德语文学的动力源。老一代作家继续推出重要作品，如施尼茨勒出色的内心独白小说《埃尔泽小姐》（*Fräulein Else* ），霍夫曼施塔尔的《困境》（*Der Schwierige* ），而卡尔·克劳斯则继续在《火炬》中痛斥社会，并发表了他的反战杰作《人类的末日》。年轻一代作家

213

① Ludwig Hirschfeld, *Was nicht im Baedeker steht : Wien und Budapest* (Munich, 1927), p. 57.

也崭露头角，包括穆齐尔，还有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赫尔曼·布罗赫、斯特凡·茨威格、埃里亚斯·卡内提、阿尔弗雷德·波尔加（Alfred Polgar），以及一大批其他作家：安东·库赫（Anton Kuh）、伊贡·弗里德尔（Egon Friedell）、弗雷德里希·托贝格（Friedrich Torberg）和希尔德·施皮尔（Hilde Spiel）。这里提到的所有作者中，只有穆齐尔不是犹太人或犹太人的后裔。

在这个时期的音乐界，阿诺德·勋伯格和他的（非犹太）学生阿尔班·贝格（Alban Berg）、安东·冯·魏本（Anton von Webern）一起完善了他的十二音创作体系。大战期间和随后的几年中是维也纳哲学成就最大的时期，这体现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和维也纳小组的逻辑实证主义中。维也纳小组中有一些杰出的非犹太成员，如德意志人莫里茨·石里克（Moritz Schlick）和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但大多数人有犹太血统，包括奥托·诺伊拉特（Otto Neurath）、菲利普·弗兰克（Philipp Frank）、汉斯·哈恩（Hans Hahn）和弗雷德里希·魏斯曼（Friedrich Waismann），还有这个小组最杰出的批评家卡尔·波普尔。路德维希·冯·米瑟斯（Ludwig von Mises）的研讨班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论坛，这种学说后来的代表者是他的（非犹太）学生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但这个研讨班的大部分成员是犹太人出身。在教育学方面，欧根尼亚·施瓦茨瓦尔德（Eugenia Schwarzwald）在两次大战之间取得最高成就。汉斯·凯尔森是奥地利宪法的主要起草者。

由于两次大战之间奥地利的困境，很多出色的思想家前往国外寻求更为富饶的发展空间。勋伯格成为柏林普鲁士科学院的成员，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去了美国，哈耶克去了英国。对维也纳的思想文化人物来说，魏玛共和国时期柏林的巨大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两次大战之间的维也纳仍然是一个突出的思想文化创造中心，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维也纳现代文化的社会储蓄库仍然存在于犹太资产阶级中。

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样大多是犹太人出身，包括鲍威尔、 214

马克斯·阿德勒、鲁道夫·西法亭和古斯塔夫·埃里希（Gustav Ehrlich）。他们提出了一种新康德式的、个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这种解释为这个倾向于极权主义的时代提供了一种更具吸引力的理论选择。在红色维也纳的思想文化画卷上，既有奥托·戈洛凯尔、阿道夫·卢斯、卡尔·毕勒尔（Karl Bühler）等非犹太人士，但凯特·莱希特（Käthe Leichter）和奥托·莱希特（Otto Leichter）、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feld）、汉斯·迪策（Hans Tietze）、大卫·约瑟夫·巴赫、奥托·诺伊拉特、约瑟夫·弗兰克和夏洛特·毕勒尔（Charlotte Bühler）等犹太人仍占据着主导地位。

即使在奥地利右派的文化政治中，犹太出身的个人也占有突出地位。在两次大战之间，关于哈布斯堡神话的扛鼎之作是约瑟夫·罗特1932年创作的《拉德茨基进军记》（*The Radetzky March*），尽管该著带有微妙的批评色彩。对奥地利的保守政治来说，最重要的“犹太”贡献是萨尔茨堡艺术节。胡戈·冯·霍夫曼施塔尔和列奥波德·冯·安德里安是创办这一艺术节的两个关键人物，两人都是著名的犹太家族的后裔，安德里安还是贾科莫·迈耶比尔（Giacomo Meyerbeer）的孙子，而贾科莫则是理查德·瓦格纳的作品《音乐中的犹太人》的原型。虽然非犹太人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是艺术节上的主要音乐家，但艺术节的戏剧大师是马克斯·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艺术节上的很多其他参与者是犹太人，如艺术指导奥斯卡·斯特纳德（Oskar Strnad）。

犹太人也广泛参与奥地利的民间大众文化，他们实际上支配着奥地利的娱乐业。在电影界，犹太人作为导演、制片人和电影院经营者都十分突出；埃里希·冯·施特罗海姆（Erich von Stroheim）和比利·维尔德（Billy Wilder）都是在电影界起步的。犹太人，首先是赫尔曼·列奥博蒂（Hermann Leopoldi），写了一些最著名的维也纳民歌（Wiener Lieder），而阿道夫·匹克（Adolf Pick）的《马车夫之歌》（Fiakerlied）也是最具“维也纳特色”的歌曲之一。

犹太人在维也纳的轻歌剧界表现尤其突出，他们或是演出经理、经

纪人、制作人、投资人，或是演员、作曲家，但最出色的还是作为脚本作者。甚至施特劳斯家族——拉德茨基进行曲、蓝色多瑙河华尔兹和《蝙蝠》（Die Fledermaus）的作者们，也有部分犹太血统（纳粹试图在1938 年掩盖这一事实）。在轻歌剧的“白银时代”，即从一战前到两次大战之间，犹太人的表现特别突出。当时也有很多非犹太轻歌剧作家，最著名的是弗兰茨·莱哈尔（Franz Lehár），但这个时期很多重要的轻歌剧是犹太人创作的，如伊姆雷·卡尔曼（Imre Kálmán）、奥斯卡·施特劳斯（Oscar Straus）和列奥·伐尔（Leo Fall）。另外，大部分最著名的脚本作者是犹太人，包括尤里乌斯·布拉默（Julius Brammer）和阿尔弗 215 雷德·格伦瓦尔德（Alfred Grünwald）的创作小组，他们的知名度体现在对两次大战之间奥地利身份特性的一幅有趣的绘画阐释中。



插图 36 达尼罗瓦茨：“诗人中的王者”（奥地利国家图书馆）

像在好莱坞一样，犹太人在轻歌剧中通常不被提到。不过，犹太216人偶尔会公开出现，而且带有正面色彩。《莱茵河之春》（Frühling am Rhein）中甚至有个犹太英雄莫里茨·福吕林（Moritz Frühling），他以自己的（犹太）智慧战胜了德国男爵的不道德行径，并让自己出身基督教、但由犹太人抚养大的继女嫁给了心上人——有点像莱辛（Lessing）的《智者纳旦》（Nathan the Wise）。

有几部轻歌剧以其强烈的解放主旨显露了作者的出身。布拉默和格伦瓦尔德战时创作的两部轻歌剧《斯坦布尔的玫瑰》（The Rose of Stamboul，1916）和《轻浮兄弟》（Bruder Leichtsinn，1917/1918）涉及当时的社会问题，如妇女权利和种族关系，作者在这两个方面都持自由主义的进步观念。《轻浮兄弟》表现得尤其突出，因为它是对轻歌剧之“轻浮”的思想辩护书，剧中的主人公是带有一半黑人血统的美国人吉米·威尔斯（Jimmy Wells）。剧本很清楚地表明，女主人公、比利时人穆索特（Musotte）嫁给威尔斯的“轻浮”决定是个正确的选择。剧中寓意不可能更为清晰了：真正重要的是人的内在本质，而不是肤色（或是鼻子的模样）。在这些问题上，轻歌剧的轻浮（以及欢快的现代性）可能比分裂性的社会成规更具清晰的辨别力。

两次大战之间，曾有一种以“乡土轻歌剧”（Heimatoperette）体裁来创建新的、以旅游为特色的奥地利阿尔卑斯身份特性的努力，犹太人也大力涉足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1930年的《白马旅店》（Im weissen Rössl），该剧在厚着脸皮为奥地利阿尔卑斯山的自然美景做广告的同时，也将对哈布斯堡的恋旧情怀和对经济困窘的艰难时世的批判结合到了一起：弗兰茨·约瑟夫甚至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轻歌剧布景中。该剧的主要作曲者拉尔夫·贝纳茨基（Ralph Benatzky）不是犹太人，其中最为轰动的曲目的作者罗伯特·施托尔茨（Robert Stolz）也不是。其他有关的作曲者，如布鲁诺·格拉尼希斯塔滕（Bruno Granichstaedten）和罗伯特·吉尔伯特（Robert Gilbert）则是犹太人，脚本作者汉斯·缪勒（Hans Müller）和导演卡尔·法尔卡斯（Karl Farkas）同样如此。演员当中也有犹

太人：该剧在维也纳首演时，剧中的“齐基·苏尔茨海默”（Sigi Sulzheimer）——柏林一个内衣制造商的儿子，口齿不清——的扮演者就是法尔卡斯本人，他是当时最著名的犹太喜剧演员之一。正是这位初涉爱河的苏尔茨海默以一个发明——“带拉链的结婚礼服”——解决了剧中的难题。即使是在“乡土轻歌剧”的阿尔卑斯山美景中，维也纳的“犹太”现代性仍然能以戏谑的方式融入技术发展和弗洛伊德心理学一起带来的成果。

217 犹太人不仅在奥地利的高级现代文化中占据中心地位，他们也在民间大众文化中起着关键作用，而这种文化很大程度上构成两次大战之间奥地利的身份特性，甚至是今日奥地利身份特性的基础。尽管如此，犹太人仍不被其他奥地利人视为“扎根者”（bodenständig）。在奥地利人理解其民族身份的方式与他们对待国内政治及思想分歧的立场之间，存在一种悲剧性的混淆。如果说两次大战之间果真有过某种奥地利民族认同的话，那也是由基督教社会党人保守的天主教内涵决定的。除了轻歌剧这一大众文化，奥地利还有另一种更为根深蒂固的传统大众文化，一种真实的“乡土”文化。这个乡土世界之所以美好，其本质是阿尔卑斯山的风景中穿着紧身连衣裙的少女，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犹太人被视为外来人，因而也是入侵者。从本质上说，这个世界不可能既是“奥地利”的又是犹太的。

犹太人可能帮助提升了阿尔卑斯和巴洛克奥地利的旅游形象，但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白马旅店》中的犹太人是一位来自柏林的工业家；萨尔茨堡艺术节可以说是个“世界主义”的表演，但它有意识地避免成为与犹太人有关的“西方国际主义”，这是一种将“德意志”文化与“天主教”宗教联系在一起的世界主义。这个艺术节是反动和反现代的，它试图再创造一种中世纪和巴洛克天主教文化的总体效应，这种总体性是排斥犹太人的，或将他们置于完全的屈从状态。

鼓励旅游本身也是一种保守的战略。早在1914年之前，奥地利“阿尔卑斯”各省的地方领导人就把旅游视为一种发展经济而又不必进行工业化、从而完全避免现代化之冲击——比如独立的工人阶级的

诞生——的手段。反过来说，旅游业进一步增强了阿尔卑斯山区社会的保守主义，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家长制的社会和家庭模式。就在工厂和办公室中的工会势力正在改造现代工作场所时，旅店和度假胜地却仍在按等级制的原则运转。外省奥地利从现代世界中邀请陌生人前来，为的是超脱于那个世界之外。外省对“富有的”维也纳旅游者的憎恶，部分原因在于司空见惯的嫉妒，但这也是对可能跟随他们而来的新现代观念和习俗的恐惧造成的。“旅游”奥地利靠这些来自维也纳和现代外部世界的客人维持生计，这种情况只会使得情况更加糟糕。

218

现代的、进步的、“犹太的”红色维也纳与保守的、外省的、“乡土”奥地利之间的截然分裂之外，还有一种与之相关的、甚至更具毁灭性的分裂，这就是社会主义者、基督教社会党人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之间三条战线上的“政治”文化斗争。

社会民主党阵营不仅代表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从前奥地利自由主义力量的进步、解放、现代主义和反教权主义纲领。这使得在两次大战之间和维也纳政治生活中，奥地利犹太人几乎把所有选票都投向了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人或许偶尔利用一下反犹言论，而且他们也可能反感犹太宗教，但他们承认犹太人是平等的个人。对维也纳的犹太人来说，这一点已经足够了，虽然他们大多是“资产阶级”身份，其物质利益受到社会主义政策的威胁。

但是，犹太人没有更合理的选择。其他两个阵营都是公开并且相当强烈地反犹的——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在政策上。基督教社会党代表保守的“资产者”，即奥地利社会中的资本部分，结果一部分更关心社会秩序和财产之安全而非完全的社会平等的犹太人也支持这个政党。然而，塞培尔的这个党派的行动是从一种十分保守的、深受教会影响的社会立场出发的。该党对资本主义的态度、至少是相关的言论，深深地打上了宗教关怀和对“小人物”的关切的烙印。它捍卫的是有产者的利益，但它又经常在说教中抨击“犹太人的”市场力量。它的经济和社会理想是社团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德意志）“民族主义”阵营包括原德意志自由派的残余人员，就

其支持“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反教权主义而言，它仍保留着过去进步主义纲领中的一些因素。然而，在两次大战之间，德意志民族主义是支配性的因素，“民族主义”阵营带有强烈的反犹色彩，而且通常是以种族标准来反犹。虽然“民族主义”阵营是三派政治势力中最薄弱、也最分散的一派，但它在奥地利非犹太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非常大。它那排外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使得其支持者极易接受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

两个资产阶级政治阵营，即基督教社会党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219 1920年后都坚决反对红色维也纳这个城市。因此，两次大战之间的政治斗争反映了“犹太的”现代维也纳和“反动”的阿尔卑斯外省之间的二元文化分裂。一方是“进步”的支持者，包括社会民主党人、聚集于维也纳的“世界主义”（主要是犹太人的）自由资产阶级，以及少数来自德意志民族主义阵营的进步主义斗士；另一方的支持者是对奥地利社会持保守观念的传统主义者。后一方的核心是基督教社会党，但大部分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也属于这一方。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可能原则上是反教权主义的，但是眼见德意志民族“文化”受到以“犹太”现代主义和“犹太—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威胁，他们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大部分时期内站在了教权主义者基督教社会党人一边。

右翼思想家试图将奥地利右派的两个方面更为紧密地结合到一起。理查德·冯·克拉里克（Richard von Kralik）提出了所谓德意志形态的天主教；奥特马尔·施潘（Othmar Spann）则鼓吹新中世纪社团主义的准法西斯论调。萨尔茨堡艺术节的组织者希望这个艺术节成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试图以此将反革命的天主教社会思想（正如在叶德曼［Jedermann］和萨尔茨堡环球大剧院［Salzburger grosse Welttheater］中表现的那样①），与自身带有世界主义色彩的巴洛克式的、天主教的、南德—奥地利版本的德意志有机论民族主义结合到一

① 叶德曼和萨尔茨堡环球大剧院是霍夫曼施塔尔的作品的名称。——译者注

起。这种思想模糊了天主教传统主义和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界限，以便为奥地利反马克思主义右派的新联合提供方便。反犹主义则弥合了所有剩余的缝隙。

虽然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联盟，但全面整合保守主义势力的努力从来没有取得过完全的成功，因为教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世界观不是轻易能嫁接起来的。因此政治文化中存在三重分裂——根源于奥地利“资产阶级”政治内部的分裂，到20世纪30年代，这种分裂给一切旨在延续共和国的策略带来了致命的麻烦。

1927年火烧司法部及随之而来的屠杀事件之后，政治局势已经很凝重，保卫共和联队与卫乡团武装之间的冲突更加频繁。几周之后的世界经济衰退对奥地利脆弱的经济和财政体系造成的打击特别严重，好几家银行倒闭。1929年10月，政府强行要求信贷局（Credit – Anstalt）接管土地信用银行，此举带来了暂时的稳定局面，但经济持续恶化，1930年失业率上升到15%。

220

在经济危机持续发展的同时，宪法政府也受到了卫乡团的威胁，后者已成为追随法西斯路线的潜在的独立政治势力。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奥地利“资产阶级”政府的日程上，关键事项是实现经济复苏、牵制社会民主党，但“驯服”卫乡团、特别是其领导人物恩斯特·吕迪格尔·施塔亨堡（Ernst Rüdiger Starhemberg）同样是个重要任务。

1930年，约翰内斯·朔贝尔政府为重新控制局面试图加强与法西斯意大利和民主制德国的联系，并在1930年4月同德国签订了一个贸易条约。与此同时，基督教社会党人在面对卫乡团的威胁时，首先是在9月试图将施塔亨堡拉入政府；此举失败后，该党在12月建立了自己的准军事组织。1930年11月，反对派社会民主党在全国选举中获得41%的选票，再次成为议会中最大的党。显然，对于资产阶级秩序派势力来说，要稳定局面还有更多的事要做。

1931年3月，已改任外交部长的朔贝尔秘密同德国进行德奥关税

同盟谈判，再次试图借此来改善政府的处境。关税同盟可能带来经济效益，也可能成为德奥合并的一个步骤，而朔贝尔及其德意志民族主义支持者和很多其他奥地利人都渴望德奥合并。但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法国政府否决了这种变相的联合，并为此施加财政压力。此举导致的一个间接后果是 1931 年 5 月信贷局出现挤兑狂潮，这家银行实际上陷入破产，奥地利的财政秩序接近崩溃，德国的财政也受到重大影响，因为德国的重要银行在奥地利大银行中有大量投资。信贷局只好由奥地利政府接管，后者这时已得到外国的紧急贷款；然而，最初的 221 崩溃摧毁了人们对奥地利经济残留的信心，并对德国的经济复苏造成悲剧性的破坏。于是，德奥合并问题再次困扰着凡尔赛条约后的欧洲。

信贷局灾难造成了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危机。私人武装之间的战斗仍在继续。9 月，卫乡团首领瓦尔特·普菲里默（Walter Pfrimer）试图发动政变。失业率一路飙升：1931 年超过 20%，直到 1934 年才稳定在略低于 40% 的水平上，很多失业者已没有了保险金。作为基督教社会党的实际领袖，塞培尔对组建另一个全体党派紧急联合政府的努力半心半意，而社会民主党则拒绝加入，而且仍然期待在民主选举中取得多数。因此，1931 年 6 月的布列什（Buresch）政府全部由“资产阶级”政党组成，包括卫乡团的乡土集团（Heimatblock），这些党派联合起来反对“社会主义的威胁”，并与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法西斯政权遥相呼应。

危机仍在加剧。1932 年 1 月，德意志民族主义者退出政府，不过他们的势力在缩水。1932 年 4 月，民族社会主义者开始在省级选举中得势，而主要的失势者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5 月，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Engelbert Dollfuss）组成由基督教社会党领导的政府，政府的靠山是乡土集团和来自农村的乡村联盟（Landbund）。急于取得进一步财政资助的陶尔斐斯终于在 1932 年 7 月的《洛桑条约》（Lausanne）中得到了一大笔国联贷款，代价是放弃任何与德国联合的念头，哪怕是关税联盟。此举虽然获得了财政和政治上的帮助，但它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的分裂，社会民主党、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和民族社会主义者同

声抗议对西方列强的“投降”行径。

条约虽然在议会勉强通过，但它没有给政府带来经济复苏和政治力量。社会民主党期待着下一次选举，民族社会主义者在加强宣传攻势和公开的暴力行为；而基督教社会党则对未来的选举忧心忡忡。纳粹（民族社会主义者）、保卫共和联队、卫乡团和基督教社会党的准军事团体纷纷上街采取院外政治行动，投弹、开枪和一般的殴斗暴行此起彼伏。

222 民族社会主义者还没有在奥地利取得选举上的胜利，部分原因在于卫乡团的竞争，不过德国纳粹以粗暴方式取得的成功给奥地利政治投上了阴影。奥地利的经济惨状加深了人们对这个国家生存之可能性的怀疑，这反过来又加速了资本的外逃。于是，德奥合并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具吸引力了，因此，希特勒的崛起对基督教社会党在奥地利的统治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

陶尔斐斯断定，必须对基督教社会党的政策作根本性变通。塞培尔还是附和议会政治的，虽然他对此持怀疑态度；在塞培尔于 1932 年 8 月死去后，陶尔斐斯开始摆脱议会的羁绊。表面上看，他这样做是为了应付纳粹的威胁，何况这种威胁的确存在。1933 年 1 月 30 日，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3 月 5 日，纳粹及其盟友在德国议会选举中取得多数。3 月 4 日，当奥地利议会的 3 位议长纷纷辞职时，陶尔斐斯利用这个宪法体制上的偶然事故宣布议会停开。因此，基督教社会党对纳粹在德国攫取权力的回应远不是捍卫共和国的原则，而是抛弃议会政治，建立它自己的威权性质的、准法西斯主义政府：“奥地利—法西斯”。

陶尔斐斯把基督教社会党的整个保守纲领强加给这个国家。奥地利将按以教权为支持的社团主义国家的模式进行改造。5 月 20 日成立的“祖国阵线”（Vaterlandsfront）是个所谓的超党派组织，各色人等均被敦促加入该组织，只要他“效忠于”政府。当民族社会主义者在 4 月份因斯布鲁克的市政选举中获得 40% 的选票后，所有地方选举都被推迟。针对陶尔斐斯的反纳粹举措，希特勒的回应是在 5 月底对所

有赴奥地利的德国人征收 1 000 马克的旅游税。

但陶尔斐斯没有向这一恫吓举动让步。被人亲切地称为“小梅特涅”的陶尔斐斯具有性情急躁的领导人所常见的好斗性格，他在对抗希特勒时博得了很多奥地利人的尊重，包括卡尔·克劳斯。然而，对奥地利来说，一件不幸的事是，陶尔斐斯的勇敢没有政治智慧或远见来与之匹配。他仍局限在基督教社会党的狭隘意识形态中。尽管此时希特勒和纳粹显然正在成为奥地利独立的最大威胁，但他的回应是把社会民主党的“威胁”当作斗争对象。

223

在针对议会的 3 月政变后几天，陶尔斐斯政府决心强化“反马克思主义”路线，并宣布保卫共和联队为非法组织。这部分是为了取悦墨索里尼（Mussolini）——所谓的陶尔斐斯反德国威胁的“保护者”；但是，陶尔斐斯反社会主义十字军行动的主要原因是他自己的信念：必须为奥地利根除这个祸害。

仍然坚持民主制的社会主义者和明显反民主的基督教社会党政府之间奇特的僵局持续了几乎一年，在这期间，奥地利已按照保守的天主教面貌进行了再造。1933 年 6 月与教皇签订的教务专约大大增强了教会对国内事务的影响力。9 月，陶尔斐斯宣布建立新的等级国家（Ständestaat），并将四丁字十字架（Kruckenkreuz）当作新政权的象征物，这是奥地利教权—法西斯主义对纳粹万字徽章的回应。在同一月份，沃勒斯多夫建立了一个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早在 1934 年 2 月之前的 1933 年底，奥地利就已经成为一个威权制的社团主义国家，它既不容忍民族社会主义者，也不能容忍反对派社会民主党。

与社会民主党最后的摊牌发生在 1934 年 2 月 12 日，当天，政府武装和卫乡团——如今它是威权政府的狂热支持者——在林茨挑起了一场社会主义者暴动，而维也纳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则号召总罢工。政府和卫乡团正等着这个彻底排除“奥地利—布尔什维克”威胁的机会，在随后的几天中，它们无情地做到了这一点。红色维也纳住房政策的象征性成就——卡尔—马克思大楼受到遭到猛烈炮击。几年前，大楼的墙壁上还能看见子母弹留下的痕迹。2 月 15 日，战斗结束，社

会主义领导人逃往捷克斯洛伐克；2 月 16 日，社会民主党被废除，其基金被没收。政府军的阵亡超过 100 人，但当时社会主义者的损失更为惨重，仅在维也纳就有 1 000 多保卫共和联队成员被杀。奥地利的内战几天就结束了，外省与都市奥地利之间的文化战争也随之终结。224 乡土奥地利征服了红色维也纳。奥地利共和国将被改造成某种新的等级制国家。

陶尔斐斯的等级制国家是这样一种尝试，即让 1918 年后的奥地利回归某种中间道路，这条道路介于两次大战之间的外省保守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哈布斯堡正统性之间。根据 1934 年 5 月 1 日的宪法，奥地利国家的中央权力由某种社团等级制构成。这种制度摈弃麻烦不断的“民众制”（demos），是由各个以职能为基础的政务会选举中央议会。总统则由奥地利的市长们选举产生。国家之根本明白无误地被规定为“基督教的和社团的”，而教会重新取得的优势地位也得以确认。国家新的象征性徽章再次选为哈布斯堡的双头鹰，不过配上了巴奔堡的红黑红三色盾牌。与这种象征主义并行的是对哈布斯堡家族更为积极的态度，1935 年以后，哈布斯堡的权利和财产大部分得以恢复。这是一个应当如此的奥地利——当然这只是外省的看法。

按官方的说法，国家对那些跟它合不来的事物相当宽厚：五月宪法许诺了宗教平等，犹太教习俗不受触动，一些犹太人被允许加入祖国阵线。对犹太人来说，奥地利等级制国家毫无疑问要好于纳粹德国。然而，官方的容忍掩盖了程度相当严重的非官方反犹主义。犹太人在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中占有突出比例，这个事实可以解释为什么 1934 年 2 月后很多犹太人失去了工作或没有得到晋升。不过它不能解释下面这种情况：亲社会主义的犹太博士被拒绝晋升的比例远高于亲社会主义的非犹太博士。犹太人仍是不受欢迎的（unerwünscht），这个新旧交融的国家说到底只是“扎根的”奥地利人的故土。新的政治文化是一种排外的文化，弗洛伊德称之为“严整的多数派”反对外来人：社会主义者和犹太人。

等级制国家也在防范另一种敌对政治文化：民族社会主义。当陶

尔斐斯和卫乡团正在消灭奥地利的左派势力时，纳粹暴徒也犯下了众多令奥地利动荡不安的恐怖暴行。奥地利—法西斯政府采取措施来反击纳粹表面上的威胁，但是它的反纳粹战略因为一种深刻的矛盾而受到悲剧性的损害。对于是否应该坚决反对纳粹主义，或者在与第三帝国达成某种临时妥协时，是否应该同希特勒竞争、以争取奥地利—法西斯分子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忠诚，陶尔斐斯从来都不是很肯定，库尔特·许士尼格（Kurt Schuschnigg）更是如此。

问题在于，这两种“资产阶级”文化如今都是反民主的，它们彼此之间的区分，已经不像它们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或“犹太”现代文化的区分那样清晰了。卫乡团的法西斯文化与冲锋队（SA）的文化相当接近，只是双方最终的忠诚对象不同；而且，这种差异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大。即使是奥地利—法西斯主义者，包括许士尼格在内，也都认为奥地利是个“德意志”国家，不过这是个较好的德意志国家。1933年的旅游税使萨尔茨堡艺术节失去了其主要的德国观众，不过它也因此更具国际色彩，但即便是这样，它仍然是一种更好的、更具世界主义色彩的“德意志”文化的象征。学校教科书仍以橡树为德意志的、因而也是奥地利的民族之树。奥地利—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的争论仍属于德意志家庭“内部”的争吵。 225

纳粹是奥地利的致命威胁——这本来只是一种潜在的认识，但是，奥地利纳粹分子实际的政变行动以及7月25日在球场广场办公室成功刺杀陶尔斐斯的行径，使得这种认为成为铁定的事实了。陶尔斐斯的死引起国际社会的震怒，这为他的继任者许士尼格在维护奥地利独立的斗争中赢得了喘息的空间。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也答应支持他，这个因素某种程度上遏制了希特勒的干涉。但是，奥地利与纳粹的关系在不断恶化。

由于奥地利国民存在矛盾心理，希特勒德国非凡的经济成功对普通奥地利人的思想和忠诚产生了巨大冲击。从心理、甚至从精神上说，与许士尼格土气简朴的等级制国家比起来，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实在更让人心动，它的“崛起”实在太耀眼了。奥地利政府也许可以吹嘘先

令的坚挺，但是，由此造成的严厉的财政税收政策却不能为经济增长和新的工作岗位创造多少机会。奥地利的失业率仍接近20%，但德国的失业率却已急剧下降。

奥地利的国际处境也在恶化。1935年4月，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斯特莱萨阵线”（Stresa Front）把确保奥地利的独立作为它们反对希特勒修约运动的一部分。但是，两个民主国家，即英国和法国，226 都不愿意为保卫奥地利－法西斯等级制国家承担多少责任。因此，作为意识形态上更加同情奥地利的邻国，法西斯意大利就成为奥地利反对德国意图的主要依靠。

1934年3月的《罗马议定书》签订后，奥地利实际上成了意大利的保护国。当意大利于1935年10月入侵阿比西尼亚（Abyssinia，即埃塞俄比精致—译者注）时，奥地利拒绝谴责自己的盟友。但是，这种屈从在国际政治中没有换来多少利益：意大利受到西方大国的粗暴对待，于是它开始同德国接近。斯特莱萨阵线的瓦解使得希特勒可以放手施展他清算凡尔赛和约的行动，墨索里尼则于1936年10月25日同德国结盟，这个盟约将成为罗马—柏林轴心的基础。奥地利夹在中间真是无计可施。当意大利、奥地利和匈牙利在1936年3月签署罗马协定补充条款以增强它们的同盟关系时，墨索里尼也向许士尼格施加压力，要后者同纳粹德国达成谅解。许士尼格除了屈从之外已经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了。

从字面上看，1936年7月11日的协定是个相当合理的妥协，德国在协定中承认奥地利的主权，承认奥地利的内政是奥地利自己的事务，1000马克的旅游税也撤销了。但是，德国政府从来不想遵守这一暗含的不干涉承诺，而奥地利的让步则意味着其独立开始丧失。奥地利许诺作为一个德意志国家采取行动，同时停止反纳粹宣传，大赦近1万7千名纳粹政治犯。许士尼格还答应两名“民族主义”阵营的代表进入内阁，表面理由是为了维护“德意志的”利益，这两个人是埃德蒙·戈莱泽—霍尔斯特瑙（Edmund Glaise-Horstenau）和圭多·施密特（Guido Schmidt）。激进的奥地利纳粹“非法”分子大概不喜欢这

个妥协，但希特勒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现在德国在奥地利政府中有了两个走卒，为“保护”“民族”利益而进行干涉的机会将有的是。

七月协定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卫乡团的影响力在下降，而“德意志道路”的势力随之上升，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和纳粹温和派进入了奥地利 - 法西斯集团内部。在等级制国家的早期岁月中，卫乡团用处很大，但它的各个组织桀骜不驯，其领导人行动乖僻，施塔亨堡和费伊（Fey）尤其如此，因此这时它更像是个麻烦而不再有利用价值。

227

施塔亨堡是副总理，负责国家安全事务，并担任祖国阵线的领导人，但从意识形态上说，他是这个体制中不合拍的人。许士尼格是个威权主义者，而不是法西斯主义者。作为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徒，他内心是个正统派和君主主义者。施塔亨堡则认为政治上的天主教信仰是个敌人，他希望奥地利变成一个真正的法西斯国家。随着意大利转向德国，施塔亨堡在奥地利的地位受到严重削弱。1936 年 5 月，他在祝贺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亚时说了“法西斯思想万岁”，于是他被许士尼格解职了。表面上看，此举是对法国和英国抗议的一个回应，但实际上是清除一个思想对手，许士尼格至少开始打算控制“爱国”私人武装了。

向“德意志道路”的转向加速了对卫乡团的控制行动。两位“民族主义”内阁成员取代了卫乡团的阁僚。10 月，所有民间武装，包括卫乡团，全部被解散。11 月内阁改组时，许士尼格排挤掉残余的卫乡团势力，强化了“民族主义”的影响，戈莱泽—霍尔斯特瑙担任内政部长，施密特成为实际上的外交部长。

到 1936 年底，许士尼格已经从与意大利和奥地利—法西斯分子结盟转向安抚德国。实际上他的选择余地也实在太小了。奥地利对法国或英国的指望少得可怜，因为阿比西尼亚问题，因为英法对等级制国家的厌恶——还因为英国对希特勒的绥靖。而意大利在 10 月的轴心协定签订后已不再关心维护奥地利的独立了。8 月，墨索里尼向奥地利人转告了德国人的想法，说奥地利“只有 20 个月的时间”，这个警告绝不是好兆头。实际上，意大利默许奥地利被接管的政策早在 1937 年 4 月就已确定下来了，当时德国许诺把南蒂罗尔留给意大利。

鉴于已经失去任何可靠的外部支持，许士尼格只得同“民族主义”和纳粹集团合作，以竭力应付德国日益增长的压力。1937 年 2 月成立了一个 7 人委员会，其中包括纳粹“非法分子”的中坚力量。6 月还建立了一个“人民政治部”（Volkspolitisches Referat），以保卫“民族”利益。号称“民族主义”温和派的阿图尔·赛斯—因夸特（Arthur Seyss-Inquart）成为国务委员会的成员。但到底是谁选择了谁都搞不清楚。当许士尼格试图以融入等级制国家来引诱“民族主义”阵营时，后者仍然坚守自己的德意志忠诚，而德国政府正在准备全盘“吸收”奥地利。4 月，戈莱泽—霍尔斯特瑙在柏林的“非正式谈话”中接受了相关指示。6 月，许士尼格投靠“民族主义”阵营，德国总参谋部则拟定了“奥托特别方案”，这是德奥合并的第一个计划。

228

在经济和财政方面，1937 年底奥地利的状况已有了明显改善，失业人口下降到 23.3 万。一些公共工程效果明显，如格罗斯克罗纳—上阿尔卑斯公路（Grossglockner-Hohenalpenstrasse）、维也纳的帝国大桥（Reichsbrücke）和维也纳高速公路（Wiener Höhenstrasse）等；外汇储备达到空前的记录。然而，经济进步并不能化解 1927 年以来政治上一连串的灾难性事件——或抉择——给许士尼格政权造成的绝望处境。

1934 年左派被镇压后，那些遭受打击排挤的人士要么支持更为极端的左派势力，包括共产主义者，要么转而支持奥地利“另一个”残存的非正统势力中心：“民族主义”阵营和纳粹。1937 年相对的经济成功并没有缓和对威权主义天主教右派把持权力的普遍憎恶，很可能大部分奥地利人都有这种反感情绪。大量的黄金储备只会使得奥地利变成第三帝国一个更加诱人的目标。

到 1938 年初，在国际上被抛弃、国内分裂动荡的奥地利等级制国家已经任凭纳粹德国摆布了。墨索里尼已经在 1937 年 9 月答应希特勒可以自由处置奥地利。11 月初，希特勒向他的将军们托出了入侵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德国驻维也纳的大使弗兰茨·冯·巴本（Franz von Papen）正在协助策划一个纳粹接管的阴谋。这个“塔弗斯

计划”（Tavs Plan）的细节在 1938 年 1 月底被披露，但直到那时纳粹仍然没有退却的想法，就像 1934 年一样。相反，希特勒开始采取驱逐异己的策略：2 月 5 日，希特勒和巴本邀请许士尼格前往萨尔茨堡边境另一侧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山上的鹰巢（Eagle's Nest），以进行“澄清气氛”的会谈。许士尼格接受了邀请，并在圭多·施密特的陪同下于 2 月 12 抵达该地。

在上午一对一的会谈中，希特勒对许士尼格大肆恐吓；下午更为公开的会议上提出了一个不容商讨的最后通牒，这份文件实际上把奥地利变成一个德国的准纳粹卫星国。赛斯—因夸特将担任内政部长奥地利的所有纳粹囚犯都应释放，民族社会主义在奥地利合法化，所有纳粹分子都应重新获得国家工作职务。希特勒唯一的让步是答应给许士尼格 3 天的宽限，以便奥地利总统威廉·米克拉斯（Wilhelm Miklas）认可这些变化。 229

惊恐万状的许士尼格在离开贝希特斯加登时已是身心交瘁。2 月 14 日，他劝说米克拉斯答应了希特勒提出的这些安排，2 月 16 日，安排就绪了：施密特正式担任外交部长，赛斯—因夸特成为内政和安全部长，戈莱泽—霍尔斯特瑙仍然留在内阁中。同时还宣布对政治犯实行大赦，奥地利的纳粹分子现在可以不受干扰地恣意横行。

奥地利独立的支持者们试图联合起来。2 月 17 日，前皇帝查理的儿子奥托·哈布斯堡（Otto Habsburg）要求接管政府（许士尼格于 3 月 2 日拒绝了这一要求）。2 月 24 日，许士尼格在回答希特勒 2 月 20 日德奥合并的要求时宣布，他绝不会放弃奥地利的独立，宣言最后说：“红白红三色旗直到我死时都不会改变。”这个宣言在各省引起了更大的纳粹骚乱，但光有宣言是靠不住的。最后的时刻政府曾试图向社会主义运动的剩余力量求助，后者的确也愿意协助对抗希特勒。然而，1934 年的记忆还是留下了浓重的阴影，流亡中的奥托·鲍威尔宣称，左派愿意协同抵制希特勒，但不是为了许士尼格而进行抵制。组建统一的社会主义—保守主义的反纳粹阵线的努力是不可行的。

3 月 6 日，为了应对纳粹狂潮，许士尼格决定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

公决，并于3月9日宣布公决将在3月13日举行。但公决根本没有到来。3月10日，很多外省中心城镇发生了大规模的纳粹示威，虽然当时也有反纳粹的示威，但大多数场合下纳粹占据了上风。德奥边境于3月10日关闭，3月11日，希特勒下令执行入侵奥地利的奥托行动。

230 3月11日上午，赛斯—英夸特和戈莱泽—霍尔斯特瑙向许士尼格递交了一份希特勒的最后通牒，要求他放弃全民公决，或者辞职。下午4点，许士尼格在放弃全民公决的同时辞职。米克拉斯一开始拒绝任命赛斯—因夸特为总理，但奥地利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晚上7点50分，许士尼格在广播讲话中宣布了他的辞呈，并敦促人们对即将到来的德国入侵不要进行抵抗，以免"德意志的鲜血"（既有德国的也有奥地利的）白流。两次大战之间奥地利对其德意志民族特性之认同的矛盾心态，直到最后一刻还表现在自己的话语中。许士尼格讲话的最后一句是"一个德语词汇和一个诚挚的心愿：愿神保佑奥地利"！

鉴于米克拉斯仍在抵制，戈林（Göring）下令入侵奥地利，赛斯—英夸特接管了政权。11日下午2点，广播宣布米克拉斯已任命赛斯—英夸特为总理。午夜时分，米克拉斯答应成立一个由纳粹主导的内阁。甚至还在德国士兵越过边境之前，奥地利就已经在纳粹手中了。

当德军于12日早上5点30分开始进攻时，实际上没有遇到抵抗，进攻变成了一次胜利阅兵游行。在这次组织得很匆忙的入侵行动中，德军碰到唯一难题是后勤补给困难，车辆的油箱很快就消耗一空；但殷勤的奥地利人很快就为德国人灌满了油箱，并把这视为爱国行动。3月12日傍晚，希特勒已经站在了林茨市政厅的阳台上向仰慕他的人群发表演说了。次日，因箪食壶浆之热情而倍感鼓舞的希特勒起草了一项德奥完全合并的法案，并将它送往维也纳批准。拒绝在法案上签字的米克拉斯选择了辞职，内阁使法案变成了法律。奥地利在"法律上"已经不复存在。

3月11日到13日的事件中抛洒的"德意志的鲜血"少得令人惊讶。纳粹分子很快逮捕了很多政治反对派，这些反对派当中有些人"自杀身亡"。不过总体来看，肉体上的暴力行为很少——除了针对奥

地利的犹太人。德奥合并在维也纳和其他地方伴随着残酷迫害的可怕行径，这些场面已经在犹太和奥地利的历史画卷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记。纳粹暴徒强迫犹太人擦洗人行道，四周则围满了兴高采烈的看客。犹太人的企业和房屋遭到抢劫，犹太人被毒打。在情绪亢奋的犹太追捕（Judenhatz）和合并大迫害中，一些犹太人被谋害了。

231

当1938年3月的奥地利人在大街上欢欣鼓舞地庆祝合并时，犹太人发现自己的世界崩塌了。在1927年，“他是犹太人吗?”这个问题曾是犹太人不能被完全视作真正的奥地利人的恼人信号。而在3月13日以后，这是个关乎生死的问题。

三、希特勒时代，1938—1945年

奥地利就这样在1938年3月13日灭亡了。5月，希特勒下令重归原名的“东部马克”（Ostmark）分成7个高（Gaue，纳粹的省），并完全并入德意志帝国。1942年，东部马克变成“多瑙和阿尔卑斯高”（Donau – und Alpengaue），以彻底根除任何特别身份认同的残留。在纳粹统治下，“奥地利”历史就这样正式被终止了，这也反映在1945年之后的奥地利历史学中，直到最近，奥地利的史学仍在回避1938—1945年这个时期，认为这实际上不是“奥地利”历史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阵痛过后出版的奥地利历史较为全面地叙述了这段历史，但是，关于如何看待作为“奥地利”历史一部分的“希特勒时期”，至今仍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沉默，虽然这种沉默可以理解。

奥地利历史与东部马克历史之间的连续性，远比1945年之后的奥地利人愿意承认的更多。从很多方面看，1938年3月后的生活基本上一如既往，很多奥地利国家机构只是被新统治者加以改造，以适应他们自己的目的。在贝尔维德的奥地利美术馆，馆长弗兰茨·马丁·哈勃蒂茨尔（Franz Martin Habertitzl）被他的副手、纳粹分子布鲁诺·格林希茨（Bruno Grimschitz）取代（另一个副手、犹太人海因里希·施瓦茨［Heinrich Schwarz］流亡），但是，美术馆的管理机构基本上原封未动，而且仍然使用同样的便笺，其抬头仍为“奥地利美术馆”，大战时期还

是如此。“奥地利”仍以许多非正式的、文化和结构的方式延续着。

即使奥地利消失在纳粹的版图中，但它的领土仍然存在，它的居民，从前和未来的奥地利人，大部分也仍然生活在那里。但是，在纳粹的统治下，奥地利当初和将来的经济和社会所经历的变迁堪称“奥地利”历史上最重大的转变之一。

232

当德国军队入侵、希特勒下令德奥合并时，大部分奥地利人是深表欢迎的。3 月 15 日，当希特勒在维也纳英雄广场（Heldenplatz）发表演讲、宣布“我的故土归入德意志帝国”时，出现了大众集体献媚的场景。这样的场景并不必然意味着全体奥地利人都支持德奥合并——维也纳也曾向拿破仑的军队致敬，但是这种场景究竟是何意味，看来不是很清楚。是令人焦虑的政治危机结束后的解脱感吗？是从等级制国家的天主教威权制下解放出来的欢欣吗？是接受德意志奥地利“回归”——即使是不可抗拒的回归——德意志祖国这一历史必然吗？



插图 37　希特勒在莱昂菲尔登（巴德—莱昂菲尔登同乡会）

所有这些因素，以及更多的因素，都对认可德奥合并起了作用。对于这种入侵加政变的行为，纳粹巧妙地营造出一种势不可挡的“既成事实”的意识，以致听天由命的奥地利人以为自己是向不可抗拒的必然性让步。奥地利天主教主教们对纳粹占领的认可，恰好印证了奥地利屈从于现存权威的悠久传统。但这一点上同样没有多少选择：等级制国家的糟糕表演已经疏离了广大奥地利民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工人可能觉得教权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之间没有太大区别。

233

当然，人们也可以赞同长期追求的德奥合并而不必赞同纳粹主义。泛德意志主义传统仍然十分强烈，它不仅存在于奥地利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中，而且存在于进步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当中，后两类人觉得在傲慢的希特勒和受欢迎的德奥合并之间无所适从。雷纳赞成德奥合并，甚至像海因里希·贡佩茨（Heinrich Gomperz）这样的自由派犹太流亡人士也对奥地利与德国的“重新统一”感到满意。

人们对德奥合并的反应是复杂的，但很可能大部分奥地利人支持合并。4月10日的全民公决中，支持“重新统一”的选票破天荒地高达97.5%，这个比例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当时对选民施加的压力，但是，鉴于天主教会和剩余的社会主义领导人全都敦促投“赞成”票，这次公决很可能相当准确地反映了人们对纳粹接管的“认可”程度。考虑到20世纪30年代——即纳粹获得大量（隐蔽形式的）支持的时期——奥地利民众的情感，很多奥地利人，也许是多数奥地利人，1938年时都在热切地希望合并，而其余的人当中，大多数也满足于顺应这种必然趋势了。

德奥合并中当然也有失败者。政治反对派被聚集到了一起：很多人被集体送往达豪（Dachau）集中营，而且很多人死在了那里。一些言语更为直率的反对派，如埃米尔·费伊（Emil Fey），则被迫自杀。在3月13日后逮捕的大约2万人中，约有3/4的人在几周内先后被释放，对大多数奥地利人来说，1938年3月之后的变化并不大，而且肯定不是向坏的方向转变。纳粹领导者很快就在这个国家展开了大规模的经济投资计划：早在5月13日，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

炼钢厂就在林茨破土动工。

234 1938年3月的主要失败者是奥地利的犹太人。在“野蛮的雅利安化”过程中，纳粹暴徒及其见风使舵的尾随者将“法律”弃之不顾，强行没收犹太人的房屋和资产，这类行径3月12日就开始了，当时德奥合并尚未完成。几周之后，纳粹当局开始施加压力以稳定局面，于是“野蛮的雅利安化”变成了系统的、有组织的、国家认可的抢劫行动。3月12日以后被纳粹“特派员”（commissars）接管的犹太企业，很多在事实发生之后获得了法律认可；其余的犹太企业被当作中产阶级的福利转交给纳粹成员，或者变成由纳粹经营的、雇佣非犹太员工的合作社。

数千犹太人失去工作，被迫以低得可笑的价格“出卖”财产，或者因为各种捏造的控告而被剥夺产业。犹太儿童被驱逐出“雅利安”学校，犹太人进入高等学术机构受到严格限制。很显然，犹太人在维也纳不再受欢迎，很多人做出了艰难但可救命的决定，即离开他们的奥地利故土。8月后，在林茨长大的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当上了维也纳犹太移民总处的头目，他在那里完善了一种敲诈程序，希望流亡的人在被准许离开前将被迫交出大多数现金和财产。这样，纳粹在清除大量犹太人的同时获取了大笔钱财：到1939年11月，逃离“东部马克”的奥地利犹太人超过12．5万。

在离开的人当中，有些是奥地利最伟大的艺术家和思想家，包括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还有很多正在冉冉升起的杰出人物，他们将使中欧（维也纳）知识分子成为“西方”文化的一个坚实的组成部分。但并不是所有离开的人都在接纳他们的西方国家获得了成功。英国、美国和英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对难民入境的限制仍很严格，因此维也纳犹太人只得不顾一切地寻求任何可以向他们提供签证、或让他们离境的国家。有一批人最后在印度洋的毛里求斯（Mauritius）岛上落足。另有相当多的一批人在上海找到了避难所，虽然当时那里被日本占领。很多逃离维也纳的人进入了其他大陆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荷兰和

235 法国，因此在大战期间他们再度落入纳粹的罗网。即使对那些有幸找

到平安避难所的人来说，流亡的创伤有时也太深重了。1938 年 3 月后，维也纳犹太人的自杀率高得惊人，但犹太难民的自杀率也很高；更为常见的绝望感和艰难竭蹶同样能让他们走上绝路。大约有 1/3 的犹太难民没能熬过大战。

对那些仍留在维也纳的犹太人来说，境遇变得越发险恶了。在第三帝国的“最后解决”（Final Solution）中，很多政策看来受到了维也纳民众的压力和当地纳粹分子的相应举措的启发，这是奥地利人的污点。1938 年 11 月 9 日的“水晶之夜”（Reichskristallnacht）对第三帝国全境的犹太人来说都是一场大灾难，但维也纳的情形尤其恐怖，当地广播电台的评论员在讲述焚烧列奥波德城（Leopoldstadt）的犹太教堂时，就好像这是一个欢快的纳粹版本的“盖伊·福克斯之夜”（Guy Fawkes Night①）。当天夜里，42 所犹太教堂和祈祷室被摧毁，至少 27 名犹太人被谋杀，88 人重伤。虽然表面上是意识形态矛盾，但还是有犹太妇女被强奸。

留在维也纳的犹太人变成了实验品，当地纳粹头目是提出迁移然后屠杀欧洲犹太人之计划的急先锋。为了解决维也纳长期存在的住房短缺问题，犹太人被赶出寓所，强行迁居到准贫民区，这样的区域主要坐落在列奥波德城。早在 1939 年 7 月，当地纳粹分子指出，民众憎恶生活在犹太人旁边，于是有人提出了把犹太人迁移到维也纳附近的集中营的计划。直到德军占领波兰，有可能把犹太人迁往那里时，维也纳的计划才终止，但维也纳的创举可能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动迁”政策的出笼，对他们最后的灭绝起了促进作用。

1939 年 10 月，仍然有 6.6 万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和 3.9 万“种族犹太人”生活在维也纳。当大战于 1939 年 9 月开始，外国援助被切断时，他们得到的非人待遇和边缘化的悲惨处境日甚一日。然而，纳粹对维也纳犹太人的意图远不仅仅是令其处境悲惨。早在 1940 年 6 月，

① 1605 年，盖伊·福克斯等几个天主教密谋者曾计划炸毁英国议会，但密谋在 11 月 5 日败露。盖伊·福克斯之夜就是为纪念这一事件举行的篝火和焰火庆典活动。——译者注

希特勒通知维也纳当局，维也纳残留的犹太人都应遣送到波兰；当遣送行动于1941年初开始时，当局命令犹太社区管理部门提供被遣送者名单，并指令“狱卒”交出名单上应被遣送的人。当犹太社区于1942年11月被解散后，其职能被长老会取代，后者负责决定谁应当被遣送。于是，纳粹是让维也纳犹太人自行决定他们当中谁应当生谁应当死。

236

由于纳粹要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再加上对遣送犹太人前往波兰的政策一度有过犹疑，因此遣送工作在1941年春暂停了。但是，到1942年初，由于头年夏天在俄国战线上的巨大成功，再加上1942年1月的万希会议（Wannsee Conference）做出“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一揽子方案，维也纳犹太人的遣送以惊人的效率重新开始。被遣送的犹太人现在直接被送往灭绝营，维也纳犹太人口的减少每月可高达5千：到1943年4月，这里的犹太居民已不足8千，而且1943年剩下的日子和1944年仍有犹太人被屠杀。在德奥合并之前，维也纳曾是17万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的家园，如果以“种族”为标准，犹太人则超过20万。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维也纳的犹太人只有5 700名，死亡营里幸存下来的维也纳犹太人有2 142名。在大屠杀中遇难的维也纳犹太人超过6.5万。在维也纳，大约1 500名犹太人是因为非犹太人的掩藏才得救。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曾对在党卫军（SS）和集中营中工作的奥地利人进行过研究，他估计，为第三帝国效劳的奥地利人应对近300万犹太人的死亡负责。[①]

历史学家们最近对这个估算提出了质疑。然而，在制造犹太大屠杀的死亡机器中，奥地利人所占比例之高异乎寻常。奥地利人在推动和提出反犹措施方面也扮演着十分积极的角色；维也纳的政策通常是第三帝国政策的楷模。由于奥地利国家已经不存在，国家责任的问题因而没有实际意义。然而国民的责任问题不可轻易勾销。

① 转引自Gerhard Botz, 'The Jews of Vienna from the *Anschluss* to the Holocaust', in I. Oxaal, M. Pollak and G. Botz (eds.), *Jews, Antisemitism and Culture in Vienna* (London, 1987), p. 202。

237

纳粹时期的奥地利人甚至不到第三帝国人口的 10%，但奥地利人在犹太大屠杀的指挥机构中占据了很多关键职位，而且纳粹的反犹政策明显成型于奥地利人的创举之中。“德国”和“德国人”通常被视为犹太大屠杀的唯一责任者，通常也是唯一对此有负罪感的。然而，如果考虑到数量比例关系，奥地利人对大屠杀的责任要高于德国人。“奥地利人”希特勒早在 1938 年之前就成了德国公民，然而，很多其他灭绝犹太人的凶犯直到 1938 年还是奥地利人。当时的奥地利人——以及今天的奥地利人——对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种族屠杀负有责任。

对希特勒时期的奥地利历史来说，核心的、棘手的问题是，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奥地利人和奥地利经济从纳粹的统治中获取了很大的利益，而且大部分奥地利人都积极或被动地支持纳粹体制，尤其是支持元首。总体而言，奥地利人的行动不像个被占领的民族，而且从待遇上看也不像是被占领者。

纳粹大大推动了奥地利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奥地利的个人可能从犹太人财产的“雅利安化”中大发横财，不过，德国为满足的战争需求而进行的投资所带来的经济推动力则更为重大。德国的很多军事基础设施建在奥地利的领土上，因为这里跟德国的大部分领土不同，它处在盟军轰炸机的航程之外（1943 年之前）。希特勒的家乡林茨有一些最大规模的投资项目，包括设备最优良的赫尔曼·戈林炼钢厂和一个大型的氮制品化工厂。维也纳新城是第三帝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厂的所在地。很多 1938 年前就已有规划但因缺少资金而未能实行的水电工程现在又重新开工，包括卡普伦（Kaprun）的水电工程。铁路网大部分实现了电气化，作为纳粹经济奇迹之标志的“高速公路”（Autobahn），也开始在萨尔茨堡和维也纳之间修建。在合并几个月之后，奥地利的失业问题实际上被根除了，奥地利经济的基础也大为现代化了。

经济变迁带来了重大的社会变革。纳粹投资产生的劳工需求使得很多农业劳动者和家庭仆役进入了城镇和工业中心。因此对很多人来说，纳粹时期是个从乡村奥地利的准封建世界中解放出来的时代。纳

238

粹的社会政策也远比两次大战之间墨守成规的奥地利，特别是那个等级制国家更加“现代”。

天主教会的权力被削弱：离婚的天主教徒可以再婚，但举行世俗婚礼。虽然1939年4月设立的教会捐税看起来似乎强化了教会对信徒的权威，但其本意是想创立一种财政刺激手段，以促使人们离开教会，仅宣称自己是“神的信徒”（gottesgläubig）。这些措施表明，纳粹政权追求的是奥地利自由派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反教权主义的目标。很多奥地利人觉得，纳粹当局对枢机主教伊尼策尔（Innitzer）和教阶制度表现出的敌意，是把人们从教士（pfäffisch）控制下解放出来的必要措施，在某些人看来，这种延续4个多世纪的控制已经过时了。

纳粹时代也是现代奥地利某些最珍贵的文化制度开始产生的时期。著名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的起源可追溯到1939—1940年冬天的一场音乐会（据说是在除夕夜举行）。

并不是所有现代化措施都受到奥地利民众的积极拥护（尽管有报酬不错的新工作，公共设施也得以改进，还有雅利安化带来的收益）。对教会的打击让大多数奥地利人感到愤恨，为了回应公众明显的不满情绪，这些措施有所缓和。保守的社会机构对经济和社会变革心怀不满。既然犹太人不复存在，发泄不满的对象变成了北德人（Piefkes），接着是任何帝国德意志人（Reich German）。

怨恨情绪自有其根据。德国当局总是从政治和物质利益的角度来考量德奥合并。兼并奥地利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为了获取它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在1938年3月后的德奥“一体化”中，奥地利土生土长的纳粹分子觉得自己上了当。一些奥地利“民族主义”头目因为策划合并之忠诚（或曰不忠诚）表现而在别处获美差。赛斯—英夸特在1940年当上了驻荷兰的帝国特派员；戈莱泽—霍尔斯特瑙在克罗地亚任职。1938年3月后管理奥地利的新人是帝国德意志人约瑟夫·毕克尔（Josef Bürckel）。1939年初，他取代本地人奥迪罗·戈洛伯克尼克（Odilo Globocknik）担任维也纳省长（戈洛伯克尼克则前往卢布林［Lublin］开始其大屠杀的职业生涯），1940年4月，毕克尔成为维也纳的帝国

239

总督（Reichsstatthalter），1940年8月，他又被另一个帝国德意志人巴尔杜尔·冯·希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取代。在毕克尔和希拉赫统治下，帝国德意志人占据了大多数关键职位，包括大学的学术职务。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奥地利纳粹分子大量集中于大屠杀的指挥机构中，而他们在奥地利的原有地盘则被帝国德意志人占据了。

纳粹的这种投机行为在奥地利纳粹分子以及一般奥地利人当中引起不安。纳粹政权遭遇到预期增长法则（law of rising expectations）的挑战，就是说，大量的物质利益只会造成进一步的需求，并觊觎更大的成功。1962年赫尔穆特·夸尔亭厄（Helmut Qualtinger）已在"卡尔先生"（Herr Karl）中对这种综合症作过简要描述。故事讲述的是，1938年3月，卡尔先生仅仅强迫一个犹太人擦洗人行道，而别人则因为协助迫害很多犹太人而发了大财，对此卡尔先生评论说："我仅仅掌管着一个犹太人，我也是个受害者。"（I hab nur an Juden g'führt. I war ein Opfer）①

很多新来的帝国德意志纳粹分子对奥地利人反犹情绪之激烈十分震惊，他们试图抑制当地奥地利纳粹分子的狂热。这种强调秩序高于盗匪行径的做法令奥地利纳粹分子心怀怨恨，于是他们认为仇恨带来的成果被帝国德意志公职人员抢去了。因此奥地利纳粹分子对新体制特别感到沮丧。

当地民众的不满是巴尔杜尔·冯·希拉赫取代毕克尔的一个原因。希拉赫把维也纳视为自己在第三帝国内部结构中的权力基地，因此他试图以复兴"维也纳"传统、鼓励约瑟夫·魏因赫伯（Josef Weinheber）等地方作家等方式来拉拢维也纳地方爱国主义势力。希拉赫大力赞助艺术事业，在他的指令下，"艺术之家"（Künstlerhaus）为伟大的"德意志"艺术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举办了最为全面的展览，其中包括阿黛尔·布罗赫—鲍威尔（Adele Bloch-Bauer）黄金像的首次展

① Helmut Qualtinger and Carl Merz, *Der Herr Karl* (Reinbek, 1964), p. 16.

出。为了“种族上的纯净”①，这幅作品当时名为“金制女人像”，240 1945年以后的很多年里也仍然是这个称呼。在希拉赫统治下，维也纳再度展现出它与第三帝国其他地方不同的独特个性。

这就使得魏因赫伯等作家看起来像是隐秘中的“奥地利人”，他们以地方特性反对帝国（Reich）德意志的帝国主义，即使他们仍然是纳粹体制的受益者。这种以地方忠诚表现出的内在抵制曾被视为奥地利人当中普遍存在的隐秘的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但表面现象可能是骗人的。预期增长的受挫、“北德人”的投机行为、“北德人”旅游者的傲慢苛求确实激起了奥地利人对帝国德意志人的反感，但是，大多数奥地利人仍对元首抱有极大的信心，希特勒及其第三帝国被认为比德国更为伟大。魏因赫伯等本土作家的文学作品实际上与纳粹的意识形态十分契合，他们把自然天性、地方传统与更大的“血与土”的民族结合在一起。魏因赫伯歌颂维也纳，就是一个德意志人在歌颂一个德意志的大城市：地方特征强化了民族特征以及民族社会主义特性。萨尔茨堡艺术节仍在举办，但现在是庆贺“统一的”德国的节日。

整体而言，奥地利民众从纳粹受战争驱动的投资中获得了很大利益。失业现象绝迹，取而代之的劳工不足。二战期间及战后对奥地利现代化做出巨大贡献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很多是由外国强制劳工修建的。第三帝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兼并及其对东南欧经济的支配性影响，同样大大有利于奥地利经济。1918年后曾中断和瓦解的奥地利与其经济腹地的联系，如今又完全恢复了。

从地方层次来说，莱昂菲尔登同霍亨福特（Hohenfurth，或称维西—布罗德：Vyšší Brod）和克鲁毛（Krumau，或称切斯基—克伦罗夫：český Krumlov）的联系甚至比1918年之前更为便利，因为现在没有了捷克人的干涉。1938年10月，当希特勒从克鲁毛返回时曾途经莱昂菲尔登。鉴于新兴的繁荣局面、与“德意志的”南波希米亚的重新统一以及大战头几年第三帝国高涨的乐观主义情绪，无怪乎莱昂菲尔登的纳粹党

① 奥戴尔的丈夫 Ferdinand Bloch-Bauer 是个犹太工业家。——译者注

员（大部分是乡村显贵）都得意洋洋地在1940年的一次纳粹党会议上拍照留念，他们头上悬着的巨大横幅曰“我们感谢阿道夫·希特勒”。



插图38　1940年莱昂菲尔登的纳粹党会议（作者自有照片）

1940年喜庆气氛的关键原因是德国在战争中的惊人成功，这似乎证明了希特勒关于德意志人民种族和文化之优越性的所有论调。在征服波兰和西欧的战役中，德国国防军（Wehrmacht）横扫一切对手，它新颖的“闪电战”战术令对手不胜惶恐。到1941年，第三帝国已控制了西欧和中欧，轴心国的军队还扫荡了东南欧。虽然英国是个比原来想象的更为难啃的骨头，但与希特勒军队已表现出的强大力量相比，它毕竟是个孤立的弱小力量，希特勒的军队甚至在北非也取得了胜利。 241

1941年夏天，德军在6月22日的突袭中粉碎苏联的前卫防线后直趋莫斯科，这时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挡德国人的胜利了。战争打到这个时候，希特勒的声望到了异乎寻常的高度，因为没有任何成功能与军事成就相比；大部分德国人都因为“孩子们”的丰功伟业而沾光，他们期待着德军主宰欧洲，乃至主宰世界。奥地利人也可以充分分享德国人的胜利信念，因为“德意志的”军队中有很多奥地利人，而且

往往和其他奥地利人一起被编入部队中。

242 当年轻的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在德国国防军中服役以“履行他的义务”时，他就是前“奥地利”军队的高级军官亚历山大·洛尔（Alexander Löhr）将军麾下的部队中的一员。奥地利人被纳粹当局视为不折不扣的德国人，对他们委以完全的信任，将他们彻底融入德国武装部队中。应召参军的奥地利人就像其他“德国人”一样乐于为之，因为他们“仅仅是在履行义务”。如果说国防军中的奥地利人的确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向一个合法权威履行义务，那是因为他们认可了德奥合并，并认为自己完全是第三帝国的成员。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无疑也应对第三帝国的罪行承担责任。

仍有一些奥地利人忠实于自己的奥地利身份，他们当中数以千计的人——像别的地方一样，共产党人在其中占有很高的比例——在整个纳粹时期都以各种形式从事抵抗活动，虽然大部分抵抗行动发生在战争行将结束的那一年。2700 名奥地利人因为与抵抗有关的行动而被处决；大约 3.2 万非犹太奥地利人死在监狱或集中营里（奥地利犹太人的这个数字为 6.5 万）；近 10 万奥地利人因为政治原因被逮捕。如果加上在纳粹安乐死计划（euthanasia programme①）中遇难的 2 万人，奥地利的纳粹反对者和纳粹政权的受难者数目是相当大的，何况奥地利的人口只有 700 万左右。但是，与在第三帝国的战争机器中服务、为元首献身的奥地利人的数目相比，抵抗者的数量就相形见绌了。

奥地利的山地部队在 1940 年 4 月的挪威战役中起了关键作用。在 1941 年春攻占巴尔干的战役以及随后与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战斗中，奥地利人都卷入得很深。1941 年 6 月后，很多奥地利部队也参加了在俄国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地利部队的直接继承者，如第四德意志高等模范步兵团（Fourth Hoch-und Deutschmeister Infantry Regiment），如今穿上德军的军服，再次在巴尔干和东线作战。对很多奥地利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上次大战的继续，只是他们加入了一

① 这个计划是犹太种族灭绝行动（Holocaust）最初的称呼。——译者注

个更加庞大的德意志战争机器。当这台战争机器开始运转不畅时，奥地利部队是最早遭殃的之一。在1943年冬天的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战役中，德国第六集团军中大约有5万奥地利部队被苏军包围。243 他们当中后来只有约1 200人返回故土。在奥地利，这场民族悲剧是个长期不为人谈起的禁忌，因为它清晰地显示了奥地利参与德国战争行动的规模。

在德国国防军中，阵亡的奥地利士兵总计为24.7万，从比例上说，这个数字与奥地利人在德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大体相当。奥地利人在“最后解决”中起的作用则超过了人口比例。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行动不仅是德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奥地利历史的一部分：斯大林格勒不仅是德国的民族悲剧，同样是奥地利的民族悲剧。

斯大林格勒不仅是第三帝国军事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奥地利民众认同感的转折点。1941年曾如此辉煌的事业到1943年已是极度的苦涩，而且只有到这一刻，奥地利人才开始懊悔他们的德意志认同，并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奥地利身份。然而，尽管对第三帝国感到幻灭，尽管对北德人心怀怨恨，但很多奥地利人至死忠诚于自己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毕竟他是奥地利人中的一员，很多人深信元首不应该因为灾难而蒙受责难，真正应该负责的是他那些腐败的顾问们和犹太人。

奥地利存在抵抗运动，而且其成员表现出的异乎寻常的勇敢配得上最崇高的嘉许。但是，积极抵抗纳粹体制的奥地利人只占极小一部分；绝大多数人追随希特勒的政策，有些人不太情愿，但很多人十分狂热。甚至当盟军逐渐形成包围之势时，情况依然如此。1943年8月盟军进入意大利后，美军首次空袭奥地利。1943年8月13日，维也纳新城遭到轰炸。在东线，德军在俄国人的攻势面前节节败退；在西线，1944年6月6日，D日行动开始。在内部，战争造成的损失不断加剧。1944年7月20日，希特勒逃过暗杀，于是战争仍在继续，但德国人取胜的前景日益渺茫。

1944年9月，美军首次开始对维也纳进行大规模空袭，失败情绪

蔓延开来。有人请求希拉赫将维也纳变成非军事化的"不设防"城市，希拉赫将这个请求转呈希特勒，10月底，希特勒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命令"耗尽最后一块石头"保卫维也纳。当德国和奥地利人的全面崩溃迫在眉睫之时，一场更有效的奥地利抵抗运动兴起了，12月，抵抗运动实现了正规化，代号为"O5"。俄国人日益逼近（1945年2月攻占布达佩斯），空袭更为猛烈，1945年3月12日达到了顶点，很多目标被严重破坏。失败主义和对纳粹的怨恨情绪——因为现在它已经失败——上升。

244

但是，对纳粹政权的忠诚度依然高得惊人，特别是在东线，因为那里的对手是苏联红军。纳粹宣传导致的偏执狂、德国人对东线发生的人所共知的暴行的后怕感、再加上苏军行动的严厉无情，导致了纳粹的拼死抵抗。直到1945年2月2日，当磨坊区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营（离莱昂菲尔登大约30英里）里的大约500名苏军战俘军官试图逃跑并有150人成功逃脱时，纳粹当局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帮助。在"磨坊边区猎兔行动"中，俄国人像有害动物一样被猎杀，幸存下来的只有11人。

但奥地利人在东线的抵抗没有效果。维也纳德军指挥部中曾发生过一个密谋，计划把这座城市交给苏军，但密谋被发现，参与者立即被处决。德军仍然服从命令，因此维也纳战役持续了一个星期，从4月6日一直打到13日，战斗十分血腥，造成极大破坏。在这之后，德军（其中包括很多奥地利人）还在马尔什菲尔德进行了最后一次抵抗。5月8日，当美军和苏军在恩斯河会师后，奥地利东部的大部分敌对行动已告结束，但交火仍时有发生。希特勒已于4月30日在柏林的掩体中自杀；5月7日，海军上将邓尼茨（Dönitz）签署了德国无条件投降条约。

只有到战争的最后阶段，奥地利人的抵抗才发挥其全部效果。直到4月13日维也纳被攻占后，卡尔·格鲁伯（Karl Gruber）领导的西奥地利抵抗运动才最后敲定起义计划，而且直到5月1日才决定发动起义。恰好在次日起义发生时，西奥地利的德军投降了。当美军于5

月 5 日进入因斯布鲁克时，格鲁伯已经占领该城，解放者们受到挥舞红白红三色旗的奥地利爱国者们的欢迎。纳粹曾计划将西奥地利构筑成不可逾越的“阿尔卑斯堡垒”，但由于缺少物力人力和当地人的支持，这个计划泡汤了。但是计划本身意味着很多重要的纳粹分子最后是在奥地利而不是在德国被俘获的。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Ernst Kaltenbrunner）是在阿尔特—奥赛（Alt Aussee）的一个农舍里被抓获的，这个度假胜地曾因与维也纳 1900 的（犹太）文学明星们的联系而扬名。

245

西奥地利抵抗运动的相对成功主要不是奥地利爱国主义力量的表现，而是明显的希望由美国人而不是俄国人占领的一个表现。正因为如此，苏军在奥地利每前进一步都需要战斗，但美国人遇到的抵抗很少——如果有的话，因为“全体”奥地利人都希望美国人赶在俄国人占领之前到来。

既然希特勒时代的泛德意志身份认同已告破产，这个原奥地利德意志人集团的新身份究竟如何呢？他们仍然是德国人么？抑或他们应该试着成为、或某种程度上已在尝试成为新的非德意志奥地利人吗？幸运的是，盟国占领者已经有一个现成的解决方案。

由于战时的宣传和外交要求，再加上一些奥地利流亡者的影响，盟国开始重新考量奥地利问题。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chill）特别热衷于重建一个独立的奥地利的观念，他这样做部分原因在于民族自决原则，但他主要是考虑到，如果对德奥分别进行处置将有助于削弱奥地利人对新德国的忠诚。丘吉尔在 1940 年 11 月的官邸演说中曾承诺为“奥地利的解放”而战斗，这不仅是对奥地利流亡者的诉求的一个抚慰，同样也是“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一个措施。

1941 年 12 月，在苏联和美国相继参战后，恢复奥地利的独立成为一个共同的战争目标。1942 年 2 月，丘吉尔声称奥地利是“纳粹侵略的第一个受害者”，虽然这种言论可能是一厢情愿的看法，但它为削弱奥地利对希特勒的支持提供了某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思路。对奥地利未来的命运来说，这一思路最著名也是最关键的表达形式是 10

月 30 日的莫斯科会议宣言。宣言承诺将把奥地利从“德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但是也附带了一项十分严厉的警告：“但是，奥地利应牢记——这是一项它不得回避的责任——由于它站在希特勒德国一边 246 参加了战争，故在问题之最终解决中，它必须为自身之解放付出应有之代价。”

更准确地说，英国人在草案中最初提到的是“奥地利人民”而不是“奥地利”，但苏联坚持要求提“奥地利”，以便利于将来对奥地利国家提出要求。

英国和美国让奥地利流亡者作为志愿军加入作战部队为奥地利的自由（和有利的解决方案）而战，1944 年底，奥地利战俘（POWs）和投诚士兵被组织起来同斯洛文尼亚抵抗组织一起战斗。盟国显然并不信任奥地利人的忠诚：1945 年 5 月，奥地利人被警告不得让纳粹将阿尔卑斯山变成最后的防御堡垒，1945 年 2 月的雅尔塔（Yalta）会议对奥地利的处置就像个缩小版的德国，它将被盟国分区占领。但盟国的官方立场仍然是要把奥地利从德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正如驻维也纳的苏军司令托尔布欣（Tolbuchin）将军在 1945 年 3 月底所言：“奥 247 地利的和平居民没有任何可以害怕的。”

到战争结束时，两次大战之间奥地利政治阶层中幸存下来的很多人简直太高兴了，以致不敢和盟军讨价还价。德意志民族主义阵营已彻底妥协，从此不再成为“奥地利”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因素。相反，天主教保守派一直主张奥地利应独立于“新教”德意志共和国，因此他们赞成奥地利的完全独立相对容易些。一个关键的派别是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在两次大战之间，直到 1933 年之前，德奥合并仍然是社会民主党的政策，1933 年之后还有很多人赞成合并。纳粹统治的经历改变了这一切。早在 1943 年初，战后奥地利杰出的政治领导人阿道夫·谢尔夫（Adolf Schärf）就对一个德国社会民党人说过：“德奥合并已经死亡。”当时他的很多同志还有不同看法；两年以后，当毁灭的第三帝国面临盟国严厉的赔偿要求时，谢尔夫的看法实际上已成为奥地利社会主义者的普遍见解。鉴于都有同德国的命运脱钩、回归奥

地利独立国家的愿望，奥地利政治中的两大尚存的阵营，即天主教保守派和社会主义者，如今达成了新的一致。

这样，1914 年之前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原奥地利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1938 年德奥合并的支持者 K. 伦纳在长期退出公共生活后，又再次于 1945 年 4 月 2 日在霍赫沃尔克斯多夫（Hochwolkersdorf）向进入奥地利的苏军提出请求，不久人们欢迎他为独立的奥地利组建一个临时国民政府，1945 年 4 月 27 日，苏联占领当局承认了这个政府。

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奥地利即将获得这样的机会：它可以拥有的将不仅是个运转有效的政体，还可以创建一种令人信服的身份认同。对奥地利人来说，希特勒时代摧毁了他们再次成为德国人的可能。如今的奥地利人能靠一点历史学上的花招和盟国的援助而获得奥地利身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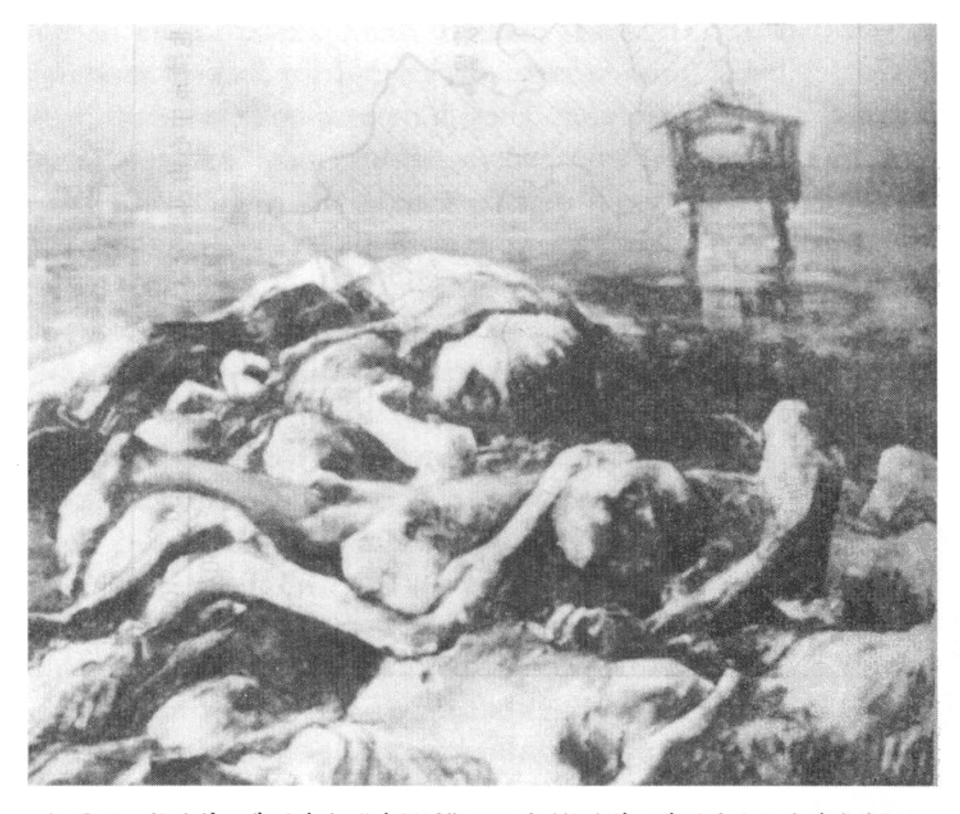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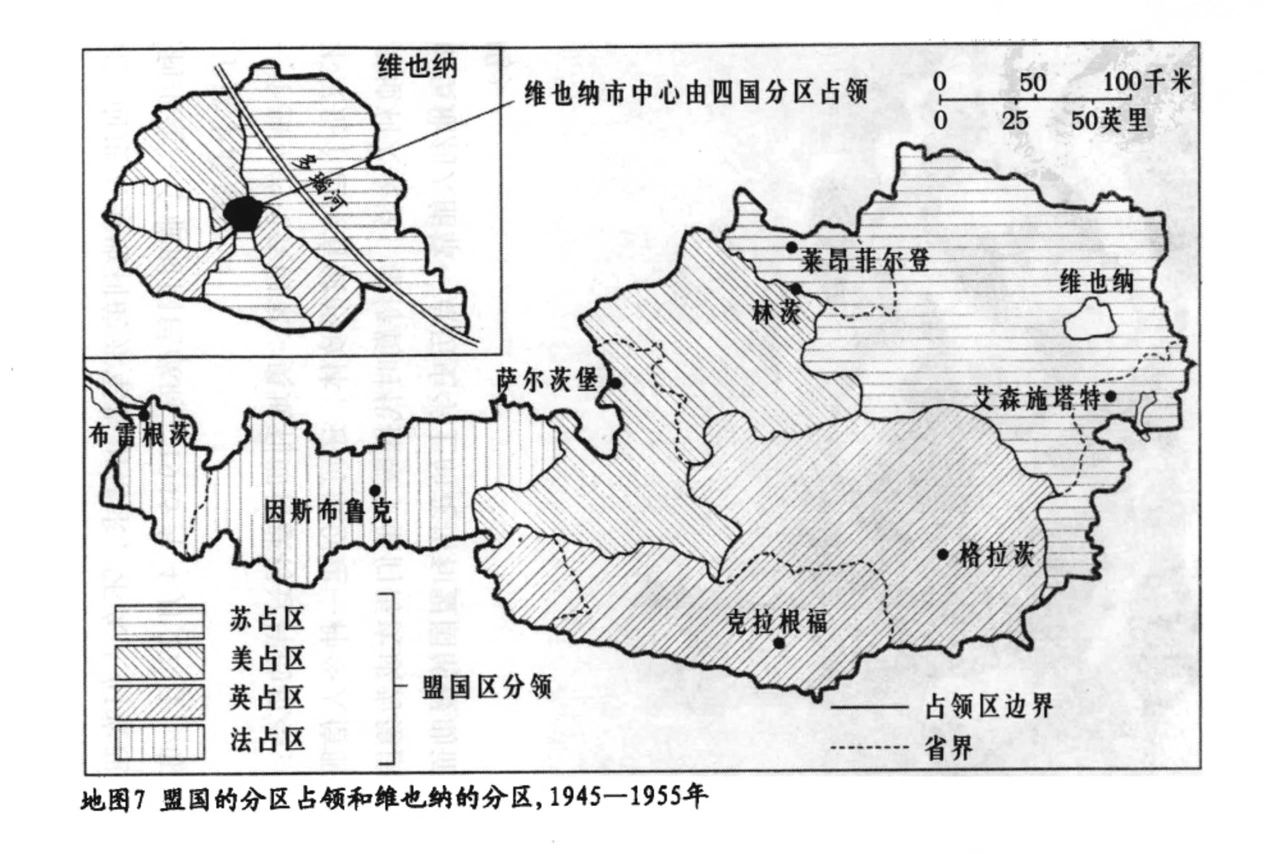


插图 39　格哈特·弗兰克尔："瞭望塔"，1964 年（格哈特·弗兰克尔纪念基金会）



地图7 盟国的分区占领和维也纳的分区，1945—1955年

第六章　1945年以后的奥地利联合社团

当奥地利共和国于1945年4月27日宣布复国时，其国土和人民处于深重的灾难之中，民众的精神低落到了极点。加入第三帝国给奥地利带来的后果只有物质、经济、道义和政治上的毁灭。但60年后，奥地利成了世界上最繁荣最稳定的国家之一。2006年，它再次成为欧盟主席国。奥地利第二共和国从1945年的灰烬中凤凰涅槃般的崛起是战后欧洲最引人瞩目的成就之一。 249

当然，这一转变并非没有经历挫折，其中也有一些潜在的悲剧性缺陷。第二共和国之所以能实现第一共和国曾苦求而不得的经济繁荣和政治凝聚力，部分原因是某种导致政治平静的社会—政治协定，部分原因也在于对奥地利历史的某种暗中操纵。这种对历史的胡乱处理有助于加强奥地利的民族认同，但它损害了奥地利人的自我理解。今天的奥地利人仍然生活在由此造成的各种不安的后果中。

一、免费的断裂，1945—1955年

在1945年5月的混乱日子里，当美军进入上奥地利时，莱昂菲尔登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听见有人急促地敲击前门。她跑过去打开门，看见的是一个非洲裔美国步兵，看到此人的黑脸时，她大为惶恐，砰的关上门跑到了楼上。纳粹灌输的信条和文化偏见使

250 这种反应几乎成为本能。然而时过境迁，面对被占领的事实，人们无处可逃。

不过，根据盟国的看法，奥地利的正式身份是一个正在摆脱“纳粹”占领的“被解放的”国家。盟军既是占领者，但理论上说也是解放者。这种模糊身份给1945年后的奥地利人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因为一个被解放的奥地利对1945之前“德国的”行动负担的责任，要远小于作为一个被占领的德国省份可能承担的责任。因此奥地利人发展出两种非常方便的意识：1945年到1955年国家条约签订之间的这段时期被称作“占领时期”，1955年则是奥地利重获自由之年，所以奥地利第二共和国有一个建国神话，即1945年是奥地利作为“纳粹侵略的第一个受害者”获得解放的一年。

西方盟国可能愿意相信这个神话是真的，因为是它们创造了这个神话，它们试图诱使奥地利人偏离德国，并使其参加正在发展中的冷战。奥地利人试图避免其罪行造成的后果，西方盟国则希望重构欧洲地图，双方利益的这种方便结合导致了“致命谎言”（Lebenslüge）的产生，而这个谎言正是战后奥地利历史的核心内容。

根据1945年7月4日的第1号管制协议，奥地利被置于盟国理事会（Allied Council）的控制之下，理事会由4位军事长官组成。7月9日的协议确定了不同占领区的划分，因此一些部队需要重新布防，如美军撤出磨坊区，把该地区交给苏军，这让莱昂菲尔登人大失所望。法军控制福拉尔贝格和蒂罗尔；美军控制萨尔茨堡和多瑙河以南的上奥地利；英军占领卡林提亚、施蒂里亚和东蒂罗尔（在此过程中驱逐了铁托［Tito］领导的南斯拉夫人）；苏军占据多瑙河以北的上奥地利、布尔根兰和下奥地利。维也纳也由四大占领国分区占领，中心城区由四国联合管理。这就使得电影《第三者》（*The Third Man*）中描绘的四人巡逻队闻名遐迩。奥地利虽然“解放”了，但从地图上看，它就像是被占领的“有罪的”德国的微缩版。



插图40 大转轮

作为盟国之一的苏联也把奥地利当作一个被占领的国家。苏军领导人很少约束士兵对奥地利居民的强奸和抢劫行径，据估计，仅在维也纳就有近10万妇女被强奸。野蛮行径从7月以后有所缓和，但“苏 252

占区”尤其以残忍的管理手段、无情的毁灭性经济政策而臭名昭著。1946年6月27日库拉索夫（Kurasov）将军的“第17号命令”钻了波茨坦会议协定的空子，实际上从经济上剥夺了奥地利东部的大片地区，其中包括作为“前德国资产”的下奥地利油田。这是换一种手段向奥地利索取赔偿，到1955年，这种赔偿总计为20亿—25亿美元。大量机器设备被运往俄国，东奥地利的苏联资产管理局（USIA）成为受人憎恨和抵制的俄国占领的代表者。

其他占领区的经历大为不同。法军在最西端各省的占领十分仁慈，因而也颇受人接受。英军在南方的占领也让人欣慰，何况英军还抑制了南斯拉夫人的领土野心。但英占区也发生过不愉快的经历，因为英国人曾把一些哥萨克（Cossack）难民交给了苏联，这些人肯定活不了。不过此事并不涉及奥地利人。另外，英国人也为人道救济和奥地利经济的重建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

最积极的推动力来自美国人。一开始，美国人对“被解放”的奥地利心存疑虑，但他们很快就采取了英国和法国的积极方针，杜鲁门（Truman）政府为奥地利提供的捐助无远弗届。1945年8月，美国倡议对“被解放的”奥地利实施紧急人道主义援助，1946年4月，赫伯特·胡佛再次到维也纳组织救援行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的食品救济对奥地利民众度过1946年、特别是1946—1947年的严冬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当时奥地利的经济活动几乎已完全停顿。

1947年6月提出的马歇尔计划是奥地利未来经济繁荣的关键。在随后的几年中，奥地利从欧洲复兴计划中接收了大约10亿美元的援助（人均137美元，而西德人均仅为19美元）。这些援助资金中一半以上投资于工业和基础设施上，如卡普伦大坝。这是奥地利辉煌的经济腾飞的财政基础。同样是在1947年夏天，美国人预付了占领费用，奥地利政府为此得到的补偿超过3亿美元。

253

西方对奥地利的好意很大程度上是受冷战之开启的影响，而奥地利又位居“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枢纽地位。在1947—1948年的关键时期，人们一度担心苏联会让东奥地利和西奥地利的分离永远制度化。

幸运的是，苏联只知道在自己的占领区竭泽而渔，而美国人则向奥地利注入资金。1946年，奥地利没有能够收复南蒂罗尔，部分原因或许是美国想安抚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意大利政府，不过，曾启动战后奥地利经济成功之旅的经济援助，其主要动机仍然是遏制苏联。

奥地利领导人利用了冷战带来的有利局面。早在1945年9月，西方占领区各省领导人便同意与伦纳在维也纳成立的“国民”政府联合，于是四大占领国面前出现了一个奥地利联合阵线。11月25日的全国大选的成功增强了新政府的合法性，并有助于说服盟国早日给予奥地利人更大程度的自治。1946年6月28日的第2号管制协议让盟国理事会主要成了一个监督机构。理事会对奥地利立法拥有否决权，但否决需要四大国一致赞同，这就大大削弱了俄国阻挠的可能。因此，当1946年7月奥地利议会对主要银行和大多数重工业实行国有化、以对付苏联抢夺“前德国的财产”时，俄国人只能抗议，并在苏占区无视该法律。

254



插图41 四大占领国的军人（奥地利国家图书馆）

奥地利联合阵线不仅跨越各个占领区，而且包含社会主义者和保守派。两个派别都已重组，但也都有所转变。社会主义者改变了党的名称，从社会民主党改为奥地利社会党（SPÖ），这是一个向1934年后一直处于“非法”状态的革命社会主义者接近的姿态。对基督教社会党而言，1945年的转变更具根本性。该党摈弃了以前与教会的紧密联系，以便能将保守派和资方势力团结在一起，这样一来，基督教社会党的后继者们为奥地利建立了一个新的党派——奥地利人民党（ÖVP），这是一个追随西方路线的世俗党派。

从1945年4月伦纳的临时政府开始，这两个党派就成为奥地利领导集团的核心。最初，由于局势所迫（俄国的军事存在），两党曾与共产党（KPÖ）分享权力，但是，随着西部各省领导人加入政府以及11月选举的举行（共产党只获得5%的选票），共产党人在政府中已是一支可有可无的势力。由于民族社会主义党被禁止参加选举，奥地利人民党获得50%的选票，奥地利社会党得票率为45%。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样，两党于12月20日组成国民联合政府，人民党人列奥波德·费戈尔（Leopold Figl）担任总理，阿道夫·谢尔夫任副总理，这一次，大联盟政府显得成功和稳固多了。

255 一般情况下，两党都完全拒绝承认奥地利有任何形式的德国身份。包括雷纳在内的很多奥地利人曾热情支持德奥合并，但这一点随着政治记忆的缺失而逐渐从集体记忆中消失。两党同样拒绝两次大战之间的分裂政治。不管是不是传说中的“集中营精神”（即作为纳粹集中营的囚犯的共同经历）让两党领导人学会了合作精神，一种新的合作实践的确成为1945年后奥地利政治的特征。

两个党派都很强大。党员数量都有迅速增长，到1955年，两党党员数量都超过50万人，而且都有复杂的组织结构、行使着实际的权威。两党都不是很信赖对方，不过这个问题已经在双方一种复杂而秘密的协定中得到明智的解决，根据这个协定，两党在1945年11月的选举过后将共产党人排除在任何实际权力之外。于是中央、省和市政权力按职位比例分配制（Proporz）原则被详细分割。此外还存在一套

平衡和制约体制，例如，每个部长之外配备一名来自他党的副部长，而且很多争论须提交联合委员会讨论，法案在呈送给议会批准前也须如此。一旦两党中头脑精明的现实主义者认识到合作的必要性，这种比例分配制就成为确保双方权威的一种形式。于是就诞生了“奥地利道路。”

比例分配制不仅是政治的基础，而且成为奥地利经济的基本形式。两党都发展出一套复杂的新社团主义体制。农业和工商业被组织在人民党阵营的各种协会中，而劳工则主要被组织在社会党阵营的各工会里。大部分重大经济政策都是在各派利益代表者关上门后拟定、然后再交议会批准的。最初还曾出现过一些小麻烦，比如 1950 年 9 月曾有过总罢工的尝试，但一般来说，这种社团合作主义方式保持了高度的劳资和平关系，并成为经济繁荣的一个重大推进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种“社会合作”成为政治大联盟在经济上的对应物，并使得议会政治降到了最为次要的地位。第二共和国更像个社团——奥地利联合社团（Austria Inc.）——而不像议会民主制度。 256

这种新政治社团主义的必然推论是奥地利身份认同的狭隘化和种族化。对德意志身份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回归君主制时代超民族的、世界主义的、多元的“旧”奥地利身份。这种身份只被西方盟国偶尔用来为奥地利的形象增光添彩，后来奥地利在一片和谐气氛中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超民族性不是新型的“民族主义”奥地利十分想要的东西。

1945 年后，奥地利社会各阶层在逐步接近。奥地利人希望安心抚平“我们自己”的差异，而国民新社团主义显然要求某种全民和谐，但这种和谐只有某种狭隘的、排他性的准种族形态的身份认同才能产生出来。

诚然，对于万事万物都处于变迁之中的战后奥地利来说，身份认同是个复杂的问题。奥地利不仅存在外国占领军，还有很多 1938 年后到来的非奥地利德意志人（当然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被允许留了下来）；还有很多被俘的德军士兵，以及至为多样的迁移居民（DPs）：从纳粹

分子到前集中营的囚犯，囚犯当中包括很多犹太人，如莱昂·策尔曼（Leon Zelman），此人在犹太大屠杀（Shoah）中侥幸存活下来。在当时的混乱局面下，盟军有时把战犯和大屠杀的幸存者关进同一座营房中。

此外还有一些背井离乡和被俘的奥地利人。奥地利战俘因为不被视作德国人而普遍受到宽大处理，他们获释的时间要早于其德国战友。到1947年年中，西方盟国遣返了全部奥地利战俘。俄国人的动作较慢，而且俄国的奥地利战俘营条件通常十分恶劣，但即便如此，俄国手中的奥地利战俘获释的时间也早于德国战俘，到1948年，一半的奥地利战俘被释放，其余的战俘到1956年底也全部获释。

新奥地利国家还接纳了很多从中东欧和东南欧被赶出的德意志人。曾在多瑙河下游谷地生活了几个世纪的多瑙河施瓦本人（Donauschwaben）被迫离开家园，他们当中有一些被奥地利接收；同样，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也被大批驱逐出境，很多人最后也在奥地利定居下来。一个来自克伦罗夫的家庭在莱昂菲尔登落足，并在一个同情他们的人家找到了工作。这些曾是“旧”奥地利人的“德意志波希米亚人”如今成了新奥地利人。除了少数例外，新奥地利的居民在种族上具有鲜明的德意志——和反犹——特征，正如对待犹太流亡者和前纳粹分子的不同方式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257

新奥地利有一个反对奥地利犹太流亡者的联合阵线。确实有很多犹太流亡者不愿返回奥地利，他们对这个国家的记忆只有迫害、仇恨和恐惧；但的确也有一些例外，犹太人回到了奥地利并被接纳，不过他们通常须接受新奥地利的统治，接受奥地利是清白的受害者的神话。但返回的犹太人数量很少，大约只有上千人，既然奥地利政府积极鼓励犹太人不要回归，这种情形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1948年11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曾讨论过美国提出的为资助犹太流亡者回归提供方便的要求，当时的内政部长、社会党人奥斯卡·赫尔默（Oskar Helmer）主张：“我认为此事应从长计议。”（Ich

bin dafür die Sache in die Länge zu ziehen)[①] 这后来成为政府处理奥地利犹太人的官方（虽然是隐蔽的）政策。当然政府也做出了一些姿态，比如通过了财产赔偿和归还的议案，但犹太受害者通常向德国政府要求赔偿，因为奥地利已经一文不名，而且作为德国侵略的受害者，它对相关罪行也不负担责任。作为一个国家，“奥地利”在1938年到1945年之间并不存在，它怎能对另一个国家的行为负责呢？奥地利犹太人得到的就是这样的遁词。

很多“普通”奥地利人憎恨犹太流亡者，因为他们曾在海外参与战争、现在又希望受到特别关照返回奥地利，但奥地利却不得不遭受战争的痛苦。这些“普通”奥地利人表面上与第三帝国保持距离（尽管1948年后的民意调查表明，1/3以上的人仍然支持维也纳的民族社会主义，在萨尔茨堡，这个比例高达40%）[②]，然而他们欣然接受第三帝国带给奥地利的很多物质利益，其中的一项就是清除犹太人，将大笔犹太财产转给雅利安人（“普通”奥地利人）。因此，政府对抵制犹太人的要求有广泛的民意支持。 258

1945年后，奥地利国家对“前德国资产”迅速进行国有化，这类资产主要是纳粹的战时投资。但奥地利国家也同样直接受惠于对犹太财产的剥夺。贝尔维德的奥地利画廊庆幸很多纳粹时期的“获取”被视为合法的，虽然很多作品是从犹太所有者那里偷来的。奥地利国家拒绝纳粹传统，但同时又接受了纳粹的物质遗产。

奥地利对前纳粹分子的处置与对犹太流亡者的态度形成强烈反差。去纳粹化和惩处战犯的行动一开始相当严厉，但大多是无组织和无效果的。1945年11月，根据临时政府通过的两项法律，即禁止民族社会主义法（1945年5月）和战犯法（1945年月），一些更为统一化的程序得以确定下来，而且奥地利政府有责任在盟国的监督下实行去纳

① Hella Pick, *Guilty Victim: Austria from the Holocaust to Haider* (London, 2000), pp. 206—207.

② Ernst Hanisch, *Der lange Schatten des Staates: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e, 1890—1990* (Vienna, 1994), p. 422.

粹化。在1946年一年当中，有53.7万纳粹党员上报登记，其中包括约10万名“非法分子”，即1938年3月之前的纳粹党成员，这些人被视为真正的叛国者，他们与随后加入纳粹的消极服从者和机会主义分子不同。人民法庭建立起来，启动的调查案超过13.6万件，起诉的案件有28 148件，定罪的13 607件，其中有43个案件判处了死刑。

同盟国驻奥地利的军事法庭判处的死刑战犯要多得多，但奥地利的去纳粹化行动很快就松弛下来。单是登记的前纳粹分子的数量就让这一行动进展缓慢，特别是90%的登记人员都因为特殊身份而提出上诉。1947年2月通过了新的民族社会主义法，规定按党内级别量刑，并把被告划分为两大类：“有牵连者”和“较少牵连者”，属于前一类的仅有4.2万人。如果说这项法律确曾认真执行过，那也是盟国坚持的结果。1948年宣布大赦“较少牵连者”后，大规模的去纳粹化实际上已经结束。对战犯的审讯仍在继续，“有牵连者”集团要等到1957年民族社会主义大赦法颁布时才被完全释放，但1948年后审讯的案件数量已开始急剧下降。人民法庭在1955年被取消，此后战犯由陪审团审判，39宗案件中共有18项微不足道的定罪。

259

审讯案件的急剧下降是奥地利形势变化的结果。冷战使得各占领国转移了对昔日敌人的注意力，它们不太愿意迫害那些可以一起反对新敌手的潜在盟友。同样，在1948年的大赦中，奥地利两大党的主要动机是争取48万被赦纳粹分子的忠诚，而不是为了保持意识形态上的纯洁性。1949年初出现了主要由前纳粹分子和民族主义“自由派”组成的独立派联盟（VdP），这也加剧了争夺这一颇有影响的选举集团的压力。

绝大部分奥地利人认为前纳粹分子也是受害者。在公众的意识中，大多数纳粹分子以普通追随者的姿态和追名逐利的方式成为了纳粹党徒，或仅仅因为顺从纳粹党的“邀请”（实际上是命令）而加入该党。因此他们是被迫享受纳粹党徒的利益，正如奥地利被迫分享第三帝国的物质利益一样。如果奥地利是德国纳粹的牺牲品，那么作为奥地利人的奥地利纳粹分子才是德国人真正的“受害者”。所以盟国迫害的

是正直的奥地利人，这些人仅仅是因为命运的偶然而成为纳粹党徒的。而且很多前纳粹分子，如著名的海米托·冯·多德勒（Heimito von Doderer），如今已及时表明了对新成立的奥地利的忠诚。虽然犹太人因为被看作“解放者”的被保护人而受憎恶，但前纳粹分子很快就被接纳为新奥地利民族的一部分：一个前纳粹分子之所以是“我们中的一员”，是因为犹太集中营的幸存者不能获得这种身份。

奥地利人试图依靠这种受害者神话来摆脱自己的过去和他们的“解放者”。当南斯拉夫、波兰和希腊等国——纳粹冲锋队和国防军中的奥地利人的确参与了对这些地区的恐怖军事行动——向奥地利提出赔偿要求时，奥地利领导阶层一致团结在外交部长卡尔·格鲁伯（Karl Gruber）的政策下，抗议说奥地利是清白无辜的受害者。格鲁伯鼓吹奥地利作为“纳粹侵略的第一个受害者”的身份，夸大个别奥地利人的英勇抵抗行为。至于奥地利社会普遍支持希特勒及希特勒政权的微小细节就被弃置不顾了。受害者战略效果很好：赔偿要求撤消了。 260

至于劝说盟国结束占领状态，耗时则要长得多。谈判早在 1947 年初就已开始，但国家条约 8 年后才签订。苏联的拖延有一个特别的动机，那就是继续对东奥地利的经济剥削，但主要的障碍是冷战对峙状态的形成，西方盟国和苏联都不愿将具有战略地位的奥地利贸然转给对方。1948 年捷克斯洛伐克和柏林的事变进一步加剧了西方对奥地利可能发生共产主义政变的担忧。由于苏联不让步，1949 年无法达成协议，直到 1953 年斯大林去世后，奥地利的外交态势才开始缓和。

为了化解东西方对峙的难题，1953 年担任总理的尤里乌斯·拉博（Julius Raab）开始祭出奥地利将按瑞士模式走不结盟的中立道路的观念。虽然要想让奥地利摆脱冷战的外交迷局，特别是与德国问题脱钩还需要灵活的手腕和运气的帮助，但拉博的思路最终打破了僵局。1955 年，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成为苏联领导人，最初他试图推动东西方关系的改善，这给奥地利帮了大忙。于是拉博不顾西方国家的劝告，于当年 4 月前往莫斯科，很快就达成了双方都可接受的协议，协议的核心是奥地利承诺宣布自己为中立国（这与国

家条约不相干)。1955年5月15日，奥地利和四大占领国的外长在上贝尔维德宫正式签署了国家条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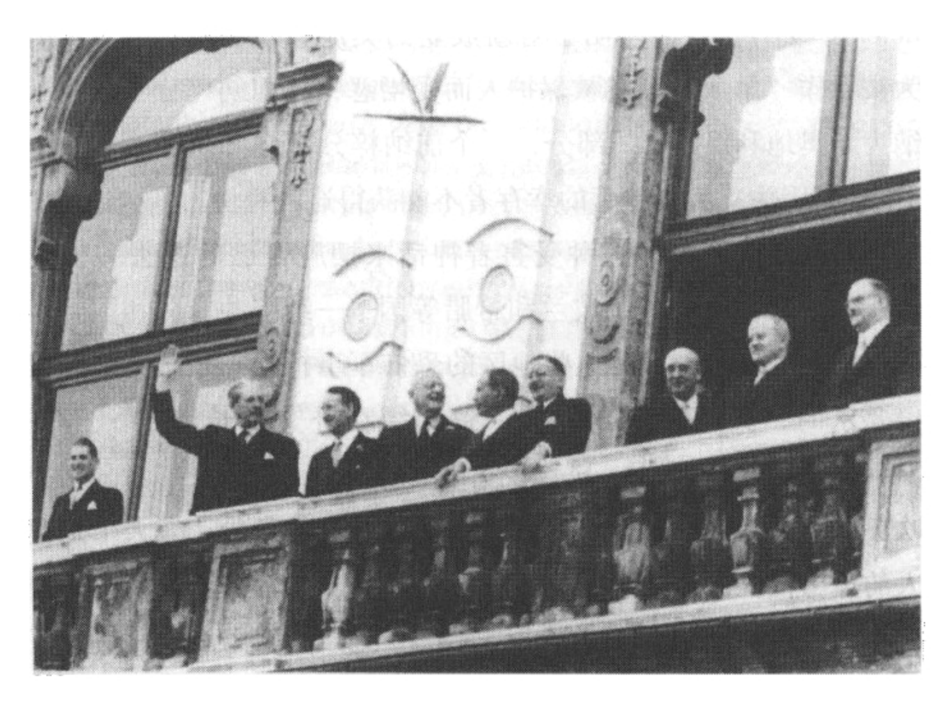


插图42　1955年国家条约签订后的合影（奥地利联合新闻社）

国家条约签订3个月后，各国占领军撤离。1955年10月26日，奥地利议会如约通过《永久（武装）中立法》。国家条约还规定向苏联赔偿1.5亿美元，以让后者“交还”德国资产，偿付的形式主要是在若干年内支付石油制品。

261　国家条约最终使奥地利摆脱了占领并实现了中立，尽管中立是局势所迫；同时，条约也让奥地利最终去除了任何重归德国的残留希望。中立可能有其弊端，正如奥地利后来在经济领域内发现的那样，但它使奥地利获得了真正的独立——这还是第一次。最后，国家条约还在国际法的框架下让奥地利摆脱了它刚刚过去的历史。条约中曾有关于“奥地利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责任”的条款，这个条款自1943年后一直存在，但根据让过去的都让它过去的精神，盟国同意省略这个条款，这几乎算个事后追加的许诺。

262　为了将来的社会和谐、政治统一、经济繁荣和新奥地利的“民

族”身份认同，奥地利就这样在抹去昔日恐怖阴魂的基础上结束了被占领状态。尽管它的中立是超脱冷战的步骤，但奥地利仍沾了西方国家的光。奥地利的政治遗忘和在国际问题上的消极无为，是占领国默许、甚至要求的，也得到大多数奥地利人的热情拥护。个别奥地利人可能对抗这种对过去的普遍沉默，但欣然顺应受盟国认可的新政体的人要远多于这类人，虽然从奥地利集体记忆的更深层次上说，很少有人能真正忘却实际发生过的历史。

二、繁荣之路，1955—1970年

如果回过头来看，奥地利在1955年走上了正轨，到20世纪70年代，它已成为经济繁荣、国内稳定的楷模，堪称其他国家效仿的对象。但在当时，事情看起来并不总是这样。

1950年曾出现一场严重的劳资危机，危机的挑起者是独立派联盟，10月，维也纳的共产党人将危机发展为一场总罢工，不过罢工失败了。1952年，经济再次因为通货膨胀失控而遇上麻烦，不过拉博—卡米茨（Kamitz）措施严厉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市场经济”的引入最终使经济走上了持续高速增长的轨道。1956年，邻国匈牙利发生革命，苏联进行了镇压，但中立的奥地利没有遭受入侵，而且18万匈牙利流亡者在那里找到了避难所，很多人还是渡过新锡德尔湖逃到奥地利的。奥地利在西方世界的形象大为提高。1961年，赫鲁晓夫和肯尼迪（Kennedy）在维也纳举行东西方峰会，此事进一步凸显了奥地利作为沟通两大意识形态阵营之桥梁的形象（当然，维也纳还是冷战时代间谍活动的集中地）。

1957年，总理拉博受到心脏病的打击，但他康复了。同年，阿道夫·谢尔夫当选为总统，接替特奥多尔·科尔纳（Theodor Körner）。在贸易政策方面，1957—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建立，奥地利担心可能由于中立地位而被排除在欧共体市场之外；不过奥地利在1960年加入了欧洲自由贸易区（EFTA）。1962年和1967年的经济衰退曾两度让人担心奥地利的经济增长就此结束，但经济改组过后， 263

增长又开始了。

在此过程中，不时传来“比例分配民主制”中“政治交易”(Packelei）的腐败丑闻，而更为频繁的是大联盟中两个伙伴的争吵：作为老大的奥地利人民党和作为小弟的奥地利社会党。两党都与唯一较有影响力的第三党派自由党（FPÖ）玩弄“小联盟”的策略，自由党的前身是独立派联盟，主要代表前纳粹分子的利益，也有些自由派资本家投身其间。但无论是人民党保守派还是社会党的领袖，都不曾真正受这个策略的诱惑。于是妥协政治仍在继续。

不过，社会党确实在一个问题上与自由党有过合作，这就是哈布斯堡家族问题。奥托·哈布斯堡在放弃对奥地利的主权要求后曾申请访问自己的历史家园，当行政法院于1963年裁决奥托可以入境时，社会党人被激怒了。在自由党的支持下（该党当时还是反哈布斯堡的)，社会党人声称此举是对奥地利民主制的司法绑架行径，而人民党则反击说这是符合法治原则的行动。最后奥托被劝说不要前往奥地利。

1963年以后，两大党内部都发生了重大的权力斗争，局面后来对人民党有利。1966年，约瑟夫·克劳斯（Josef Klaus）赢得选举后，出现了新的一党制政府，但新体制仅仅对比例分配制和社会合作产生了次要影响。此后出现了各种丑闻，涉及建筑承包商、大学中的某些作为前纳粹分子的教授，急躁的左翼学生团体数量也不断增加。这个时代奥地利政治生活的兴奋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当时还不存在双方的协调策略所克服不了的长期严重危机。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大联盟在政治上的稳定互为支持，奥地利的生产率和生活水平也随之有了惊人的提高。1955年的经济增长率为11.5%，1959年的人均GDP已经是1937年的两倍。此后增长率有所放缓，但1953年到1962年GDP的年均增长率仍高达6.4%。

264 西德的经济增长更为迅速，奥地利无疑搭上了它的顺风车，但奥地利的繁荣也有很多内在原因。一个关键因素是技术革新，特别是那些从第三帝国发展中得益最多的工业。1949年提炼优质钢的林茨—多纳维茨转炉工艺（Linz-Donawitz Process）的发明使得林茨的VOEST钢

厂（即原来的戈林工厂）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炼钢厂。基础工业的国有化启动了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腾飞。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马歇尔计划推动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但大部分投资项目是国内发起的：50年代的投资比率为17%，60年代为23%，超过了大部分欧洲国家。根据行业原则组织起来的国有化工业自身也展现出很高的企业水平。

国有化领域内的经济和政治的互动是良性的，这与英国不同。社会合作制虽然是非正式的，与宪政也无关联，但它已成为政治体制中根深蒂固的组成部分，这类准官方的影子机构如1957年成立的劳资对等委员会（Parity Commission），1963年建立的经济社会问题委员会（Board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Questions）。工会、资方和政党之间的协定使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催生了一个更加完备的福利国家。1955年通过了一项广泛的社会保险法；1959年实行了每周45小时工作制；1964年推行3周休假制。奥地利的中立有利于实现这些福利制度，因为它的国防开支较低，更多的资源可用于社会福利和再投资。

奥地利经济的成功首先表现在工业部门，但另一个重要领域也有令人瞩目的增长，并对奥地利的外部形象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就是旅游业。在西部各省，旅游业尤其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1951年，共有1 700万人在奥地利住宿过夜，到1964年则增长到6 400万人。

奥地利的旅游业大大受益于最近富裕起来的德国游客，同时它的繁荣也是政策上有意识地把旅游业作为经济增长支柱加以鼓励的结果。两次大战之间，保守派曾执迷于旅游业，这是因为旅游可能带来繁荣而同时又能拒绝社会和文化的现代性，而在20世纪50年代，旅游很契合于奥地利人作为一个热爱和平、讲求秩序、笃信宗教、逍遥自在的民族所具有的新型保守主义的自我形象。这听起来很矛盾，但对于过分讲求实利、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合作而言，旅游业的确是种奇特而有效的补充。奥地利重视旅游的形象不仅在经济上产生效益，而且构成新的国民认同的一部分。 265

部分而言，这种认同可以追溯到奥地利作为一个文化国度的形象，特别是在音乐文化方面，音乐大大有助于奥地利人取悦于战后

的外国人。1947 年维也纳爱乐乐团中和维也纳歌剧团在英国的巡回演出不仅是艺术上的一大胜利，而且是一个外交行动，它意味着文化奥地利的再生。然而，爱乐乐团中的 50 名前纳粹成员中只有 5 人被解雇，而原来的犹太成员大部分没有被邀请返回，这个事实却没有引起注意。

奥地利的文化遗产已被拂去尘埃，对哈布斯堡奥地利的怀旧之情油然而生，这体现在海米托·冯·多德勒这样的人物身上。不被鼓励的仅仅是那些过于极端的事物。弗里茨·沃特卢巴（Fritz Wotruba）、英格堡·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和伊尔泽·艾辛格（Ilse Aichinger）等艺术家曾试图挑起战后的“保守范式”，但他们大多被忽视，正如维也纳 1900 的遗产中那些更为激进的方面一样，一起被遗忘的还有对文化中有意识地破坏的记忆。1945 年 10 月，上奥地利的学校被要求毁掉 1938—1945 年的学校编年记录并重新改写。

高级文化对于奥地利的身份认同仍很重要，但这已经是一种安全的保守版的高级文化。虽然犹太流亡者弗雷德里希·托贝格回到了奥地利，并于 1954 年利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钱创办文学杂志《论坛》(*Forum*)，但他已经打起了奥地利牌，强调一种反先锋派模式的“文化”，而且对纳粹的历史保持严格的缄默。1955 年 11 月 5 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重新开张，首演剧目是《费黛里奥》（当时的导演是纳粹时期曾导演该剧的歌剧院指挥卡尔·博姆［Karl Böhm］），但是 10 月 15 日城堡剧院重新开张时选择的剧目更能说明问题：弗兰茨·格里尔帕策的《国王奥托卡的盛衰》(*König Ottokars Glück und Ende*)，一部比德麦尔时代的作品，最著名之处在于它对奥地利奇妙风景的爱国主义颂歌，这里的奥地利正是一个旅游的国度。不过，新奥地利高级文化的体现者是萨尔茨堡艺术节上的大师赫伯特·冯·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卡拉扬曾接替博姆担任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指挥，也是个前纳粹分子，不过他相当轻松地摆脱了自己的纳粹经历，并成为一名备受媒体关注的高级文化明星，而萨尔茨堡艺术节也成为一个无害的、从技术上说甚至是弘扬经典准则的论坛：“机械化的比德麦尔

风格。”

在国际高级文化的舞台上，萨尔茨堡如今超越了维也纳。冷战割断了维也纳同其中欧腹地的联系，这也致使文化动力转向了奥地利西部各省。奥地利高级文化的背景发生了改变。与维也纳 1900 那种相对高雅的、城市化的现代环境相比，如今的奥地利人展现给外界的形象是一个乡村化的阿尔卑斯山区的人民。奥地利高级文化还与一种通俗化的大众文化联系在一起，而且很大程度上被后者取代。

“奥地利”成为冬季运动的天堂，1964 年的因斯布鲁克冬季奥运会大大提升了奥地利的这一形象。两次大战之间开始的奥地利身份的乡土化如今加速前进，民族服饰（Trachten），如皮裤（Lederhosen）和少女装（Dirndl），都被当作奥地利时尚的象征而得意洋洋地向游人兜售。游客还被吸引到阿尔卑斯山区的娱乐表演上，如岳德尔民歌（yodel）和踢踏舞（Schuhplattler），当他们离开时便以为这就是奥地利文化。莫扎特《魔笛》中的主人公帕帕格努（Papageno）仿佛真的存在。

百老汇（Broadway）和好莱坞也宣扬奥地利的这种旅游形象。1959 年，罗杰斯（Rodgers）和哈默斯坦（Hammerstein）的《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曾轰动百老汇。这部剧作讲述的是玛丽亚·冯·特拉普（Maria von Trapp）从见习修女到政治流亡者的极度伤感的故事。1965 年，电影版的《音乐之声》开始发行，其轰动效应更加巨大。这部电影是为萨尔茨堡及附近的奥地利阿尔卑斯山美景奉献的一曲颂歌。它以人格化的形式讲述了“坚强但弱小的奥地利”同德国纳粹分子的斗争，更为具体地向西方展现了奥地利的正面形象。

这部电影在一个地方并不那么轰动，这个地方就是奥地利。电影故事的天主教保守视角不可能吸引社会主义者和反教权主义阶层，尤其是在维也纳；虽然外国人可能认为这部电影是在称颂奥地利人对希特勒的抵抗，奥地利人则可能认为，电影中的纳粹分子是奥地利人，而男女主人公可能在 1938 年离开了奥地利。

不管这部电影多么感人，但它可能并不受人欢迎，因为对奥地利公

267 众而言，它揭开了一段仍然极端敏感的历史。1961 年，双人表演组合卡尔·麦茨（Carl Merz）和赫尔穆特·夸尔亭厄创作了一段讽刺性独白，这段独白后来由夸尔亭厄扮演的“卡尔先生”在奥地利电视节目上广播。它对奥地利的纳粹合作者论证其行动之合理性的荒谬逻辑进行了辛辣的嘲讽，恼怒的观众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攻击；但是，正由于这个节目揭穿了奥地利是受害者的民族神话，他们的反应才如此直截了当。



插图 43　卡尔先生（首播记录）

电影《音乐之声》的拍摄工作引发了战后奥地利的双重意识的一次公开表露。摄制组曾请求拍摄德军进入行宫广场（Residenzplatz）的场景，但奥地利当局拒绝了这个申请，开出的理由是，萨尔茨堡人曾是坚定的反纳粹者，若见到纳粹道具展现在眼前，他们会感到愤怒。于是摄制人员提议用 1938 年的新闻短片替代之，但片中有萨尔茨堡群众以希特勒式敬礼欢迎德军的场景，这时奥地利当局的态度缓和了，但它提了个附加条款：不得显示群众欢迎的场面。

268 对于西方游客，奥地利人表现出的是一副欢快好客的面孔，但他

们仍很提防西方思想文化中更为激进和进步主义的倾向。这样的思想和文化很大程度上曾是奥地利流亡者的创造。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的维也纳小组中的流亡成员——如卡尔·波普尔——曾彻底改造了哲学。阿诺德·勋伯格在洛杉矶引领现代音乐理论，他的奥地利同事比利·维尔德则成为好莱坞最著名的导演之一。心理学仍深受奥地利流亡学者的影响，这其中包括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在伯克利（Berkeley）的汉斯·凯尔森在法学理论方面影响巨大；还有很多声望卓著的经济学家，如弗雷德里希·哈耶克和约瑟夫·熊彼特。奥地利和“中欧”的流亡者，如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和格奥尔格·魏登菲尔德（George Weidenfeld），在英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

这种巨大的影响力不仅仅是由流亡者星空中的巨星造就的，创造者当中还包括所有名望较小的人物，他们分布在电影、电视、戏剧、音乐、商业、各个大学和高等教育中心等领域，其职业如医生、研究学者、记者、中学里的德语教师，如扬·帕尔默（Jan Palme）和赫尔塔·帕尔默（Herta Palme）不仅向学生传授德语语言，还讲授曾滋养他们的中欧进步文化中的伟大价值。汉普斯特德[①]不仅是思想论争的代名词，还是流亡者世界主义生活方式的同义语，而在这个世界里，奥地利人扮演着重要角色。

如果我们回到奥地利，那些仍停留在1938年的奥地利人很不愿意接受这种别具一格的流亡社团和文化。人们曾尝试在西方世界和新奥地利之间建立更为密切的思想文化联系。流亡人士克莱门斯·海勒（Clemens Heller）在战后不久设立的萨尔茨堡研讨班（它所在的列奥波德斯克隆宫［Leopoldskron Palace］曾是马克斯·莱因哈特的寓所，并曾用作《音乐之声》的主要电影布景）成为一个著名的国际论坛，它的确促进了奥地利文化界领军人物与国外同行的联系，但大多数奥

① 汉普斯特德（Hampstead）是伦敦的一个地区，贡布里希等奥地利知识界名人曾在此居住。——译者注

地利人并不知道它的存在。阿尔普巴赫欧洲论坛（Alpbach European Forum）同样旨在促进相互理解，但关心它的只有少数精英。曾在20世纪30年代受到重创的奥地利思想文化源流没有得到充分修复，虽然269 萨尔茨堡艺术节为奥地利人营造了一种可泰然处之的保守世界主义。

一些目光敏锐的人士抗议对奥地利文化遗产中进步主义元素的忽视，正如弗雷德里希·希尔（Friedrich Heer）指出的，犹太人曾是进步元素中的核心，如今他们的主要代表者成了流亡者。大多数奥地利人乐意看到这些麻烦制造者远走他乡，他们更喜欢旅游者的到来。

莱昂菲尔登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旅游业是如何改造一个奥地利小村庄的命运的。这个村子坐落在偏远的磨坊区，直到1955年还被苏军占领着，它与北方腹地的联系被切断，而且没有壮丽的阿尔卑斯风景，看来这里不可能分享奥地利新出现的繁荣。但是，1960年，村子里的5名商人发现了一个绝妙的商机。18世纪时，莱昂菲尔登曾以布伦德尔教堂中能治病的神奇之水而闻名，19世纪80年代这里已兴起矿泉疗养业。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这一事业中断，但如果莱昂菲尔登按现代方式重建温泉，情况会怎样呢？林茨这个发展迅速的奥地利重工业中心离这里很近，奥地利和西德对矿泉疗养的需求在不断增长。

商人们成立了一家公司，并向省政府寻求支持，后者拨款资助并授予莱昂菲尔登矿泉疗养地的资格，于是到1962年，这里变成了巴德—莱昂菲尔登（Bad Leonfelden，意即莱昂菲尔登疗养浴场）。同年，新的疗养院开张，这是一所建在森林边上的现代风格的建筑。疗养院遵循德国人塞巴斯蒂安·克奈普（Sebastian Kneipp）的疗法，这种疗法立刻取得了成功，尤其是对德国人效果明显。到1990年，这所疗养院的顾客数比1962年增长了10倍。

疗养院的成功盘活了村子里的其他产业，并使村庄本身也成为一个度假胜地。卡斯特纳（Kastner）的咖啡糕点店以其精美的糕点和姜饼而在当地闻名，很多从林茨来这里度周末的家庭都喜欢去那里。到1970年，莱昂菲尔登人已在谈论他们多年的生意经，不过，他们经济成就的基础在于拿着国家医疗补贴的德国和奥地利的疗养游客、来自

林茨国有企业的当日游客以及政府可观的经济援助。

正如巴德—莱昂菲尔登的成功所表明的，奥地利的新社团主义体制看来颇富企业精神，就全国的情况而言，生活水准和生活质量在持续快速提高。汽车拥有量有了巨大增长：1949 年每千人有 6 辆汽车，1969 年每千人 151 辆；住房建设蓬勃发展：20 世纪 60 年代共建了 45 万套，增长率为 25%。小汽车可能只是微型的施泰尔—戴姆勒—普赫（Steyr-Daimler-Puch）汽车，但它毕竟是汽车；住房可能只是一套丑陋的混凝土单元，但这毕竟是自己的房子。很快就会有更好的汽车、有装修更舒适的房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生活的确已经相当惬意了。 270

不过到此时，这个制度开始丧失魅力。非民主的社团主义逐渐被认为与现代奥地利不相适应。大联盟仍可以达成重大妥协，如 1962 年的学校改革法，但让人感到气馁的是，这样的成功越来越少了。战后奥地利成功的发动机如今成了政治"健康"发展的障碍。

老派政治势力的消逝同样松动了 1945 年后铸就的联盟关系。1961 年，拉博从总理位置上退休，两大政党中的新一代官员都已崭露头角，他们受过更高的教育，受过更为技术化的训练。从新社团主义向"技术社团主义"的现代化转变成为奥地利政治的目标。现在的问题是哪个党派能完成这个任务，谁能率先走上一党议会制政府的未知航程。

1964 年，弗兰茨·奥拉赫（Franz Olah）争取社会党领袖资格的努力未能成功，随后他分裂了出去，这就使得社会党在 1966 年的全国选举中准备不足。人民党及其新兴现代领袖、1964 年担任总理的约瑟夫·克劳斯在 1966 年的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根据奥地利的比例代表制）：该党获得 48% 的选民票，在议会中占有 5 席多数（人民党 85 席，社会党 76 席，自由党 4 席）。

人民党选择战后首次单独主政。这个举措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激进，因为比例分配制已深入到奥地利政治的血脉中，以致某种程度上不受内阁职位变迁的影响。克劳斯推行技术治国方针，将决策权交到专家而非政客手中，这是对民主政治的一种削弱，它具有典型的"自 271

上而下的启蒙”的奥地利特征。

尽管如此，克劳斯政府还是在认真推行现代化。政府注资进行新住房建设。奥地利的大学体制大为扩张，萨尔茨堡和林茨设立了新大学。奥地利的大学生数量 1955 年为 2 万人，1985 年达到 17.5 万。学术研究机构和设施也纷纷建立，其目的在于把奥地利打扮成一个思想和技术先进的现代国家。

但克劳斯政府在政治上不成功。1970 年大选失利后，重振旗鼓的社会党成了最大党，获得 81 个议席。由于现代化程度不够，克劳斯政府遭受了希斯[①]式的命运（Heathite fate）。1967 年的经济衰退也起了部分作用：为了应付衰退，财政部长斯特凡·科伦（Stephan Koren）采取了一揽子严厉紧缩政策，削减现代化计划，虽然此举极为成功，为下一次为时更长的增长创造了条件，但得益的不是克劳斯，而是他的继任者。更大的难题是克劳斯作为国家“首席教授”（Oberlehrer）的形象，他是某种约瑟夫主义的道学教授，害怕媒体批评，但这已经跟不上迅速变化的时代了。新一代的大学生已经不再是 20 世纪 50 年代那些驯服的人民党支持者了，他们像西方国家的同学一样具有左倾思想倾向。

即便是天主教会也在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1962—1965）后走上了逐步转变的轨道。一位奥地利教士在这次公会议上扮演了关键角色，他就是 1956 年任维也纳大主教、1958 年任枢机主教的弗兰茨·科尼希（Franz König），他推动教会以开放态度正视变革和政治左派，这对奥地利教会而言的确是一种新气象。僧侣集团的左倾趋势反映了奥地利社会的整体变化。在接受西方消费主义和放任心态的同时，很多奥地利人已不能容忍别人以教训现代人的口气来教训自己。事实表明，克劳斯只是奥地利新型现代政治的报春鸟，真正的实践大师将是布鲁诺·克莱斯基（Bruno Kreisky）。

---

① 这里的希斯指的可能是英国 20 世纪 70 年代的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斯（Edward Heath）。——译者注

二、至福岛，1970—1985 年

1971 年 11 月，奥地利总统弗兰茨·约纳斯（Franz Jonas）作为奥地利国家元首首次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标志着南蒂罗尔问题解决后战后奥地利地位的一个重大转变。在 1946 年格鲁伯—德·加斯佩里（De Gasperi）协定签署后不久，南蒂罗尔人和奥地利人便觉得受到了意大利人的捉弄，因为后者在行政上将说德语的南蒂罗尔和说意大利语的特伦特合并起来，从而破坏了曾经许下的保障南蒂罗尔人自治的承诺。反意大利的情绪甚至引发了恐怖袭击。不过，根据 1969 年的一项协定，南蒂罗尔人最终获得了真正有保证的自治，虽然该地区仍留在意大利。此后，意大利很快就放弃了它对奥地利与欧共体谈判的否决权，在这次国事访问几个月后，即 1972 年 7 月，奥地利与欧共体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从而在经济上成为欧共体的非正式成员。

272

紧接着意大利之行的是总统对梵蒂冈的访问。教皇保罗六世（Paul VI）在与约纳斯的会谈中称奥地利为“至福岛”（an island of the blessed）。

教皇对奥地利的赞美可以理解。天主教氛围浓厚的奥地利社会仍相对保守，教会仍是国民生活中举足轻重的角色。新社团主义的社会合作精神体现了教会关于经济组织的教导，而且产生了令人艳羡的社会和平。奥地利基本没有受到 1968 年西方世界风暴的影响，苏联对其邻国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的“布拉格之春”的镇压也没有对它产生太大波动，它已经成为远离冷战风暴的天堂，虽然它接纳了 9.6 万捷克流亡者。

不过，教皇对现状的称赞还有另一层含义：希望一个月前在刚刚议会取得绝对多数的社会党人最好不要对运转如此良好的制度作过于深刻的改变。新政府也欣然顺应，虽然它也提出了各种左派言论。保守派有时也很担心社会党人关于社会解放和民主化的纲领，但总的说来，变革是温和的。社会党人继续社会合作、政党比例分配制、协作

和共识的"奥地利道路"，这样的状况在繁荣和平之中延续了十多年，而这个时期的领导人布鲁诺·克莱斯基的地位是如此牢靠，以致这个时期又被称作克莱斯基时代。

克莱斯基来自1938年后被毁灭的维也纳犹太资产阶级社会，这真是奥地利历史的反讽。克莱斯基1911年出生在维也纳，1926年加入社会民主党，1935—1936年曾被许士尼格当局监禁。1938—1945年，他流亡瑞典。大战结束后，克莱斯基成为大联盟政府中一个重要的外交决策者，并于1959年到1966年担任外交部长。奥地利中立政策的提出十分成功，而克莱斯基是这一工作中的核心人物。他还从1956年后担任议员。尽管如此，他的外交官背景和犹太资产阶级的家庭出身还是让他成为社会党中的局外人。1966年大选的惨败给了克莱斯基机会，他决心以"现代派"候选人的姿态挽救社会党。富有政治头脑的克莱斯基抓住这个机会，排除万难，成为社会党的首脑，1970年又担任了总理。

人民党试图利用众多奥地利人的反犹偏见来反对克莱斯基。在1970年的竞选中，约瑟夫·克劳斯自诩为"一个真正的奥地利人"(Ein echter Österreicher)，这显然是在影射——虽然是间接地——克莱斯基的犹太出身。但克莱斯基的精明足以应付这类攻击：在淡化自己的犹太身份的同时，他把自己打扮成新奥地利的现代派领导人，他站在年轻人一边（尽管自己已接近60岁），为了寻求他们的支持，他建议将义务兵役期从9个月缩短为6个月。3月的大选后，社会党首次成为战后奥地利最大的党派，但并没有获得绝对多数。克莱斯基组成了一个少数派政府，实际上还得依靠自由党的容忍。当这种安排因为1971年的预算案而破裂时，克莱斯基再次举行选举，10月10日，社会党在奥地利历史上首次取得绝对多数。1975年和1979年的大选中，克莱斯基领导的社会党继续赢得绝对多数。社会党执政超过12年。"至福岛"成为一个社会党人领导的、极为成功的、复合经济体制的福利国家的代名词。

经济繁荣是社会党力量的主要源泉。34岁便担任财政部长的哈内

斯·安德罗什（Hannes Androsch）堪称当时最杰出的经济企划者之一。他延续了科伦时代的增长势头，尽管1973年的石油危机造成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安德罗什推行非正统的经济政策，在维持通货坚挺（将先令与马克挂钩）的同时进行大规模公共投资，并实行高额预算赤字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走势中，奥地利经济异军突起，继续以健康的比率增长，其速度比西德还快。虽然偶尔也有挫折，如在1975年和1981年，但总体而言，奥地利是经济奇迹的教科书，经济学家们把这归因于安德罗什出色的"奥地利—凯恩斯主义"政策（Austro-Keynesianism）。 274

奥地利之所以能躲过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风暴的侵袭，其原因当然很多，但主要原因是这里没有劳资冲突。与每周用电3天的英国[①]不同，奥地利实际上从未发生过罢工。这就提升了投资者的信心，国外投资纷至沓来，基础建设投资和预算赤字的财政代价较低，易于实行。和平的劳资关系是战后的"奥地利道路"和持续的社会合作的成果。

社会党本来可以单独执政，但克莱斯基仍然谨慎地保留了政党比例分配制，确保人民党和资方在谈判桌上有一席之地。克莱斯基任命人民党人科伦为国立银行首脑。在安德罗什的经济政策中，资方从经济增长中获取的利益实际上高于劳动者，原因在于劳资对等委员会中关于工资上涨的谈判受到了限制；不过，由于人人都过得不错，人人也都很满足，于是奥地利这个联合社团怡然自得。到20世纪80年代初，奥地利已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

社会党更感兴趣的是以一种对社会负责的方式经营主要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而不是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在西方国家中，奥地利是经济国有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其比例超过经济总量的1/3，但是各家公司，包括大部分银行，仍按商业方式运转，而不是成为公

① 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政府为了应付因煤矿工人罢工造成的能源紧张，决定严格限制商业用电，从1974年1月1日到3月7日，商业用户每周只能连续用电3天，电台甚至都须停止广播。——译者注

共机构。社会党扩大了工会的法律权力，但它更倾向于促进企业精神和机会平等，而不是强制推行公共管制。对于奥地利一些经济不够发达的地区，如磨坊区，社会党采取减税和财政刺激等举措，巴德—莱昂菲尔登的商人就从中获益匪浅。社会党注重推行更为慷慨的福利措施，如提高退休金和医疗补助；它强调扩大劳工权益，如实行每周40小时工作制，每年4周休假制；这些举措是奥地利经济社会中相互认 275 可、循序渐进的变革模式的另一方面，这种模式最终使得各方境遇都得到了改善。

克莱斯基政府的社会改革纲领同样以渐进的、共识的方针为标志。改革的结果虽然有限，但它的确让奥地利达到了西方世界的标准。1971年和1975年刑法改革的主要幕后人物是克里斯蒂安·布罗达(Christian Broda)，一位怀有进步信念的司法部长。不过，布罗达的激进主义始终受到实用主义的克莱斯基的约束，后者总是盯着选举政治，总想保持和科尼希枢机主教及教会的良好关系。克莱斯基对堕胎合法化特别踌躇，但这项改革措施毕竟获得了公众的认可。枢机主教科尼希反对这项法律，不过他没有造成太大的阻碍。改革还包括很多自由化措施，以便法律能适应新的社会现实。私通不再是违法行为，完全禁止同性恋的做法也被废除，但一些附带条件实际上让奥地利的男同性恋者处于隐秘状态。

家庭法也作了大幅度修改。婚姻从原来的男权性质转变为平等关系。离婚法也作了自由化修改，男女双方获得了较为平等的地位。1979年的公平待遇法规定了同工同酬而不论性别的原则，对奥地利妇女来说，这是一个进步时代，甚至出现了科学和研究部长赫尔塔·费恩堡（Hertha Firnberg）这样的妇女先锋。

费恩堡的新政是较具争议的大学改革的中心议题。社会党企图在奥地利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机会平等，进而建成“无阶级社会”，而教育政策是其努力的核心内容。学童的课本费和上学旅费都被免除，鉴于人民党反对进一步改革中小学教育，社会党决定介入高等教育。战后的大学仍遵循过去的传统，充当保守主义的堡垒，很多前纳粹教授

保持或重新获得了教职。虽然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曾有一些转变，但大学依然等级森严，保守色彩浓重。费恩堡的科研部设立后，大学与教育部的官僚机构脱离关系，于是可以对它们进行深入改革了。1975 年的大学组织法（UOG）将奥地利的高等教育推上了自由化和民主化的道路，随着更具进步思想的青年学者的进入，奥地利的学术机构的守旧特色有所削弱。

276

像大学组织法一样，1974 年的国有广播媒体（ORF）改革也遭到强烈抵制，不过迈向更大自治（以及挑选 ORF 董事会成员）的变革还是让奥地利的广播业走上了更为现代（和左倾）的道路。

克莱斯基政府为奥地利确立了一种更具进步色彩的身份认同，这一工作主要靠的是循序渐进的诱导。在克莱斯基的支持者当中，大约有 5% 的选民属于“资产阶级”，但他们的社会立场是自由的，这就使得社会党执政的时间足以能让新的“社会—自由共识”扎下根来，而且至今还是奥地利社会的共识。

虽然克莱斯基的内政很成功，但他最为著名的工作是外交政策上的突破。克莱斯基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就成为奥地利外交政策的实际领导人。1966 年后担任克劳斯政府外长的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甚至也遵循克莱斯基的基本方针。在完全执掌政局后，克莱斯基让“小小的奥地利”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国际角色。他是积极中立政策的坚定信奉者：奥地利中立的最好保障是积极推动共产主义东方和资本主义西方关系的改善。克莱斯基认为必须有可靠的防御力量，1975 年的国防政策提出以瑞士为模式创建一种全民防御体系。但奥地利的国防开支远远低于西欧各国（和东欧各国）的标准，而奥地利卓越的经济表现部分原因正是在于它的中立从未经受武力的考验。因此，良好的东西方关系对奥地利的利益至关重要。

有的时候，奥地利作为一个与他国接壤的中立者的地位颇为棘手，尤其是当共产党邻国发生危机时，如 1956 年的匈牙利和 1968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在两次危机中，奥地利都表现良好，它为数千名流亡者提供了避难所，虽然有证据表明，在 1968 年的危机中是奥地利驻布拉

格大使鲁道夫·基尔希施莱格（Rudolf Kirchschläger）挽救了奥地利作为一个独立中立国的声誉，当时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对维也纳要求暂停发放签证的匿名指示（据说是瓦尔德海姆发出的）置之不理。后来基尔希施莱格成为克莱斯基政府的外长，接着又在1974年担任总统，在冷战的复杂局势中，他的正直提升了奥地利的声望。

277

克莱斯基同时在两个方向上利用奥地利的中立地位。他利用中立来改善与奥地利的共产党邻国的关系，谋求与邻国开放边界、建立互惠经济联系的可能。另一方面，他利用苏联对奥地利谋求加入欧共体的明显不悦，于1972年签订了一个十分有利的自由贸易协定，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又让奥地利同时搭上了北约和欧共体的顺风车。

早在1970年，克莱斯基就大力支持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而当时西方大国对苏联的这个提议深表疑虑。一个稳定的欧洲显然符合奥地利的利益，但是克莱斯基已经预见到，这个和解的历程——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定（Helsinki Accords）便由此而来——最终将损害共产主义阵营而不是为它提供保障。地方爱国主义的因素甚至也卷入进来：随后的欧安会谈判在维也纳的霍夫堡举行。欧安会的替代组织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的总部仍然设在奥地利的首都。

克莱斯基的积极中立政策的抱负甚至超越了中欧，他最傲人的时刻之一是作为东道主接待了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两位领导人于1979年6月在维也纳签署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 II）。不过，克莱斯基不仅希望维也纳成为两个超级大国的结头站，而且还要充当国际社会的首都之一。1979年8月23日，维也纳成为联合国的第三个所在地，当天，位于维也纳东北郊的一座庞大建筑——联合国城被正式移交给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

建设联合国城是克莱斯基将维也纳（和他自己）推向世界政治中心之努力的顶峰。很长时间以来，维也纳就以作为国际关系中非正式角色的聚集之地而闻名，这种非正式角色就是间谍。一些国际组织也

被吸引到这里，如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便于 1965 年在维也纳设立总部。不过，对克莱斯基而言，最具吸引力的还是成为联合国机构的东道主。

奥地利很长时间以来都是联合国的活跃成员，奥地利部队还经常参与联合国的蓝盔维和部队。现在，克莱斯基利用奥地利在联合国的角色，充当连接第三世界国家的平台。他和奥罗夫·帕尔梅（Olof Palme）、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及随后的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都是社会党国际的积极成员，他还支持不结盟运动，这些政策使奥地利不仅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而且成为了南北之间的纽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维也纳获得了第三座联合国城的地位，而且奥地利驻联合国大使也于 1971 年担任了联合国秘书长。这样，奥地利成为了世界瞩目的中心，它很久没有这样被关注过了。 278

大体上说，上述政策都可被视为积极中立政策的组成部分，但克莱斯基深深卷入中东事务则显然超出了中立立场。石油输出国组织设在维也纳以及奥地利在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中日益增长的优势，这些都是克莱斯基关注中东的原因，正如他参加社会党国际一样。然而，克莱斯基的犹太背景必定是个重要因素，因为他的中东外交的主要目标是实现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居——包括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和平。克莱斯基认为，这样的和平只有在直接谈判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于是，他在 1974 年会见了亚希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并倡导双重承认，即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西方国家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奥地利率先做出表率，于 1980 年正式承认了巴解组织。这样的行动使克莱斯基和奥地利在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国家以及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深受欢迎，但引起西方舆论的敌视，同时也激怒了以色列和世界各地的许多犹太人。

毫无疑问，克莱斯基与犹太人和犹太国家的关系是极为矛盾的。以色列人认为，克莱斯基想通过牺牲犹太人的利益来换取同阿拉伯人的良好关系。当他于 1973 年 9 月关闭苏联犹太人前往以色列的申瑙（Schönau）过境营地时，以色列政府对这一向阿拉伯恐怖分子“投

降”的行径感到愤怒。对以色列和一些其他国家来说，克莱斯基对1975年12月欧佩克会议遭袭一事的处理是更为懦弱的投降行径。

279 很多犹太人也因为克莱斯基对奥地利历史的暧昧立场而诟病他。西蒙·维森塔尔，这位以维也纳为基地的著名的纳粹追查者一直查到了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但他招致克莱斯基的敌意，因为他在1970年和1975年揭露克莱斯基的阁僚（即汉斯·奥林厄［Hans Öllinger］）和未来的合作者（即弗雷德里希·彼得［Friedrich Peter］）曾是冲锋队成员。克莱斯基并不认为这是个开启奥地利历史辩论的机会，在他看来，这是政治上与人民党有牵连的维森塔尔企图削弱社会党的一个步骤。

克莱斯基从一开始就接受奥地利是纳粹的第一个受害者的“致命谎言”，而且他认为自己是个政治流亡者，而不是犹太难民。作为一个不可知论的社会主义者，他认为，与奥地利的社会民主事业和世界的和平与正义比起来，他的犹太身份微不足道。为了实现更美好的未来，他愿意忘记过去，更何况在他眼里，奥地利确实变得更开明了——这也是他政策的结果。在他与维森塔尔的积怨中，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进步主义者战胜了一个无法摆脱过去的反动派。

在1975年的“彼得事件”（Peter Affair）[①] 中，克莱斯基的某些行动并不是完全合理的，如他曾评论说：“如果犹太人是一个民族，那也是个悲哀的民族。”[②] 克莱斯基在为这一说法辩护时声称，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他从不认为存在一个犹太民族，因此其特征也仅仅是推想出来的。但是，何以推想出来的特征如此消极呢？部分原因是，他出身于被解放、被同化的奥地利犹太资产阶级。当他在1973年对戈尔达·梅厄（Golda Meir）夫人说“你与我属于不同的世界”时，某种意义上讲他是在声明，他与以色列和梅厄夫人代表的那种犹太身份认

---

① 彼得事件指的是克莱斯基和维森塔尔之间积怨的一个插曲，彼得即前文所指的弗雷德里希·彼得，1975年，克莱斯基曾试图任命这位自由党领导人、前冲锋队成员为阁僚。——译者注

② Pick, *Guilty Victim*, p. 107.

同存在距离。

不过，克莱斯基对犹太人的事业和以色列的利益也表现出很大的同情。在他的协助下，奥地利成为苏联犹太移民的中转国，虽然阿拉伯恐怖主义的威胁已经让荷兰和挪威不敢承担这一角色。关闭申瑙过境营地实际上对奥地利作为中转国的角色影响甚微或没有影响。奥地利管理下的新营地又在沃勒斯多夫（Wöllersdorf）开放，在申瑙营地关闭后，途经奥地利的苏联犹太人比以前更多了。他坚定地支持以色列的生存权并认为应保障这一权利——既然它已经存在了。当 1975 年的联合国决议将犹太复国主义与种族主义等同时，奥地利进行了谴责。克莱斯基还秘密帮助 1982 年入侵黎巴嫩时被俘的以色列士兵获释，尽管当时以色列舆论正因为他强烈批评入侵行动而大肆中伤他。 280

在劝说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与以色列展开和谈的过程中，克莱斯基也起了重要作用，1975 年和 1978 年初，萨尔茨堡的克莱斯海姆宫（Klessheim Palace）中举行了两次关键性会谈。但是，当以色列和埃及于 1978 年 9 月在戴维营（David Camp）签署和平协议时，克莱斯基是少数对和约感到不满的西方领导人之一，因为和约忽视了巴勒斯坦的不幸处境。在当时，这种批评被视为典型的克莱斯基式“犹太问题”而被摈弃，但今天，他的批评看来是有远见的。

大部分奥地利人对“皇帝布鲁诺”外交尝试中的小瑕疵并不介怀。作为“至福岛”上的一员就意味着不怎么关心政治。社会合作意味着局面比以前更好，不管怎样，经济比以前更繁荣了。奥地利欣欣向荣的娱乐业现在可以满足国内消费主义的增长。巴德—莱昂菲尔登迅速扩张，城里人（主要来自林茨）建造的消夏寓所吞噬了过去的土豆田。一个新的“文化中心”设立了，并附带有网球场。由于受附近铺设从俄国到西方的天然气管道的刺激，村子里的老酒馆变成了时髦的迪斯科舞厅。克莱斯基对奥地利的共产党邻国采取友好政策，1978 年 12 月，捷克斯洛伐克开放了边境通道。巴德—莱昂菲尔登建起了带室内游泳池的饭店，卡斯特纳在小镇的边上开办了一个很大的工厂。

到20世纪80年代，卡斯特纳的产品在奥地利的各地的商店里都能见到，甚至国外也有销售，不过莱昂菲尔登人则抱怨产品质量下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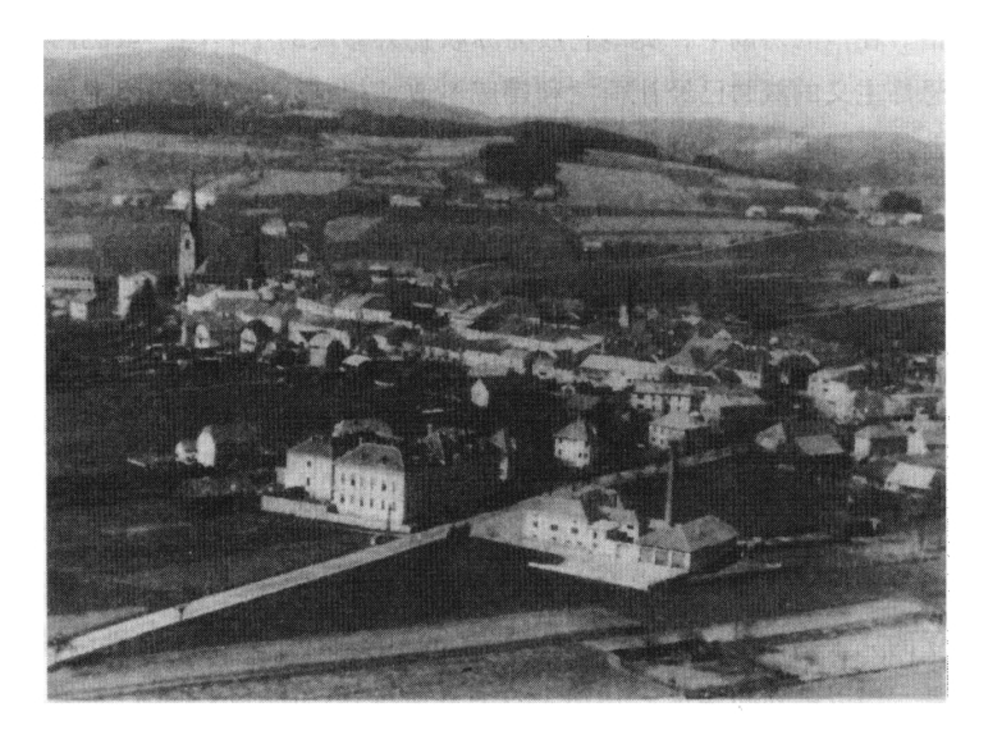




插图44　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的莱昂菲尔登（巴德—莱昂菲尔登同乡会）

在维也纳，有一种在经济上赶上更为繁荣的西奥地利的自觉努力。这个城市复兴的关键环节是高瞻远瞩的交通政策。对于日益青睐小汽车的潮流，社会党人治下的维也纳反其道而行之，继续着力发展公共交通。对一个现代都城来说，拥有地下轨道交通网某种意义上是件关乎荣誉的事，不过维也纳的地铁（U – Bahn）（第一期于1976年投入使用）被融入了一个更大的体系，它与市中心的步行道建设和维也纳发达的电车网的重建结合到了一起。这种规划当时与众不同，但此后便成为都市交通规划的楷模。 282

奥地利的经济发展起步较晚，但它恰当地与“奥地利—凯恩斯主义”战略结合了起来，这种战略强调采取反周期公共投资（counter – cyclical public investment），以提高经济基础设施的水平。在1970年，奥地利的经济仍然落后于英国，但到20世纪80年代，奥地利已经领先了一大步，同时还保持着自身的社会同质感和政治共识。它的中立如今成为其优越地位中一个备受褒奖的象征：它幸运地与西方联系在一起，但又充当连接共产党东欧的通道。

旅游业继续发展，无论是冬季还是夏季旅游。音乐节和文化节继续繁荣；不过普通奥地利人最感兴趣的还是运动员的精彩表现，如滑雪运动员安妮玛丽·摩泽尔—普乐尔（Annemarie Moser – Pröll），如赛车手约亨·林特（Jochen Rindt）和尼基·劳达（Niki Lauda）。有两件体坛大事甚至成为民族认同的一部分：弗兰茨·克拉默（Franz Klammer）在1976年因斯布鲁克冬奥会上奇迹般地获得金牌；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上奥地利足球队战胜西德队。“皇帝布鲁诺”（Kaiser Bruno）领导着一个幸福、繁荣而且普遍满意的国家。

思想文化生活也有了可喜的发展。在艺术方面，怪诞写实主义（Fantastic Realism）流派为自己赢得了声望，其代表画家有恩斯特·福克斯（Ernst Fuchs）、阿里克·布劳尔（Arik Brauer）和弗里登斯莱希·洪达特瓦萨（Friedensreich Hundertwasser）。更为前卫、更具轰动效应的是赫尔曼·尼奇（Hermann Nitsch）等人的行动主义

(Actionism)。彼得·汉克(Peter Handke)、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和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等人都堪称德语文学和世界文坛的革新者。奥地利的流行乐明星甚至也赢得了国际声誉,如法尔科(Falco)的名曲“Rock me Amadeus”(1985)。

20世纪70年代还是个真正热衷于重新发现维也纳1900的时代。分离派和奥地利表现主义的艺术越来越受欢迎。对马勒(Mahler)的音乐的兴趣也不断上升,部分原因是它被用在了卢西诺·维斯孔蒂(Luchino Visconti)的《威尼斯之死》(Death in Venice)(1971)中。对世纪末维也纳的兴趣之所以能复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工作有一个强有力的思想背景。美国人卡尔·朔尔斯克(Carl Schorske)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文中将世纪末维也纳描绘成这样一个楷模:政治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如何导致现代主义主观文化的兴起的。到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已开始认为,维也纳1900或许是20世纪初现代文化的主要中心。这种探讨不仅有利于旅游,而且为当代维也纳平添了声誉,注意力转回维也纳也有了理由,而这里正是社会党的堡垒。

283

所有这些成功的发展趋势何以在20世纪80年代初迅速转向恶化,乍看起来确乎是难以理解的。不过,社会党垄断地位的基础在于选举的胜利,但这种胜利仅仅是高出几个百分点。克莱斯基政府要想继续执政,必须依靠纪律、手腕和相当大的运气。当初期富有生气的改革于1975年前后结束时,那些困扰所有长命政府的难题就显现出来。

一个主要困难是克莱斯基和安德罗什之间出现了争吵。争吵部分源于政策分歧,克莱斯基注重充分就业,而安德罗什坚持坚挺的货币政策、反对赤字开支。但主要原因是克莱斯基从1974年起怀疑安德罗什是个篡权者。安德罗什在财政界不断上涨的声望只能加剧克莱斯基的不信任。后来,他指控安德罗什假公济私,并于1981年解除了后者的职务。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由于安德罗什不再掌管经济事务,

赤字一路攀升，国际金融家对奥地利失去了信心。经济问题接踵而来：1983 年 1 月，失业率逼近 5%，达到 1960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一个日益倾向于货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时代，奥地利—凯恩斯主义看来难以奏效。

在外交政策方面，美国的里根（Reagan）政府对克莱斯基的巧妙伎俩不感兴趣，社会党国际也不再是个重要论坛。1981 年，瓦尔德海姆连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努力没有成功，穆亚马尔·卡扎菲（Muammar Gaddafi）上校 1982 年 3 月对维也纳的国事访问是个令人尴尬的失败。与此同时，克莱斯基所谓的亲阿拉伯政策也没有让奥地利人——尤其是奥地利的犹太人——幸免于 1981 年和 1982 年的众多恐怖袭击。虽然克莱斯基的政策富有前瞻性，但没有人愿意听他的。

克莱斯基政府的成就已经够大了，以致选民都变得麻木了，要想取悦他们也更难了。1983 年初，奥地利的经济表现依然比大多数西方国家好得多，但还不足以好到让奥地利人满足的程度。政府在社会自由化方面的成就也产生了对它不利的后果。奥地利公民社会出现了，它独立于国家、教会和政党权威，它开始顶撞、甚至逼迫政府。民间行动的一个重要领域是环境问题。1976 年，克莱斯基政府征得人民党赞同后，在茨温滕多夫（Zwentendorf）建造奥地利第一座核电站。但电站从来没有发过电，因为抗议和民间行动导致了 1978 年的全民公投，结果反对核电的投票略微占了多数。克莱斯基只得接受这个结果，但他在 1979 年的大选中依然获胜。不过，环保主义者并不满意政府的技术至上方针。眼见周围生态危机四伏，环保主义者发起了绿党运动（Green movement），这场运动后来成为奥地利政治中的第 4 种势力，而它的兴起主要损害的是社会党的力量。

284

2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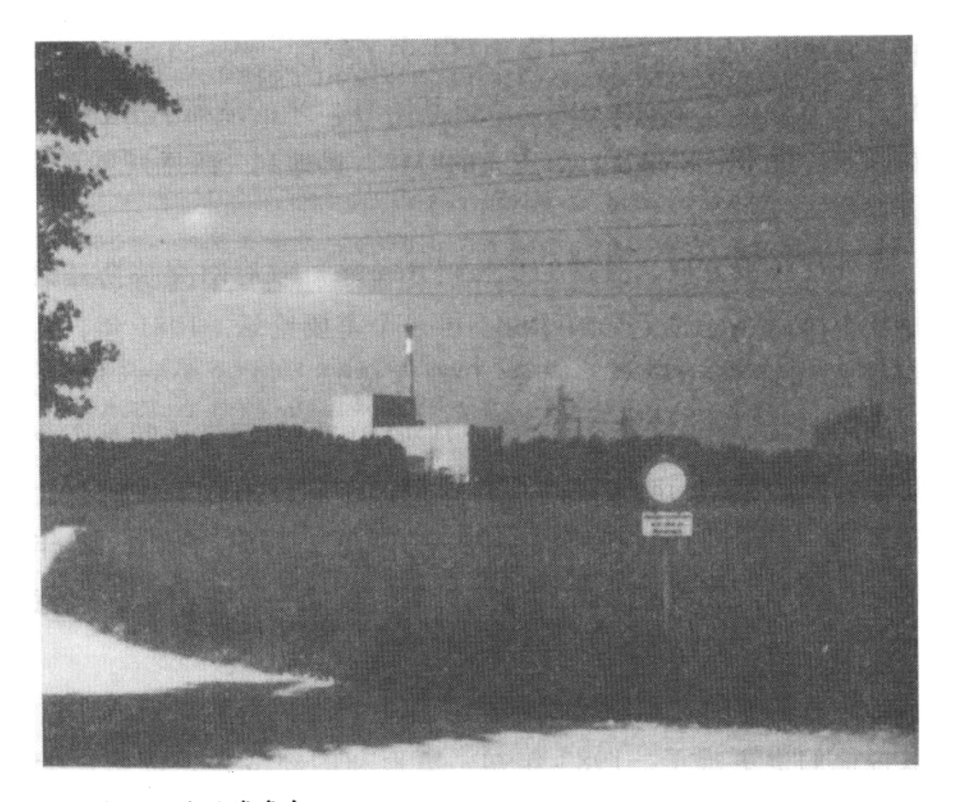


插图 45　茨温滕多夫

成功中的危机的另一征兆是一系列的腐败丑闻，这些让政府焦头烂额的丑闻主要牵涉维也纳新医疗中心（AKH）的建设。这本来是个雄心勃勃的工程：既要重回国际先进行列，又要提供一流的社会化医疗服务；但是工程最后只是揭露了新精英阶层是何等腐败和损公肥私，甚至安德罗什也卷入 1981 年的审判中。在 10 年的执政过后，社会党领导集团现在被视为"国家党派"。奥地利公众现在已更为富有、更有教养，在大众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与社会党有牵连的丑闻的刺激下，他们认为克莱斯基是个没有节度的年迈之人，而非当初的改革英雄。1983 年 1 月严冬时分，克莱斯基同意以一揽子经济紧缩计划以应对最近的财政危机——同时他又跑到自己在马洛卡岛上的别墅中度假。

在 1983 年的大选中，社会党首次丧失在议会中的绝对多数。克莱斯基随后辞职，继任者是弗雷德·季诺瓦茨（Fred Sinowatz）。社会党改变以前的常规，与自由党组成联合政府。自由党原本是前纳粹分子的党派，但 1983 年该党的领袖诺伯特·施蒂格尔（Norbert Steger）是

个温和派，他想把自由党改造成一个中间自由派政党。联合执政的难题在于，自由党内的民族主义右翼对施蒂格尔来说太强大了，由此造成的党内动荡成为奥地利政治中一个不成文的规则。

但经济依然停滞，失业率仍在攀升。由于“高枕无忧的”国有工业亏损日益严重，预算赤字更形严重，这就需要更多的税收。环保主义者抗议在多瑙河上的海因堡（Hainburg）建造大型水电站。牵涉社会党“Schickeria”（面子）的丑闻日渐增多。1984 年底爆出了以乌多·普罗柯什（Udo Proksch）为中心的“卢克那案件”（Lucona Affair）[1]，安德罗什再度受到调查。奥地利仍然是世界上最繁荣、管理最出色的国家的之一，但这些都徒劳无益。心怀不满的奥地利公众认为季诺瓦茨是个捣蛋鬼。

季诺瓦茨的霉运在 1985 年 1 月达到了顶点。当时，世界犹太人大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二战后首次在维也纳举行。这本来是季诺瓦茨的一个胜利，但事实表明这在公共关系中是一场灾难：1 月 24 日，即会议召开前两天，奥地利国防部长、自由党人弗里德赫姆·弗里兴施拉格（Friedhelm Frischenschlager）亲自欢迎一个从意大利监狱中返回的战犯瓦尔特·里德尔（Walter Reder），并和后者握手。在随之而来的喧嚣中，弗里兴施拉格勉强作了道歉，但并没有辞职，尽管世界犹太人大会和国际舆论十分愤慨。这只是奥地利人与世界、与自己的过去、与自身的关系之大动荡的开端，而这场动荡至今尚未平息。 286

三、为未来而反省：1985 年以后的历程

1985 年 5 月 15 日，奥地利人回首过去 30 年极为成功的独立岁月时自然不无骄傲。不过，若回首随后的 20 年则远非那么愉快。奥

---

[1] 卢克那是一艘货船的名字，1976 年，奥地利企业家普罗柯什租用这艘船运送铀矿石，并为此在保险公司投下高额保险金。1977 年，货船在印度洋爆炸沉没，6 人殒命，但保险公司拒付保金，因为它猜测货船上装载的并非铀矿石，而是废铁。由于普罗柯什在奥地利政坛的人脉关系，调查部门并未澄清此事。直到 1985 年，普罗柯什才因欺诈嫌疑被逮捕，但很快就被释放，并逃亡他国。后有记者调查此案，称之为“世纪丑闻”。——译者注

地利历史问题的重现给这个时期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对于这个位于中欧中心的国家来说，这个时期本来充满了机会。当奥地利进入21世纪时，它已经经历了一段时好时坏的历史，而它的这些经历远非是“清白”的。奥地利人是否会因此变得更明智、更友善，仍须拭目以待。

里德尔事件是一系列剥去奥地利至福岛形象的危机中的第一个。4月份又爆发了布尔根兰葡萄酒丑闻：部分葡萄酒制造商被发现向上等甜点葡萄酒中添加可能致命的二甘醇作为抗冻剂，以图提高酒的级别和价格。这个事件摧毁了奥地利蒸蒸日上的葡萄酒行业，也损害了奥地利的国际信誉。

1985年夏天，在蒂罗尔，林恩的安达尔（Anderl of Rinn）遗骨一事再次表明，奥地利的历史问题仍然在造成创痛，即使是非常遥远的历史。相传安达尔是中世纪犹太人祭祀杀生中的受害者，直到1985年，他的遗骨仍然摆放在尤登斯坦（Judenstein）供人朝拜。当有人计划把遗骨迁走时，保守派表示反对——不过他们显然不关心那些与遗骨相关的血腥的诽谤论调会永久流传下去，危机就这样开始了。在经过一番非常奥地利化的妥协后，安达尔的遗骨从高高的祭坛上被请了下来，装进小棺材后镶在了教堂的墙上。当然，搪塞过去并没有掩盖奥地利作为一个反犹国家的消极形象。

287

这类事件虽然揭露了奥地利的另一种历史，但它们基本没有搅动奥地利的公共生活。在自由党内部，施蒂格尔受到右翼分子、准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卡林提亚的党派领袖约尔格·海德尔的抨击，不过海德尔还只是个不起眼的麻烦制造者。“奥地利道路”仍在运转，奥地利仍然信赖自己的中立地位。1985年，奥地利的外交政策仍然受以下问题的支配：到底购买哪种二手战斗机，如何处理与东欧邻国的关系以及对南非的制裁问题。“中欧”已出现一些骚动，但直到1985年底，人们很少关注此事。为了对奥地利较近的历史作更为彻底的再审视，奥地利和外国学者也做出过一些建设性努力。但是，这些轻微的震动都难以影响战后奥地利精心构筑的、看起来如

岩石般牢固的形象。

但瓦尔德海姆事件改变了这一切。

1985年11月，库尔特·瓦尔德海姆毫无争辩地成为奥地利人民党的总统候选人。瓦尔德海姆曾是奥地利的外长和联合国秘书长，但他没有党派牵连。他与克莱斯基共事良好，1985年年初，社会党和人民党就曾商讨联合提名瓦尔德海姆为总统候选人。虽然库尔特·施泰尔（Kurt Steyrer）后来成了社会党候选人，但瓦尔德海姆显然更被看好。瓦尔德海姆让美国的右派和亲以色列的犹太团体颇感不悦，因为他讨好苏联和阿拉伯人，不过这些在奥地利的政治中无关紧要。鉴于他有“全世界都信赖的人”的出色记录，鉴于他关于“德国占领”时期的自传无甚特别之处，看来他就是奥地利总统的理想人选。

但是，在提名后不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1986年1月，在一个纪念亚历山大·洛尔将军——一个被判罪和处决的战犯——的仪式上，有人提到，瓦尔德海姆曾当过洛尔的副官。社会党的策划者们至迟从1985年夏天就听说过瓦尔德海姆的“褐色历史”，不过，真正对此事进行认真调查的只有记者们，其中最著名的是《侧影》（Profil）杂志的记者胡贝图斯·采尔宁（Hubertus Czernin）。调查的结果见诸3月发表的一份重要报道，报道介绍了瓦尔德海姆实际的战争记录，其内容与他的正式表态呈现强烈的对比。这表明，瓦尔德海姆在自己的历史问题上撒了谎，他在德国战争中的卷入之深也远远超出他假装的程度。

288 这件事本来能迫使瓦尔德海姆和奥地利人承认他们对历史的歪曲和否认。而另一方面，很多西方媒体组织，最突出的是3月底的世界犹太人大会，在对证据进行初步审查后有点过分地宣称，瓦尔德海姆是个“战犯”。正如后来表明的，从严格的法律角度说，这个说法并没有材料为支撑。大多数奥地利人对瓦尔德海姆明显的欺骗行为基本视而不见，而是紧盯着“战犯”一说。甚至维森塔尔和克莱斯基也联合起来抗议这种“卑鄙的攻击”（但克莱斯基后来改变

了看法）。

关于欺骗和伪造的控告折腾了好几个回合，瓦尔德海姆并没有让步，总统基尔希施莱格任命一个委员会负责澄清瓦尔德海姆的战争罪行。瓦尔德海姆在为自己辩护时声称，他只是做了当时每个奥地利人都做了的事，这就是“履行我的义务”。这样，他就把战争时期的整个一代人牵连到自己的历史记录中了，同时他让这些人都期待其战时行为能被原谅，既然他们只是在履行“义务”。但没有多少人询问（但很多人已意识到）是向何人何物履行这种“义务”。

瓦尔德海姆阵营还祭出奥地利政治煽动中的王牌：反犹主义。面对瓦尔德海姆的众多反对者，这个阵营开始集中攻击的是世界犹太人大会。美国媒体的批评被当作来自美国“东海岸”（Ostküste）的言论而不予理睬，而东海岸一词恶毒但出色地把美国媒体与备受鄙视的原东欧犹太人（Ostjuden）联系了起来。对可怜的瓦尔德海姆的攻击无非是——用他本人的话来说——“犹太人的谎言”。面对“犹太人的攻击”，一份无耻的招贴做出了这样的答复：“我们奥地利人选举我们想选举的人。瓦尔德海姆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适合！”[①] 就这样，国民要求自主选择的情绪被误导了，正是在这种情绪发泄中，奥地利人选择了瓦尔德海姆。在5月4日的第一轮选举中，瓦尔德海姆没有获得绝对多数，但他仍于6月8日当选为总统。6月9日，季诺瓦茨辞去总理职务。

290 1986年夏天的奥地利是向右转的。7月，瓦尔德海姆就任总统一个星期后，保守派赫尔曼·戈罗尔（Hermann Groer）被任命为维也纳大主教，接替弗兰茨·科尼希。最关键的变化也许发生在自由党内部：9月13日，海德尔的支持者从施蒂格尔周围的温和派手中夺取了控制权。奥地利这匹马看来走上了一条几十年来都未曾预见过的道路。

---

① *Der Spiegel* , 14 April 1986, p. 139.



插图 46　戴克斯："奥地利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曼弗雷德·戴克斯）

然而，奥地利政坛上演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幕中的主角是原财政部长和新总理弗兰茨·弗拉尼茨基（Franz Vranitzky）。弗拉尼茨基为人果断，行事实际，当海德尔执掌自由党后，他的第一个步骤是终止联合执政并进行选举。但 11 月的选举结果让人颇感意外。社会党仍然是最大的党，但力量遭受重大损失；但人民党也远非赢家，它同

样丢失了地盘。最大的胜利者是海德尔蛊惑人心的右翼政党自由党，该党赢得了近10%的选票，比1983年翻了一番。两大党的领导层都深感震动，面对这种局面，双方于1987年初又回到了老路上：组成大联盟政府。

对人民党而言，这是个局部的胜利，但是作为联盟中的小伙伴，它的处境并不好，因为它必须为那些社会党仍掌握最后决策权的政策承担责任。而社会党在忍受它的主要政治对手作为政治伙伴的同时，也可以推行经济改革并把改革责任归咎于"资本主义的"人民党。这种问责游戏必然以丧失选票为代价，不过最初这还不是个紧迫问题，因为两个联盟者的得票率仍超过80%。因此对奥地利来说，1987年是在经济和外交事务上做出一些关键性、并更为亟需的决策的年份。3月开始与欧共体举行建立更紧密关系的谈判；4月制定了一个对国有工业进行合理化和部分私有化改革的方案。9月达成了关于1988年的紧缩预算案，这一年终于再现高增长率，其速度远远超过其他西欧国家。

但是，瓦尔德海姆事件仍挥之不去，奥地利也被迫认识到，国内决策的确给对外政策带来了影响。西方各国政府下达了禁止与瓦尔德海姆会晤的非正式禁令，在他担任总统的6年中，他作为国家元首访问的国家仅仅有梵蒂冈、塞浦路斯（Cyprus）和几个阿拉伯国家。1987年4月27日，瓦尔德海姆被列入美国嫌疑战犯监控名单，从此不能进入美国。维森塔尔一向不会宽恕，但这次他一反常态——虽然从政治上说可以理解——谴责把瓦尔德海姆列入监控名单，而奥地利境内脆弱的小型犹太社团的领导人则徒劳地向世界犹太人大会申诉说，对瓦尔德海姆的攻击正在挑起反犹情绪。在国内外的联合施压下，5月19日，瓦尔德海姆部分承认在处理对他的控告时举止失当，当天还宣布召集一个国际历史学家委员会来处理瓦尔德海姆的战争行为问题。

291

委员会在9月召开了第一次会议，1988年2月，有关报告便草拟好了，这份报告是毁灭性的。报告确认，指控瓦尔德海姆为战犯并不成立。但是，他的确作为德国国防军的军官参与了在巴尔干和萨洛尼卡（Salonika）的战斗，他所在的部队也的确犯下了野蛮的战争暴行。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他参与了这些暴行，但他显然知道这些行动，因为各种相关命令上有他的草签——而且他没有采取任何举措去制止这些暴行。国际历史学家委员会的一位成员杰拉德·弗莱明（Gerald Fleming）写道，瓦尔德海姆是“造成这些事件的军事机器的一部分”。瓦尔德海姆没有辞职，他要求赦免战争罪行，但不管怎样，这对他本人和奥地利的形象都是个决定性打击。瓦尔德海姆的生平故事，还有战后奥地利的历史，被证明是建筑在谎言之上的。3月11日是德奥合并50周年，虽然留出了一个“反思”的时刻，但瓦尔德海姆事件使得50年前的历史对大多数奥地利人而言变得太过切近了。

奥地利的生活仍在继续。陶恩高速公路（Tauern motorway）的开放完成了纵贯欧洲南北的高速公路轴线。奥地利的滑雪运动员取得了很多胜利。奥斯卡·布罗纳（Oscar Bronner）的新型进步主义日报《标准报》（Der Standard）于10月开始出版。经济再度快速发展，年增长率超过4%。但瓦尔德海姆事件揭开的奥地利历史丑闻却没有缓解的迹象。8月，仍然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海德尔称奥地利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畸形儿”。托马斯·伯恩哈德的《英雄广场》（Heldenplatz）于11月6日在城堡剧院首演，而当天正好是“水晶之夜”的纪念日。这部剧作取得了“轰动性成功”：当伯恩哈德剖析奥地利对其过去看法的虚伪时，遭到了观众的嘘声。当伯恩哈德于1989年2月去世时，他在遗嘱中禁止在奥地利上演他的作品。赫尔德里卡（Hrdlicka）的《反战和反法西斯纪念》（*Memorial against War and Fascism*）同样遭到公众的抗议，不过公众这次批评的理由是，作品只会让被认可的奥地利历史永远处于乖张的扭曲状态。1989年4月1日，当前皇后齐塔下葬在嘉布遣会的地下墓室时，奥地利几乎出现了一种对君主制“美好时代”的感伤怀旧之情。“至福岛”的岁月看来过去了。

292

与此同时，国际局势的急剧演变正在改变战后奥地利的外部地位。由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开始对苏联进行全面改革，并宣布不干涉东欧国家事务，“中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实

践行动。1988 年 5 月，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宣布联合举办 1995 年世界博览会，奥地利还与原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其他继承国展开了重建文化和历史联系的谈判，在艾哈德·布泽克（Erhard Busek）于 1989 年 4 月被任命为科学部长后，这个“计划”得到大力推动。但是很少有人——如果真有的话——预见到 1989 年东欧和中欧发生的剧烈变化。

4 月，波兰政府邀请团结工会举行会谈，此举是个信号，它已经预示着秋天的投降。5 月，已部分实现自由化的匈牙利开始在奥匈边境拆除“铁幕”，但是这一举措的全部效应要到 8 月才显现出来。在泛欧联盟（领导者为奥托·哈布斯堡）于奥匈边境两侧举行的一次“野餐会”上，分割两个国家的铁丝网被正式切断，匈牙利当局被劝说准许东德“旅游者”免签穿越这条边境。于是东德人争相借道匈牙利逃往西方，共产主义东欧瓦解了：11 月，柏林墙被推倒；布拉格的丝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取得成功；罗马尼亚也发生革命。到 1989 年底，东欧的面貌已经改变。

对奥地利来说，这是令人欣喜的事情。12 月初，数千捷克人来到维也纳，以欣赏前哈布斯堡首都圣诞节前的华彩表演，这些来客受到热烈欢迎，因为这也意味着奥地利人的解放。维也纳街道上通往布拉格、布尔诺（Brno）、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和布达佩斯的环线标志，其意义跟几十年来的意义已经不同了。维也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重享在中欧的光辉地位。与布达佩斯共同举办博览会的计划已经开了个好头；对正在出现的新欧洲进行规划的欧洲圆桌会议也召开了。1990 年 6 月，应瓦尔德海姆的邀请，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和德国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共同出席了萨尔茨堡艺术节。

然而，局势转变带来的愉悦并没有真正持续多久。对新近被解放的东方人民的欢呼很快就被担忧所取代：外国的廉价劳工、想靠奥地利国家为生的冒牌避难者将如洪水般冲破边境线。奥地利的仇外情绪受到一些不怀好意的政客的挑唆，而他们当中首当其冲的是海德尔。早在 1990 年 9 月，奥地利军队就奉命增强打击非法移民的边境警备队

的力量。

不久之后，德国重新统一，奥地利在中欧政治中的地位黯然失色。到 1989 年，奥地利的战略地位在向坏的方向转变，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世界局势。现在已不可能继续依靠中立来逃避世界演变的大势，也不能像克莱斯基那样高超地玩弄东西方平衡策略，相反，奥地利面临靠边站的可能。1989 年是奥地利人重新审视自己的好机会，他们也必须这样做。

政府也曾做出一些努力，以图再次让奥地利成为其他中欧国家和平友好的、地位平等的导师，并通过历史和文化达到某种后哈布斯堡认同。正因为如此，对世纪之交的维也纳和中欧的兴趣的复兴才受到鼓励。文化和经济关系是相互促进的。但“中欧”院外势力更为宏大的构想因为奥地利缺乏自信而遭受挫折。1991 年 5 月，维也纳人拒绝与布达佩斯共同主办 1995 年世界博览会，奥地利人看来不是很愿意全心全意地拥抱他们的后共产主义邻居。

从 1989 年以后，奥地利外交政策的主攻方向转向了西方，也就是转向了欧共体。从欧共体于 20 世纪 50 年代成立伊始，奥地利国内就有一支强大的游说势力要求加入共同市场。1963 年在因斯布鲁克以南 294 建造的欧洲之桥，某种程度上便反映了奥地利依恋欧洲的哀婉之情。由于奥地利与西德的经济联系空前紧密，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也就更具经济意义了，而且加入欧共体也被视作奥地利进一步在西方站稳脚跟的步骤。

但反对奥地利加入“欧洲”的力量也很强大。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实际上对此仍有否决权，不过这一阻碍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而逐渐隐去，奥地利于 1987 年便开始与欧共体商讨进一步加强联系，苏联对此没有太大的抵制。1989 年 7 月 17 日，奥地利申请成为欧共体的正式成员，当时正是苏联的东欧帝国分崩离析之时，对奥地利来说，这个摆脱自己的东欧宿命的机会颇具诱惑力，因此很难说这两件事一起发生是个巧合。

反对加入欧共体还有内政方面的考虑。中立已成为奥地利身份特

征的一部分，而加入欧共体必然意味着政策自主程度的降低。一些左翼人士认为，加入欧共体将威胁到奥地利已然十分发达的福利国家制度。而且，奥地利来之不易的“民族”身份认同将因为加入欧共体而受到损害：奥地利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和语言上都会被德国淹没。

政府对这些问题有相当清晰的认识。1995 年加入欧共体的条约中有一些古怪的条款，其中有一个特殊货物名录，名录上的货物，如杏仁，只能以其奥地利名称 Marillen 在奥地利销售，而不得使用德语名称 Aprikosen。然而，1989 年的巨大震荡使两大党派的领袖都认识到，除了加入欧共体之外别无他途，当南斯拉夫分裂造成的枪战和炮击于 1991 年蔓延到奥地利土地上时，这个决定进一步坚定了。两党领袖都认为，欧共体正在成为更为统一和强大的机构，而且正如久拖不决的过境权争论所表明的，身处欧共体之外将削弱奥地利在谈判中的地位。

还有另一种内政方面的考虑：加入欧共体就必须接受欧共体的所有既定法律，全面修改奥地利的法律——但通常是在现代化和自由化方向上修改。采用欧洲标准带来了自由化影响，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男性同性恋的合法化，奥地利人对其男女同性恋的认可态度大为加速。295 刚刚凸现出来的艾滋病危机使得这种立场上的转变显得特别恰当。

奥地利加入欧共体的那几年也被称为“奥地利为欧洲做准备”的时代，它需要对国有工业进行私有化和合理化改造，改革并巩固“国家的社会制度”，包括范围广泛的退休金改革。此外，大学和联邦博物馆的改革、扩大低级别联邦直接资助金的自主权等工作也已展开。奥地利的经济表现虽然堪称欧洲最佳，但现代化是要付出代价的，两个联合执政的党派总是因为财政问题发生争吵，奥地利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也发生激烈对抗，特别是因为 1994 年年底达成的“一揽子节俭计划”。“为欧洲作准备”通常还是推行各种政策的借口，这些政策或者确属必须，或者出自意识形态上的动因。而反对欧共体的选民现在则受到海德尔的奉承，后者一夜之间就从准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变成反对欧洲和德国干涉奥地利事务的“奥地利”民族主义者。

1990年10月的选举表明，海德尔的策略有所斩获。社会党仍保有43%的选票，绿党得票率也相当可观，为5%。但人民党遭受重大挫折，得票率仅为32%。最大的赢家是海德尔的奥地利自由党，它获得了17%的选票，成为奥地利抗议者主要的吸引力源泉。随着加入欧共体的日子日益临近，大联盟和政府仍执意推行现代化计划，但是联盟中的一些合作者，尤其是三心二意的人民党人，显然是首鼠两端。

1991年6月，一系列的事变给了联合政府以出乎意料的喘息空间，并使其走上了更为自由化的方向。6月13日，海德尔在玩世不恭地调侃奥地利的历史禁忌时做得太过火了。在卡林提亚省议会上，他以赞许的口吻谈论“第三帝国合理的就业政策”。奥地利政治当局对此十分恼怒，海德尔也被迫辞去卡林提亚省长职务。

几乎在同一时刻，为了适应1989年之后的新局势，联盟中的两大党派采取了调整各自身份特征的步骤。奥地利社会党的步骤纯属象征性的，它将党的名称又改回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而人民党则采取了相当引人瞩目的姿态，选举自由派人士艾哈德·布泽克作为党的领袖。当月瓦尔德海姆宣布他无意竞选连任，奥地利加入欧共体的障碍已被清除，它已真正做好了准备。 296

鉴于瓦尔德海姆事件，这次全国性改革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承认奥地利人在1938年到1945年之间的所作所为。在瓦尔德海姆事件期间，很多奥地利知识分子和学者就曾极力主张，奥地利人应当承认他们对参与第三帝国的罪行负有责任。政府很快在这方面做出表态，例如，它下令奥地利的学校必须讲授1938—1945年的历史，政府内部也有很多人主张，奥地利承认战争责任是重建奥地利的国际声誉、使奥地利能跟上欧洲未来的第一步。态度上的变化的确发生了，但很缓慢。

1988年，奥地利政府对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做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姿态：每人一次性获得2 500—5 000先令（合200—400美元）的“荣誉赔偿”，这个姿态很难弥补奥地利官僚机构在补充和赔偿问

题上臭名昭著的拖延行径。与此同时，英国历史学者罗伯特·奈特（Robert Knight）发表了一则无法回避的证据，它表明，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这种拖延一直是奥地利的官方政策。1990年，奥地利政府进一步拨款支付犹太幸存者的养老金，并为犹太老人之家提供资助，但是，直到1991年7月8日，即瓦尔德海姆当选总统5年后，弗拉尼茨基才在议会的演讲中承认，奥地利对历史上的善与恶负有集体责任。

这是奥地利领导人首次承认奥地利人参与了犹太大屠杀，承认奥地利应对此担当的道义后果。物质后果则表现在新的赔偿体制中，这个体制花了4年时间才组建起来，不过到1995年，“民族社会主义受害者全国基金会”已筹集到5 000万美元，每个奥地利犹太幸存者得到了6 000美元的赔偿。这还只是补偿和赔偿问题转变的开端。

立场的转变远不只是钱的问题。这需要重新塑造第二共和国自我理解的基础。过去人们对奥地利历史文化中任何明显的犹太特征都持相当激烈的抵制心态，而现在奥地利人开始慢慢承认很多犹太人对奥地利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贡献，承认这一贡献中的犹太特征。1993年11月18日，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博物馆（重新）设立，这些行动促进了对奥地利文化遗产中犹太成分的更高评价。

297

与此相应的是同以色列和解的努力。1992年5月，托马斯·克莱斯蒂尔（Thomas Klestil）取代瓦尔德海姆担任奥地利总统。两个月后，奥地利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完全恢复。1993年6月，弗拉尼茨基正式访问以色列，这是奥地利总理首次到访这个国家，1994年11月，克莱斯蒂尔在以色列议会（Knesset）发表演讲。而几个月前，即1994年2月，艾哈德·布泽克在耶路撒冷（Jerusalem）的希伯来大学主持了科尼希枢机主教教席的开讲典礼，这个教席专为奥地利研究而设。奥地利至少在官方层面上开始正视其历史中的犹太方面。

奥地利加入欧盟（1991年改名）则相对容易。1992年，奥地利答应与欧洲自由贸易区其他成员一起成为欧洲经济区的成员国，但它希望获得完全的欧盟成员资格。当南蒂罗尔问题最终于1992年5月完

全解决，而奥地利又接受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中的安全和外交政策条款后，奥地利加入欧盟的谈判于 1993 年启动。农业问题和关于过境权的老争论成为主要障碍，致使谈判久拖不决，但协议最终于 1994 年 2 月达成，当年 6 月 12 日的全民公决中，67%的选民对欧洲说“是”。1995 年 1 月 1 日，奥地利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国。奥地利不再毗邻铁幕，不再因为其纳粹历史而受西方冷落，看来它将享受政治和谐、经济繁荣、无忧无虑的轻松生活，就像欧盟的其他小国一样，或者说，奥地利当局的很多人也是这么认为的。这一美好前景中看来只有一个麻烦：约尔格·海德尔。

在后瓦尔德海姆、后冷战的多变世界中，不管弗拉尼茨基—布泽克的大联盟政府引领的奥地利表现多么出色，不管政府如何成功地让奥地利平稳加入欧盟，很多奥地利人在《皇冠报》（Kronenzeitung）之类的舆论制造者的怂恿下，仍然对政府日益感到不满。国有工业的合 298 理化改革以及预算紧缩政策改善了奥地利的经济和财政状况，但也很不得人心。从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的转变固然带来了繁荣，但也导致了很多失败者，尤其是在蓝领工人阶级中。

大联盟政府还抑制了选民的民主参与热情，因为不管他们怎么投票，选出来的仍是同样的政府。两大党都承诺不与海德尔的极端党派——奥地利自由党合作，但奥地利政治也陷入了除大联盟外别无选择的境地。战后共识的非民主结构又建立起来。强调社会合作的社团主义制度比以前透明了些，因为合作各方在 1992 年 11 月公布了彼此间的协议，但这仍然表明奥地利只是个冒牌的民主国家。

与此同时，中欧的演变和南斯拉夫的解体引发了移民潮，移民当中大部分是寻求避难所的难民，由于奥地利是近邻，再加上其移民制度和避难法相对宽松，很多难民都把奥地利视作他们的目的地。1991 年，奥地利 780 万人口中有 51.8 万外国人，占总人口的 6.6%，这还是南斯拉夫难民大潮到来之前的数字。到 1994 年，有人估计外来人口约占奥地利总人口的 10%，这个比例若按欧洲的标准实在太高了，而且很多奥地利人也认为这是对奥地利国民身份认同的威胁，也是对他

们工作的威胁。

海德尔是大联盟政府之所以成为必要的根本原因，因为他现在可以大肆利用选民中日益抬头的仇外情绪。1991 年夏天，海德尔曾退出政坛，但为时十分短暂。当年秋天，他的奥地利人民党在上奥地利和维也纳的省级选举中取得了难以置信的进展，并一跃成为首都的第二大党。1992 年 3 月，海德尔竭力重返议会，并推动自由党进行最后一次冒险：这就是对“德意志人民和文化共同体”的“民族扭曲”（Umvolkung）展开煽动性攻势，而 Umvolkung 一说是自由党的一位议员安德烈亚斯·摩尔采（Andreas Mölzer）在当年 2 月提出来的，这个说法让人想起了纳粹。

299 不幸的是，对于海德尔利用难民危机，政府的对策竟然是与他在同一个方向上竞争。1992 年 6 月的外来人居住权法标志着自由化政策的剧烈转向。1993 年，该法律开始实施，另一项进一步限制外来劳工配额的法律亦获通过。奥地利以前的仇外行为曾给犹太外来者造成伤害，当这个国家正与从前的过错和解时，又屈服于新的仇外主义的幽灵。

政府的模仿举动更加助长了自由党的气焰，1992 年 11 月，它发动了一场名为“奥地利优先”的请愿运动，要求严厉打压外来人。在自由党的极端主义中，关于奥地利的身份认同带上了种族主义色彩，但和 1991 年一样，这种极端主义对奥地利的公众舆论而言太过分了。这一次，海德尔的煽动在奥地利自由派左翼中激起了切实的反应。12 月，一个名为“尊严优先同道人”（SOS Mitmensch-Anständigkeit）的团体建立起来，1 月，该团体在维也纳市中心组织了一次烛光游行，参加者超过 25 万，构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灯火海洋”。两大主要政党也参加了反对自由党的行动，1993 年 2 月 1 日，自由党走向了失败。几天以后，该党内部尚存的温和派领导人海德·施密特（Heide Schmidt）脱离自由党，自行组建她的自由论坛（Liberal Forum），这样一来，本来可以遏制的自由党上升势头就更加易于遏制了。自由党的分裂有助于奥地利顺利融入新欧洲——因为海德尔的威胁看来再次被

解除了。

但事实证明这是个假象。选民中的怨恨情绪仍在增长，执政联盟的两大党派继续丧失选票。1994 年初，自由党在卡林提亚和萨尔茨堡的得票再度增长。6 月，加入欧盟的全民公决虽然以 2/3 的多数票通过，但仍有 1/3 的选民反对。海德尔继续施展他那机会主义的排外民众主义手腕。当 1994 年 10 月的全国选举来临时，结果再次引发震动：社会民主党获得 35% 的选票；人民党得票率为 38%；自由论坛表现相当优异，赢得 6% 的选票；绿党也获得 7% 的选票；但海德尔的自由党得票率高达 23%，其势头直逼两大政党。甚至在奥地利加入欧盟前，国内局势就已朝着危机的方向转变。

1995 年 12 月，由于政治联盟在预算问题上发生危机，奥地利进行了新一轮的选举，选举的结果与上一次大体相当。从这时直到 1999 年的全国选举之间，奥地利政治的态势基本没有变化。但人事方面发生了变动：沃尔夫冈·许塞尔（Wolfgang Schüssel）取代布泽克担任人民党首脑，并于 1995 年初担任副总理；弗拉尼茨基于 1997 年退休，继任者为维克托·克里马（Viktor Klima）；不过政坛格局依旧如故。政府的自由化倾向和选民的保守主义反动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在日益增长的国际压力下，政府比以前更加倾向于清算那些棘手的历史遗产。1997 年，政府宣布 5 月 5 日为纳粹受难者纪念日。在维也纳市中心的犹太广场建造新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的计划得以通过，在错综复杂的异议过后，纪念馆的落成典礼终于在 2000 年举行。为了调查犹太人的财产剥夺和相关的偿还事务，设立了一个国际专家委员会，其中包括罗伯特·奈特。新的难民国籍法通过后，仍处于流亡状态的“旧奥地利人”可以更为方便地重获奥地利公民身份。犹太人的财产偿还进程加快了，1999 年，奥地利各银行拨出 4 000 万美元专款，用于犹太大屠杀的赔偿。毛尔巴赫（Mauerbach）地方有一批抢夺来的犹太艺术品，奥地利政府曾将这个秘密一直隐瞒到 1984 年，这批艺术品于 1994 年被移交给维也纳的犹太社团，相关的拍卖款也在 1996 年被交还给犹太大屠杀的受害者。1998 年举办了有关奥地利参与德国国防

300

军的展览，展出中包括相关的犯罪行为，此举标志着奥地利对历史的公开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财产偿还的进展仍很艰难，而且令人生疑地缓慢，一些案件仍遇到很大阻力。但情况在 1998 年有了重大改观，当时希勒的两件绘画作品被暂借到纽约展出，但被美国当局没收，理由是它们可能是被盗窃的财产。这个案件受到奥地利政府的关注，但它触发了文化部长伊丽莎白·戈莱尔（Elisabeth Gehrer）的根本性政策的变化，这位部长决定放弃冗长拖沓的官僚程序，将剥夺来的犹太产业归还它真正的主人。1999 年，罗特希尔德家族的财产被偿还，许多其他归还工作也随之而来。

但即便如此，陈旧的习惯仍在顽固作祟。在克里姆特的几件绘画作品——包括阿黛尔·布罗赫—鲍尔的黄金像，它如今已是维也纳 1900 的象征符号——的归还案件中，有人仍在利用法律上的繁文缛节，以否认这些作品归还其所有者、费迪南德·布罗赫—鲍尔的继承人玛丽亚·阿尔特曼（Maria Altmann）的正当性（最近这个案件的裁决有利于阿尔特曼）。不过总的来说，由于奥地利犹太社团获得了更多的支持，由于它在奥地利的身份认同中有了更加醒目的位置，奥地利官方表面上根本改变了对过去和对奥地利犹太人的立场。

302

表面看来，奥地利正在变成一个比以前更加国际化、更为开放的国家。1998 年，奥地利担任欧盟主席国，这是第二共和国声望的顶峰。奥地利的预算再度回归正常，经济发展势头良好，1999 年 1 月 1 日采用新货币欧元后，奥地利对成功充满了信心。由于声誉卓著的欧盟农业专员弗兰茨·费什勒（Franz Fischler），以及包括布泽克在内的其他奥地利人，都积极参与了欧盟向东欧扩展的准备工作和巴尔干危机的处理，奥地利成为一个积极活跃的欧盟新成员。甚至文化事业也在复兴，突出的表现是令人难忘的城区博物馆（Museum Quarter），它为奥地利的现代艺术遗产提供了豪华的展览空间。



插图47 1998年7月1日奥地利首次担任欧盟主席（鲁道夫·希默坦）

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对奥地利国内政治的僵局产生影响。大联盟政府在逐步瓦解中，而且日益不得民心。新自由派拒绝延续“过时的”社会合作的影响力，而一种反对国际化和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的潮流已

经形成，虽然多元化让新奥地利比从前那个内省的奥地利更具吸引力。所有这些都成为海德尔手中的牌。施密特的自由论坛从来没有超越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圈子，而且此时也没有什么影响力。绿党离左派太远了，无法吸引抗议者的投票，而这种抗议实际上是经济上的失望在政治上的表现。因此心怀不满的奥地利人把选票投给了海德尔的自由党，海德尔自己则在政府中扮演牛虻的角色。《皇冠报》给了他很大的帮助，这家报纸支持他反对“腐败”和过多的外国人的事业。1999 年 3 月，自由党赢得了卡林提亚 42% 的选票；9 月，它又赢得了上奥地利 27.5% 的选票；在 1999 年的全国选举中，自由党的得票率为 27.2%，并以微弱优势把人民党挤到了第三的位置上。

303 奥地利的政治从此发生了另一场深刻转变。在过去的 6 年中，关键人物是人民党领袖沃尔夫冈·许塞尔。2000 年 2 月，许塞尔没有继续组建大联盟，而是打破奥地利政治中的核心禁忌，转而与海德尔的自由党组成联盟。此举被视为对政治制度的一次无所顾忌的非法滥用，结果奥地利爆发了群众抗议示威活动。国际社会对一个被视为极右翼的组织进入欧盟成员国的民主政府也深感不安。欧洲的其他 14 个成员国中，很多国家自身也面临着来自准法西斯主义的排外右翼运动的压力，但它们试图为后共产主义的中东欧国家、为欧盟未来的成员国树立榜样，于是 14 国联合对奥地利实施外交制裁。美国、以色列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也抗议这种明显的历史倒退行为，有人甚至说海德尔是新希特勒。

然而海德尔并不是希特勒。许塞尔和海德尔本人都意识到他们的行动底限，但总统克莱斯蒂尔要他们做出担保。在一个让人感到不光彩的动议中，克莱斯蒂尔要求许塞尔和海德尔签署一个承诺遵守宪法和人权的宣言，然后他才认可新政府。但海德尔从未成为政府成员，更谈不上副总理了。他仍然担任卡林提亚的省长，而委派自己的代表苏珊·里斯—帕瑟尔（Susanne Riess – Passer）为副总理。虽然自由党在选举中得票（略）高于人民党，但在新政府中它实际上是个小伙伴。

虽然人民党反对国内群众示威和国际制裁，但这些抗议有助于人民党按自己希望的方式确立奥地利政治的新构架。自由党没有执政经验，而且党内存在派系摩擦，与其盟友相比处于劣势位置，但人民党还可以利用国际压力的威胁来对自由党施加控制力。但是另一方面，人民党又声称，欧盟 14 国再次因为奥地利行使其民主自决权而来“找茬儿”，这个说法引起公众的共鸣，虽然其根据极为可疑。

大多数奥地利人很可能仍然认为，14 国的制裁是欧盟的制裁，是对奥地利主权的一种非民主方式的侵犯。实际上，其他 14 国在表达它们的不满时也是在行使自己的主权，它们不愿看到一个民主党派忽视显而易见的公众意志、让一个民主的“真诚意愿”实际上很可疑的党派进入政府，因为这个政府对欧盟政策拥有否决权，因而也对 14 国的行动自由享有否决权。 304

但这种想法无关紧要：国际抗议和制裁被视为干涉，而且只能为政府赢得民意。国内的示威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政府度过了难关，6 个月后欧盟 14 国取消制裁。奥地利的政治革命完成了。

自由党进入政府所带来的最糟糕的担忧并没有成为现实。一旦掌握了权力，一旦面临责任，自由党便自行瓦解了。海德尔继续从侧面操纵他的党派，而且还继续进行挑衅。与此同时，许塞尔与自由党一起执行更为右倾的施政纲领，如税收改革、削减开支、私有化、大学改革和收紧避难法和移民法，但他仍然牢牢控制着政府。

另外，为了局部回应国际社会的关注，许塞尔政府继续并加大了财产偿还和赔偿政策，其对象不仅有犹太人，还有奴隶劳工。2001 年 1 月，政府与奥地利犹太社团达成如下协议：政府和奥地利各公司将出资 3.6 亿美元设立一个基金，用于解决被剥夺者的赔偿要求。这样看来，海德尔为促进与犹太人关系的改善倒是做了不少事。

自由党内部的常年争吵终于导致了 2002 年 9 月的克尼特菲尔德（Knittelfeld）政变，而里斯—帕瑟尔则脱离了该党。面对这种局面，许塞尔终止联合执政，并宣布于 11 月举行选举。许塞尔劝说他的“神童”财政部长卡尔—海因茨·格拉塞（Karl – Heinz Grasser）脱离自由

党加入人民党，但由于黑蓝执政联盟的经济表现逡巡不前，再加上民众对激进的新政策多有不满，许塞尔的地位不那么稳固了。如果社会民主党领袖阿尔弗雷德·古森鲍尔（Alfred Gusenbauer）在竞选中表现更成功的话，许塞尔政府可能已经倒台了，但这一切并没有发生。

不过11月24日选举的结果还是颇为令人关注。社民党得票率为36.5%，绿党为9.5%，两党获得的选票均有上升，但它们加起来仍不足以构成多数。在执政党方面，力量对比有所变化，人民党得票率上升了15个百分点，达42.3%。这一胜利完全得益于自由党竞选的溃败，它的得票率下降了17个百分点，只赢得了10%的选票。自由党和海德尔看来已被最终驯服了。

305

很多人希望这次根本性转折能让人民党重新作定位思考，许塞尔确实对大联盟政府，甚至对与绿党的黑绿联合政府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最后他还是转向了已被驯服的自由党。第二届黑蓝联合政府一开始就稳固多了，因为两党都不愿冒再次面对选民的风险，因为在地方和省级选举中，社民党和绿党获得的选票更多。在2004年6月的欧盟议会选举中，自由党只获得6.4%的选票，人民党则被社民党超过。而在4月的选举中，社民党人海因茨·费舍尔（Heinz Fischer）当选为总统。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执政联盟的这种极端脆弱地位竟能推出一系列产生重大变革效应的立法。

格拉塞利用预算程序来考验并削弱奥地利福利国家。2002年被搁置的税收改革又重新启动，其目标是将国家控制的国民收入降低到40%。目标的实现靠的是大幅削减教育支出，而高等教育改革看来是降低开支的主要手段。国有工业的私有化继续进行，这被视为一种撒切尔（Thatcher）式的伎俩：既带来了暂时的收益，又达到了意识形态上的目标。削减开支的目标锁定在红绿阵营控制的部门，而其他国家部门的开支甚至有增长，如国防开支，尽管奥地利仍是中立国，而且边境上没有显而易见的敌人。

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右倾转向并非没有引起抗议。2003年，退休金改革方案引发了战后奥地利的首次总罢工，最终的法律被迫作了妥协。

铁路改革虽然也遭到激烈反对，但还是推行了下去，国营广播媒体和警察部门的改革也是如此。这些改革的理论依据是去管制化和自由化，但改革通常服务于庸俗的政治目的。当初曾困扰社会党的腐败嫌疑，如今转移到现政府身上，尤其是在格拉塞自己的纳税行为上。 306

2003年10月，政府通过了一项十分严厉的避难法，但招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的公开批评。对待来自新的中欧欧盟成员国的经济移民的严厉政策，同样表现出政府对排外情绪的迎合。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也给这种陈旧心态注入了某种内省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奥地利自我理解方式。许塞尔还不时祭出奥地利是纳粹受害者的观念，这样一种意识也再度浮现：奥地利人应该忘记过去向前看。

但也有很多奥地利人想从历史中学习某些东西，并为建立更为开放、包容、友善的奥地利政治而努力。然而，最主要的反对派社民党却在劳动市场问题上选择了保护主义的方针，而当时奥地利的经济之所以有良好的表现，主要得益于欧盟新成员国的机会和增长产生的刺激效应。

纯粹由政府政策转变造成的效果不应被高估。尽管政府削减了开支，但奥地利仍然是世界上最周全、最慷慨的福利国家之一，这种制度的根基在于广泛的社会共识，政府也同样抱有这样的共识。最近，许塞尔在批评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盎格鲁—撒克逊”新自由主义的同时，再次重申他对“欧洲”社会模式的信心。虽然国内反欧洲的情绪仍然高涨，但它没有对政策造成太大的影响。奥地利已完全融入“欧元区”，2002年后，欧元便成为奥地利实际使用货币。2004年欧盟的东扩也让奥地利获益匪浅。奥地利人贝尼塔·菲拉罗—瓦尔德纳（Benita Ferraro – Waldner）是现任欧盟对外政策专员。

目前奥地利的政治又陷入动荡。政府正在推进其“右翼”纲领，但自由党又一次发生分裂。在激烈的党内争吵过后，海德尔和该党联邦派领导人脱离自由党，组建新的“奥地利未来联盟”（BZÖ）。在2005年秋天的省级选举中，社民党得票上升，海德尔的奥地利未来联盟一无所获，海因茨—克里斯蒂安·施特拉赫（Heinz – Christian Strache）领导的自由党表现比预想的要好，但这位新党魁甚至比海德

307 尔还要极端。当2006年秋天的全国大选日益临近时，奥地利政坛再次达到了平衡状态。

正如罗伯特·梅纳斯（Robert Menasse）预测、安东·培林卡（Anton Pelinka）已经证实的，2000年的“意外事件”导致了奥地利政治体制的松动，并引起奥地利社会的进一步现代化。但最新的动向中存在深刻的矛盾。重新抬头的排外主义仍在制造麻烦，其矛头现在指向了穆斯林和土耳其人；与此同时，很多奥地利人看来又退回到对欧洲一体化持怀疑态度的“小奥地利”身份认同中，这同样造成了难题。奥地利人对欧盟的重视程度，看来还不如其重视奥地利追求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决心，尽管欧盟存在“民主赤字”。相反，奥地利人信赖的是自己狭隘的、排外的国民身份之假象。不幸的是，在这一点上，现代奥地利人跟其他欧洲人很相似。

不过，从文化和社会层面上说，奥地利正在成为一个更加世俗化的现代社会。教皇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II）曾尝试向奥地利天主教会注入更为保守的力量，但事与愿违，儿童色情丑闻使得教会上层受到牵连，前往教堂的人数也在下降。奥地利公众主要关心的是后现代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产生于1945年根本未曾料想到的物质成就之308 中。虽然政治生活中泛起排外浪潮，但社会看来更加具有世界主义色彩，而且愿意接受国外的影响。这些相互矛盾的趋向如何相互作用仍是不可预见的。

在巴德—莱昂菲尔登，以疗养院为基础的旅游业依旧欣欣向荣。卡斯特纳的商号依然吸引着大批游客，它的姜饼已经行销全世界，虽然这个生意不再是家庭所有了。林茨人仍然来到这个村子，以躲避自己烟雾缭绕的城市，虽然村子的扩张意味着要走更长的路才能看到开阔的原野。还有更为方便的消闲活动。捷克边境的另一侧有一些引人入胜的去处，如童话般的克伦罗夫镇和罗申贝克（Rožmberk）城堡。一个来自林茨的游客去那些地方甚至可以不穿过巴德—莱昂菲尔登，他可以绕开它。但巴德—莱昂菲尔登继续欣欣向荣，因为这里已经被指定为地区教育中心。



插图 48　2004 年的莱昂菲尔登

这是一个现代化的、甚至是后现代的村庄。在新近举行的一次婚礼上，客人们被邀请穿上民族服装，当然只是宽泛意义上的民族服装。在天主教婚礼上可以听到美国的福音音乐，世俗婚礼中有凡·莫里森（Van Morrison）的《是你让我一身轻松》（You Ease my Burden）。欢迎会上一个 R&B 乐队进行了表演。两个文化和种族背景大不相同的表兄弟，一个 7 岁，一个 6 岁，一起度过了美好的跳舞时光。巴德—莱昂菲尔登和奥地利看来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取得了巨大成就。

3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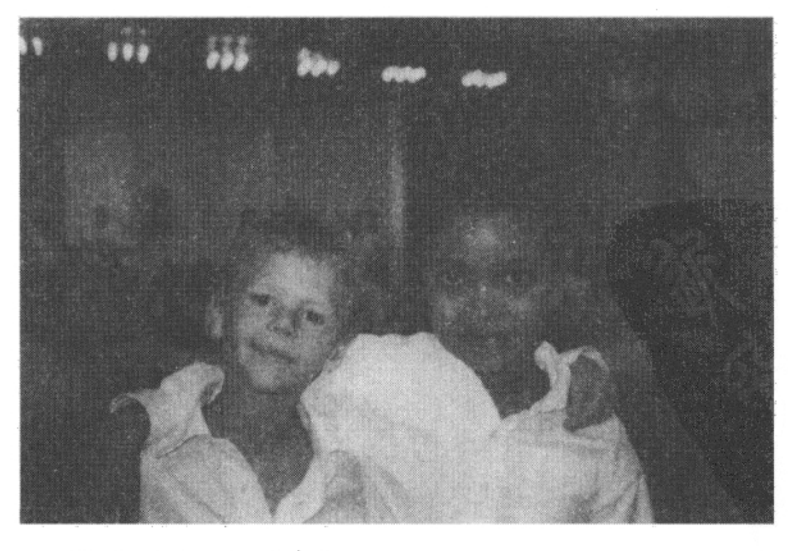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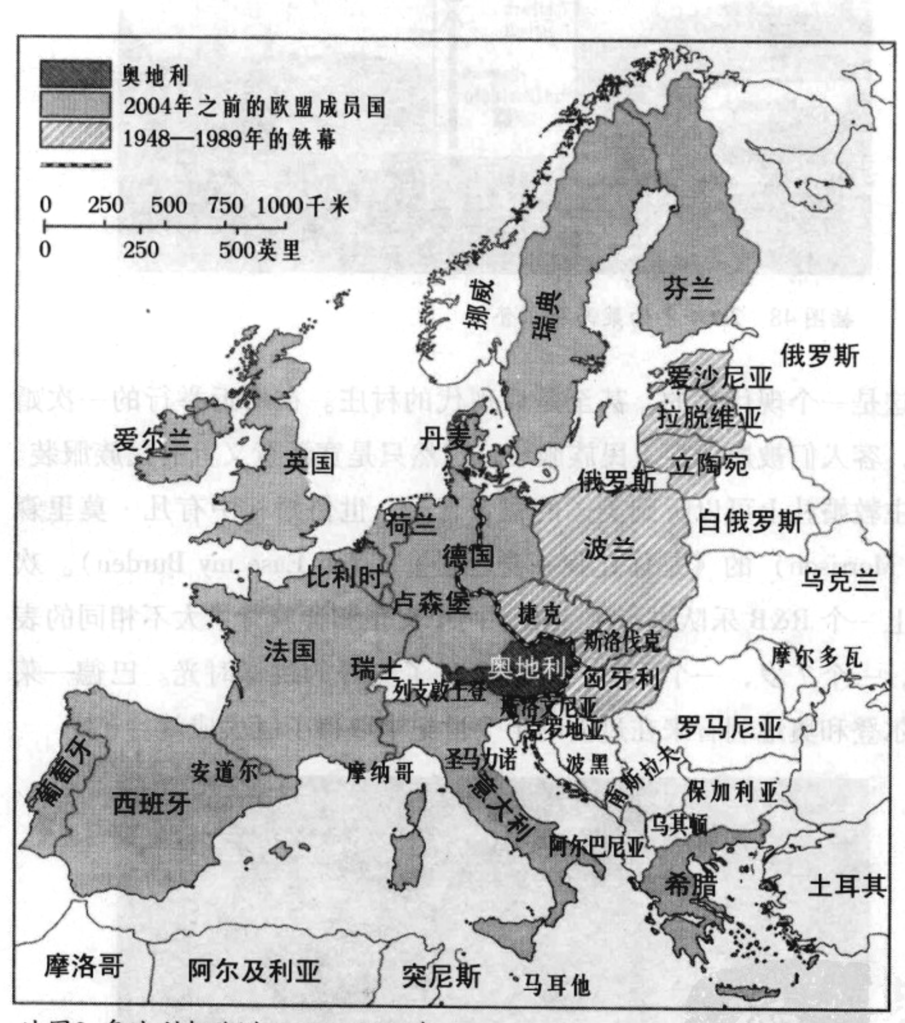


插图 49　奥地利的未来?



地图8 奥地利与欧洲，1955—2004年

结　论

1996年1月底，特劳恩河（Traun）的兰巴赫（Lambach）水电站 311 施工现场挖掘出一个集体坟墓。有人立刻怀疑这是集中营囚犯留下的尸骸，西蒙·维森塔尔还就发掘一事接受了采访。他评论说，如果愿意找的话，上奥地利的每个地方都能找到这样的集体坟墓。“如果你在奥地利进行挖掘，你能发现罗马遗址。你也能轻易找到被枪决的人。要知道，毛特豪森的附属集中营在这里”①。

但事后表明，坟墓中并非纳粹受难者的遗骨，而是19世纪的船夫们留下的。但是，维森塔尔的评论提醒我们，只要轻轻刮去奥地利的表层，就能看见一层层的历史沉淀，不过对今天的奥地利人来说，直面这些沉淀却是很困难的事。这个说法在任何地方都适用，但对奥地利尤其尖锐，这既因为过去的奥地利比现在这个小共和国大得多，而且因为它较近的一个时期，即1938—1945年，是一个民族耻辱。

历史对奥地利来说是沉重的。奥地利历史是一段寻找权威的故事；在这一过程中，哈布斯堡王朝必定是个核心角色。哈布斯堡家族相当成功地合并了各种封建势力，并由此奠定了帝国权威和辉煌的基础。不过，帝国时代奥地利的辉煌成就只是昙花一现，而当帝国模式不再能支撑局面、并被现代民族国家取代时，这种成就反而成为奥地利的 312

① 转引自奥地利联合社的报道，1996年1月31日。

麻烦。作为一个超民族的王朝势力，乃至作为一个超民族的国家，哈布斯堡君主制已经是反常的，它站到了“进步”的反面——正如大多数欧洲人理解的那样。

民族国家奉行的是严格的排中律逻辑，即个人要么属于某个民族，要么不属于这个民族，其他形式的身份和忠诚都不能违背这个铁律；而在民族国家的时代，奥地利和奥地利人碰到了这个难题，因为这个逻辑让它们无所适从。奥地利德意志身份认同的犹疑不决使得这个君主国在 19 世纪步履蹒跚，但身份问题在哈布斯堡君主国崩溃后变得尤为尖锐，奥地利问题缩小为德意志奥地利和奥地利共和国问题。1945 年后，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构建和承认单独的奥地利民族身份。于是奥地利成为“标准的”民族国家，不过与此同时，1945 年后的欧洲历史走上了相反的方向，即迈向今日欧盟这一超民族的实体。

奥地利的历史以复杂的辩证发展为特征，无论是 16 世纪和 17 世纪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之间的辩证发展，还是随后 18 世纪和 19 世纪中改革和反改革之间的对抗。超民族性和民族性之间的关系曾是奥地利 19 世纪和 20 世纪历史的标志，如今，这种关系看来在奥地利的欧盟成员国身份中达到了某种综合：奥地利是民族国家，欧盟则是超民族的。然而，这种关系当中仍存在明显的紧张因素，如奥地利人对欧洲一体化的怀疑眼光，如奥地利人长期存在的狭隘的、排他的、“我们自己的”自我理解方式，还有如对待前“奥地利治下”中欧邻国的戒备心十足的态度，等等。

奥地利人对自己的历史遗产仍感到不自在，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这份遗产比今日奥地利这个小型民族国家大多了。这份遗产是超民族、多民族和多种族的，它几乎触及世界的所有角落：据说蒙特祖玛（Montezuma）的羽毛皇冠并不在墨西哥，而是在维也纳，因为这是当初美洲的征服者送给哈布斯堡国王的礼物。另一方面，1938 年以后，奥地利文化遗产中最光彩夺目的部分正是因为逃到了世界其他地方才得以挽救，奥地利对现代世界的贡献，很大一部分不是发自维也纳，而是源于汉普斯特德、伯克利和耶路撒冷。时至今日，这种迁徙意味

313

着奥地利遗产散布到世界各地的方式是许多奥地利人一知半解的。另外，人们虽然意识到，奥地利现代文化遗产中大部分是奥地利犹太人创造、促进和资助的，但是，鉴于奥地利人曾在1938年到1945年间全力参与对犹太人的剥夺、驱逐和灭绝的丑恶的集体犯罪行为，我们仍不敢肯定，奥地利遗产中的犹太部分是以何种方式真正“归属于”当下的奥地利民族的——甚或它是否归属于这个民族。

最近关于克里姆特的阿黛尔·布罗赫—鲍尔的金色画像的争论便是“奥地利”遗产问题的典型：这幅画究竟属于“奥地利”还是属于1938年被盗走该画的犹太家族呢？从某个层面上说，这个问题纯粹是个法律问题，但它也有某种道德维度，因为躲避法律义务的奥地利政府再次试图否认奥地利人对一个奥地利犹太家庭犯下的显而易见的过错，否认奥地利国家1945年犯下过的错误，为此它回溯到1938年以前，并声称此后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事态的状况。 314



插图50 克里姆特，“阿黛尔·布罗赫—鲍尔I”，1907年（贝尔维德奥地利美术馆）

这个案件最后的判决有利于作品的犹太所有者，但是，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说，奥地利人是否能担当得起他们自己的历史遗产，这一点仍不清楚。如果说奥地利人在解决同自己历史的麻烦关系方面没有进展，那可能是粗暴的；现在的状况已经与20年前有了质的差异，这是一种改善。然而，奥地利官方在克里姆特绘画谈判中相当鲁莽的立场表明，至少它仍执意摆脱和超越、而不是完全接受这份遗产和相关的责任——包括有关的费用。

当前对欧盟其他国家的消极态度，尤其是对毗邻的东欧新成员国的态度，同样是一种偏狭和缺乏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的表现。奥地利人似乎仍然仰赖于一种狭隘的民族身份认同，这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身份仍缺乏信心。他们不具备从正确的公民身份感中产生出的独立与自信，依然不时表现出依附性臣民的本能反应，依然忠实于他们所从属的国家，而不是从属于他们的国家。

如果奥地利人对自身的价值有更强烈的意识，或许他们接受历史遗产中最具吸引力的诸多方面会容易得多，尽管这部著作中指出一些臭名昭著的恐怖行为，但这份遗产与今日的欧盟和国际社会的关系最为密切。如果奥地利和奥地利人不再固执于捍卫奥地利“民族特性”的狭隘的、仇外的防卫心理，它们便能利用奥地利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超民族和多民族遗产，利用维也纳1900的世界主义的包容文化，这样，当下的欧盟及其向中欧的扩展不仅可以视为奥地利获取物质利益的大好时机，而且可以看作宽泛意义上的奥地利传统中最美好的理念的实现。

315

我们开头曾提到一个悖论，也是最大的悖论：当今天的奥地利人为他们的民族认同至为骄傲的同时，他们的历史和遗产大部分外在于、超越于纯粹的民族界限，或介乎各种狭隘的民族界限之间。奥地利人自认为已经解决的“难题”是昔日君主制国家的超民族性和种族多样性，是1918年后民族共识的缺乏——即国民的“无所适从的中间状态”；但是，他们所认为的“难题”正是奥地利对现代世界最积极、最重要的贡献的核心所在。多样化的身份特质、各种类型和差异的交

汇、各种分裂之间的联系、对寓于统一性之中的多样性的认可：正是这种经历构成了我们所称的后现代主义洞见——对此暂时还没有更好的说法——的典型表征，而这种另类的欧洲历史或曰奥地利的历史与遗产，最终涉及的也是这种经历。它应该成为某种被珍视和接纳的东西，而不应该被消解。

也许现代奥地利人将认识到奥地利历史的更大意义。今天，各大党派大概都争相严格限制外来（中欧）劳工，但根据规划，欧洲内部的劳工市场将于2011年实现自由流通；奥地利选民可能对穆斯林和少数族裔劳工仍有所反应，但极端主义党派看来已被驯服，奥地利对少数族裔的政策仍处于更为自由化的欧洲的范围内。小报媒体对中欧的新欧盟成员国的态度可能仍然是戒备和狭隘的，但奥地利公司在这些国家有大笔投资。在2000年的波折过后，现实的局势可能会把奥地利引上一条积极的外向道路，这条道路本来在1999年就已确立了。让我们这样期待吧——对所有思考过奥地利的理想（如果确有这种理想的话）并为此竭尽全力的人来说，这条道路更为可靠，而其他的道路则远不这么令人欣喜。

2006年1月，奥地利人纪念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奥地利人沃尔夫冈·阿马多伊斯·莫扎特诞辰250周年。只可惜严格地说莫扎特算不上真正的奥地利人。当时萨尔茨堡还不属于奥地利，虽然莫扎特成年 316 后的职业生涯大部分是在维也纳渡过的；但他是个真正的德意志作曲家，比同样住在维也纳的贝多芬更像个德意志作曲家。奥地利人应该把莫扎特当奥地利人来纪念吗？他们当然可以——如果他们秉承宏大的、开放的、包容的、世界主义的奥地利精神遗产的话，而莫扎特最肯定无疑地是这一遗产的一部分，而且堪称其楷模。作为天才神童的莫扎特很早就是个世界主义者：他是共济会会员，与艾曼纽埃尔·施 317 卡尼德一起宣扬启蒙的人道精神；他最喜爱的剧本作者洛伦佐·达彭特是个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卡萨诺瓦（Casanova）的朋友，这位前教士最后卒于纽约。

维也纳1900的现代文化中甚至也有一种奇特的关联。1911年，

伟大的法国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创作了一樽名为“莫扎特”的胸像。这件以大理石雕刻的作品是关于作曲家灵魂的一篇论文，但是雕塑的轮廓实际上是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的，罗丹曾于1909年为后者创作过青铜胸像雕塑。当奥地利人可以全心全意地庆祝历史文化交融的全部馈赠，领会其另类、多样和深刻时，当他们完全认识到这一交融对于自己如何看待国境内外的外人意味着什么、并据此采取行动时，他们就能真正履行自己的义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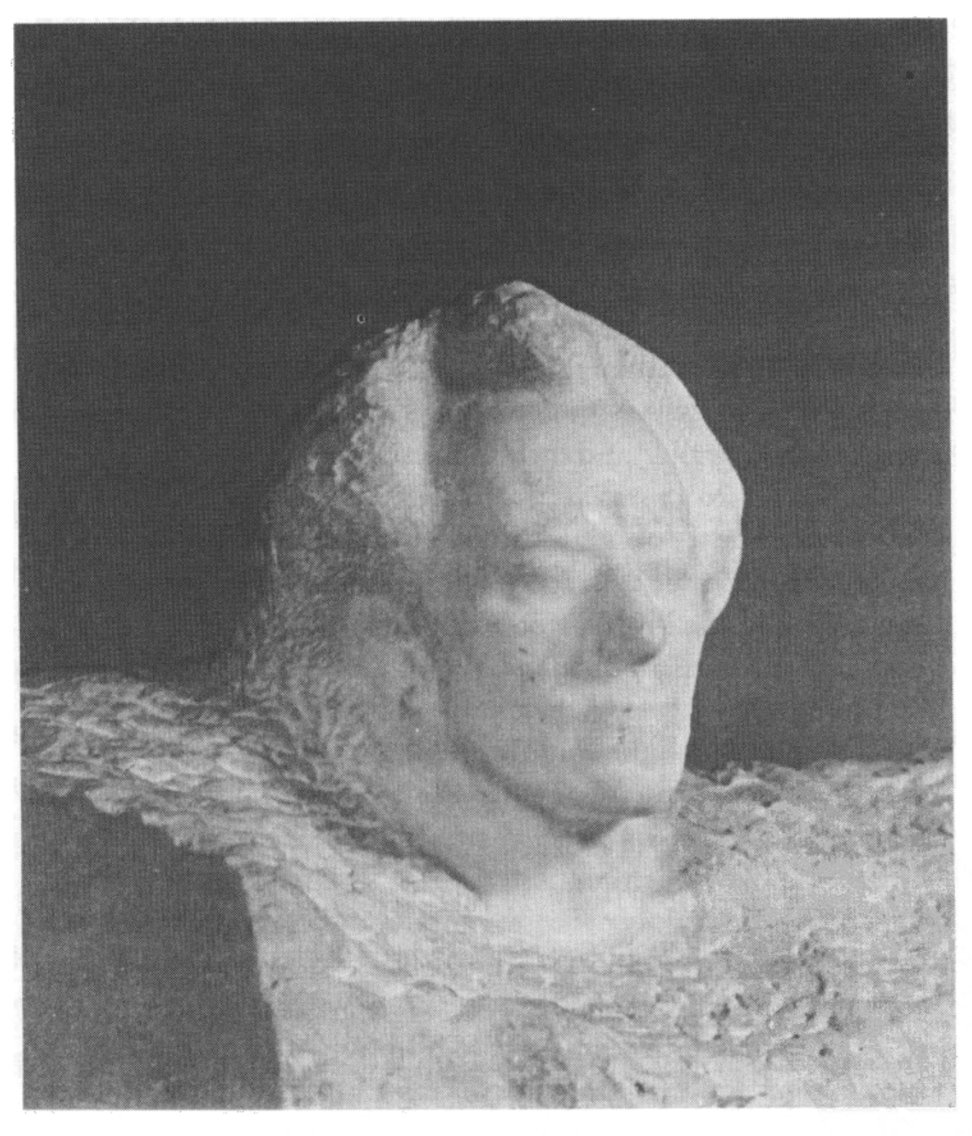


插图51　罗丹：“莫扎特”（巴黎罗丹博物馆）

进一步阅读书目

本书依据的许多文献只有德文版。不过有关奥地利历史的英文文献十分丰富，特作如下选录。

学　报

Austrian History Yearbook (New York: Berghahn)

Austrian Studies (Leeds: Maney)

Central Europe (Leeds: Maney)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Boston: Brill)

Contemporary Austrian Studies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概　论

Barea, I. *Vienna* (New York: Knopf, 1966)

Brook-Shepherd, G. *The Austrians*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6)

James, L. *Xenophobe's Guide to the Austrians* (London: Ravette, 1994)

Jelavich, B. *Modern Austria: Empire and Republic, 1800—198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Johnson, L. *Central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Introducing Austria (Vienna: Bundesverlag, 1987)

Kann, R. A. *A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Empire*, 1526—191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elinka, A. *Austria: Out of the Shadow of the Pas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8)

Solsten E., and D. E. McClave. *Austria: A Country Study*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1994)

1740 年之前

Barker, T. M. *Double Eagle and Crescent* (Albany: SUNY Press, 1967)

Benecke, G. *Maximilian I*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2)

Bérenger, J. *A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Empire*, 1273—1700 (*Harlow: Longman*, 1994)

Blanning, T. C. W. The Culture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Culture: Old Regime Europe, 1660—178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Evans, R. J. W. *The Making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1550—17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9)

Rudolf II and his Worl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3)

Evans, R. J. W., and T. V. Thomas (eds.). *Crown, Church and Estates: Central European Politic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Fichtner, P. S. *Ferdinand I* (Boulder: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1982)

Maximilian II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Ingrao, C. *The Habsburg Monarchy*, 1618—18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In Quest and Crisis: Emperor Joseph I and the Habsburg Monarchy (West Lafayette: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1979)

(ed.). *The 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Austria* (West Lafayette: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1994)

Kann, R. A. *A Study in Austrian Intellectual History* (New York: Praeger, 1960)

Koenigsberger, H. G. *The Habsburgs and Europe*, 1516—166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Leeper, A. W. A. *A History of Medieval Austr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Lockyer, R. *Habsburg and Bourbon Europe*, 1470—1720 (London: Longman, 1974)

McKay, D. *Prince Eugene of Savoy*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77)

Maltby, W. S. *The Reign of Charles V*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2)

Parker, G. *Europe in Crisis*, 1598—165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Spielman, J. P. *The City and the Crown: Vienna and the Imperial Court, 1600—1740* (West Lafayette: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1993)

Leopold I of Austria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77)

Steinberg, S. H. *The 'Thirty Years War'* (London: Edward Arnold, 1966)

Stoye, J. *The Siege of Vienna* (New York: Holt, 1965)

Tanner, M. *The Last Descendants of Aeneas: the Habsburgs and the Mythic Image of the Empero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Wheatcroft, A. *The Habsburgs: Embodying Empir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5)

1740—1918 年

Beales, D. *Joseph II, 1741—17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Beller, S. *Francis Joseph* (Harlow: Longman, 1996)

The Tragic Carnival: Austrian Culture in the First World War, in A. Roshwald and R. Stites (eds.), *European Culture in the Great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Vienna and the Jews, 1867—1938: *a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ed.). *Rethinking Vienna* 1900 (Oxford: Berghahn, 2001)

Blanning, T. C. W. *Joseph II* (Harlow: Longman, 1994)

Boyer, J. W. *Culture and Political Crisis in Vienna*, 1897—191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olitical Radicalism in Late Imperial Vienna, *1848—189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Brauer, K., and W. E. Wright (eds.). *Austria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 olution*, 1789—1815 (Minneapolis: Center for Austrian Studies, 1990)

Bridge, F R. *The Habsburg Monarchy among the Great Powers*, 1815—1918 (Oxford: Berg, 1990)

Browning, R. *The 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

Cohen, G. B. *Education and Middle-Class Society in Imperial Austria*, 1848—1918 (West Lafayette: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1996)

Cornwall, M. (ed.). *The Last Years of Austria-Hungary* (Exeter: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 2002)

Deá k, I. *Beyond 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Dickson, P. G. M. *Finance and Government under Maria Theresa*, *1740—1780*, 2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

Geehr, R. S. *Karl Lueger*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Good, D. F *The Economic Rise of the Habsburg Empire, 1750—191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Hamann, B. *Hitler's Vien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Hanson, A. M. *Musical Life in Biedermeier Vienna* (Cambridge, 1985)

Healy, M. *Vienna and the Fall of the Habsburg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Janik, A., and S. Toulmin. *Wittgenstein's Vienn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3)

Jószi, O. *The Dissolution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9)

Jenks, W. A. *Austria under the Iron Ring*, 1879—1893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1965)

Johnston, W. M. *The Austrian Mind: an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History, 1848—193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Judson, P. M. *Exclusive Revolutionari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King, J. *Budweisers into Czechs and Germa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Macartney, C. A. *The Habsburg Empire*, 1790—1918 (London: Macmillan, 1969)

Maria Theresa and the House of Austria (London: English University Press, 1969)

McCagg, W. O. *A History of Habsburg Jews, 1670—1918*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McGrath, W. J. *Dionysian Art and Populist Politics in Austr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Freud's Discovery of Psychoanalysis: the Politics of Hyster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Melton, J. V. H. *Absolutism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rigins of Compulsory Schooling in Prussia and Austr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Okey, R. *The Habsburg Monarchy: From Enlightenment to Eclips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1)

Pulzer, P. *The Rise of Political Antisemitism in Germany and Austria*, rev. edn (London: Halban, 1988)

Rath, J. R. *The Vien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Greenwood, 1969)

Redlich, J. *Emperor Francis Joseph of Austria* (New York: Macmillan, 1929)

Reifowitz, I. *Imagining an Austrian Nation* (Boulder: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2003)

Rothenberg, G. E. *The Army of Francis Joseph* (West Lafayette: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1976)

Schnitzler, A. *The Road to the Open*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1)

Schorske, C. E. *Fin-de-Siè 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0)

Shedel, J. *Art and Society: the New Art Movement in Vienna*, 1897—1914 (Palo Alto: SPOSS, 1981)

Sked, A.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Habsburg Empire*, 1815—1918 (London: Longman, 1989)

Stone, N. *The Eastern Front, 1914—1917*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75)

Taylor, A. J. P. *The Habsburg Monarchy, 1809—1918*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48)

Varnedoe, K. *Vienna1900 : Art,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1986)

Vergo, P. *Art in Vienna, 1898—1918* (Oxford: Phaidon, 1981)

Wangermann, E. *The Austrian Achievement, 1700—1800*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73)

Wawro, G. *The Austro-Prussian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Williamson, S. R., Jr. *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Macmillan, 1991)

Wistrich, R. S. *The Jews of Vienna in the Age of Franz Josep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918 年之后

Bassett, R. *Waldheim and Austria* (London: Penguin, 1988)

Bottomore, T., and P. Goode (eds.). *Austro-Marx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Bukey, E. B. *Hitler's Austri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Hitler's Hometow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Bunzl, M. *Symptoms of Modernity: Jews and Queers in Late Twentieth、Century Vien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Carsten, F. L. *Fascist Movements in Austria* (London: Sage, 1977)

Clare, G. *Last Waltz in Vienna* (London: Macmillan, 1981)

Cronin, A. K. *Great Power Politics and the Struggle over Austria, 1945—1955*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Field, F. *The Last Days of Mankind: Karl Kraus and his Vienna* (London: Macmillan, 1967)

Gehl, J. *Austria, Germany and the Anschluss*, 1931—193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Gulick, C. A. *Austria: From Habsburg to Hitler*, 2 vols. (Berkeley: Univer 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8)

Höbelt, L. *Defiant Populist: Jörg Haider and the Politics of Austria*

(West Lafayette: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03)

Katzenstein, P. J. *Corporatism and Change: Austria, Switzerland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Kitchen, M. *The Coming of Austrian Fascism* (London: Croom Helm, 1980) Klemperer, K. von *Ignaz von Seipe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Luft, D. S. *Eros and Inwardness in Vienna: Weininger, Musil, Doder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Robert Musil and the Crisis of European Culture, 1880—194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Mitten, R. *The Politics of Antisemitic Prejudice: the Waldheim Phenomenon in Austria* (Boulder: Westview, 1992)

Oxaal, I., M. Pollak, and G. Botz (eds.). *Jews, Antisemitism and Culture in Vienna*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7)

Pauley, B. F. *Hitler and the Forgotten Nazi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1)

From Prejudice to Persecution: a History of Austrian Anti-Semitis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2)

Pick, H. *Guilty Victim: Austria from the Holocaust to Haider* (London: I. B. Tauris, 2000)

Rabinbach, A. (ed.). *The Austrian Socialist Experiment* (Boulder: Westview, 1985)

Robertson, R., and E. Timms (eds.). *The Habsburg Legac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4)

Singer, P. *Pushing Time Awa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3)

Snowman, D. *The Hitler Emigrés* (London: Chatto & Windus, 2002)

Spiel, H. *Vienna's Golden Autumn*, 1866—1938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7)

Stadler, F. *The Vienna Circle* (New York: Springer, 2001)

Stadler, K. *Austria* (Praeger: New York, 1971)

Steiner, K., F. Fellner and H. Feichtlbauer (eds.). *Modern Austria* (Palo Alto: SPOSS, 1981)

Steininger, R., G. Bischof and M. Gehler (eds.). *Austri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2002)

Sully, M. A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Austria* (London: Routledge, 1990)

Vansant, J. *Reclaiming Heimat: Trauma and Mourning in Memoirs by Jewish Austrian Reé migré s*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Waldheim, K. *The Austrian Example*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3)

Wright, W. E. (ed.). *Austria since* 1945 (Minneapolis: Center for Austrian Studies, 1982)

索　引

（文中所标页码为原书页码）

B

C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Y

Z

书名=奥地利史
作者=史蒂芬·贝莱尔著
页码=340
ISBN=
SS号=12428821
dxNumber=000006810768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定价：